

审定

EA77/15
郭代荣 全绪启
陈明诰 陈保全

政协第八届阳谷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成员名单

主	任	陈明诰		
副	主	任	李印元	张学峰 张万知
委	员	刘振岱	段延世	郭炳庆

特邀编辑 王泽文 崔存英

做好文史工作，功在

当代，师被后世。

徐淑满

—一九八·十—

研究地方文史

服务家乡建设

张同村
共
年
月

中共阳谷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同村题词

存史資政

鑒往知來

郭代榮

阳谷县政协主席 郭代荣题词

鏡替鏡失
為興為得
史知人知
以可以可
陳明誥

阳谷县政协副主席 陈明诒题词

前 言

郭代荣

文史资料是政协富有特色的一项工作，它以当代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方式来记录和反映历史，不仅可以存史、资政，还可以育人。

自 1980 年我县政协恢复工作以来，在县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届政协领导的关怀指导下，我县文史征集史料 600 余篇，270 万字，编发了油印本《阳谷文史资料》1—21 辑，出版了《阳谷文史资料 1—20 辑选编》、《刘琰诗文校注》、《王伦起义史料》、《阎锡山军閥揭秘》、《汤显祖与阳谷七级》等百余万字的图书资料。但由于人员、经费等因素的影响，尚有近百万字的有价值的史料等待整理、出版。这些资料倾注了一大批老文史员们的心血，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人物等各方面。

李瑞环主席在 1998 年 5 月 6 日听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汇报后明确指出：“征集到文史资料后，不能把它束之高阁，而要充分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年轻一代更深刻地了解

过去，珍惜现在，面向未来。这应当成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重要任务。”我们整理、编辑这本《阳谷文史集刊》，正好符合李瑞环主席的讲话精神，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提高阳谷知名度，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近几年来，随着一大批老文史员的相继谢世，建国初期乃至文革期间史料的征集工作已迫在眉睫，如不抓紧时间，人去史亡的现象将会继续发生。为此，今后我县文史工作要在继续征集建国前史料的同时，把重点转向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并专题出版，进一步加快文史工作的节奏和步伐。

目 录

前言	郭代荣 (1)
阳谷战役	潘 焱 (1)
怀念胞兄涂世祺	何 挺 (5)
浦师千古 ——缅怀原贵州省委书记、 顾委会副主任申云浦同志	冯之琨 (8)
鲁西“肃托”受害纪实	冯之琨 (16)
“七大”前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	徐运北 (24)
扑不灭的火焰 ——省立八乡师党组织活动片断...	王洪祺 (30)
两次特殊任务	冯之琨 (39)
我对阳谷抗日期间一些情况的回忆	段延世 (43)
阳谷县抗日战争片断回忆	李程九 (74)
我的经历	李程九 (106)
对关于李程九同志材料的更正	段延世 (113)
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作情况的回忆	周金铸 (118)
关于抗日时期农民负担政策的回忆	李培现 (133)
1946 年参加阳谷县土地改革工作队的回忆	崔衍双 (139)
周子厚烈士传略	崔衍双 周金铭 (144)
侯继荣同志传略	杨绍英 (154)

红岩英烈冯鸿珊	王泽文整理	(156)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哈利生	王泽文整理	(161)
志愿军“活烈士”李玉安	盛星辉	(164)
坡里暴动前的韩建德、曹万年	杨绍英	(170)
丁团、王团收编始末	訾蔚林口述 郑清铭整理	(177)
丁振声先生抗战事略	赵景尹	(184)
回忆青山港阻击战	王树功	(186)
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见闻	李建白	(188)
宋长胜攻打阳谷县城	杨元璐	(194)
薛传峰	郑清铭整理	(199)
王佃臣其人其事	赵凤臣口述 刘子长整理	(201)
陈二杠子	段延平 段延世	(204)
关门口黄沙会暴动事件	周金铸	(207)
难忘的一年	李维勤口述 李道达整理	(210)
痛苦的回忆	李朝选口述 李道达整理	(215)
清末民初阳谷教育点滴	李玉法 高澄波	(218)
国民党统治时期阳谷教育点滴	李玉法 高澄波	(225)
阳谷县不同时期的教育情况	李玉法 高澄波	(230)
解放前阳谷六处县立高小	李玉法	(233)
阳谷县立第三高小始末	陈赞臣	(235)
阳谷县立第五高小始末	王印传口述 李道达整理	(240)
杨万选办学	杨元璐	(246)
毛文衡先生传略	李玉法	(249)

武仲景同志传略	李玉法	(251)
孙膑拳传人杨廷岳、杨廷栋	郑清铭整理	(254)
杨明斋与青岛武术	王第荣	(258)
拳师杨明斋与国技学社	徐自良	(264)
武术名家杨明斋	李成银	(266)
孙膑拳的创编和分布流传	李成银	(267)
孙膑拳的传承、拳理和手法	李成银	(269)
齐鲁旧闻缀记	李玉法等	(274)
阳谷旧闻随笔	李玉法等	(297)
鲜为人知的去思碑	段延平 段延世	(317)
“胡万岭发丧——不是小闹”的来历	杨元一	(320)
胡万岭发丧不是小乾坤	陈清林	(324)
阳谷人物琐记	李玉法	(325)
武朝聘	刘子长	(337)
先祖父杨公子青志略	杨元璐	(340)
三个录事长	李子厚	(343)
回忆田济川老师	李子厚	(345)
王常昭	王桂岭	(347)
《困学丛著》及其作者王常昭	李印元	(349)
记吾父申集磐先生二三事	申仲铭	(351)
熊观民诗词三首		(355)
忆张稷臣老先生	吕岩升	(359)
怀念杨沛如先生	刘彦民	(361)

挥泪话当年	王影侠 (369)
一门父子 济南名医	田道正 (377)
我记忆中的二哥杨志宏	杨玉琴 (383)
解放后第一次战胜黄河特大洪峰 高凤歧口述 刘子长整理	(388)
毛泽东对阳谷县石门宋农业生产合作社养猪的 批示记述	史乃奇 (390)
刘少奇 1958 年视察聊城地区	史乃奇 (392)
摄影师：威廉·史密斯	施吉利 宋家珩 (395)
威廉·史密斯和他的中国老照片	宋家珩 (400)
田耕莘	台湾《传记文学》(404)
田耕莘：故乡、童年	杨传亮 (406)
坡里庄及其开教史	杨传亮 (410)
宗教与文化教育	田耕莘口述 赵雅博笔记 (414)
世界名人田耕莘枢机主教	李炳耀 (420)
我和田耕莘认识的回忆	王社光 (424)
山东阳谷县坡里天主教堂之由来	李炳耀 (426)
天主教及阳谷教区概况	李炳耀 (430)
“真福圣人”福若瑟神父	李炳耀 (431)
田耕莘	雷镇闾 (433)
阳谷县内的清真寺	吕岩升 (436)
陈阿匄口传的“清真十夸”	吕岩升 (438)

阳谷城隍庙·东关泰山行宫·慈氏寺

- 李子厚口述 刘子长整理 (440)
- 杨陆寺 刘子长 (445)
- 妈妈社 刘子长 (447)
- 寿张旧时寺庙 《寿张县志》(449)
- 七级镇的庙宇 田明远 (453)
- 张秋的祠庙和古会..... 《张秋镇志》编写组 (455)

- 阳谷四大镇 《阳谷县志》(457)
- 运河名镇张秋 张万知 王文岩 (463)
- 明清时期的张秋镇 官美堞 (470)
- 张秋道情 张邦振 (480)

- 经传释地 王传明 (482)
- 阳谷县姓氏村分布概略 王苓忠 侯继朝 (493)
- 孙膑故里之谜 ——兼与韩馥绶同志商榷
..... 王苓忠 侯继朝 (497)

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勘探发掘纪实

- 陈昆麟 孙淮生 (507)
- 山东阳谷县关庄唐代石塔 刘善沂 孙淮生 (514)
- 新出土的吴澄墓志铭 李印元 (518)

- 迷魂阵与迷魂汤 ——阳谷县史迹及乡味小考 ... 李志刚 (527)
- 《金瓶梅》与阳谷饮食趣谈..... 李志刚 (529)

- 宁家仓看花记 孔广沐 (541)

邓楼喇叭	李道达整理 (543)
民间丧葬礼俗	张兆月 (546)
独具一格的鲁西祭祖风俗：十周之庆， 二十周年庆贺	张兆月 (550)
轶事二则	张邦振 (552)
魔术师戏耍袁世凯	杨元璐 (557)
《四库全书》内收录的阳谷人著作	石业华 (560)
阳谷方志述略	王桂云 (564)
马之骥与《〔康熙〕重修张秋志》	王桂云 (572)
谈阳谷县志的几个旧存本	李印元 (574)
遭遇孙膑	张辉 (578)
《型世言》第二十三回之本事及明代诗家 殷云霄其人	王传明 (590)
刘琰生平著作年表	李印元 (603)
关于刘琰任太子老师问题	李印元 (609)
《一七七四年山东王伦起义》导言	(美) 韩书瑞 (611)
一七七四年王伦起义的教派	(美) 韩书瑞 (617)
阳谷历史上的知县	李印元 (639)
你，走了 ——痛悼李印逵兄	王传华 (646)
关于几本书的更正	编者 (647)
后记	编者 (651)

阳谷战役

潘 焱

1945年7月，我冀鲁豫军区为贯彻党的“七大”路线，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于16日下达了组织阳谷战役的命令。我八军分区部队，以五、六、七团及分区地方武装和军分区九二步兵炮连以及九军分区炮兵连为攻城部队，军区骑兵团、特务团及其他有关的军分区为打援的部队。军分区的同志通知我回分区参加攻阳谷城的战役。我是军分区参谋长兼随营学校副校长，学校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规，还有许多事要做，真有些离不开。但作战事大，我将学校的工作做了交待安排，马上赶赴阳谷。

我于20日赶到阳谷城东南角的张楼，这是军分区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见到了段君毅政委、万里副政委，他俩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三人分工在指挥所，曾思玉司令员到第一梯队阵地去了，我们共同负责指挥全盘，先让司令部的作战股长向你讲讲攻城部署吧！”

分区的攻城部署是：以七团配属濮县、范县基干大队，为第一梯队，归团长温先星、政委戚先初指挥，争取以偷袭突破城墙，同时，准备如果偷袭不成以强攻突破阳谷城，歼灭伪治安军第九团。

五、六团配属寿张县基干大队，由曾长柏团长、赵欲樵（军分区组织科长）指挥，先歼灭阳谷城南关伪军会道门，为二梯队，尔后配合第一梯队攻城，入城后歼灭张秋、阳谷县伪军和伪县政

府。

以基干团为第三梯队，由傅学阶团长、李彬政委指挥，在西门配合第一、二梯队攻城，突入城后歼灭朝城伪军和伪县政府。

九军分区炮兵，归我军分区直接指挥。任务是支援七团从东门攻城。我军分区之特务连、公安连为预备队。

朝城基干大队由邢大队长、徐政委率领围困王子仪治安军据点，相机攻取之，并与一军分区打援部队取得密切联系。

军分区后勤处长朱荃卿同志和专署副专员统一负责政治部的工作，转运站设在三十里铺。

组织城防司令部，由何光宇任司令、范阳春任政委，负责城防事宜。

我分区指挥所位置第一步在张楼，第二步前移到东关。

阳谷城城墙由石头垒成，高约10米，有护城河，城墙外有两道外壕，一道鹿砦，城墙设有三层火力，墙上设有碉堡，中层有火力点，城墙下有暗堡，城墙各突击部设有侧射火力点，城门楼及四角有堡垒，形成支撑点。大城内有小城，在大城内西北角，构筑有较坚固的核心围寨，围寨四周的民房已被拆除，围墙高，四角设有高碉堡，固守城垣之敌每人担负5米地段，阳谷城面积约12平方公里，总兵力约2500人。

守城的主要兵力系原北洋军阀、大汉奸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部第九团。该敌武器装备优良，待遇高，人称“二鬼子”，有一定的战斗力，第九团团长张育焕曾任第三营营长，固守张秋镇时与我部战斗过，善守卫碉堡据点，不善野外作战。

阳谷城内还驻有伪军张秋镇、朝城、莘县、阳谷县大队和伪政府，战斗士气低落。

21日对阳谷城开始总政击，第一次攻击突出队受挫，重新准备第二次攻击。24日，突击部队一举攻击登城突破城垣成功，主攻、助攻部队突破城墙，各自按照任务区分，向纵深发展。指挥

所将情况报告军区后，杨勇副司令员高兴地说：“望你们迅速扩大战果，彻底消灭敌人，解放阳谷城！”

25日，攻城部队包围歼灭了伪军伪县政府后，经过周密的组织勘察，仔细地察看治安军固守的小围寨的工事、兵力布置的情况，深夜对治安军展开疲劳战术，对核心工事实施佯攻，使守敌惊恐不安，军心动摇。

26日拂晓，分区特务连，七团、六团各一个连，对治安军核心据点围寨实施总攻击。七团一营三连趁炮火和炸药爆炸的烟幕，勇猛攻击，一举突破治安军核心阵地围寨据点，占领了敌人大院内的大楼，敌人无法招架，即龟缩固守核心碉堡，企图死守待援。此时五连攻到院内，同治安军短兵相接，进行白刃搏斗。三连连长王金山同志端着机枪向反扑的敌人横扫，杀得敌死伤成堆。王金山连长壮烈牺牲，更激起了指战员为烈士报仇的决心。

同志们奋勇冲杀，一直打到伪治安军九团团长张育焕固守的碉堡，作恶多端的张育焕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残敌纷纷夺路向西北突围，遭我预先布置好打突围和追歼部队全歼。这就是死心踏地汉奸的可耻下场！26日上午，阳谷战役胜利结束。

老百姓奔走相告：“八路军解放了阳谷城！阳谷、寿张、莘县、朝城4个县的汉奸队、伪县政府、二鬼子治安军被一网打尽，八路军为人民群众报了仇。”

近两天来，阳谷、寿张、张秋、莘县大小村老百姓男女老少敲锣打鼓，人民群众吃饺子庆祝阳谷城解放。还有的群众从几十里路外的地方，给子弟兵八路军送慰问品，有手提的、肩挑的、人抬、小车推、大车拉的，瓜类、猪肉、羊肉、蔬菜、粉条、鸡蛋、烧鸡等应有尽有。人们喜笑颜开，扬眉吐气！阳谷城周围的老百姓扛着铁锹锄（镢？）头，踊跃来到城墙上，夜以继日地平毁阳谷城垣碉堡工事。

经历了6天的阳谷战役，歼灭治安军第九团、4个县的伪军伪

政府，毙伤敌近千人，俘虏 2000 余人，活捉伪县长 4 人。缴获轻重机枪 50 余挺、步枪 1600 余支、迫击炮、掷弹筒、汽车和弹药、粮食等胜利品。

在阳谷城 6 个昼夜的作战，各参战部队打得勇敢顽强，我军共伤亡 500 余人，七团一营营长黄世友、三营营长李华中、基干团政治处主任黎波等军政干部 15 人英勇牺牲。烈士们为了阳谷解放将热血洒在鲁西北古城阳谷，终于取得了阳谷战役胜利。除掉了敌人所谓的中心据点，粉碎了封建势力的堡垒，使我一、七、八军分区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我军力量，改善了装备，为我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阳谷战役结束后，我未来得及参加战役总结，就告别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赶返濮阳县柳下屯随营学校，继续这里的工作。

（节选自潘焱著《十五个春秋》一书“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章，红旗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潘焱，河南新县人，1929 年参加红军。离休前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阳谷战役时任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副校长、第二军分区参谋长。）

怀念胞兄涂世祺

何 挺

那是1938年的春天，抗日的烽火燃烧在鲁西平原。我的胞兄涂世廪毅然送我去抗战移动剧团当了一名宣传员。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少年。临别时，哥哥一再嘱咐我：“不要孩子气，不要哭。到祖国需要的地方，抗战不分男女老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要服从领导，多向同志们学习，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万没有料到，这次的分别竟成了永别。光阴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哥哥的临别赠言我仍记忆犹新。

我的哥哥于1912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一个中医家庭里。中学毕业后就跟祖父学中医，学经营药店。那时，国民党政政府腐败无能，官僚、地主对人民进行剥削压榨，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哥哥满怀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药店做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申云浦等同志来镇上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启迪和教育下，我哥哥逐步走上了革命的光明大道。

1934年，哥哥加入了申云浦同志组织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从此，祖父的涂庆德药店就成了党的一个秘密工作联络站，哥哥也就成了一名联络员，在党的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开展工作。当时祖父是个救死扶伤、济贫之人，在当地享有盛名。凭着他老人家的威望，再加上药店来往人多，便于掩护，同志们乔装打扮，频繁出入药店，秘密开展工作。哥哥经常东奔西走深夜而归。当时党的工作还处于保密的情况下，他们具体干些什么家人并不知道，

只知道他们都是为了穷人的翻身而斗争的人。他们以办俱乐部为名唱唱京戏，拉拉胡琴，把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有时又以打牌为名围坐在油灯下通宵达旦地研究工作。镇长刘振南也参加了俱乐部的活动。这就更便于掩护和探听敌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教育熏陶下，我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他们开会时我就成了义务“小哨兵”。七七事变后，这个俱乐部成了党在镇上的宣传机构，撒传单，贴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曾记得县委的徐翼同志也来我家与哥哥共商筹建游击队的事。他们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弄些枪支来，让母亲藏起来，过几天又拿走了，母亲也成了他们的义务保管员。那时的阿城镇还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虽然打着国共合作的招牌，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监视、阻挠破坏我党的抗日工作。记得一个深冬的夜晚，大雪纷飞，我猛然被一阵争吵声和嫂子的啼哭声惊醒了。原来是国民党的警察又来搜查了。不一会儿哥哥被警察五花大绑推倒在母亲的面前。母亲很是害怕，而哥哥镇静地对母亲说：“妈，不要怕，我干的是抗日救国的事，光明正大，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油灯下晃动着黑狗子们的狰狞嘴脸，他们恶狠狠地对母亲说：“你儿子是共产党，快把枪交出来。”说完，先把屋子里的箱箱柜柜翻了个底朝天，接着又来搜查我睡的床。母亲也沉着地说：“我的小女儿病了正在出汗。”我会意地呻吟了两声。他们见搜不到枪，就把屋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哥哥被他们拳打脚踢，脸上流着鲜血，最后被带走了。而枪还在我睡的席后边，后怕使我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夜里同志们安全地把枪转移走了。父亲这才东奔西走，四处托人送礼搭救哥哥出了虎口。哥哥回到家里伤还未好，就又和同志们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哥哥在斗争中成长起来，193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党开辟根据地就把他调出来工作，后来被任命为阳谷县二区区长。他的工作更加积极努力，对敌斗争坚决勇敢，发动群众建设敌后

根据地，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日夜奔忙。正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1941年鲁西“肃托”运动中，一顶莫须有的“托派”帽子紧紧地扣在了我哥哥的头上，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哥哥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年华。他短短的一生，出生入死，不愧为一名人民的勤务员，党的好儿子。哥哥离世后，战争更加残酷，为了防止敌人对抗战家属的迫害，我的名字改为何挺。

建国以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逐渐真相大白。党组织给死者昭雪平反的时候，我找了申云浦、万晓塘等一些老的领导同志（万晓塘是当时的公安处处长，后是天津市第一书记，他对案情最清楚），由他们向省委写证明材料，证明涂世廪的历史和工作情况，并称他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于1963年由山东省委组织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每当我回故乡阳谷县烈士陵园瞻仰哥哥和烈士们的英灵时，总是不由得热泪盈眶、思绪万千。先烈们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开拓前进。

（原载《山东党史》1998年第6期，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何挺，原名涂月英，阳谷县阿城镇人，潘焱同志爱人，在国家海洋局工作。）

浦师千古

——缅怀原贵州省委副书记、顾委会副主任申云浦同志

冯之琨

申云浦同志在贵阳去世已经5年了。因为我远在重庆，又因他临终留言不通知省外好友和同志们，所以，当时没得知噩耗，而后见到《人民日报》刊载的讣告才知道的。顿时，我悲痛万分。面对近20年他写给我的七封情真意切关怀和勉励我的信，忆往昔教诲之情，使我思绪万千。半年前听从贵阳来的同志说，他患的肺心病，病情已十分严重，虽然他在医院靠吸氧维持生活，而且仍然抱以“生命不息，奋斗不息”（他生前誓言）的毅力，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同时念念不忘工作。特别是他退入二线后，热心倡办的省老年大学和原冀鲁豫边区党史的工作。然而，此刻生命已经濒临垂危了，他还叫秘书给我写信，鼓励我写些东西（本集的书名就是他那次书写的遗墨），并且要求我保持一个青春的晚年，要求我说：“桑榆未晚，要奋进不息啊。”我是1985年去探望了他，不料那竟是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谈晤了。他临终前没有再见他一面，实在愧疚。

申老曾是我的师长，自1937年冬，我参加革命活动后，至四十年代中，又都是我工作中的直接和间接（地区上层领导）的领导。是在他教导、培养和领导下，我成长起来进行工作的。至今，斯人已逝，我也是老年了。可是，申老行状风范，仍存我心中，永不磨灭。

英姿洒脱 畅谈英雄

1936年，申老只有20多岁，被我就读的简师校长、他的朋友李鸣陆先生聘来作预备班和我们师范年级历史课临时教员。他身影干练，英姿洒脱，而言谈举动似一团火般对待同学。在课堂上讲时势造英雄的故事。如荆轲刺秦王别燕太子丹时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吟唱得有声有色，感人肺腑。还讲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英雄人物和我们故乡传诵的红头反（太平军）、黑头反（宋景诗）和长毛反（捻军）的业迹。他问道：“你们能做这样的人吗？”我们高声地回答：“能！”还有他的同学朱保明也来校代过课，他和申老同样受我们欢迎，给我们的感染力同样大。不久，他们走了，我们都思念他俩。当时，我和几位同学就暗暗地猜想他俩准是共产党，而且为之庆幸。他到学校教课时，他的朋友武子升、王筱湖常来会他。同时他们都是李校长的朋友。之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也都是我今后做人的榜样。

挺身而出开门 急忙赴聊报告情况

1937年冬，申老担任中共阳谷县工委书记，组织、领导聊城（中共鲁西特委机关驻地）派来阳谷的服务员徐明、黄主一、徐翼等同志，举办阳谷县政治人员训练班，培养干部。我这时也在这里一边参加学习，同时一边办县抗日青年写作会。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突然听到城里西街枪声大作，说是土匪攻进城里来了。训练班的一百多人正在不知所措，又听到土匪砸训练班的大门。这天申老正在这里住宿，他毅然挺身而出说：“我去开门交涉，说明这是学校，不准这些人进来。”他刚到门里，土匪就把校门踹开了。

进来的土匪一见他就朝他“砰”的开了一枪，并且喊道：“小舅子快把枪拿出来！”幸亏这一枪没打中他。于是他对进来的人说：“我们是学校，都是学生、教师，没有枪。”正说着，又进来一个人，迎面称他“二叔”，并且说：“我是李钟洪。”原来这人是申老同村的人。随之，这个人才把他在混乱中送出城去。申老出城后心急如焚地赶赴聊城向政治部（特委机关）和范筑先司令部报告阳谷县城被土匪攻陷的情况，到聊城见到中共山东代表张霖之和范筑先总司令。范筑先总司令立即决定亲自带兵去阳谷，包围了被土匪占领的阳谷城，并令匪首布永言送出我方人员、枪枝和其他物资，接受无条件投降受编。经谈判，布永言受编。申老随部队回到城内。之后，又去城东北乡开展党的工作。

鲁西受命 开辟聊、阳、阿边沿区

1939年春，中共鲁西党委决定开辟运河东西两畔地区的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在这以前，阳谷县城被土匪进占，在国民党顽固派挑拨下，范筑先撤掉了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徐茂里的县长，换上顽固派方面的人——张维庠，抗日政权变质，我党派在县政权的人员被排挤出来。申云浦同志领导县工委到县城东北的农村开展党的活动。如在城北的王营一带夺取乡、区政权。特别是在东北孟尝乡一带，利用原已建立的抗日乡政府，经常在这里和区委的同志研究工作。这里是聊城、阳谷、东阿三县边沿地区，地处运河东西两畔，南北上下数十里方圆。顽固派地方政府对这里的控制薄弱，我党的工作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于是县（工）委就确定这里为党的活动中心地点。不久申云浦同志调鲁西特委任宣传部长，还时常回到这里指导党的工作。聊城失守后，1939年初春，他奉命组建鲁西二地委，任书记。他和军事部长徐翼同志每人携带一把匣枪赴任了。这个地委辖濮、范、观、寿张、阳谷、东

阿、聊城等七个县。地委起初驻寿张、范县边沿区，开展活动，统一领导几个县党的工作。之后，115师罗荣桓政委在东平湖西畔小安山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号召在平原地区开拓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为此，申云浦书记率领地委各部长及机关人员北上，到阳谷孟尝乡公所所在地——后刘湾住下。利用这里有我党掌握的乡政权为掩护的有利条件，地委便于开展党的活动。这时地委除了一方面全面领导所属各县党的工作外，另一方面，重点是开辟聊（城）、阳（谷）、阿（东阿）边沿区抗日局面，以便西南和冠馆中心区，东面和泰肥中心区连结成一片，扩大我抗日中心区。申云浦书记和王子光组织部长、徐冀军事部长、黑百里宣传部长一起和聊城县委书记孙寒光、阳谷县委书记王伯锦、姚修文、东阿县委书记苏民、寿张的唐香亭等同志携手工作。在半年时间里，在边沿区上百个自然村建立了党支部或小组；分别建立了聊城、阳谷、东阿三个县的抗日民主县政府和下属各区、乡政权；从几个人、枪开始，拉起700余人枪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东纵第四大队和各县武装，如运东大队、谷山大队、聊城、东阿县基干大队等人民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数十次与敌伪作战，杀伤、消灭大量敌人；三县边沿区的村庄里普遍地建立了青抗先、自卫队和各级骨干武装小分队；坚持了反摩擦、反顽固派，发动群众配合主力部队第一次讨伐了石友三的十军团一部；进行了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了白凤仪、周云章、冯鲁民、申集磐、张郁文、刘镇南等地方开明人士，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这样，于1939年底，在聊、阳、阿三县边沿区数百个村庄，方圆近百里，基本形成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达到了西联冠馆、东接太肥抗日中心，扩大根据地的目的。

申云浦书记在鲁西二地委工作的十个多月里，不辞劳苦，东西南北地奔走，和徐冀、王子光部长跨过运河，渡过黄河，往返所辖几个县境，和有关县的基层同志一起，开展党的工作。特别

是拉四大队和分化“忠孝团”的工作中，他和徐翼深入老党员家里和冒风险走访会道门头头，跟他们交谈，宣传党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许多次是由我陪同去进行工作的。他对人的诚恳，善于宣传鼓动的口才，深入浅出的道理，说动人心，使对方十分信服。他与地方上上点年纪的民主人士结为忘年之交，他们称他是“了不起的才子”。他一身短打扮，穿着俭朴，生活也节俭。我们地委机关平常只吃玉米饽饽、白菜、豆腐。而他外出工作便是食无定时，孟尝乡的冯鲁民乡长看着他的生活艰苦，有时请他去吃饭，给他改善下生活。而他却以苦为乐，特别是在东阿赵寺开办小兵工厂造手榴弹和修枪时，为了节约公费，把做棉衣的钱也用进去了。到了十月，他还没穿上棉衣。可巧，在敌人扫荡中，小工厂又被敌人破坏了。他却风趣地说：“鸡飞蛋打了，我们再从头来，棉衣穿不上，就给天斗吧。”他那时又黑又瘦，长一辈的人都称他“黑景玮”（他原名叫申景玮）。他在地委机关对我们说：“我们二地委的地形，是两头大，中间细，像弹棉花的木槌子。我们就是弹花人，可要给党和人民弹好棉花，做好工作啊！”他的比喻十分恰当生动和鼓舞人心。

坚定地否定鲁西“肃托” 坚持平反冤假错案

1939年11月，申云浦同志调运西地委书记。就在这一年，在鲁西地区的首脑机关——主署和区党委机关掀起“肃托”运动，中共山东分局特派员高明宇来鲁西，在区党委主要成员相继去太行整风之际，不通过党的组织，错误地在主署、区党委以及有关地区机关大肆捕人，并进行逼供信。于是很快酿成特大案件。不久，申云浦调区党委宣传部任副部长，随后又去太行整风。回来后，他察觉到许多同志中，包括他熟知的干部和他曾多年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也被诬为“托匪”被捕了，这使他十分气愤。但他

知道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解决问题就较难了。立即建议区党委书记严令停止继续抓人，停止“肃托”。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对高明宇的做法也表示愤怒，于是高明宇随之返回山东分局了。申云浦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孙光同志旗帜鲜明地否定这次“肃托”运动。他俩和有些领导认为：鲁西“肃托”案是一大冤假错案，不是什么只是扩大化了和工作中的缺点问题，应尽快解决受害同志的问题，全面否定这次“肃托”。同时，他积极地帮助和关心有关受害同志解决问题。有些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才解决了问题，摘掉了“托匪”帽子，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他对有的同志，虽然十分关心，但由于当时环境战争关系，不在一地，有的已下落不明，一时难以联系，但他十分挂念他们。其中我个人就是一个。直至1946年他任运东地委书记，专程到阳谷我工作的地方找到我，催促我尽快写完申诉书，送到地委组织部，以便审办解决问题。之后，等我的问题解决了，他还致函给我，表示他的祝贺。同时，他告知我，对他十分了解的六位被错误杀害的同志表示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山东省委正式批准对原鲁西肃托案的审查结论：“……鲁西肃托是一大冤假错案。……全案全结，予以彻底平反。”事实证明，申云浦同志一向坚持的应予平反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这在当时在位还在负责的领导同志中，如他和孙光同志坚持对鲁西“肃托”的正确态度还是不多的。在这之前，他还表示：凡是在鲁西被错误对待的同志，有问题皆可找他解决。因为这时领导人如张霖之、万晓棠等都去世了。只有他、孙光和徐运北等同志了解当时错误发生的原委。他这种关怀革命同志、关怀革命事业和革命队伍中遭受错误对待者的精神，多么可贵，多么叫人感动啊！

身处逆境不怯 革命斗志不变

1954年，在他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第二

年，错误地受到行政撤职降级及党内处分，被下放到安顺京山农场当副场长。而他仍精神抖擞，工作勤奋，毫不自怯。他对老同志说：“某某中央领导问申云浦是什么人？什么出身的？”又说：“那好，就查吧！我是贫农出身，16岁就参加革命活动，1932年入党，从未脱离革命工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处分你？”他答：“那个一把手怕我当第一把手，老实说，我没有这种野心。说我有个人主义，到底看谁有个人主义吧！”他在农场劳动、工作，天天去游泳，晒得黑黑的，一身正气，气宇昂扬。“文革”时期又受到迫害，下放当了工人。1979年才得平反，恢复了原职务和行政八级工资待遇，出任贵州省副省长。这期间，贵州经济工作难搞，其他领导都畏惧分管财经工作，而他却自告奋勇地分管经济工作，立志振兴贵州。之后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省顾委副主任，1986年退入二线。

热心党史工作 兴办老年继续教育

申老年逾七十，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后期转为肺心病，住进了医院。但他并不等闲，仍然倡办贵州老年大学，并任校长，为退下的老同志创造继续学习的机会。此外，他更重视原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征集、编撰工作，担任原边区党史办副主任，徐运北任主任，办公室设在山东济南，他带病赴济参加会议，组织领导和推动工作。他还兼任党史文艺组长，组织作家规划填补反映原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实的电影文学和其他文艺作品的空白状况。这时他的病已十分严重，于是他宣告“生命不息，奋斗不息”的誓言，决心鞠躬尽瘁。这种无畏的革命精神实在感人肺腑。

贵州人民缅怀他 老同志们思念他

1985年我去贵阳时曾去会见他，我俩见面后，他和我欢叙往事，不觉间竟过了两个多小时，而且他忘了料理女婿急症住院的事。不想这次竟是最后一次和他会面了。

在他逝世后，我在1995年去贵州，贵州的老同志谈起申老来都对他怀念不已。贵阳市机关的老同志们为他曾遭受迫害而痛心，为他的逝世感到悲痛。他们说：“申书记在职时没有官架子，平等热忱待人，对老百姓也是这样，他是一个不多见的好领导。”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一位富有才华、早在1923年入党、经历了近60年革命历程的革命活动家，一位党的宣传鼓动家，党史和老年继续教育事业家，过早地去世了，葬在他被下放劳动的京山农场。然而，他为人民工作的业绩和他的人品风范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1995年元月2日于重庆家中

（原载肖吾著《大运河丛集·第一卷》，1998年6月印刷。冯之琨，笔名肖吾，阳谷县七级镇后刘湾人。1920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四十年代后期曾任阳谷县政府教育科长，1949年随军南下在大西南工作。任西南工业管理学校书记兼校长，调重庆工业管理学院顾问，1983年离休。）

鲁西“肃托”受害纪实

冯之琨

受害前的一段情况

1940年4月初，我被原鲁西二地委书记、已调任运西地委任书记的申云浦同志指名，自阳谷县委调到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主任肖华，是名誉职务，副主任董君毅，实际上领导日常工作）工作。我到鲁西区党委临时工作了半月，就由区党委组织部长孙光同志分配来主署秘书油印科报到了。在区党委暂时帮助工作时，我曾提出要求到新闻学习班学习，因我读师范时就曾接受过济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函授课程，对它有兴趣，也想搞业余以至想作专业新闻工作。当时孙光部长说：“现在主署刚成立，十分缺乏人手，需要一批工作人员充实机关。你是云浦同志提名调来的，先去主署工作，以后有机会再来学新闻工作，我可以告诉他们你的意见。”就这样，我到主署油印科工作了一段后，又将我的意见反映了，主署周秘书主任不答应我离开。我去找云浦同志，而他和孙光同志已去太行参加整风学习去了。于是，我心中闷闷不乐，情绪不安定，工作不安心。而且自己又有点傲慢，对女科长不太尊重。为此，受到周持恒主任的批评。之后我注意改正了一点。但由于工作机械呆板，心里感到有些苦闷。不久，主署编印机关内部刊物《生活周刊》，并确定由我负责编辑和印刷。我对此很高兴，立即开始了工作。连续出了三期，反映较好。一些处长、同志们表示

了我对我工作的赞扬。但是，由于我在该刊上写了揭露官僚主义作风的两篇短文《一种人的高贵化》和《两种人，两种态度》，却遭到不同的反映。个别人认为是讽刺挖苦，他们不高兴了。后来听说，还有人认为我别有用心，不怀善意。而我没有为这种不同反映所影响，也没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意见，仍然是一边作科里的工作，一边忙着编印周刊，因而在9月间累病，患了重感冒，被送进后方医院。经半月治疗，稍有好转，但是仍不能下床行走。

被诱骗入狱

在我病情稍有好转，但仍不能下床行走的时候，主署机关总支书记晓光同志来到医院，对我说是需要转院疗养，我表示服从。可是当天，治疗医生对我说他不同意，他让我在此继续治疗，因为我仍然有低烧未退。第二天，这位医生对我说：“田同志（那时我叫田光），你们单位的来人坚持要你转院，我阻止不了。只好给你打了针，再带上些药，由他带你去别处疗养了。”他还说：“来人已找了民夫用小车把你推着走，也不叫我们护送你去。”这位医生表示无可奈何，心情不悦地和我告别了。

深秋天气，有些凉了。但因我发着低烧，坐在民夫同志推的小车上也不感到寒冷。晓光乘马或前或后地跟着走。我也没有问他到什么医院去。一直东行，下午两点多钟的样子，到一处驻军住地停了下来。谁知这是344旅的除奸股驻地，原来晓光把我送到除奸股来了。股长王青山向我宣布：“田光，你要交待问题，只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还是可以回去的。”晓光这时也对我说：“你最近参加了什么组织，有什么活动，希望你讲出来，才能回去。”他说后就不见他了。这样，他算是完成了诱捕我的任务。

被诬为“托匪”

这个看守地点是 344 旅除奸股管的，我被送进时，已关了十多人，全是男性，我一个也不认识。之后知道他们是分别从区党委机关，濮、范、观中心区的县和其他地区逮捕押送来的，没有军队的人，全是地方的干部，都是比较负责的领导者，他们年纪在 30 左右至 40 岁，只有我才刚刚 20 岁，有的已经挨过吊打、逼供讯。我被押进看守处的这间屋子之前，在王青山办公室，王已恶狠狠地对我说：“毕睿夫是你们的头子，他是托匪，已供了你，你还不承认。想不到你才 20 岁，就这么顽固不化。”这时，我才知道晓光诱捕的原因。原来主署发生了肃清托匪运动，毕睿夫（主署总务处长）是头子，诬供了我。我实在意外。使我痛心的是：主署的党组怎么这样偏信？我没有听说过主署机关有托匪活动，而且也不知道毕是托匪头子。毕是总务处长，我和他都在一个大机关，常常见面，只是打个照面，虽然他曾于 1938 年在聊城政干校当过大队长，我是其中一个中队的学员，只认识他，而没有和他接触或谈过什么。他怎么诬供了我呢？我怀着愤恨进入关押“犯人”的这间看守处后，看到屋子的一角有一个体无完肤、遍体鳞伤、半坐半卧的人，原来就是毕睿夫。我愤怒地质问了他。而他却以微弱的声气说：“田光，我对一不一起一你。”这时，王股长进来说：“别演戏了，你们师徒还装什么！谁不承认就没出路。田光，你要明白。毕睿夫想死，也不算完……”这时我感到有口难辩，无可奈何。听“同犯”们说，毕被拷打得半死时，说出他认识记得的上百个名字，而后他懊悔了，又全部推翻，说“是我胡说的，没有这回事”。他也没有承认自己是托派头子。于是，又被拷打。他回牢房后（原先是单独关着他）感到懊悔，实在对不起别人，就找到一根火柴引火自焚，结果没有烧死，被看守人员

救了火，他就成了这个样子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万分地愤恨他，因为我以为他真是托匪分子，陷害了我和别的同志们。

经常行军，行军时除了我行走无力，只用绳子捆在手臂上和“同犯”们被绑的绳子连在一起。其他的“同犯”被戴上只露眼睛的头罩。毕睿夫已不能走路，用小车推着他。听新进来的“同犯”说，主署机关还有的同志被抓走，关押在别的地方，有的在区党委那边被关押后又送到这里的，我才知道关押人的地方不只是这一处，另外别的地方还有几处。

我和外界联系完全被隔绝了。我不知道主署的同志和我们县里的同志，特别是申云浦同志知道我的情况吗？他们是最了解我的，怎么都不来过问呢？我极度的痛苦、沉思着。王股长逼我坦白反省，我坦白什么？反省什么？我只有反省、检查工作上的不安心等错误。结果他指责我思想顽固，避重就轻。此刻我陷入了困境。我的棉被、手枪、棉鞋等用品被王股长、郭干事没收了。我只穿一件半大衣，一双破了底的鞋，在流动的狱中过了严冬。

刑场示警

王股长为了进一步实施威胁逼供手段，一天，把我们近30个“同犯”拉到一个林子外树林边上的场院坝上，同时也从别的地方押来十几个“同犯”，共有40名左右的“同犯”，其中有女“犯人”。王股长开始训话：“你们有的人不老实交待，顽固不化，今天就是他们的下场。谁要是再顽固抗拒就是死路一条……”他又当场介绍了一个大首长模样的人说：“请高部长（中共山东分局派来鲁西区党委的特派员）训话。”这个高部长讲了大体和王股长差不多内容的话。不过他貌似公允，但语言的诱惑性比王股长还大，其主要目的是诱供、逼供。他还表示：不把鲁西的“托匪”肃清绝不罢休。他要我们“同犯”们认清生死的前途，不要执迷不悟

等等。接着王股长命令拉出来他们要处决的5个顽固不化的“托匪”，在离我眼前不远的地方枪杀了当时我没有认出这5个所谓“托匪”是谁。事后几年才知道其中3位是阳谷的涂世祺、杨诚斋，还有寿张的万开铎。他们都是1936年左右入党，从事地下活动和抗战工作的老同志，这次被错杀了。据说还有几名从延安来的3位女大学生早被杀了（若干年后才被平反）。而后，又把我们十余名“同犯”拉回除奸股的看守所关押。其他的20余名“同犯”，也被拉回他们原被关押的地方去了。

被吊打、指供

王股长一再训斥我顽固，说我避重（不承认是托派）就轻（只检查工作上的问题），不肯老实交待。于是对我施刑了，我被反绑着吊在树干上拷打。同时把半死不活的毕睿夫拉来，半蹲半躺地在地上被问话。郭干事狠狠地用木棍子拷打，我的头骤然像炸了似的沉痛难忍，两眼冒着火星子，背上、身上挨着棍打，我半昏迷过去，也不感觉太痛了。我不能听清楚王股长对毕的问话，好像由王述说我的所谓“罪行”，由毕认定。在我被吊打得昏昏沉沉中，王股长完成了他的指供任务，算是我的罪行。据别的“同犯”说，他们也是经过这样被指供的。我依然被关押着，已经一个多月了。

高部长训话实施精神高压

高明宇部长（山东分局特派员）来视察了，王股长事前告诉了我们，并且要我们谁也不准“翻供”，谁翻案罪上加罪。还说：高部长是上级首长，他是很高明的。他是来看看他办案的成绩的。你们要明白这一点，对你们的处理有好处的等等。这天，高明宇

来了，显示出大干部的作派，坐在椅子上，前面摆着两张条桌对起来的长条案子。叫来我和几个难友训话。他说王股长在这次“肃托”大案中，立了大功（1942年得知王青山犯了严重错误被部队处分，离开部队了），成绩很大，叫我们顾全这个大局。并威胁我们说：“今后谁要翻案，罪加一等，要重重地处理。”于是，他宣布我们有了自由，可以出来吃饭了。这几天王股长也买些菜给我和几个“同犯”吃。并且对我说：“田光，你的被子和手枪被郭干事带走，他调到别的部队去了，不能发还你了，对不起了。”之后，我到寿张集去见了黄明吾同志，他是这次我的“同案犯”。我们又分别回区党委、主署（已合并为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了）时，已是1941年初了。

回到行署，本想向董君毅副主任讲出遭受诬陷的事，但又怕说不清楚，不被信任，反而遭受加重处理。高明宇给我的思想压力太重了，使我思想矛盾极大。幸而，行署机关有原鲁西主署时期的处长，仍继任的几位处长对我依然如故地热情相待。有的处长丝毫不询问我不久前发生的事，像似不知道这回事一样。后来若干年才知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我被诬陷被捕了。有的问我那里去了，还有的认为我请假探家去了呢。我为什么被捕，他们更不愿过问这个事。如方皋当时是鲁西银委的副行长，建国后任中央农行的行长。几十年后，他对我说：“当时我们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你被错捕了。”原来高明宇他们是不通过行政组织而秘密逮捕人的。我回行署后，党总支部书记晓光代表党组织向我宣布：“你被党除名了。”（当时他是这样公布的）还说希望今后能作党外的朋友。从此，我被错误地对待，中断了党的组织。这时我21岁。

行署行政组织分配我到视导室作秘书，经我申明，因无党籍，我已不适宜作这种重要工作，过了一段后才调粮食科工作。我决心忍辱负重，埋头工作，虽然暂遭不白之冤，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这里发生冤案是局部的问题，今后我会有洗清不白之冤机会

的。

有关情况的提供

我知道在受害者中，我认识的有主署机关中的石磊（民政科员，河北省人），张一山（秘书处油印科科员，肥城县人），还有个叫田平的同志。后来听说鲁西北的张策（女）也被错捕，鲁西支队的王唯一、刘家夫也被错捕了。

据云南省委组织部长王镜如谈：高明宇曾发展和组织过社会服务队为社会部的秘密组织，是为社会部秘密服务的。高曾发给王镜如同志表格，邀他参加该组织，他并没填表。王说：鲁西“肃托”是高明宇以省分局特派员身份，乘鲁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张霖之和几位部长去太行整风期间，不通过鲁西区的组织，凌驾当地党组织之上，直接指挥搞起来的。有的地方就启用了他组织的秘密组织社会服务队乱捕乱抓人的。张霖之书记从太行返回区党委后，指责了这种错误行动，指示立即停止抓人、捕人。并说：“谁再乱抓乱捕人，就开除谁的党籍。”（参见段君毅、万里等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但鲁西“肃托”已经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时难澄清了。高明宇后来被山东分局调回去了。

刘国华（现在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原鲁西主署文化教员，实际职务是特派员）1987年给我来信，说冀鲁豫边区党史办曾召开原边区公安工作座谈会（在菏泽市），会上曾查询我的地址并且为我过去遭受不白之冤表示赔礼道歉。他并且说，当时是他错误地向他的上级报告，我才被抓的。不过不知为何不是由他逮捕我，而由晓光出面诱捕我的，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对于晓光这人，他不告诉其工作的详细地址，不愿我直接找他询问情况。对此，他态度暧昧。

据我后来听说，在这次鲁西“肃托”中被错捕的有近百人，被

株连的也不少，被错杀的 38 人（有共产党员 15 人），其中还有几个女同志，都是从延安来的优秀女干部，如金维、金淳、水泊等同志，都被错杀了。

在这次鲁西“肃托”中，除鲁西党和政权的首脑机关的一些同志受害外，在鲁西北地委也有受害的同志，如范策同志，受尽折磨，身致残疾。就连所谓鲁西托匪头子的鲁西行署总务处长毕睿夫、鲁西支队参谋长王唯一也非托派而被错杀了。

我曾应冀鲁豫边区党史办之约而写过大体内容相同的文稿送该办。历史证明：鲁西“肃托”是“一起冤假错案”，“涉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给鲁西地区的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应予彻底平反，全案全结。”（这是关于鲁西“肃托”的历史结论）我的问题也早已解决了。

（此篇与后载《两次特殊任务》一文均选自肖吾著《大运河丛集·第一卷》。）

“七大”前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

徐运北

鲁西是山东省津浦铁路以西地区。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在这里成立了中共鲁西区党委，归晋冀鲁豫中共北方局领导。当时，日寇占领了这个地区的县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和游击区，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39年初冬，鲁西区党委在泰安、肥城一带活动，张霖之为区党委书记，我是民运部长。接到上级通知，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将很快在延安召开，要鲁西区党委去一代表参加大会（以后因大会推迟，又陆续增加了几位代表）。我们也听说中共山东分局的代表，前几天经过鲁西南、鲁西北先走了。由于鲁西处在战争环境，不可能开党代会选举，区党委开会研究，确定我为鲁西地区的“七大”代表，前往延安。鲁西区党委为此积极准备材料，要向党中央、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汇报鲁西地区的党和人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和坚持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大家议论，过去鲁西地区的党组织没有和中央发生过直接关系，这次有代表去参加“七大”，为了向党中央、毛主席表示敬意，应该送点礼品。鲁西有名的特产是“堂梨、博枣、肥城桃”。但是，堂邑县的雪花梨、博平县的熏枣、肥城县的大蜜桃，在战争形势下没法带。想来想去想到传统特产补养品阿胶（驴皮加药品熬制而成），大家认为合适。阿胶的产地是阳谷县阿城镇，我西去要路过阳谷境，正好带走。因此，立即令党内交通先去通知阳谷县委，设法买到阿胶。

我带领五六十人的地方武装小部队，经两夜行军到达聊城、阳

谷两县交界的宓家海村。第二天上午阳谷县大队就来找我们，送来了五斤阿胶。我过去从未见过阿胶，这次阿胶作为礼品包装是用土纸包的，一斤一包，表层贴有一页红纸。当天下午我们就带着阿胶继续西去。第二天上午到达冠县西南鲁西北特委驻地。鲁西区党委派出五名地委级干部随我去北方局党校学习，这时也到鲁西北特委和我会合。我叫交通员在农村集上买了几尺土布，请房东老大娘把阿胶用布包好缝好，和我仅有的一床薄棉被、两件衣服装在马袋里，放在我骑的马上。

当时，邓小平同志是八路军 129 师的政治委员。他正和在这一地区活动的 386 旅政委王新亭率一支小的掩护部队在大名县和冠县之间卫河边上的营镇开会。会议召集了冀南、豫北、鲁西北团、地委级以上干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主要是根据当时抗日斗争形势，要加强武装斗争，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他的传达对于坚持冀鲁豫地区抗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会后，邓小平同志回太行山 129 师师部，我们也在听了传达报告之后，随邓小平同志的掩护部队，同时从临洺关附近夜间越过平汉铁路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太行山。

行军时，阿胶放在我身下马袋里，宿营时放在我睡觉的枕旁，随时可以摸到。过封锁线时，我右手抓紧马缰绳，左手摸着阿胶，心里想着，有我在就有阿胶在。

晋冀鲁豫北方局住武乡县王家峪，我们到北方局后得知“七大”延期，山东代表团未走，住在距王家峪不远的上北张。我即归到山东代表团生活、学习。冀南、太行、太岳等地区的“七大”代表，也相继集中在北方局。大家住在一起学习，距北方局党校很近，有时听党校的报告。1940 年夏初，百团大战快要开始，形势比较紧张，在北方局的“七大”代表已有数十人，就决定由太行山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转移。在娘子关附近过正太铁路时，日寇封锁严密，战斗比较激烈，掩护部队有伤亡。我们半夜在战斗

中过路，拂晓敌人即出动追击。在敌人的炮火声中我们进入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我虽然是骑马，但摸阿胶的手，也已经麻木了。

此后，我们“七大”代表在晋察冀边区参观学习，9月间，由太原以北地区过同蒲铁路西进。这时百团大战全面展开，在激烈的战斗中过了同蒲路，到达晋西北根据地兴县。我们在兴县过的中秋节，经过休息，继续西行，过了黄河就是陕甘宁边区，经过绥德，于1940年10月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到延安后，山东代表团暂住马列学院后山窑洞，和中央机关住在杨家岭仅仅是延河一河之隔。第二天早饭后，我拿着阿胶送到杨家岭中央秘书处，并说明这是鲁西区党委代表鲁西党和鲁西地区人民，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献礼。向中央献礼的任务完成了，我内心感到非常愉快。隔了一些天，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陈云、李富春、张闻天、中央秘书长王首道等同志，欢迎陆续到延安来的“七大”代表在中央党校前中央机关食堂吃晚饭，并和大家亲切地交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心情很激动。我想，我总算没有辜负区党委的委托，完成了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的任务。1945年“七大”以后，我回到冀鲁豫解放区——鲁西地区已合并冀鲁豫边区，经过解放战争，南下贵州，又于建国初期调北京工作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送阿胶一事早已成为历史。

八十年代，我在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七届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工作。一次到阳谷县视察，谈到阿城镇，我联想起当年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的事情，就想看看阿胶是怎样生产的。我原来以为阿胶厂是在阿城镇上，不料地方同志带我到阿城镇西北朱楼村附近野地里去看一个小工厂。一进这个小厂的大门，就见一个又大又深的大水井，井旁有个过去年代的古碑，厂房比较简单。工厂领导同志向我介绍这就是阿城镇的阿胶厂，这个大井就是炼阿胶水的水源，是过去多少年代传下来的，这时我才知道阿胶之所以

出名可能与水的来源有关系。中国地大物博，有些传统产品就是与水土环境分不开的。比如，贵州的茅台酒离开了原产地的水源，即使在外地实验多年，也还是制造不出来。我由此进一步认识了阿胶之可贵。

阿胶！阿胶！阿城镇传统特产阿胶！在战争环境中，作为鲁西党和人民向党中央、毛主席的献礼，曾经将你用鲁西北的土纸、粗布包装，行程几千里，穿过硝烟炮火，送往延安。正是通过你表达了当年鲁西广大群众对党中央和伟大领袖的深情厚意。现在，六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愿阿胶——阿城镇传统特产阿胶作出新的贡献。

1998年夏

附 崔存英：关于此文的成稿经过

1997年11月初，我在阳谷阿胶厂听副厂长霍忠臣说，当年徐运北曾带着阿城的阿胶送给在延安的毛主席。后又谈及，但详情不知。我觉得这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必须立即抢救。在段延世、李印元先生的引荐下，才得以与北京的徐运北联系上。1998年1月14日我给他去了一封信，让其将送阿胶的全过程写出来。2月3日徐回信：“段延世、李印元同志并文史科、广播局诸同志：大家好，向你们拜个晚年！春节好！接到你们热情的来信，不胜感谢！八十年代我去阳谷两次，第一次（忘记了时间）去，我到阿城朱楼村阿胶产地，看阿胶厂，看了有名的水井，并向该厂职工鼓励和致谢，当时并向阳谷县陪我的同志详细介绍了1939年冬我去延安，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的详细情况，作了记录，我看了记录稿，也作了修改。我认为阳谷县会在刊物上刊出，或作为材料保存，以后我也未再问，不知你们为什么还不知道我的谈话记录稿。当时的记录稿，也不是三言两语，如果我现在重写，绝不会一字不差，万一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就更不好办。我认为还是请你们把过去的记录稿找出来，抄一份寄我，我对原稿重新校对修正

作为正式的记录稿。特请考虑。随同来信收到延世同志的宝贵照片，一并感谢！回信请寄轻工总会。徐运北 1998年2月3日”（徐运北用“中国轻工总会便函”写了两页，原件现存档于县政协文史科。）

看来，徐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确信无疑，可上哪儿去找原记录稿呢？去党史办，不知道；到档案局，也没有。无奈，我又带着徐来信复印件再次到阿胶厂，见到了正在打着吊针的厂长宋来海，简要述说了信的内容。宋说：我保存着他的讲话录音带。徐上阿井看，有印象，他说用红绸子包着阿胶，其实是用的红标签。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2月24日录音带到手，我找来了录音机，连夜一句句地记录整理，一直到凌晨1时才整理出5500余字的稿件来。第二天即去复印社排印。因是录音，有些字词记的不甚准确，需请亲历者订正。正当与阿胶厂联系去北京请徐过目之时，厂家易主，一切冻结。这并没改变我的主意，自费去！我请了假，3月1日与县政府秘书董长侠一起乘火车去了北京。2日晨7时许找到了徐家。徐四方大脸，留着花白寸头，身板硬朗，精神很好，只是有些耳背，有点眼花，看书报时用一个手拿着放大镜。徐审读了我们带去的录音整理稿，又谈了些细节，在他的会客厅待了3个小时。我赠送他一盘复制的录音带，一本《阳谷揽胜》、一盒阿胶（500克）作纪念（原带去二斤自己花钱买的阿胶。徐坚辞不要，最后他说留一盒吧，留作纪念，顺手将其立放到书橱上）。我们请他题词并一起拟文：“为七大献礼 给毛主席送阿胶”、“挖掘历史资料 造福阳谷子孙”。其间，在征得徐的同意后，长侠用带去的相机抓拍了几张像片，临别时我们三人又合影留念（徐的爱人给拍的）。

当日从京返回阳谷后，我采访了年已77岁、时任县青委书记等职的知情者段延世先生，他提供了县民运部长兼秘书张冠军在阿城岳家庄购买5斤阿胶的情节。我将这一重要事实写进了通讯

《心愿——追忆徐运北赴延安参加“七大”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一文中。这样，就有了两篇文章：一是徐运北署名的《谈谈赴延安参加“七大”期间给党中央、毛主席带去阿城阿胶的情形》，一是如前所述我们署名的《心愿》。

这两篇稿子打印出来，又寄给徐看，徐看后又寄回，反反复复有三个月。光复印费就花了近200元。

不久，徐将用毛笔写好的题词挂号寄来。我一看没有年月日及印章，恐没有说服力，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猜忌，于是又将其寄回。5月4日徐来信称：“崔存英同志：您好！①关于我署名的稿子，我修改得更简单一些，重新打印，给您寄去一份，请查收，原整理稿即作废。②关于《心愿》稿，请您根据我改稿子的材料，作相应的处理，因为由你们署名，我就不改了，原稿寄回。③录音稿的时间，我已记不起来了，请你们到招待所查查我去的时间——他们会有来宾登记的，加以核对即可。④题词已盖章，今寄回，请查收。敬礼 徐运北 1998年5月4日”。徐运北将署名文章的题目改为《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并签了自己的名字：徐运北 可供发表 1998年5月20日。在《心愿》稿件上也同样签了自己的名字：徐运北 阅，略有修改 1998年5月20日。

在寄回两定稿的同时，徐运北用“中国轻工总会用笺”的一页纸写道：“崔存英同志：两稿收到后，阅改签字再寄上，请查收。敬礼 徐运北 1998年5月20日。 我去阿城阿胶厂参观，大概在1985年左右，供参考——又及。”

从此事酝酿到促成，半年中先后与徐运北通信6次（除第一封寄县政协外，余皆寄我）。这就是年已85岁的徐运北《给党中央、毛主席送阿胶》一文的成稿始末。可以说，没有这一番积极努力，这个宝贵资料怕也就难以被发掘出来。

扑不灭的火焰

——省立寿张八乡师党组织活动片断

王洪祺

1936年10月的一天黎明，我背着书包去学校赶上早操，穿着夹袄还有些寒意。临近学校门口就看到有些异常，走近真使人吃惊。荷枪实弹的黑衣警察站满了门两旁，对学生不光盘问，有的还要搜身。

我忐忑不安地步入教室，室内的同学都三三两两地在低语。有的同学去厕所回来说，校墙周围也设有岗哨，气氛非常紧张，连我们这些初小三年级的小学生也都意识到：校里一定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大事。

早饭后军警撤走，有关信息从师范本部经附小高年级逐渐传开，详细情况都不清楚，但都知道是从师范部抓走了共产党，不光有学生，还说有个老师，共抓去四人还是五人，也闹不很清。

后来又听学校传达室的工友岳喜柱说：头天晚饭后来了两个穿风衣戴礼帽的人，说是学生王福昌的亲戚，待把王叫出来后，两个人把王蒙上头，就绑架走了。事发一个多小时后，县里军警就包围了学校，并又抓走了四人。学生们由于平时受进步学生和教师的熏陶和影响，认为共产党不图升官发财，积极主张抗日，不愿做亡国奴，政府为什么要抓他们呢？

对这件事我虽弄不清楚，但久久不能忘怀。直到多年后，才逐步认识到这是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扑灭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而采取的逮捕杀害共产党的血腥镇压政策。

这次经过信访和走访当时寿张八乡师地下党组织的老同志，对这场反动派妄图扑灭革命火焰的事件，才得到较清楚的认识。

山东省寿张第八乡村师范的建立

三十年代初，我省在“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响下，全省已有七处乡师。又准备建立第八乡师，原计划在烟台，因烟台在福山县境内，福山县要求建立在县城内，两地互不相让，争夺激烈。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也颇为难，与他的秘书杨沛如流露，“如果有第三者申请，就干脆挪到别处去建，以免打哭一家，引笑一家”。杨是寿张县莲花池人，闻讯抓紧找王聘山、蔡蕴之、马春海、张景颢等在省教育厅和在济南其他机关任职的寿张人，加紧活动，加之当时的寿张县县长、教育科科长、商会会长等的大力支持，才报请省里批准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建在寿张。

寿张八乡师，校址在寿张东关外。于1931年正式招生。校长是何思源的亲信王冠英，教导主任、训育主任也都是国民党员，他们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但学校的师资条件较好，教师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思想开通，多属激进派。该校办学宗旨是培养乡村小学教师，学制四年，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东阿、郓城、范县、阳谷、莘县、冠县、寿张的高小毕业生，他们多是家庭比较贫寒的农民子弟，无力走中学、大学深造的路，考取乡村师范，每人每月能享受官府发给的五元生活费，学生能够上得起。

八乡师师生创办了不定期的校刊，刊名《寿张简易乡师校刊》，至1937年1月，共出版15期，内容丰富，有教师的教学研究，师生的文艺创作，学术论著和生活介绍等。校刊对开发学生智力，推动教学活动，启示活跃师生思想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寿张八乡师，有来自农村出身贫寒、性格淳朴的学生，有知识渊博、思想进步的年轻教师。丰富活跃的学校生活，为我地下

党组织的建立和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寿张八乡师党支部的建立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聊城三师的师生义愤填膺，在校内举行集会。并组织去校外宣传，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妄图亡我中华的野心。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学校当局劝阻，学生不予理会，爱国学潮愈演愈烈，学校当局按山东省党部的指令，采取“提前放假”的办法，驱散学生离校回家，破坏学生爱国运动。聊城三师学生的革命活动受阻。1933年山东省委连续遭到破坏，中共鲁西党组织的活动十分艰难。

这时，正如毛泽东同志论述的那样：“西方不亮东方亮”。地处鲁西偏僻一角的寿张八乡师党组织却迅速得到建立和发展。

赵健民，山东冠县人，济南乡师学生，1932年11月由姚仲明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因年龄小不能入党），入团不到半年，临危授命，担负起济南乡师支部的领导任务，赵健民以乡师为基地，向外开展工作。1934年发展了寿张八乡师学生沙延孝、冯千才（二人都是赵的冠县同乡），点燃了革命之火。当年春天，冯千才、沙延孝在寿张八乡师迅速吸收了王福昌、段延鸣、冯子华和时玉泉等人入党，后又吸收了王宪五、司银章、管修林、张运昌、路绍禹等。并在赵健民的领导下，建立了寿张八乡师党支部，由段延鸣任书记。党支部的中心任务是：在学习交往中，通过交朋友、组织同乡会、读书会介绍革命书刊。当时传阅的书刊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列宁、鲁迅、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团结进步学生，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贪污腐败，选择培养党员发展对象，积极扩大党的组织。

1935年暑假，寿张八乡师学生党员冯子华，在故乡莘县以同

学会的名义组织暑假读书会，邀请堂邑私立武训中学、山东省立兖州第四乡村师范等校同学参加，以团结进步学生，培养党员发展对象。在读书会活动中，冯子华与直鲁豫边区特委巡视员刘晏春发生了联系，得到了帮助和指导，加深和扩大了党组织在对敌斗争中战略回旋余地。到1936年夏，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寿张八乡师党组织本着“精干隐蔽，单线联系”的原则，在寿张八乡师的4级8个班中，有6个班建立了党小组，发展党员约30名，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活动。

当时的学校当局为了效忠蒋介石，叫学生都剃光头。为了揭穿和打击这一政治阴谋，党支部组织全校性的“护发运动”。组织学生到训育处请愿，最后迫使校方屈服，收回成命。学生每年入学后由公费制作统一的服装，但事务主任从中贪污，另外他克扣学生的伙食费，学生对此很不满。于是王福昌、段延鸣等党员发动学生去事务处说理，要求查账，最后伙食由学生自己组织“伙食团”管理，定期公布帐目，打击了学校当局的反动气焰。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对内剿共、对外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王福昌、段延鸣、冯干才等党员组织学生上街演讲宣传，排演革命戏曲，呼口号，抵制日货。

1936年5月，学生党员王福昌任八乡师党支部书记。王福昌字耀光，1911年10月生于阳谷县今范海乡富安镇村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勤奋好学，在班内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阳谷师范讲习所与本班同学段延鸣结为挚友。

王福昌任八乡师党支部书记期间，曾多次和赵健民联系，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领导党员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同学校当局进行斗争。他们和中共安乐镇中心支部发生了横向联系，在寿张、阳谷、东阿一带，发展了一大批优秀党员。他们还以同学会的名义和济南一中、聊城三师、曲阜二师、临清十一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系，相互推荐进步书籍，交流学生运动的情况，党的

组织活动和学生运动如烈火燎原之势在鲁西大地上燃烧起来。

寿张八乡师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1936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被捕，特务从赵健民身上搜出了给王福昌的电报底稿。10月初的一天傍晚，韩复榘的特务到寿张八乡师，他们将王福昌诳出逮捕，第二天就押送济南。

在济南狱中，敌人对王福昌多次进行审讯、逼供和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使我党的地下组织没再受损失。后来，敌人以“共党”罪进行宣判后，把他关到看守所。在看守所为了组织党员同敌人进行斗争，赵健民、理祺、姚仲明和王福昌等人在看守所中建立了支部，组织党员学习政治理论，讨论国内政治局势和研究对敌斗争策略。1937年5月间，由于敌人长期的百般折磨，王福昌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发高烧几天不退，病情日见严重，看守所虽名义上有医生，但都敷衍了事，医治均不见效。在5月底的一天下午，优秀的共产党员王福昌同志终于被敌人折磨致死，年仅26岁。

野火烧不尽，寿张八乡师重建中共党支部

寿张八乡师是鲁西寿张、阳谷、莘县、冠县、东阿等县党的建设和发祥地。如何尽快地恢复1936年10月被破坏的寿张八乡师的党组织，是上级党组织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鲁西特委书记刘晏春和刘仲莹同志几次来冠县都曾对王宪五讲过，应尽快设法把寿张八乡师的关系恢复起来。1936年11月，在冠县兰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由刘晏春同志主持，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决定派王宪五同志去做这一工作。

王宪五（王维群），山东省冠县王辛村人。派王宪五去恢复寿张八乡师的党组织，有以下有利条件：王曾是寿张八乡师的学生，与八乡师的地下党组织成员沙延孝、冯干才等，不光是要好的老乡，而且是冯干才于1934年初冬介绍王宪五正式加入共产党的，王并且还在寿张八乡师积极参加过党组织的活动。

王宪五全家八口人，仅有9亩薄碱地，不能维持生活，靠他父亲做木工活补充。他求学期间，长期依靠同学、朋友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1934年底他在寿张八乡师求学，实在难以支持，经过慎重考虑，向党支部汇报了想退学的要求；并提出退学回家后找点事干，增加一些收入，也好解决一部分家庭困难，同时也可以坚持自学，继续读书，更重要的是回到家乡后，能够更广泛地接近群众，有利于开展工作。

经党支部研究，批准了王的请求，并具体给王交代了任务，指示王回家后可去教小学，一方面有利于学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开展工作。同时还要求同党支部保持联系。王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于1935年初退学，从那时起再没有回过学校。王回冠县后，经冯干才介绍，到冯原来教书的张家庄小学任教。王和冯干才等八乡师的同学除假期一块活动外，平时还经常通信，冯干才等也不断给他寄书刊，传递信息，告诉他如何活动和学习。

1936年初夏，冯干才陪同鲁西特委书记刘晏春同志来冠县王宪五教书的地方，一天下午，在王村西头一棵大树下，刘晏春同志召集开会，参加者有冯干才、于树昌、王宪五。会上决定建立党支部，由王宪五任支部书记。

1936年秋，刘晏春同志带领巡视员刘仲莹同志来冠县，在许辛庄小学召集会议，冯干才、任玉民、王宪五参加了会议。刘晏春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决定成立冠县党的工作委员会，由王宪五任书记。

1936年10月，寿张八乡师党支部遭到破坏，支部书记王福昌

被捕，冯干才跳墙逃了出来，在王宪五教书的地方躲了一段时间。由于以上情况，所以决定王宪五同志去寿张八乡师恢复党的关系，是比较适宜的人选。

王宪五身着长袍，以商人装束来到寿张，先到学校门房，传达室把门很严，不让找人。王以找亲戚送东西为由，见到了时玉泉，王约时黄昏到东大苇坑边交谈，王了解到自从学校党支部遭到破坏后，学校当局对学生监视、控制很严。党员积极分子不得分开接近，只有几个人还在秘密联系。

王宪五同志指定时玉泉同志任临时支部书记，要求他利用机会，找可靠的党员个别谈话，秘密开展党的工作。王在寿张北关外一个小店里住了一夜，随即返回冠县，向刘晏春、刘仲莹做了汇报。

1937年春末夏初，冠县县委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建立中共冠县中心县委，负责领导莘县、堂邑、馆陶三个特区和冠县的党组织。冠县中心县委王宪五任书记。随着形势的发展，以鲁西北特委南部的濮县、范县、观城、朝城、阳谷、寿张建立了鲁西南特委，特委有刘晏春、马功岑、陈东升负责，鲁西北特委北部的冠县、莘县、堂邑、聊城、馆陶、临清、清平、博平等县为辖区，建立鲁西北特委，特委由刘仲莹、徐运北、王宪五、鲍廷干负责。

寿张八乡师的党组织在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开展活动，逐渐从师范校园里扩散到广大农村，由学生变成了先生，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座沟通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桥梁，在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中，建立起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当时在寿张、阳谷、东阿、濮县、冠县已有三四十个共产党的农村、城镇支部，已有上百名农民党员。鲁西北共产党的发展，为鲁西北特委开辟了农村这个革命决胜的战略领域，取得了出师的战略支点。在直鲁豫和鲁西北两个地区的对敌斗争中，已取得了战略

回旋的主动权。

扑不灭的火焰已成燎原之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0月寿张八乡师奉命南迁，经梁山旋湖北，辗转流离于四川绵阳，与山东的其他流亡中学、师范，合为六中师范部，八乡师的建制遂告结束。寿张八乡师的党组织，遵照鲁西北特委的部署，在鲁西北继续开展活动。

1937年9月19日（仲秋节），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济南向中共鲁西北特委负责人徐运北，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的紧急形势下，党号召共产党员深入敌后，脱下长衫，发动农民，发动学生，共同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徐运北立即返回鲁西北，传达了这一重要指示。寿张八乡师的共产党组织和鲁西北各地的党组织一样，积极地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号召，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在共产党员掌握政权的寿张、阳谷、范县、莘县都建立了抗日武装。同时，在禹城、高唐一带组织了冀鲁边区抗日游击第七大队；石横组织了山东第六区游击营；博平组织了400多人的抗日武装，被命名为聊城第四游击大队；赵健民被营救出狱，回冠县组织了鲁西北抗日游击队；东阿县高集成立了由200余名石料工人参加的鲁西北第一支工人武装——冀鲁边游击队；茌平县也先后组织起河西游击队、岐山游击队、抗日先锋队、茌博聊阿抗日游击队等小型武装，鲁西北遍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寿张八乡师的党组织，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比较及时地适应了民族矛盾逐渐上升，阶级矛盾相对减弱的转折规律，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

蓄力量和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的方针，发展起来的。

寿张八乡师党组织的发展，为革命保存、传播了火种。这正如徐运北同志在《关于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断回忆》中所说的：“多数党员为知识分子，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毕业，基本上是小学教员，这是抗战以前鲁西北党的骨干力量。”当时“各种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到处是抗日救亡的呼声。在鲁西北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小学教员，他们是从城市到农村的桥梁，从知识分子到农民的先锋，高小、初小、短期小学象蜘蛛网一样，撒在鲁西北大地，使革命抗日烽火形成燎原之势。”

山东省立寿张八乡师，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建党、发展、遭破坏、恢复、发展壮大的胜利进程中，融入到中共鲁西北党组织的洪流中，对鲁西北的革命历史，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王洪祺，1928年生于山东省寿张县城内，1936年是山东省立第八乡村师范附属小学三年级的学生。194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离休前是山东省阳谷师范高级讲师。本文材料来源，除信访、走访有关老同志外，并参考了《鲁西北革命史》、《光岳春秋》、《阳谷文史资料选编》等有关部分。）

两次特殊任务

冯之琨

进入日寇据点侦察

1939年初春，日寇突然从鱼山开来一个联队，300多名日军在七级镇盘踞下来。这时我正在徐翼同志（鲁西北地委军事部长）率领的陶山支队中做民运工作。其任务是在部队活动中与地方党组织联络。对于日寇突然开来这样一股较大兵力的真实意图，我们部队和地方党组织都搞不清楚。为此，必须侦察清楚。经徐翼同志与县委同志共同研究，决定派我并且由孟尝乡丁刘继文（党员）伴随，以给敌人送马料为掩护，进入日寇盘踞的七级镇，进入伪维持会内，一是要认清敌翻译官（他经常来伪维持会活动）的面貌，以便计划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时捕捉他，弄清敌人行动意图（整个日本联队300余人中只有这个翻译是中国籍）；二是找到家住镇上的姚修文同志，拿出他绘制的日寇布防图。我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后，装扮得土一点，像个农民小伙，由地道的农民乡丁刘继文推着小土车，车上放着多半口袋喂马的高粱。我拉着车子，身佩“良民证”（我们仿造的）上路了。30分钟到了运河沿上夏街头敌寇外围哨位。两个高瘦个子的日本兵持枪站哨，他两个表情呆木。我俩装着笨痴痴的样子，给他哈哈腰，他点了点头，其中一个过来摸了摸车上的高粱袋子，就叫我俩过去了。这

样过了第一道哨卡。到小桥间，又有两个日兵站哨，他俩更是旁若无人，一副傲气不大警惕的样子。我俩心里头也稍稍放松下来了，向他们点点头就过了桥了。没想到日本人这么放松警觉。怪不得头几天镇上的同志来说：“敌人很麻痹，只恃他们武力强大，很骄傲，疏忽大意，白天竟敢把枪架在一堆，集体下河洗澡。”所以，我从队部出发时心境也不甚紧张。走进街里进入伪维会，一边伪装等着过秤交粮，一边察看院子里外情况，等着翻译官出现在这里，也好认识他面貌、身个、口音等特征。等了一会没见翻译官的身影，却见北屋里外，几十个中年和年轻点的妇女，她们表情不一。据伪维会的人说：这些妇女有的是头几天日军带来的，有的才从鱼山用车拉来，都是日本兵要来过夜的。我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心头压抑，十分揪心。正思忖，忽然眼神一亮，一个全副黄呢子军服，头着日军军帽，右边臂膀上戴的袖套上写“通译”的人进来维持会了。这就是敌翻译官了。我有意靠近他，认清了他的面貌，听到他正询问翟清云伪维持会长送来的马料数目、妇女数。他一口东北口音，鼻音较重，声量不大，低沉、沙哑；刀鞘脸，尖鼻子，留日本小胡子。我确记了他的面貌、身个、口音等特征，第一项任务算是完成了。

和刘继文约好，他在伪维持会等我，我去了姚修文家取来敌布防图、火力位置图，放在小推车事前准备好的夹缝中。他推着车，我拉着走在街上，看到敌人驻扎的几处门口，街上墙上张贴的敌联队长的布告。迎面过来一队日军在巡逻，没有干涉我俩。我俩赶快过了桥。河西沿出现了一座新坟，坟前竖着木牌上写：薛蕙孃之墓。附近的人说是驻这里的日本联队长三天前亲自送葬，埋在这里的一个年轻少女。传说是自杀身亡的，详情不知，一直是个谜。这个少女是什么人，为啥自杀，不知道。

我回到部队把取回的资料交给徐翼同志，他和大队长廖云山讨论夜间突袭的问题，结果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服从了廖云

山的决定，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也巧，不知什么原因，敌人第二天突然撤走到铜城去了。但是，徐翼同志还是请求给他派一个18人的便衣小队，携带短枪，于第三天黎明前出发，到达七级镇北隐蔽起来，等待截击敌寇一个小队，他们是返回七级镇接一个去当翻译官的汉奸。结果情报不确，日寇没有来。我们逮捕了那个汉奸，被陶山支队正法了。这天在七级镇还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骚动，在徐翼身处险境而不惊，大义凛然地处置对付下，转危为安，平息了下来，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流血事件。

到伪区长家做客

1943年春，我带着阳谷县抗日民主县政府文印股的两位干部和一位交通员住在安乐镇东8里的徐庄高××家。是通过关系住在他家，也是领导介绍，认为住在他家是安全的。因为伪军不来骚扰。高××与我们关系也好（我们在这里工作对外不公开），他的人品可靠，所以住在他家是安全的，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我们给他公粮，吃饭由他供给，也较方便。起初我还不清楚我的家庭曾和他家是世交关系，后来经县武装部王亚同志给我说明，我才知道了。原来是任县敌工部长的我叔叔告诉他的。而高××和我叔有友谊关系。而且我祖父在世时，在南京、济南开过土产运输公司，高家有人曾是我祖父手下的徒弟，这人就是高××在济南的哥哥。半年后，高××的哥哥，被伪政权委任为安乐镇这个区的伪区长（敌伪上层不知道他和我家的世交关系），他于是回安乐镇来了。这时，为了进一步争取他，使他了解我方对他的态度，经岳县长、军分区徐翼副司令员和我叔叔决定，与这位伪区长进行试探接触。于是，由王亚和伪区长的弟弟策划，先以我的名义，以晚辈的身份写信问候他，并且相约于×月×日前往拜访。这封信由其弟送到他在安乐镇伪区部的家中，面交给他，试探他的态度。

信送去后，由他夫人收转给他，并由其弟当面向他讲明情况。他看了信并了解情况后十分高兴，既热情也很谨慎地告知其弟说：“请这晚辈来当面叙一叙我们两家的世交情谊吧。”于是，我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岳县长和徐翼同志都给这位伪区长写了信，向他申明我党和政府的政策，对他愿与我们联系表示欢迎，并且向他提出了要求，令他今后可直接与敌工部联络，要善自珍重。这样，我就准备妥当，和他弟弟持岳、徐的信前往安乐镇伪区部附近他的家中去会见他了。他和他的夫人在家中等候我。我见到这位伪区长年纪近60岁，很热情温和，态度也很诚恳。他的夫人尚不足40岁，文静热情。他俩像是对待亲人、晚辈亲戚，同时又象对待贵宾一样，十分尊敬地和我交谈。他阅读了岳县长、徐翼同志的信后，十分激动，把信交给夫人珍藏起来。他说：“请县长、司令放心，我一定按吩咐做，不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他两位的事……”谈话后，又摆宴席款待我，还对我说：“你爷爷在世时，待我如亲兄弟，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可别客气呀。”他夫人又买来一条围巾送给我，热情地请我收下，亲自送我出了他家门。临行，伪区长低声谨慎地对我说：“明后天区队可能要去苑店、赵园一趟，你回去可要告诉县长，如果那里有政府和八路军人员要做好准备，别发生意外的事。”我和他兄弟就告辞回来了，把会见他的情况向我叔叔作了汇报。之后，这位伪区长表现不错。1943年，他奉命跟随伪县警备大队到七级一带扫荡时，我们把他的区队缴了枪，放他回去后，他辞去伪区长职务，去济南住闲去了。我们解放南京时，有位曾在我县当过副县长的同志看到他在街上摆香烟摊，做了小买卖，后来帮助他返回原籍了。至于他的弟弟，据说是在土改时被有过火行动的部分群众打死了。去年在邯郸和叔叔谈起他，叔叔说：“不该是这样！他又不是恶霸，曾秘密为抗战作了不少工作，可是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1986年5月于重庆

我对阳谷抗日期间一些情况的回忆

段延世

光荣的传统

阳谷是幅员辽阔的大县，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尤其是阿城、安乐镇、七级、郭屯一带，素有革命之乡的美名。早在1936年，革命先辈王寅生、杨耕心等人就播下了革命火种，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农民，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其中不少人锤炼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骨干。他们为了党的事业，在白色恐怖之下，舍生忘死，呕心沥血，奔走操劳，始终不渝地坚持革命活动；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以苦为乐，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的功勋。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阳谷人民的光荣和自豪。

青年学生掀起抗日高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借口日兵失踪，在河北宛平芦沟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战争的硝烟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不久，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阳谷也形成抗日的高潮。

1937年，我正在阳谷县立乡村师范初中部读书，暑假期间，我与胞兄延禧去阿城剪子股街口给张冠军、王伯谨、杨玉琨送信。大

意是：“……日寇入侵，平津沦陷，国难临头，时局动乱，危在旦夕，望速速进城，共议应变之策……。”大家一同进城后，伯谨转达了杨耕心同志加强抗日救国的宣传，并号召青年学生和教员离开学校，走出家庭，参加抗战，发动组织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的意见，并研究了分头活动的办法。

1937年暑假开学后没几天，敌机便飞经我校，去寿张投弹扫射，炸死了一些群众，使当地人民和阳谷一带百姓惶惶不安，城乡学校也自动解散。当时有传言说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准备让全省大中学校与师范南逃，于是在学校师生中形成两种思想：一种是幻想到南方安全地带，继续教书或求学；一种认为天下已经大乱，到哪里也不会有容身之地，不要轻信当权者。

在学生思想极度混乱时，一些学生便自动串通商量，成立学生抗日组织，可苦于没有一条好办法可以实施。正当他们为难之际，共产党员司银章、赵凤升找到段延铭、段延禧和我，商讨组织抗敌后援委员会的问题。商讨后，大家心中有了谱，于是分头发动，城乡的很多学生们纷纷响应，表示抗日到底。针对有些老师学生思想混乱，抱有幻想，他们又提出以阳谷乡师为中心，以激进同学为骨干，扩大影响，开展活动。接着，他们又商定了几条实施行动：（一）加强抗日宣传，说明只有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稳定情绪，破除恐日病。（二）提出反对学校南逃的口号，读死书与死读书都不能救国。（三）司银章、段延禧和我马上去学校，联系自己熟悉的有威信的同学，成立自己的抗日团体，参加抗战。（四）赵凤升立即联系城内教员，稳定情绪。经过一阵紧锣密鼓的准备，特别是一些义正言辞的宣传和慷慨激昂的抗日热情，不断地感染着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一股抗日高潮正逐渐形成。

学生的抗日高潮形成之际，申云浦、宋金川、王伯谨同志又不断给学生们讲解共产党的发展形势，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观

念，让学生们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情况，以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和革命的精神鼓舞这些青年学生，使他们信心百倍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洪流。

阳谷县“学抗会”、“文抗会”的成立

正当共产党人领导我县广大青年和教师开展抗日运动的时刻，旧政府官员却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着逃跑。一时间，土匪乘机四起，会道门兴风作浪，封建迷信蛊惑人心，绿林好汉揭竿而起，并传说有人向井中投毒，吓得旧政府通令各地设木盖和铜锁，锁住水井。一些恶棍歹徒、军阀余孽暗通日寇，宣扬日寇的军威，整个社会一片混乱，大家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只有热情奔放的学生仍在活动，不断散发激进言论，动员社会各界抗日，肃清社会上的不良倾向。很多毕业回家的学生也行动起来，纷纷来校联系，支持参与在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古老的文庙（阳谷乡村师范校址）成为学生抗日救国的策源地。

面对形势的不断变化，学校骨干分子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成立“阳谷县抗敌后援委员会”，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公开的抗日活动。由司银章、段延禧起草通知，连夜印制六百余份，内容如下：

通 知

亲爱的同学们：

在这大敌当前、国难来临的危机关头，热血青年、有志之士不能沉溺在家中。我们要离开学校，走出家庭，勇敢地参加抗日救亡。为此定于九月二十五日下午八点，在阳谷乡师召开学生和文化界抗敌后援委员会成立大会。希望届时邀约附近同学，前来参加为盼。

此致

抗日敬礼

发起人：司银章、孟昭功、段延禧
方茂诗、殷中兴、段延世

通知是由留校学生传送的。全县学生和文化界人士接到通知踊跃前来，远道的提前一两天进城，近处的当天起早赶到，与会人五百余众，无一人迟到。大会是上午八点在文庙大成殿正式举行的，会议由赵凤升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教师、乡村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

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了“阳谷县学生抗敌后援委员会”和“阳谷县文化界抗敌后援委员会”的成立。会议表示，虽然这是两个组织，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在大会上，学生界代表和文化界代表都发表了激昂慷慨、热情洋溢的讲话，并通过了《抗敌后援委员会组织章程》（草案）。

阳谷县在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下，建立的两个抗日救国会，是我省战后成立最早的抗日团体，除“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和“天津抗敌后援委员会”外，也是华北建立最早的抗日组织。

学生宣传抗日，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当天，大家便自备伙食，立伙集中活动。由总务部长刘福杰收费管伙，忙得不可开交，有一天他仅吃了一顿饭。在学生爱国精神的感动下，学校的校工、炊事员自动不回家，为学生们义务劳动。

第二天救援会同志提议向县政府申请活动经费。于是，组织派殷中兴、司银章去县政府找杨霁峰县长申请备案，给予活动经费。杨借口无权批示，必须请示省政府，对救援会请求一拖再拖，几经交涉不予答复。对政府的行为大家当时十分气愤，大家商议后决定踢开误国殃民的旧政府，自带笔墨纸张，写标语，印传单，

进行集市宣传，积极地活动起来。

宣传活动之初，我们就受到魏玉岭先生的大力支持。魏玉岭是阳谷西文林堂书局的管帐先生，他为人正直，思想进步，见到我们宣传抗日经费不足，便将存封的白纸、色纸、文具开箱供应，解决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当务之急。

为了稳定群众情绪，克服惶恐心理，起到鼓舞抗日的的作用，我们采用了一鸣惊人的办法，在一天的早晨，分头将红红绿绿的彩色标语和传单张贴到四关街。醒目的标语上面写着：

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拥护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清除汉奸，打倒卖国贼！
抗战必胜，妥协投降必亡！
卖国求荣罪该万死！
当汉奸可耻！
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赶集的群众看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标语和传单，从心里感到有了靠山，有了希望。

为了教育广大农民，救国会还有计划地组织人员深入到乡间进行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宣传活动中，缺少经费是常有的事。正当我们东筹西借时，聊城来了一位范筑先将军手下的少校副官，他身穿灰色军服，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身材不高却英姿勃勃，气度不凡。见我们缺少经费，他深表同情，主动与我们联系，在文庙大成殿前召开抗

日救国会议，鼓励我们要不畏艰险，坚持活动，并答应回聊城后立即向范筑先将军汇报。在这位副官临走时，将身上仅有的五块银元留给我们做办公费用。

政训处来到阳谷

1937年10月下旬，阳谷正处在人心惶恐、形势混乱的情况下。正值此时，鲁西北特委通过范筑先，派来了“政训处驻阳谷办事处”。办事处有三十人左右，人数不定，时有增减。

“政训处”原是1937年8月间，在韩复榘动摇不定时，山东省委为了争取同他合作抗日，通过西北军高级将领张郁光和姚第鸿同志的家庭关系，在第三路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机构，它是在党的地下工作者张霖之等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党组织又通过政训处办了一期培训班，其成员是地方党员、青年学生和北方局的同志带来的数百名平津流亡学生以及大中小学教师与文化界人士。

1937年10月，鲁西北特委为了更好地团结范筑先将军合作抗战，从政训处请来了二百四十名训练班学员，在第六专区警备司令部增设了政训处，各县设政训处办事处。“政训处驻阳谷办事处”即是六专署司令部政训处的派出机关。政训处内都有党的组织，各县政训处和地方党组织也保持密切联系。政训处在党的领导下，肩负着团结各阶层，动员群众，发展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职责。于1938年3月六专署警备司令部改为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政训处也随而改名为政治部。

政训处来阳谷后，我和司银章、宋士品、殷中兴等人接待了他们，帮助他们在阳谷文庙安排了住处，布置了办公室。两天后，工委书记（即县委书记）申云浦和赵凤升同志先后来县城同政训处联系。

政训处来到阳谷，对我们学生抗日救国会来说是件大喜事，也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学生抗日救国会同政训处密切配合，共同印刷宣传品，共同组织宣传小组，一起讨论宣传内容，这时政训处客观上成了我们的指导机关。

政训处来阳谷后，做了大量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抗日武装，创建了国共合作的新政权，给阳谷的抗战和创造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慰问二十九军伤员

1937年11月，政训处来阳谷不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即第一集团军）因配合山西国民党部队侧击平汉线石家庄失利，伤亡惨重。为了安全，他们把伤员转运南方，转运途中路经阳谷，他们便住在阳谷城西街路北文公祠（现印刷厂）。听到这个消息后，阳谷党组织、政训处、学生抗日救国会立即开展募捐慰问活动。大家走东串西，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在城内商铺、群众中募捐了一百多元（相当于一万二千斤小麦），买了些点心、糖果、肉类等慰问品，由林荫茹同志带队慰问。政训处去的有余文伟、夏炎、赵小舟、豆洪年、王梦元、杨沛等，学生会的有殷中兴、岳崇方、岳崇禄、司银章、宋士品、段延禧、段延世等。

去后，豆洪年介绍了政训处和学生抗日救国会前来的心意及阳谷人民大众对二十九军流血将士的崇敬心情。随后医官把我们派到祠堂内和伤员见面，对伤员们进行慰问，虽然形式很简朴，但却洋溢着浓厚的团结气氛。

慰问开始时，军医官向伤员们介绍了政训处、抗日救国会情况和对战士们的崇敬心情，而后林荫茹代表我们作了慰问讲话，他说：“敬爱的二十九军伤员弟兄们！你们为了抗击日寇，挽救民族的危难而光荣负伤，你们是劳苦功高的英雄。你们来到阳谷时，县

长、公安局、警备队都跑光了，但阳谷的劳苦大众对贵军的抗日战士是非常拥护和爱戴的。在我们募捐时，他们都慷慨解囊，这就充分说明老百姓和受伤将士是心连心的一家人。”接着，他又给病员们介绍了一些募捐时的感人场面，并发誓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誓不罢休。

正在讲话时，突然一位头包纱布的伤员失声痛哭地高喊：“我们一定和日本鬼子拼到底，为牺牲的弟兄报仇！”接着室内二十多位伤员都哭了起来。随着又跟随余文伟同志高声呼喊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口号，之后大家又群情高昂地唱起歌来，歌曲一首接一首，把大家激动的情绪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

唱完歌后，军医院负责人领着我们去看伤员，见他们有的用纱布缠腿，有的裹着胸，有的断了胳膊，有的失去腿，惨状实在让人目不忍睹。见我们来到，他们都流露出感激的神情，在相互鼓励的沟通中，大家的心溶合在一起。

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休息养伤，我们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同他们道别。出门后，林荫茹同志掏出五角钱对我说：“延世，你去文公祠附近，用这些钱给伤员们买水送来，一个人忙不过来可以再找几个小孩。”这时又有几个人要拿钱，被荫茹同志婉言劝阻了。找孩子送水很难，因为街上的小孩都随大人逃到城外去了，只好找了本族的大立成和二立成兄弟俩。由于伤员用水很多，茶馆供不应求，我们又动员了左邻右舍烧水供应。

在我们慰劳的第二天，抗日救国会的女同学主动提出来要为伤员们洗衣服洗纱布缝补衣裳。那时她们还有些封建，是我和赵凤升领着去的，军医官们谢绝了她们的热情，只派她们到各屋看望了伤员，姑娘们忘了害怕，见到伤员们伤重的情形后，眼都哭红了。

这次慰劳活动，给二十九军战士留下深刻友好的印象，因局势需要，伤员们住了六七天就向南转移了。

鲁南之行

李程九同志根据短时间的活动，认为在鲁西组织抗日武装大有可为，于是决定回鲁南向三专署和党委汇报，并请示今后如何行动。行前李程九邀约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一同前往。经过研究，我们决定由孟昭功、段鲁猷陪同前往联系，同去鲁南一行总共七人。

行至曲阜东部，在李程九的一个熟人家中住下。经过电话通知三专署后，张里元（三专署专员）派汽车前来把一行七人接到临沂，并设宴招待。为了迅速发展扩大武装，张里元特地发了一部分空白委任状和校尉军衔。李程九又用原来领取的一千元活动经费买了一批武装带，一只三把匪轮。张专员交待：到鲁西要注意和地方搞好关系，和第六专署取得密切联系，大力发展武装，必要时警备司令部可以供给一部分枪支弹药。此外，张专员还告诉大家，三专署已和六专署谈好，在东阿设立了第三专署办事处，以便加强联系。李程九当时考虑一千元已快用光，本应再领取经费，以解燃眉之急，可是为了取得三专署的信任，更好地利用这个关系，未便启齿，免得张专员疑心为金钱而干。

回鲁西南，汪洋同志又作了具体布置，他说：“当前时局急剧恶化，回鲁西后万一和鲁南党组织没法联系，自己要有单枪匹马独立作战的精神。要和鲁西地下党加强联系，阳谷县党的工作基础很好，段延铭、管修林、司银章、焦玉美、孟广生都是老同志，必要时和他们联系。”后来他又说：“三专署张专员思想顽固不可靠，六专署范专员是勤政爱民的爱国将领，可加强与他的联系，另外我还设法说服张里元派人去东阿设立了办事处。”

接受任务后，一行人急速返回鲁西。来前为了避免土匪民团和沿途军警的阻挠，随同前去人员全部穿上了军装，挎上武装带。

回到阳谷境内柿子园时太阳刚落，李程九派孟昭功去村内问路，突然冲出一群黄沙会人员，对着孟昭功就是一枪，幸好没中。李程九听到枪声知道不好，就让其他人就地等候，自己冒险进入村子，奔向枪响处。这时黄沙会人员立即把他俩押了起来。

不一会，提前去城东周庄联系住处的段鲁猷听到枪响，并了解到情况，赶快拜托周庄亲戚前来做保放人。黄沙会的人硬说抓的是土匪，不准取保。第二天一早，段鲁猷又把三教寺民团团长侯某请来，才把李程九等六人放了出来。

联络宋继成及其遇害始末

“七七事变”后，我县八乡师的党员回家后也积极活动起来，并决定利用有利的社会关系，通过亲友用“乡农学校”的名义征派存留的枪支，成立民团，进而改编为抗日武装。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从訾海、殷坡、灵王庙、葛海、任海一带着手发动。经过一番动员后，灵王庙的丁钦铎、葛海的葛瑞轩、殷坡的殷广涛等均表赞成，但是，由于群众的恐日心理比较严重，时局日趋动乱，计划未能实现。

十月的一天，訾修林来我家谈论起时局现状，这时我二哥延年进来说：“商坑的宋继成拉大杆哩，莘县、阳谷、寿张、朝城、范县五县的四五千人，都归他管了。”

宋继成和我二哥延平是要好的朋友，这个人很讲义气，当土匪是为贫穷所迫，他喜欢打抱不平，主张劫富济贫。每次劫了大户得到钱财，他都是先给同伙的穷兄弟养家糊口。每次分股子他总是少要，或者分文不取，自己分得的钱物时常周济不认识的穷人，附近四五个县放名望的大土匪头子、大青皮都很敬重他。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我们在充分了解宋继成为人的情况下，决定由段延年与宋继成联系。第二天，延年兄邀请盛玉琢一同去莘

县，找到宋继成说明来意。宋说：“二哥（段延年）走的那天，莘县的李××又来联系，我把他推走了。二哥和玉琢叔来了，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咱们有枪有人，这几天来投靠我的人很多，总人数快到六千了，钱款存的也不少，五个县的杆子头都是要好的朋友，都听咱的。”接着他问道：“这次你们来是给谁联络的，有根不？”延年说：“什么根不根，人人都说中央军是根，可他们都跑了，现在谁打日本谁是根。自古以来，创业皇帝哪个靠别人的根，别信那一套，自己走的正就是根。”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双方达成了默契。

次日延年和盛玉琢回来，详细介绍了联络情况，大家喜出望外。接着警修林拿出了已经拟定好的计划，说：“你们走后我和延禧商量了半天，估计你们一定会联络成功，果然没出意料。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你们给宋继成一份。”他边念边讲，谈了一下拟定的计划内容。计划准备成立抗日救国军，并设总司令部，由宋继成任总司令，同时还拟定宋兼任军法处处长。计划详细周密，从组织到人选都做了详细说明。

第二天盛玉琢、段延年起早去莘县，将初步的计划安排详细告诉了宋继成。宋继成立即通知各杆子首领议决，大家一致赞成，当天大摆宴席表示庆贺。各杆子首领当场表示愿意摊钱买武器，要求我们派参谋长，派识字有学问的人充实队伍。

盛玉琢、段延年回来转告了谈判情况，大家又作了一番研究，积极地进行准备。就在我们刻制印章、物色人选的时候，一位二十九旅参谋长带着警英林（警修林的叔兄）的信来到我家，想通过我家社会关系和地方联络，准备在鲁西活动。实际上他们认为南退没有前途，害怕被蒋介石吃掉，并想乘动乱之机割地盘，保存扩大个人势力。警英林原任二十九军张自忠部营长、新兵营营长。1935年段延年和盛玉琢等曾协助警英林招募新兵五百余人，他和我家既是亲戚又是老世交，因而我们很信任他，并决定与他

共谋大事。我们经过商定后决定成立抗日救国军，并决定发给宋继成两只步枪、部分七九和短枪等。大事议定，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愉快。

正当我们准备把这一切告诉宋继成时，他的护兵小张突然急匆匆地来家说：“宋当家的被人打黑枪了，各杆子当家的，都拉着自己的人走了。”他边说边哭，经过询问才知道是因为宋继成存了很多钱，部下×××因图财而杀害了宋继成。

我们为了追杀凶手，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线索。但歹徒知道自己罪不容诛，跑得无影无踪，至今杳无音信。

后来因局势日趋动乱，二十九旅参谋长和警英林也没再来。因为宋继成遭遇不测，他的属下又人走马散，我们的计划便落空了。

兵运始末

在兵慌马乱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冀南特委指示阳谷党委组织党员发动学生，去国民党二十六军孙连仲部（原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

阳谷党委申云浦等同志商定让威信高影响大的杨耕心同志领导前往。大约十月下旬，我党委发动了近百名青年学生和党员，分作两批起程，集合地点是阳谷城内东街孟广生家中，住宿地点分别在孟广斌饭馆和西街鸿盛楼。第一批人员由张静宇、李登岐带队，第二批由杨耕心带队。另外，所去人员中还有清丰、南乐和范县地下党发动的二百余人。

第一批人员南下后，盛北光同志听说了，他认为去参加兵运的党员和学生都是积极分子，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阳谷革命的骨干，他们到一个没有可靠关系的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工作，是草率的冒险行动。再者，阳谷已出现了抗日高潮，舍近求远地南下行动，对阳谷来说是不利的，万一不顺利不成功，可能造成意

外的损失。因此，盛北光同志立即骑自行车火速追赶，追到黄河南见到杨耕心同志，陈述了自己的分析和认识，要求他立即返回。耕心同志听了盛北光同志的意见，认为分析得很对，但是他想到第一批已经走了，如果不去对不起这些热血青年，生米已成熟饭，即便是刀山火海也不能回去，就这样杨耕心同志为维护党的信誉，便和北光握别毅然而去了。

两批党员和学生们到了孙部后，发现情况有变，原来是清丰的叛徒刘兰斋欺骗了冀南特委刘晏春同志，各县党组织也上当受骗了。刘兰斋交差后躲了起来，再也不和大家见面了。

二十六军的顽固分子将前去的人员全部编入连队，实行连坐连保法，来回控制，如发现士兵开小差，就问罪于邻铺睡的弟兄，执行枪决。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杨耕心同志毅然决定，立即脱离反动部队，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回乡打游击。因为无法召集人员开会，他只好千方百计的个别通知，约定时间分别逃脱。终因通知不便，使有些党员和青年学生沦落在国民党部队。杨耕心设法通知作了布置之后，一直等到去延安和回乡人员安全逃脱后，自己才设法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吴玉章同志作了汇报。办事处党组织决定留耕心同志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为此杨耕心报考了干部训练团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三十六师做简报工作。据说1943年鄂西会战时，耕心同志不幸被俘，而后惨遭杀害。

阳谷、范县、清丰、南乐的党组织开展兵运策反的计划，就这样在叛徒欺骗下，在顽军钳制和日寇扫荡下破灭了。

抗日高潮的形成

1937年10月中旬，宋哲元的第一集团军和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南退，先后路经阳谷。他们来到阳谷后，先委派县长，以便

为他们的队伍征集粮款，保证过境军需。这些县长都任期短促，少的十几天，多者不满一月。曾记得石友三来到后，住在西街澡塘，他思想顽固，喜食毒品，不受欢迎，但他委派的丰县长，却是两袖清风，临行前将剩余的巨额征款，全部交给地方，受到我县民众好评。

二十九军过后，奉命南撤的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人张维翰、姚第鸿的说服劝导下，毅然班师回聊，并根据鲁西北特委的建议，委派了十几名共产党员分任县长。我记得委派各县县长的情况是：阳谷徐茂里、莘县吕世隆、观城张舒礼、范县周子明、寿张管大同、冠县张维翰、邱县成润……。这些同志到任后，积极配合政训处和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组织群众抗日团体，于是鲁西大地出现了抗日高潮。

阳谷县的国共合作县长徐茂里，聘任商会会长熊梦弼为县政府秘书，又请政训处干事熊易五到任后组建了抗日公安队自任队长，李旭东任指导员。与此同时根据政训处和县工委的意见，在原警备队的基础上利用征枪征人的办法组建了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由政训处赵小舟任总队长。

这样以来，局面混乱的阳谷出现了秩序井然、群情振奋的抗日高潮。

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的成立

阳谷抗日高潮形成，县工委（即县委）书记申云浦同志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亲自配合政训处，主持成立了“阳谷县抗日军政干部培训班”。培训班成立后，抗日救国会的热血青年和文化界的爱国志士，几乎全部参加了训练学习班，因而训练班的开办无形中宣布了两个抗日救国会的结束。

训练班共招收了四百人左右，由政训处王梦元任主任，后增

设了副主任，由徐翼担任，还有两个军事教官，下设三个中队。学习课程主要有：国际形势、民众动员论、游击战术、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任课教师全部由政训处的同志担任，学习内容及管理方法基本和原来的聊城军政干校一样，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训练班也常请人来作报告，开课后还立即成立了编印小组，刻印了讲义提纲和大量的革命歌曲，由段延禧等人主办了训练班小报，又成立了话剧团。剧团成立后，突击排练了《喜峰口战斗》、《枪毙韩复榘》、《放下你的鞭子》等七八个节目。演员有教员有学员，主任也参加演出，都是自动报名参加。当时没有女同志，我年龄最小，就让我男扮女装演了乡姑娘，其他女角色都是乡师的老演员。演出时男女老幼拥挤得水泄不通，每次演出后都会激发起台上台下群众的抗日救国激情。学习期间，同志们利用课余饭后时间学唱革命歌曲，训练班成了激发人们抗日激情的号角。

由于形势好转，农村迫切需要抗日救国的宣传，于是县工委决定在训练班和抗日游击总队的少先队中，抽调人员组建临时的“阳谷抗日巡逻宣传队”。宣传队共二十余人，由夏炎和余文伟同志带队，宣传路线是南仓、阎兴鲁、骆驼巷、张秋、阿城、七级、安乐镇、石佛。宣传队每到一处便开大会，演小型话剧，歌咏队唱抗战歌曲。有时化上装，以卖艺的形式在集市上或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还有时采取集体唱歌的形式吸引群众，进行口头宣传。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国共已经合作，希望蒋介石抗战到底；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要拥护范筑先将军的抗日战斗，大家要一起团结抗日等。

这次前所未有的抗日巡逻宣传，鼓舞了群众抗日情绪，破除了群众中存在的恐慌和悲观情绪。宣传归来后，发生了匪顽攻城的不幸事件，生气勃勃的阳谷顿时阴云密布，形势逆转恶化，训练班的宣传活动也暂时停止了。

二月二土匪打城和收编布永言

1938年（阴历二月二）3月3日后半夜，突然枪声大作，训练班和政训处的同志从睡梦中惊醒。这时空中流弹横飞，西门方向喊杀冲天，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大家猜定是土匪打城。

惊恐之下部分学员越墙跑走，去同学或亲戚家避难。我家和训练班仅一墙之隔，数十人跑到我家避难，天将明时王梦元、徐翼也先后来到我家。家里住不开那么多人，便去了鸿盛楼饭庄，仅被褥就堆了半间屋。

政训处、训练班和剧团的小孩大部分被堵在训练班内。土匪向这些赤手空拳的学员和政训处人员要枪逼款，可是这些人枪款全无，有的土匪便把学员的毛衣、毛围巾、好衣服沾去（土匪黑话强拿叫“沾”），有的土匪逮走了富户人准备罚款。

因为我家开饭庄多年，祖、父辈为人正直，仗义疏财，交往甚广，本县和邻县的绿林对家父也很敬重，所以他们历次打城时都主动派人保护我家。正因为这样，我家成了地下党组织理想的活动场所，这次二月二打城，鸿盛楼也贴上了“布司令住此”的长条，使得免遭劫难。依靠家庭交往的便利条件，徐翼和王梦元由二哥延年托人，去找失散的同志，不到两天就找到失散同志数十人，并将一批人护送出城，冯之琨等人就是被找到后护送出城的。

扣押在匪部的数十位同志被看管得很严，不准自由行动，不准唱革命歌曲。同志们不服气与他们争执说：“我们唱的是《救亡进行曲》，有什么罪？”土匪头头李英臣大发雷霆说：“唱《救亡进行曲》也要杀头，这是共产党编的歌。”过了两天他的态度缓和了，对我们说：“不让大家乱唱是好意，你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学生，前途无量，我很喜欢大家，希望你们跟我干，我不会亏待大家，千

万不要误入歧途，要走正道。”

李英臣每天带着护兵外出联络，暗地拉拢各匪部人员，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徐翼认为李有政治阴谋，主张迅速了解李英臣是个什么样的人，设法阻止他陷害我们的同志。我们又另外找到了几个土匪，由我领着去找训练班和政训处的同志玩，借以显示这些学生和各匪部关系密切。这一招果然奏效，李英臣对大家好了许多，并杀了一匹马慰劳大家。尽管如此，我们对李的警惕丝毫没有放松。

经过多方了解，我们弄清了李英臣是汪派军人李英武的部下，是二十一别动队。此人思想反动，因此我们对他加强了防范。二月二打城的有布永言部、毕金海部、刘贵安部、叶世琦部、王佃臣部、王朝元部等十几股土匪，另外有二十九军哗变的王绍堂和汪派李英林。说起来是土匪打城，实质上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活动。这次李英臣煽动并伙同各匪部攻打阳谷，主要是根据国民党省政府反动分子李树春等人的指使，破坏共产党人和范筑先将军开创的鲁西抗日根据地。

李英武、李英臣在打阳谷前不久，于1937年前后带领新成立的新编部队收编了范县城南的于耀川、袁青山和布永言、刘贵安、王佃臣、毕金海等匪部。收编后他们运来三船物质，有面粉、子弹和民生银行的纸币，分发各部，发了三个月的军饷，土匪们高兴异常，一致乐意接收改编。

在敌人破坏鲁西抗日新局面未能得逞之时，李程九同志、申集磐先生通过南街孟宪章说服布永言，接受了范筑先将军的收编。王绍堂闻信逃之夭夭，李英臣见势不妙，也溜之大吉了。

土匪攻城的第八天即二月初九，范专员、李程九、申集磐、孟宪章等，在北关路西杨家店里和布永言谈判成功，布正式接受了收编。

战地服务团与袁仲贤

1938年4月下旬，日军土肥原第十四集团军为策应津浦线正面进攻徐州的军事部署，由平汉路经大名、濮阳进驻濮县，伺机渡河。先头部队近两千人，数日内在濮县集结两万余众，其中大部分挥师南下进逼徐州。

5月5日，我方侦知敌情后，范总司令、参谋长袁仲贤、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为了配合徐州战场，阻挠敌寇增援，破坏京汉日寇的策应部署，袁仲贤同志提出火速调五、六、二十一、二十二支队和原驻防濮县的十三支队协同作战，同时在阳谷组织一个“战地服务团”随军支前，范筑先立表同意。

会后决定由袁仲贤组织“战地服务团”，袁打电话给阳谷政治部主任黄主一同志，限他当天组成二十至五十人的“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随前方司令部工作。

黄主一接到电话后，立即找到豆洪年、徐翼、赵凤升等人商量。徐翼建议从十九支队政工人员中抽调，于是大家分头动员，从十九支队抽调了岳崇方、岳崇录、殷中兴等人，加上从附近动员的共二十余人。人到齐后，没军装的换上军装，除团长佩戴上校军衔外，所有团员一律是上尉军衔，武装整齐后在上午七八点钟整队出发。

途中接到范司令手谕，命令我们迅速赶到范县西街宿营，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步伐。总司令部设在范县西街路南天主教堂内，我们住在靠近司令部西边路南一个茶馆中。午后三点多钟，范县县委书记丁××和原县委书记刘××接通知来联系工作，徐翼带我去司令部叫袁仲贤同志。我到楼上后说明了来意，袁仲贤同志立即出来，去茶馆会见丁、刘二人。这次会谈主要是要求地

方党组织大力发动群众开展支前活动，让丁、刘二同志迅速转告濮县县委书记。

5月7日早饭后，范总司令、袁仲贤同志率领传令队、战地服务团七十余人，沿着金堤河向濮县进发。沿途按袁仲贤同志的布置，贴满了抗日标语。行军途中范司令和袁仲贤同志并肩行进，谈笑风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大家的斗志。当天我们进驻在距敌十八华里的王堤口，该村西南六里是孙膑摆阵的古云集，西北三里是庞涓孙膑鏖战决斗的马陵。

第二天早饭后，徐翼同志布置马上出发宣传，出发前以为前面一定有驻防，可宣传了三四个村还没见一兵一卒。后来袁仲贤对大家说：“我们调的部队大部分尚未赶到，原来驻防濮县的十三支队现驻在白衣阁一带，其他支队也很快赶到，大家不要担心害怕……”

我们驻王堤口的第三天，调遣的各支队陆续赶来。部队到齐后袁参谋长又作了新的布置，对濮县形成了东、北、西三面包围之势。

我们进驻王堤口，同当地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抗日。濮县群众的战绩十分惊人，他们主动配合我们收编绿林武装，破坏交通、切割电线、拔掉线杆，每个晚上都有三四大车。我们部队破坏敌人交通通讯设施的活动更是频繁。有恃无恐的日寇在我们的打击下，居然害怕起来，他们每天派敌探侦察我方情况。

这次范筑先、袁仲贤、徐翼率领七十多人，冒险进军濮县进行破坏敌军交通电讯命脉，虽然不是刀光弹影，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桩军事壮举。

战地服务团是直属第六专区司令部由政治部直接领导的，但它诞生在阳谷，其成员又多是阳谷人，该团随范筑先去濮县前线，因而战地服务团的功绩也是阳谷人民对抗日的贡献。

下面简介袁仲贤同志的情况：

袁仲贤同志是红军师长，曾受伤十余处，仅两条腿上就有核桃大的伤坑七处（左三右四）。袁仲贤同志平易近人，性格豪爽，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袁仲贤同志是1938年1月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徐翼、朱穆之等一块来鲁西的，来后任范筑先将军的高级参谋兼作战参谋长，还兼任军事教育团团长，为鲁西培养了大批干部。他来鲁西后，主要是忙于军事活动，鲁西三十多个支队六万多人马的调遣设防，都是他出谋划策。难怪范筑先将军自豪地说：“我文有燕铭、郁光，武有仲贤，还有一批政训处的干将。”

袁仲贤同志建国后出任我国驻印度全权大使，1954年奉命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不久，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

范司令回戈抗日后的阳谷形势

1937年10月间，范筑先专员奉命南退后，不几天，共产党人姚第鸿、张维翰去齐河追劝范筑先专员返聊领导鲁西人民抗战。范筑先将军看到国民党毫无抗战诚意，跟他们走下去只有国破家亡，于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毅然回戈抗战，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策，依靠共产党领导。

返聊后根据鲁西北特委的建议，立即将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第六区抗日游击总司令部，范任总司令。接着，范司令和部分共产党员分头冒险收编土匪和顽军散兵，改编民团，建立抗日支队，同时委派十余名共产党员出任各县县长。记得徐茂里任阳谷县长，管大同任寿张县长、周子明先后去高唐、范县任县长、张舒里任濮县县长、吕世隆任莘县县长。政权恢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动荡混乱的鲁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邻近区县如德州、临清、济宁、菏泽等地区、大名、清丰、南乐等县的抗日青年，都奔向了范筑先将军的队伍。阳谷因为党的历史长，工

作基础好，鲁西北特委把阳谷作为工作的重心区，指令政训处配备了强有力的干部，结合地方党组织，发展了六万余人的抗日武装，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局面。

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抗日局面不断发展，便怀恨在心，他们先用卑劣的手段夺取了濮、范、寿的抗日政权，继而沈鸿烈、李树春勾结复兴社第二十一别动支队的李英武、李英臣，挑动土匪攻打阳谷，破坏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

阳谷的国民党反动派乘机而动，利用造谣栽赃、挑拨离间的丑恶伎俩，给徐茂里加上失城有责、作风不正、难当重任的罪名，要求撤销其县长职务。范司令打算要再任共产党员接替徐茂里，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胁迫下，结果委派了六专署一科科员张维庠任阳谷县长，张是倾向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和共同抗日，我党作了一定的让步。阳谷的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反共时机已到，便开始破坏团结抗战，制造反共摩擦，杀害共产党员。他们首先恢复和充实区乡政权，扩建保安队，建立乡区武装，同时开办“阳谷县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反共骨干和军事爪牙，大力灌输反共思想，以图和我党争夺青年。训练班的人员很多是徐茂里时期“阳谷县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员，由于政治基础好，没有上当受骗，有些富家子弟、投机分子则对国民党反动派们言听计从，紧步其后尘。学员中也有少数共产党员，他们参加受训是为观察反动派的动向，了解他们的内幕，争取避免或减少对抗日的破坏。

训练班开学之前，通过沈鸿烈的省政府派来一批三青团，分配到各县，来阳谷的是焦冠军、李玉柯等人。训练班成立后，焦、李二人任训练班队长，他俩都是阳谷乡师二级的学生，来阳谷后大力发展三青团，进行积极反共。

张维庠时期还从军训班抽调人员，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队长是周子昌，队员有男有女，多数是三青团分子，其中也有共产党，

还有山西来的“抗日敢死队”成员。我们的党员同志团结了多数同学，形成了进步力量，因而国民党顽固派的宣传队却成了抗日的宣传机构。

“阳谷军事训练班”结束后，刘建高等根据省政府的指示，在安乐镇职业学校旧址办了一所“山东省联立中学”（简称联中）。联中班次很多，男女各有，学生来自鲁西各县。联中实行旧学制、旧教育，用旧课本，表面上是学校，实质是与我党争夺青年的工具。

张维庠时期还成立了一个国民党操纵的“阳谷抗战动员委员会”，设置在城内西街熊梦弼先生的西院内，其成员比较复杂，有政府官员，有国民党、共产党和各界人士。这个组织是国共合作的形式，名义上是抗战的团体，其实也只是个空架子，从成立到结束从未进行过抗日动员工作。

阳谷县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之日，正是山东省国民党政府制造反共摩擦的高潮之时，而阳谷的共产党人却一如即往的坚持团结同志和民众，进行抗日工作。这时申云浦、赵凤升、李旭东、段延铭、王筱湖、孟广生等同志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在群众中的威望，经常不断地联系青年学生。赵凤升同志着重联系在机关工作的同学和领导寿张党的工作，李旭东同志负责青年工作，申云浦除了领导全县掌握全盘处理重大问题之外，还挤出时间深入群众，协助学校工作。

在反共摩擦的白色恐怖之下，还有三位外地共产党员黄主一、余文伟、豆洪年冒着生命危险，宣传特委制定的“第六专区抗战救国施政纲领”以及持久抗战的方针。这些赤胆忠心的共产党人，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长期不懈地同敌对势力进行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阴谋，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聊城政干校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9月，鲁西北特委鉴于沈鸿烈、李树春、王金祥之流的反动气焰日益嚣张，决定让聊城政干校的第一期结业学员进行一次行军锻炼，进一步发动抗日救国宣传，唤起民众。宣传途中路经安乐镇、张秋、寿张和阳谷。

去安乐镇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和联中师生联欢，激发联中学生的抗日激情，扭转他们认为政干校学员是怪青年、赤化分子的看法。到达后我们拜访了教务主任刘建高。刘建高邀请我们到联中来教学，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并给他宣传抗日道理。

与刘建高道别后我们急忙找联中的老同学谈心。这时我们看到校园里政干校的学员们与联中学生三五一群、八九一伙的密切交谈。交谈中政干校的学员们向联校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政干校严肃活泼的好学风。听了我们的介绍后他们感慨很多，对我们充满了羡慕之情。可是也有少数联中学生，特别是一些大家闺秀和纨绔子弟，总用不相信的眼光看我们，似乎我们是怪物。其中一些老师和学校领导也视我们为异端，有的老同学也不愿见我们。

第二天召开联欢大会，双方师生全部参加，联校负责人讲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毫无亲切之情。我们的教育长周子明登台后慷慨陈词，讲述了困难当头大家应奋起抗日，提出了抛弃前嫌合作抗日的愿望。讲话时联中学生不断地鼓掌欢迎，大会上两校师生还进行了拉歌，一方是慷慨豪壮的战歌，一方是陈词旧调，两方相比，泾渭分明。

与联中同学们分手后，我们来到张秋镇，该镇是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驻地，是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的大本营。行军抵达张秋的第二天，省政府召开欢迎大会，他们的国军、政治大队和数百名群众参加了大会，行辕主席廖安邦发表讲话，其欢迎也是毫无

真诚之意。会上，他讲道：“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只有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只有一个领袖——蒋委员长。希望政干校的同学们，要在沈主席的领导下进行抗战，不要误入歧途，走上斜路……”听了他的讲话，我们气愤地高呼道：“拥护抗日的国民政府！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拥护抗日的蒋委员长！妥协投降是死路一条！曲线救国是卖国政策！破坏团结抗战罪该万死！拥护范司令抗战到底！”呼声惊天动地，张秋群众也跟着振臂高呼，吓呆了反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

大会上教务长齐燕铭和教育长周子明先后讲了话，批评了廖安邦的反动谬论，申明了抗日救国大义，讲述了抗日救国主张，洪亮的声音和感人肺腑的诚意打动了台下的师生们。散会后大家当天出发去阳谷，路上欢声笑语，议论纷纷，交谈着一路上的见闻。

到达阳谷后，住到文庙，次日在老粮市举行欢迎大会。欢迎会上县长张维庠没敢公开与学员们为敌，因为他原是六专署一科科长，知道范司令重视政干校，喜爱政干校的学生，所以他仅仅简单地表示了欢迎。这样一来欢迎会便成了我们进行宣传的场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社会各界各方面的人，这次令人振奋的宣传对于鼓励抗日情绪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大会结束后，大家以表演节目、跳舞等助兴。行军路过阳谷，对政治部的黄主一老同志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回校后我们第一期三个大队六百多学员立即分配了工作，分别被分到各县各支队和战地服务团等，我被分到阳谷政治部工作。

阳谷抗战低潮和忠孝团作乱

聊城失守前夕，反动派李树春亲自去安乐镇勾结地主豪绅，煽动会道门，密谋杀范除共的奸计。他们在第四职业学校召开忠孝团八大首领会议，布置反共杀范的活动，同时利用鲁西行辕参议

赵长衡战前和日本特务的关系，去济南日本特务机关勾结敌人进攻聊城，企图彻底破坏鲁西抗日根据地。

在民族败类的合污密谋下，他们出卖了聊城，引狼入室，范筑先将军在抗日保城的斗争中光荣殉国。范将军就义后，民族败类王金祥粉墨登场，当了第六区专员，坐镇朝城，占据寿张、阳谷、濮县、范县和冠县，公开制造反共摩擦，到处扣留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首先利用莘县反动势力杀害了抗日县长共产党员吕世隆，扣留了教务长齐燕铭和巩固（巩俊杰）同志，继而又杀害了张炳元同志。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扩充反动势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在阳谷工作的政训处同志黄主一、豆洪年、余文伟等无法再进行活动，被迫转移冠县。但是王金祥的部队占据莘县一带，盘查很严，很难出境，幸亏李程九同志利用第三专署的护照才将他们送出去。

12月初，余文伟有事回阳谷，同我与凤升、旭东商讨工作。他回冠县时接到特委通知，让我和赵凤升去冠县参加“鲁西工农青妇代表大会”。凤升有任务不能去，我有病他们不让去，可我年轻心胜非去不可，最后余文伟带我们一道去了冠县。一路上匪兵阻挠，我们左绕右转，提心吊胆，当时又赶上北风咆哮、雷雨交加的坏天气，身上出的汗在袄上都结了冰。因为我大病初愈行走异常困难，余文伟不断扶着我走。到烟店时为了安全，文伟先去和村内党员张××联系。等张××和文伟来接我时，我已经休克了，等苏醒后我们次日抵达了冠县。

“鲁西工农青妇代表大会”是在冠县师范讲习所东教室召开的，参加大会的有各县政工人员。大会由徐运北主持，高元贵、申云浦等同志先后讲了话。大会对抗战形势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和工作要求。大会结束后，特委派我去一二九师先遣抗日纵队工作。

1939年春为开辟新区，特委调我回阳谷，这时阳谷县长仍是38年冬接任张维庠的吕仁道。吕仁道是平度人，原在六专署管理处任科员，和李程九很熟。到任后他看到时局不稳，便通过李程九依靠地方进行活动。我们政治部的黄主一、余文伟、豆洪年离开阳谷后，吕仁道又重新组建了一个“阳谷县政治部”，主任是于营的武仲景，武思想进步，靠拢共产党，政治部成员多是进步青年。为了团结这些青年，我们经常和他们进行联系，并在其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党的工作在同志们的努力下仍然收效很好。

聊城沦陷后不久，忠孝团上层在李树春的策划煽动下，特务赵长街为了配合和借助日寇侵略鲁西，肃清阳谷进步势力，又鼓动忠孝团攻打阳谷。愚昧的黄沙会信徒，在忠孝团首领刘清泉、赵二虎等指挥下，蜂涌而来，将县城团团包围。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指天划地，以为天神保护可以刀枪不入。守城部队的公安、保安等分工防守。忠孝团的主攻面是北门，北门守军是保安队一连郭安仁的队伍，忠孝团一个首领手举大旗，身背木制宝剑，口念咒词，一直走到距城四十米处，大声叫喊开门，如不开门，神兵天将杀进城去，鸡犬不留。当时守城的部队认为群众迷信无知没愿开枪，可是后来大队人马攻上前来，一旦失守，市民必遭残杀。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连指导员段延禧当机立断，下令还击，自己瞄准前面的首领，一枪将其击毙，黄沙会众人见首领死于非命，顿时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一会儿乱了阵脚。事后才知道被击毙的首领是忠孝团头子刘清泉。这次护城战役李程九同志也参加了，打死刘清泉时他正在城墙上巡视北门。

正当忠孝团攻城失利，阳谷城解围之时，王金祥带领二十一、二十二支队奉命从莘县、朝城赶来，追打忠孝团。出发前王金祥下令：“打败忠孝团，自由三天。”所谓自由，就是说打到忠孝团据点去，可以烧杀奸淫为所欲为。

忠孝团见大军包围，纷纷逃窜，王金祥部队尾追数十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阳谷东北方向的百余村庄，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三日未绝，惨象目不忍睹。

这场罕见的浩劫，是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春、王金祥一手制造的。这些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用任何卑鄙的手段，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昙花一现的寿张联立中学

聊城失守后，鲁西局势日益恶化，局面日趋复杂。聊城敌人不断外出扫荡，逐步蚕食扩大占领区，石友三的第十军团驻扎在运河两岸的阿城、张秋、代（戴？）庙等地方，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基地。齐子修的三支队流窜到寿张城东柴楼一带，想当土皇帝。内奸王金祥盘据在朝、阳、濮、范、观一带，积极进行反共。聊城失陷不久，莘县的反动派提出“莘县人不打莘县人”来麻痹进步人士，却杀害了抗日县长共产党员吕世荣，扣留了政干校教务长齐燕铭和巩固。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饰其罪恶行径，于1939年春在寿张东关外路北原八乡师旧址开办了一所“山东省联合中学”（简称联中），校长由山东省教育厅教育专员孙芳时担任。孙芳时先生是聊城沙镇区孙凤人，曾留学于美国，战前任聊城三师校长，1939年秋被日寇杀害。

联中特设军事教官，对学生实行军训，进行法西斯教育，大量发展三青团，在团员中公开号召反共。学校的活动反映到赵凤升那里，经研究凤升派我带领几个进步学生打入联中，进行深入了解，争取和团结同学们走向抗日道路。经过观察了解，学生中近半数被发展成为三青团。经过同志们的联系发动，也有很多学

生倾向于进步和光明。

1939年，鲁西和鲁西南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局面，这时山东省乡建派梁漱溟先生去延安会见毛主席，返回重庆时，路经阳谷、寿张。他到达寿张后在联中举行了一次报告会，报告中他除宣扬乡村建设派的主张外，大肆鼓吹速胜论。他认为在美英法盟军的援助下，三个月即可反攻，一年内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大放厥词。同学们听到报告后，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半信半疑，接受过党的教育的同学清醒地认识到梁漱溟的论调是错误的，他错估了敌我力量，过分依赖外援进行抗战救国。

梁漱溟离开寿张不久，从西安分到学校一批黄浦七分校的毕业生，学校特地举行茶话会，邀请他们与师生联欢。联欢时他们介绍了黄浦军校学习生活情况，当时有许多同学听后去西安报考。不久，一位从省政府来的官员在校长室的宴会上大骂范筑先叛国，并鼓动学生们加入三青团。因为同学中绝大多数人敬仰范筑先将军忠心报国的气节，见到骂范司令，他们强烈不满，不少同学为此拒绝参加三青团组织。

我们在学校任务完成的很出色，后来又回阳谷工作，我离校后不久便听说联中害怕敌人滋扰而南逃了。

一县一年六县长

国民党亲日派幻想曲线救国以敌制敌，但日军不是其救主，绝不会为国民党打天下。日军占领徐州之后，继续向西向南入侵，短时间内攻占了莘县、阳谷、寿张、朝城等十几座县城。李树春、沈鸿烈之辈非但不抗日，反而成了日军帮凶，鲁西大地形势极其严峻复杂。

1939年，省政府张秋行轅率部逃往鲁南沂蒙山区，王金祥也随后南窜。石友三的十军团一个师由师长米××带领投敌，驻扎

朝城一带。石友三的莫旅进驻阿城、张秋等运河两岸地区，其余的集结在濮县一带。范筑先的十九支队投靠齐子修编为特务团。而后不数日，齐子修害怕被别人吃掉，流窜到堂邑、聊北、茌平、博平一带。十九支队司令布永言看到省政府王金祥、齐子修都不可靠，经政治部主任郭澄之、参谋长王维一动员说服，接受了杨勇同志的收编，改编为一二九师三四三旅独立团。这时鲁西抗日的重担，完全落在共产党、八路军的肩头。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止反动派和顽军的捣乱破坏，挽回鲁西危局，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我军分头开辟新区，一方面直插敌占区，一方面进军齐禹和泰肥大峰山区以及鲁西南曹县、菏泽一带，威逼陇海路。整个鲁西形成敌、我、顽、匪同时并存、互相斗争的局面。

1939年的阳谷，局势更是混乱不堪。我们成立了抗日县政府以齐南峰为县长，此外在一个县里一年之内同时还出现了五个县长。县城为敌寇占领时，董政华任伪县长，整天催粮要款。原来王金祥委派的县长吕仁道，带领部下退到安乐镇一带活动。不久，吕见形势日趋恶化，不敢冒险坚持阵地，便解散部队隐蔽起来。这时省政府又委派了张秋镇的李士荣出任阳谷县长，李因形势恶劣难以存身，接任不到一个月就主动辞职不干了。事后活动在阿城、张秋一带的十军团莫旅，为了扩充地盘，当土皇帝，他们便委任陈清元做县长。陈清元极为反动，专门制造反共摩擦，到任后不几天便伙同他的副官焦冠军带领保安队，包围袭击了我方工作队，逮捕活埋了共产党员李鸿甲等七位同志。

阳谷西北进步士绅丁钦铎、王本昭为了抗日保家，先后利用乡农学校时期征派的枪支人员，成立了民团，和城内日伪军公开对抗，号称丁团、王团。当时经段延年、段延福说服和介绍，丁团接受了二十九军改编成的一个排，排长曹××是菏泽人，他们装备良好，战斗力强。另外还有一些土匪，也随曹排投奔丁团。丁

团成立不到三个月，和日寇伪军血战数次，曹排在战斗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1939年夏末秋初，盘据在堂邑梁乾、戴湾等地的齐子修看到了王二团有势力可以利用，便派来一位姓储（褚？）的县长。但是他们没料到王二团已在进步势力控制之下。这位手拿长杆烟袋、身穿长袍的光杆县长，一看形势不妙，来到阳谷不足半个月便不辞而别了。

敌人占据阳谷后，李程九同志根据鲁西特委的安排，通过北三里庄张清彬先生成立了近百人的“阳谷县抗日游击大队”，同时他又说服刘继敬的绿林武装，走向抗日道路。

在阳谷环境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我县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更加斗志昂扬。他们不断发展农村党员，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团结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给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以及阳谷的最后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阳谷抗日政权的建设

阳谷县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县政府比较早，继而东阿、茌平、聊城、博平、东阿也先后成立了抗日县政府。

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后，马上建立了二区抗日区政权，杨鼎同志任区长，所辖地区包括阿城、张秋、骆驼巷、古柳树、范海、闫楼、周庄一带。原来在和国民党顽军斗争中建立的抗日四区，包括七级、三里等乡与安乐镇周围几个乡划归四区，区长由王子恒担任，1940年秋改胥光同志。郭店屯一带的老三区，是我党在白色恐怖之下隐蔽的唯一红色政权。县政府成立后，石佛、定水镇、沙土集一带的行政乡也由三区领导，区长仍由王筱湖担任。

以上三个区各占全县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只有城区被敌伪控制，这时我们控制了全县五分之四的大片土地，形成了以七级、

阿城、郭屯为核心的阳谷抗日根据地。各抗日区部，除区委员负责等领导外，区部还设民政、财经助理员，1940年初设武装助理员，1942年设公安、文教助理员。当时由于没建司法机构，民政助理员和县政府一科分管司法工作。

阳谷抗日政府成立后，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全面有力的对敌斗争，实施了抗战教育，在根据地建立了抗日小学，在敌区也成立了隐蔽或半公开的抗日小学。1940年2月在阿城岳庄成立了第一个抗日高小，由党志强、姬秀兰、武子栋、翟继禹等老师任教，后来又在苇铺成立第二抗日高小。这些高小除学习语文、数学、史地、自然外，还设政治课进行抗日教育，同时还讲解政府法令和游击战术。每当敌人扫荡时学生们便和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斗争，有时抗日高小的师生们树林做教室，青纱帐里是课堂，学生们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抗日县政府还颁布了“减租减息”、“实行加级累进合理负担”等种种法令，与此同时大力开展了民主宪政运动，进行了反贪污、反资敌的斗争。通过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进而通过民主方式改造了乡、村政权。新的乡村政权在推行政府法令中是十分认真的，对敌斗争也是十分坚强的。抗日政府的县长、区长、科长、科员及助理员都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段延世，阳谷县阳谷镇西街人，1922年生。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学校工作。第五一八届阳谷县政协委员，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1982年春节期间，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县政协副主席常立亭和李印元同志找段延世座谈文史资料，段口述，李记录，搞了十来天，后李整理成几万字的文字，经段几次补充修改，写定回忆录稿。这里发表的文字是又经王泽文整理过的。）

阳谷县抗日战争片段回忆

李程九

范筑先的两届阳谷县政权

1937年8月，我受鲁南临沂党组织汪洋（汪洪波）委派回阳谷组织抗日队伍。我到阳谷时，县长还是杨霁峰。那时，韩复榘率领他的三个师和一个手枪旅已全部南逃，各地专员、县长和地主豪绅也纷纷过了黄河。只有范筑先不听韩复榘的命令，提出“抗战到底，与鲁西人民共存亡”的口号，在聊城建立了鲁西抗日总司令部，并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鲁西抗日总司令部下设八大处，即参谋处（参谋长王金祥）、副官处（赵疤拉）、经理处（崔乐三）、军械处、政治处，还建立了阳谷办事处（副处长宋子明）和驻武汉办事处（处长牛连文）。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等是国民党为主，政治处是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主持工作。司令部还设立了政干校、教导团，也都由共产党掌握，团长袁仲贤就是老红军，培养了很多党员干部，为后来的三十二个支队、三个路十几万人的部队输送了骨干力量。司令部还建立了《鲁西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分别由共产党员齐燕铭和申仲铭同志担任。

范筑先司令积极抗战，遭到了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反对。沈鸿烈在阳谷张秋镇设立了鲁西行辕，同范筑先司令对抗。幸有共产党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的支持，范筑先的抗日队伍才得

以发展壮大。日寇进攻到沧州时，沈鸿烈也闻讯南窜了。范筑先英勇抗战，曾率部进攻济南，牵制了板垣师团台儿庄作战的兵力。

1937年12月范筑先委派共产党员徐茂礼任阳谷县长，秘书熊仲符。随之建立阳谷县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宋立泉（共产党员），下设三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队长是岳舜卿。阳谷县政治部设在东街路南，主任是黄主一同志。政训班设在西街，由刘见高（国民党）、申云浦（共产党）共同负责，徐明和徐翼都在其中任教。共产党员赵凤升在城东附近村庄也办了青年学习班。国共两党开始了争夺青年的斗争。国民党集体加入三青团，强迫青年学生填表，笼络了一部分落后青年输送给国民党部队，大部分青年则参加了共产党。

1938年旧历二月初二夜，布永言率千余名土匪自城东北角偷袭了阳谷城。我们的队伍和县长徐茂礼撤出，黄主一等政治部的同志和政训班的学生以及地方士绅申鸿渐等均被围在城内。恰巧我那天回家，听到此事，于初四上午即赶到聊城，向司令部报告了布永言打城情况和兵力部署。范筑先亲率警备大队一个营和五、六支队以及杜之恒独立营，当日就围困了阳谷城，司令部设在焦海围子里。范司令绕城一周看了地形，听取了徐茂礼失守县城的汇报后，开始向城里进攻。同时，联系与布永言有关系的孟宪章、申鸿渐等人进行劝降。二月初九，布永言与范司令在北关店里谈判达成协议，将他的部队编为十九支队，布任司令，孟宪章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团。徐茂礼因失守县城被撤职，在城外拉小组，后在济南叛变投敌。

1938年4月中旬，范司令派张维庠来阳谷当县长。张是泰安人，三十七八岁，国民党员。他组织好警备队、公安局后，即开始限共。政治部黄主一同志受到严重威胁，决定去冠县根据地充实十支队骨干力量，走时怕出危险，找我研究办法。当时我有四个警卫员，还有从临沂带来的护照，我给黄主一等12名同志写

了护照，从西门护送出城。在斜店我祖父药铺吃了饭，我又给莘县花园徐××写了信，他们晚上即住在徐家，第二天安全到达目的地。

旧历九月十五，聊城失陷，范司令壮烈牺牲，张郁光、姚第鸿同志也同时死在日寇屠刀之下。盛北光同志（中共党员）从阳谷率五支队三百余人支援聊城，队伍到达时城已失守，即去冠县找先遣纵队，被编为二营。范司令牺牲后，反动头子王金祥当上了聊城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扎在朝城，他不抗日，却密令他的部下反共限共。莘县县长李士荣（吕世隆）同志被该县顽固派杀害，黄主一等 12 名同志离开阳谷，就是这个时候。

忠孝团围攻阳谷城

1938 年 10 月，忠孝团刘清泉在日寇特务唆使下，以“真主”出现为名，率团丁二千余人攻打阳谷城。刘清泉 40 岁左右，安乐镇丁庄人，出身地主，崇尚迷信，身佩宝剑，肩背匣枪，手举大旗，叫部下抬着铡刀，放火杀人，强迫群众加入。在张岩寨烧了八十多间民房，铡了两名群众。群众害怕，被迫归顺。

阳谷县长张维庠听到此讯非常恐慌，要弃城去守门庄围子。我那时正在城内养病，便会同聊城驻阳谷办事处副处长宋子明和五支队负责人一起找张维庠，张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组织队伍固守县城，查岗放哨。当张维庠带政务警携款从南门外逃时，被我发现，强行带回县衙，派人监视。第二天早晨，忠孝团从北、东两面包围了县城。我到北门指挥，见刘清泉正在北门东 30 米处的城壕外指挥攻城。他说：“城门用手一指就开。”刘正掐指念咒手指城门的时候，我们的机枪打响了。头一梭子打在刘的腰部，刘倒在地上，口中还说：“真打呀！”我们又打了一梭子，击中其头部，刘当即死亡。我们又去东门。东门外约二华里处，有忠孝团用步

枪向城内射击。我们组织了警备队一个中队和公安局一部共约二百余人，向司营一带出击。围城的数百团丁正在司营吃饭，看到我们的队伍即乱成一团，纷纷向东逃窜。我们尾追至八里营，抓获了两个团丁，用铡剃下人头挂在东门高杆上示众。

忠孝团是乌合之众，互不联系，东面被我们击退了，北边还在打枪。这时，王金祥带队从西向东包剿过来，忠孝团不知所以，盲目向北逃窜，溃不成军。王金祥带队追至张岩寨一带，也放火杀人，把群众抢掠一空。

忠孝团被打走后，王金祥也率队返回朝城。他派了二十二支队袁寿山（外号硬盖子）驻守阳谷，袁寿山为发国难财，把张维庠赶走，自派二十二支队参谋长刘子璋当了阳谷县长。约三个多月的时间，当闻信聊城日寇想占领阳谷时，袁寿山即带领部队和他的县长刘子璋南逃了。

日寇占领阳谷

刘子璋逃后，王金祥又派来一个县长，名叫吕仁道，平度人，三十多岁。吕来阳谷后，组织了保安队，下属三个中队，一中队长郭安仁，二中队长申端生，三中队长刘序华，共三百余人，二百五十条枪，四挺轻机枪。公安局有几十个人，保卫队四十余人，长短枪共五十余支。吕仁道准备在阳谷做一番事业，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秋，日寇相继占据聊城、莘县、东阿县城以后，又五路进攻阳谷，进城未占就走了。8月，日寇从莘县第二次向阳谷进攻。阳谷劣绅郝师温、刘学来、吕汉卿、张景凤、方明月等人，组织维持会，打着小膏药旗欢迎小岛司令官进了阳谷城。吕仁道未加抵抗，就率队退出。保安大队的一、二中队带枪走了，三中队在共产党员武子升、冯德华掌握下拉到刘湾，把两挺轻机和六十多条步枪插起来，队伍暂时解散。后来成立谷山游击队就是用的

这些枪支。那时，徐翼同志也来阳谷组织四大队，吕仁道与我们合作了一段时间，不久被王金祥调走。

阳谷抗日游击队的建立

我护送黄主一等12名同志去冠县根据地的事被顽固派王金祥侦知后，王派人抓我。我便到莘、冠一带找到八路军先遣纵队，受到司令员李聚奎、政治委员肖永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参谋长王波等同志的热情接待。我跟随活动的半个月时间，王幼平找我谈话。他说司令部党委对我的工作作了研究，阳谷县抗日政府快要建立，准备派纵队政治部民运科长齐南峰任阳谷县长，并介绍我与齐南峰同志见了面。让我先回阳谷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县政府的建立。我回到阳谷时县城已经失守。这时谷山游击队在申鸿渐先生支持下，利用保安大队第三中队插起来的六十多条枪和两挺机枪拉了起来，冯德华为队长，武子升为政指。四大队也拉起来了，徐翼任大队长，谷寿楨任大队副，黄流任教导员。我和张清彬在城北三里庄，也组织起八十余人的游击队，活动在县城周围，配合谷山游击队和丁团丁钦铎的活动。日寇在灵王庙进攻丁团时，谷山游击队支援丁团击退了日寇，当晚又围攻县城。谷山游击队在城西，丁团在城北，我队在城东配合。西、北两面都未攻进城里，我从东面攻了进去。队伍进到东街小隅首，又被迫撤出城外，住到了韩洼。翌晨，岳舜卿带领谷山游击队也向韩洼开来，岗哨误认日寇偷袭，开枪打死了侯继龙同志（谷山游击队指导员），队伍撤退到金海。岳舜卿到韩洼问明了情况，才知发生误会，便立即派人与我联系。对侯继龙同志的牺牲，我悔恨莫及，大家也很感痛心。（编者按：侯继龙，后载杨绍英所写材料作侯继荣，所写其牺牲情况与此有异。）

同顽军势力的斗争

1939年10月，国民党杂牌军二十九军派来阳谷一个旅，又派来一个县长陈庆元。陈庆元组织了一个保安营，营长是原保安大队连长郭安仁。陈以国共合作的名义，在城北一带与我混合活动，暗地扩大地盘，笼络地方民团。阳谷东北部民团团团长徐方德（他和枪最多）、城西北民团团团长丁钦铎、王本昭等三股顽固势力，还有二十九军一个旅和陈庆元的队伍，经常包围着我们。我们的政府和队伍住在苇铺，他们就住在苇铺周围的大杨、葫芦头、井庄，以限制我们的活动。因此，我们调来了骑兵团、筑先二营和独立旅一营。如果他们的部队住下，我们的部队也住在他们的周围，开始有了矛盾和小的摩擦。我们的工作人员李洪甲等七名同志住在七级西焦庄，被国民党暗杀团长焦冠军（焦庄人）侦知并报告了陈庆元。陈率队包围了焦庄，把李洪甲等7名同志捕去。除王子恒一人偷跑出，元武克被郭安仁的护兵保释外，其余5名同志均在七级田庄村北被活埋。从此，我们就同陈庆元和二十九军那个旅公开进行斗争。1939年12月初，肖华支队和曾支队包围了二十九军的那个旅，陈庆元也被包围在内。夜间，我们向李芦、薛庄等七个村上的顽军发起进攻。激战5个小时，把他们全部压缩到薛庄围子里。直到拂晓，稍为停火。天黑后，敌人向西南逃窜。徐方德带着他的六百多民团也随着逃跑，丁钦铎和王本昭两个民团没有逃脱，被俘后改编了。从此，阳谷城外的顽固势力除刘清兰为首的忠孝团外，基本被我们肃清。

提起焦冠军，还有一段插曲。1939年7月，我侦察刘清兰的消息，经过安乐镇天和堂药铺休息，被焦冠军侦知。焦带领暗杀团5人到了药铺，在门口站上岗，焦进柜屋与我坐在一起。申怡之同申济民二人对我使眼色，我一看不好，当即用匣枪对着焦冠

军说：“送送我！”焦未敢动，把我送到道东饭馆内。我又叫焦与我推着自行车送到东门外。我对焦说：“你回去吧，这回我不打死你。以后你老实一些，否则没好下场。”

包围朱庄，活捉刘清兰

忠孝团头子刘清泉被击毙后，他三弟刘清兰又当了团首。刘清兰集合忠孝团残部约二百人，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民政厅长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春的支持下，坚持与人民作对。二十九军高树勋被肖华支队打跑以后，刘清兰带领忠孝团一百余人，全副武装占据了朱家庄地主大院，依靠大院内的群楼坚决与我军对峙，妄图东山再起。因为高部已被我军打跑，我们认为刘清兰有了争取余地。1939年的旧历年三十，组织上派我和刘宝敬去朱家庄利用关系说刘清兰投降。天黑到了朱家庄，找着关系通知刘清兰，刘与我们见了面，在他据点里吃的晚饭。饭后，我们说明来意，刘不表态，刘的部下刘二铁头一连三次向刘清兰报告，说李厅长（李树椿）派来一个旅支援他们。我们看刘清兰不能争取，刘宝敬便与他打起牌来。第二天早3点，我们辞别出来到姚皋我们部队时天刚明，正赶上队伍过年。早饭后向领导作了回报。组织决定另采取措施。

1940年1月，独立旅何德全参谋长率队包围了朱家庄，仍对他实行政治争取的办法。刘一看被大军包围，被迫开门投诚。后因看管不严，刘逃跑。

拔掉青杨李据点

1939年秋末，阳谷县抗日政府在阿城刘楼建立，齐南峰任县长。日寇亦在县城成立了汉奸政府，伪县长董政华。为了扩大他

们的势力，经董政华与日军司令官久保岛策划，在八区以伪区长郝师温（郝楼人）为主，向当地乡村要枪要人，招兵买马。月余时间，伪区团扩充到二百多人枪，在郝楼安了据点。不久，由伪八区团副孟继汉（城角孟人）带领一部份兵力又占了青杨李，安了据点。后来，伪军扩大到二百五十人，有二百多条枪，开始向北蚕食。我们反蚕食的斗争也开始了。

他们到谷庄要人要枪时，我们乘机派李春坦、李春俄等人打入进去。后来，李春坦当了伪八区中队副，李春俄当了班长，基本上控制了这个中队。他们这个中队住青杨李南门里，另一个中队住北门里，队长是刘团山。我们利用刘保敬也做好了刘团山的工作。伪团部住在西门里地主李清庚院内，约40余人，长短枪40余支。为拔掉这个伪据点，1940年2月初某天夜间，谷山游击队和四大队共二百余人，由徐翼为总指挥，从聊阳公路东魏庄出发，向青杨李挺进。齐南峰、徐翼和我在南门外，刘保敬在东门外，对好暗号后，李春坦、李春俄从南门，刘团山从东门，即把队伍拉了出来。徐翼和岳舜卿带队冲进据点。齐南峰不慎自己打伤了左脚，在南门外等候。我们的两挺轻机枪在路北楼上向伪团部射击，伪团长孟继汉开始顽抗，打了三四个小时后，由于我军炮火的压力和喊话政治争取，孟继汉要求我们派人到据点谈判。徐翼同志同意我去谈。谈判是在孟住的北楼上进行的，伪军头子约十余人参加。我首先向他们说，这次来的兵力很多，徐司令决心拔掉你们这个据点，同时交代了我们的政策。孟继汉等人说，他们的家属都在家里，投降后家属和财产都不安全，要求回家安排好，三天后把队伍拉到赵海向我们投降。我看他们没有诚意，告辞出来，向徐翼同志回报了谈判经过，决定再发起进攻。打响后，孟继汉又提出交枪的请求。因将近黎明，阳谷、聊城、莘县三处的鬼子和伪军增援部队也快到了，我们就答应了他，他们用绳子从据点里下了6支大枪、3支匣枪。我们又向孟继汉提出三条：要他们走

时把据点烧掉，不准动老百姓一草一木，三天后到赵海一带向我们投降。他们也答应了。于是，我们集结队伍，并带领投诚的二百余名伪军向阿城朱楼进发。到达目的地，天已大明。清点缴获枪支一百五十余支，子弹两万余发，手榴弹一千多枚，战马 25 匹。会餐后，将他们编为第七大队三、四中队，刘保敬、刘二闷子分任中队长，李春坦跟刘宝敬当中队副，李春俄到二中队刘振南部任中队副。那时，七大队大队长是岳舜卿，我任大队副。

薛庄反扫荡战斗

1940 年 3 月，我八路军在东阿、茌平边区成立了四地委、四军分区、四专署，以迟桥、大白庄为根据地。军分区司令员是刘志远，政委杨劲，专员夏振秋，副专员谢鑫鹤。军分区调阳谷七大队一、二中队升级编为二大队，岳舜卿调走当大队长，从潘北调去两个连编为三大队，王克寇任大队长，负责保卫领导机关，为发展和壮大正规军初步打下了基础。

这时四大队也升级为鲁西支队，徐翼任副司令。阳谷还有四个中队（三中队队长丁钦铎，四中队王本昭，五中队刘宝敬，骑兵队王希雷），后来都改为连的编制，以中队长为连长并派了指导员。三连指导员胡雪仑，四连×××，五连谭文朗，骑兵连李春鸿。上级派我任独立营营长，张新吾任政委。军分区和我营驻阿城北小冯一带。这时，城内日伪军开始对我军扫荡。

1940 年秋，有一次，日寇扫荡被我们侦知，为避免损失，军分区向东阿官庄以东转移。我营到官庄和军分区失掉了联系，又回到薛庄宿营。下午 3 点日军向我们开来。敌人尖兵到了薛庄附近，我营五连在村东围壕和敌人打响。敌人用机枪、大炮向我们射击，激战约两个小时，我军死伤十八名，敌人也死伤多人。因众寡不敌，为避免大的伤亡，我军主动撤到杨窑一带。因天黑敌

人未敢追击退回阳谷。我部撤退时，三、四连连长丁钦铎、王本昭带队逃走。我们派人联系，但他们始终未能回来。

西关全俘伪王团

我队和抗日县政府住在古柳树时，侦知城西新成立了伪王团，约六十余人枪，住在西关路南店里，团部住路北两个民院。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一是王团估计不到我军能去，无作战准备；二是正在青纱帐时期，我军便于行动和袭击敌人。于是决心吃掉他们。我和刘宝敬带着12名精干骑兵，黄昏由古柳树出发，晚9点到达了刘灿明，把马留下由两名战士看护，其余的人于晚10点到了阳谷西关。为防城内鬼子增援，由8名战士作警戒，我和刘连长各带一人分别向敌人偷袭。我负责打店里的敌人，刘打伪团部。我到店时，敌人尚未睡觉，门口也未设岗。我们闯进北屋，敌人还不知道，正唱着打腰牌的小调，枪都挂在墙上。我突然喊了声：“不要动，谁动就打死谁。我们是八路军，把你们包围了。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伪军一个也未敢动。我叫起一个伪军，把墙上所有的枪栓都摘下来装在布袋里，然后到院内集合站队。他们很服从，照我的话办了。一个伪军扛着布袋，其余排队走出店院到了街上。这时刘连长也带着伪团部的俘虏和王团长的家属出来。我们在西关要了辆车载着王的家属和布袋，俘虏扛着无枪栓的大枪，集合一起由我训话。我讲：“你们不要跑，好好跟我们走。我们大队都在外围，如果谁跑，被打死自己负责。”他们都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离开西关后，命令哨兵向城里打了三枪，告知日寇我们走了。天刚明到达了古柳树村。俘虏孟副官问：“你们就12个人吗？”好像后悔了。张新吾又向俘虏讲了话，说明八路军的政策，愿回家按路途远近发给路费，愿跟我们干欢迎。会后，请俘虏会餐，回家的5人，留下的都编入了五连。后来，那个孟副官鼓动

战士逃跑，被我们枪毙了。王团长比较老实，在五连当了司务长。这次胜利俘虏 65 人（包括家属），缴获长短枪 60 支，子弹 3600 发，手榴弹 90 枚。

因我多次给敌人打击引起注意，敌人在四门画像缉拿我，悬赏金票两万元，王筱湖同志也在敌人悬赏缉拿之列。并派伪军剿我的家。我家属早已流亡在外，祖父在张海姑娘家隐蔽，被敌人抓获打死。这倒更坚定了我的斗志。

张海情报组的建立与破坏

1940 年 4 月，为及时弄清日寇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情况，派我独立营战士张家海的张俊田为情报组组长。张俊田通过朋友关系派霍兆安到日本司令部当便衣队，派张学香到警备队刘继春部当兵，张贵荣在敌人门口摆烟酒摊。如敌人出动，霍兆安、张学香把信送给张贵荣，张贵荣再送到张家海转送部队。霍兆安、张学香要求我军写个通行证，我给他俩每人写了一张。后来张学香回张家海家结婚，张俊田夜晚给张学香帮忙，被伪警长的父亲发现，伪警长知道后到阳谷日军司令部作了报告，张学香、霍兆安被逮捕。随后日寇又派了两辆汽车载着五十余名日军去抓张俊田。张俊田见汽车进了村，忙叫家属都跑到邻家。日寇到张家翻了两遍，没逮住人，张俊田全家就此流亡在外。张学香、霍兆安被敌人活埋。张俊田以后接张万岩任情报站第六分站站长，阳谷解放后，因家中无人退伍。张万岩同志升级到县基干队任排长，后又到团里任炮兵连连长，大军南下时阵亡。

我独立营被卫河支队改编

日寇为挽救失败局面，集结机械化装备的五百多名日伪军向

我们扫荡，并命令伪县长董政华借机扩大地盘，安设据点，建立伪区政权。他们在石佛建了伪区部，安了据点，郝超任伪区长；在郭屯也安了据点，住了三十多名日军和一个警备中队。董政华借日寇扫荡之机，向农民要人要枪，把伪警备大队扩大到七八百人，委任城东马庄刘继春为大队副。我队转移到聊、阳、阿边区打游击，派骑兵连和小部兵力到县城附近活动，夜间袭击敌人。敌人不知我军实力，扫荡十余天就停止并撤回城里。由于我军不断袭扰，安乐镇据点未能安上。我主力部队又回到县内活动，对外出抢粮的伪军给以打击。

1940年9月，卫河支队来阳谷活动，司令员邢仁甫与四军分区首长杨劲和县委研究，叫阳谷独立营升级。我们接命令后，全营干部战士都表示同意。卫河支队和独立营全体干部会了餐。不几天，卫河支队通知独立营在东阿油坊村集合。我们到油坊后，卫河支队把独立营强制改编了。为了叫在县城附近执行任务的骑兵连同时接受改编，他们又派我和张新吾以及五连连长刘宝敬、副连长李春坦、排长李梦来等回来召集骑兵连去。骑兵连长王希雷不满卫河支队的这种强制行动，夜间在刘胡同打了一阵枪，即拉走投敌了。我和张新吾、指导员李春鸿、文化干事吴新华等12人则继续抗日游击活动。因强制改编独立营，卫河支队司令邢仁甫、四军分区政委杨劲、县委书记赵姚、县长齐南峰等犯了政策性的错误。邢仁甫、杨劲、齐南峰分别调走，赵姚降为阳谷县公安局长。邢仁甫调到渤海军区独立旅，后叛变投敌，在天津被我们逮住，枪毙在德州了。

敌伪到处安设据点，我军在困难中坚持斗争

1940年冬天，青纱帐没有了，我们的部队被改编，日伪乘机向我根据地进攻，并到处安设据点。安乐镇、七级、阿城、古柳

树据点，各住伪军一个中队和日军一个小队，日伪分设，不在一起。周庄、张楼、张富安、南仓上等据点也都设有伪区长，伪区团七八十人。伪区长有张万言（大汉奸张景凤之子）、武子才、吕继全、李序寅、岳子敬、郝超。伪警备大队和伪区部在日寇配合下迅速扩大，达到三千多人。日伪又以划片分割的办法，强迫群众挖宽4米、深4米的封锁沟。在重要的交通路口都设有碉堡，以监视和限制我军行动。在郭屯封锁沟上，董政华亲笔写了“新民沟足治共匪之死命”的牌子。敌人妄图把我军和抗日政权一口吃掉。阳谷形势恶化起来。

这时，徐翼调任阳谷抗日县长，靖浩然为县委书记，杨钦副书记。王子奎为基干大队副。这个大队部有一个中队，约七十余，警卫连百余人，共有步枪150支。这时，四军分区刘志远司令员带二大队岳舜卿来到薛庄，通知我和张新吾归队。我们到了薛庄，刘司令员说明了强制改编独立营的错误，派我去军区教导队学习。1941年3月，我学习期满后，接替王子奎同志任基干大队副（王调东阿县抗日大队），政委是张健民，副政委王良。不久，相继建立了二、三、四、六、十、十一等抗日区政权和区队（三区区长是原有的，各区长和区队副名单附后）。三区、二区区队各有七八十人，其余三五十人不等。我大队也扩大到两个连，约二百余人。对敌斗争开始了新的一页。

我军在吃穿、武器弹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和敌人展开了反蚕食的斗争。我们早晚行军，住在据点附近，封锁消息。如果据点伪军进入我军驻地，我们就吃掉他。对封锁沟路口的碉堡，我们的敌工部利用各种办法进行政治争取。对死硬分子，则采取便衣短枪捕捉，就地枪毙。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多数碉堡被争取过来，与我敌工人员拉上了关系。我军和工作人员通过碉堡路口，他们不敢管了；鬼子扫荡时，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可在据点内躲避，他们还用饭茶招待。我们则保证他们的人

身安全。大部队通过封锁沟时，则采取铁锹和三齿镢破口的办法，等天明敌人发现时，我军已不知去向了。

1941年秋，正在敌人感到我抗日武装棘手的时候，鲁西剿共司令赵长显（外号赵二虎）、郎司令，组织当地洪五申、陈广新等十几个民团约二千人，又在七级、阿城至张秋一带安设据点，企图把我们挤出来。阳谷环境更加恶化。我区队不坚定分子姚宪章、十一区吴文德、四区杨文胜、六区田庆海等区队副，先后带队投敌，八区长杨季昆（九都杨人，中共党员）被敌人逮捕后也叛变了。那时，阳谷地区只有七个村我军能住，我大队和县政府及四个区被挤到张秋以南大路口、小路口、吴坝、李坝一带，与张秋县抗日独立营营长杨朝炳和八团配合活动。1941年年底，我们的队伍和抗日县政府拉到了聊、阳、莘边界墨城集过年，三区区长王筱湖给送去了猪肉和其他过年的东西。

1943年5月，杨季昆被董政华派到郭屯东于庄安据点。我抗日县长岳舜卿写信争取他。杨回信说，咱们各事其主，只有战场相会，不能投降。我军乘于庄据点未安好，开始攻打，不到两个小时打开，捉住杨季昆枪决了。

建起情报站和敌工站

1942年2月，徐翼调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岳舜卿调阳谷任抗日县长。3月我由军分区第一基干大队副调任分区情报参谋，我三弟春俄接任大队副。

不久，我们建起了三处情报总站（齐禹、茌平、博平三县边区建总站两处，聊、阳、阿边区建总站一处），各县均建立了支站。各区建了情报分站，阳谷县支站站长是王月盈，后是我四弟春鸿，指导员是李景。每站设情报员三人、文书一人，负责外线情报。尔后又成立了敌工站，冯子肃、谷寿祯任正副站长，负责内线工作，

为我军瓦解和打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谷寿祯同志打入了鲁西剿共司令部独立营长王培谦驻守的于庄据点，不久该部投了我们的基干大队，编为一中队，薛长康同志任中队长。我基干大队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由一个中队一百人发展到三个中队三百多人。

冲破日寇大扫荡

日寇为消灭我军有生力量，于1942年9月27日对我冀鲁豫边区开始大扫荡。徐翼带领一个营驻阳谷孙楼。据情报员报告，聊城、寿张、阳谷城内都增加了大量敌人，开始向我根据地扫荡。徐翼同志率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到杨窑宿营，阳谷县抗日政府和基干大队到吴庄宿营，则恰巧跳到日寇包围圈内。日寇以班为单位，每班一挺机枪，打着小膏药旗，从大圈向小圈压缩。我军对反扫荡缺乏经验，我大队在东阿过黄河到银山，又跳到敌人埋伏的重兵圈内。敌人用轻重机枪和大炮集中向我军扫射，我基干大队被打散，伤亡30余人。中队长张科嘴部被子弹穿透，和公安局长张靖宇、司法科长李玉峰等被敌人俘去，县长岳舜卿、大队副李春俄、政委张健民跑了出来，副政委王良肩部被打穿，跑到汤洼张大娘家被掩护起来，养伤一个多月（王良同志现任遵义军分区政委，与汤洼房东还有通信）。5天以后，我们收集失散战士五十余人，牺牲的收尸掩埋，受伤的找地方养伤，其余的都跑回家去。因这次军事失利，大队副李春俄调任军分区特务连连长，政委张健民调训。月余之后，张科和张靖宇等同志在济南冲破敌人监狱跑了回来。

李春俄于1943年在军分区三团任作战参谋，改名李仑。该团后被调到延安，编入王震旅。1947年在保卫延安战役中牺牲，时任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年仅27岁。

1942年10月，上级又派来林路任大队副，苏超任政委。除原大队剩余战士外，又升级了三个区队，成立了基干大队，下属两个中队，约二百余人。1943年3月由军分区一个营配合，县基干大队打下了簸箕柳据点，活捉了伪中队长，俘伪军70余人，缴获长短枪60余支。同年青纱帐时，我八团以三个连埋伏在阿城孙楼以西，以少数侦察人员把古柳树据点日寇35人、伪军二百余人引出，让过伪军，把日军引到包围圈内，二十余挺机枪一齐扫射。日军防守不及，被我击毙34名，只有一个叫小野的鬼子官跑回据点。小野发疯了，用自己的战刀刺杀伪军，把伪军轰出据点，然后吃醉酒用大盖枪把自己打死了。这两次战斗，使我军军威大振。伪军在据点不敢出门，更加恐慌。除阿城据点李洪图顽固对抗外，多数据点都与我敌工站有了关系。1942年春，军分区三团住在七级井庄，也以侦察员把七级据点的日伪军一百五十余人引到崔庄以东，放过伪军，包围了32名日军，击毙28名，缴获枪20余支，子弹2000余发，轻机两挺，掷弹筒一个。

同年10月，日寇集中聊城、东阿、阳谷、莘县及济南一部分主力，在东阿小冯一带进行最后一次扫荡，包围了阳谷县抗日政府和基干大队。我同林路带一个中队冲出来，到了敌占区阳谷城附近的王胡同、郭海、杜庄隐蔽；苏超同志率领的另一个中队被敌人打垮，苏超化装隐蔽，岳舜卿县长隐蔽在崔庄。我军政人员和群众被敌人俘去约八十余人，均用铁丝穿透胳膊，用汽车载到济南埋了。专署民政科乌亚乌、县委宣传部长张冠军，被敌人枪杀在小冯附近的沙堆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周四嫂也被吓疯了。言念及此，悲痛万分。至此，敌人向我进攻结束，相持段开始。

日寇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绝大部主力调走，每县只剩下少量日军。阳谷一个日寇班长外号“大胡子”的任伪县府顾问。敌人已无法再集结兵力向我扫荡，伪军再多也不是我军对手。伪地方政府感到无法维持，请示伪中央汪精卫派正规军支持，阳谷派

来治安军一个团，约千余人。治安军每连约百人，武力配备除每人一条步枪外，还配有轻机枪三挺，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火力较强。这是1944年的事。同年四月，我军三团约三百余人，住在阿城亓庄。我军初次和治安军作战，敌人散兵群进攻较迅速，我们对敌人的战斗力还不了解，退出了亓庄。敌人进距亓庄约百米后，卧倒不敢前进。我们发现敌人的弱点，派一个连向敌后包围，两个连对敌发起进攻。敌人被我前后夹击，狼狈逃窜。

董政华两次险些被获

1941年2月，日伪军五百余人到郭魏陈一带抢粮。军分区接到情报后，即由政委石新安率一个营从迟桥出发，急行军至阳谷李炉村宿营。早8时董政华和日寇先头部队将至郭魏陈村南，被我军拦腰截断。我军以手榴弹、刺刀勇猛冲杀，约战一个小时，敌人不支，向西南狼狈逃窜。董政华马被打死，人险些被获。这次战斗毙敌三十余，缴获轻机一挺，步枪二十余支，其他军用品一部。

1943年春，我县大队、县政府和军分区一个营住在王堤口一带，董政华配合日军约五百余人去抢掠，被我军包围。激战一个小时，敌人溃退了。我军乘胜追击，董政华险些被获，击毙敌23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其他胜利品一部。

孙家庄被剿共队包围

1943年3月，六区区长屠士奇（编者按：当作涂世祺）、肃托时被行署公安局逮去枪毙。六区系敌占区，距县城很近，区长不好派。当六区长首先得敢当，还要社会关系多，到处有掩护，才不致发生危险。组织上让我选择个能任六区区长的人。我考虑迷

魂阵秦家海张金榜能胜任，便带领刘春、张新吾、李春鸿去动员他。因是敌占区，目标大，我把张新吾、李春鸿留在孙家庄孙继雪家，与刘春二人到张金榜家。张未拒绝，只说：“我到关外卖趟皮条回来干。”我说：“您去吧，我与您饯饯行。”第二天早晨，我派人去赵家海买酒菜。不一会，孙家庄孙继雪的家被剿共队包围，有七十余人，每人都两支长短枪。开始有7个敌人闯进孙继雪院内，张新吾、李春鸿听到狗咬声忙起来站在屋门前。敌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张、李二人答：“是八路军。”喊声“冲呀”就打响了。敌人被打了出去，包围着院子不敢再进。我与刘春在张金榜家听到枪声忙往外出，张用手拉住说：“您从我大门出去，我的家就没有啦。”我们从张家后园子跳出，见未被包围，我命令刘春从西向东打，我从北向南打，把张新吾、李春鸿接出来。我们打到孙家院后，因都穿便衣，敌人先只认为是他们的人。打到敌人跟前，喊了声：“冲啊！”敌人一看不好，全部向西跑去，我们也未远追。到了孙家北屋，只见张、李的帽子、手巾，未见有人。到街上问了问，群众说二人已翻墙从西头走了，我们也放了心。敌人跑时丢下了几辆自行车，刘春骑着一辆，推着一辆，我骑着一辆，奔胡家那里去了。与张、李二人会合后，谈了打包围的经过，四人都大笑起来。

赵家海打垮齐子修一个独立旅

1943年7月，我三团住罗家海。据报，赵家海来了一部分敌人，情况不明。我与四弟春鸿自报奋勇去弄清情况。到了赵家海附近，查明原来是齐子修的独立旅布如良、布如标、丁福堂、刘宝敬等，因与日军发生冲突，被迫跑到赵家海来，现在还怕八路军打。我们到了赵家海，找到刘宝敬、布如标，他俩说：“您可来了，我们正想法派人去找您，请您通知八路军不要打我们，早晚

我们这部分人归八路军。”我考虑他们不是真心，想把他们全部消灭，便把他们十大头领集中在陈玉厚院内一块谈判。我说：“八路大军住的还远，要想叫不打你们，我得写信通知我们的队伍。”他们相信我，同意我写信。我将从哪里进等情况写明，派春鸿送到罗家海交给团长谭光汉和政委苏超。队伍由春鸿领路急行军半个小时到了赵家海，从西头冲进来。听到机枪响，我说是鬼子，他们也认为是鬼子，都未敢回自己的部队，出院向玉米地跑了。我军只差40米未抓获他们。敌人没了头，乱成一团，被我军打散。我军俘敌六十余人，缴马三十余匹，长短枪52支。后来，敌人在李家庄围子，集合残余力量约三百余人，向赵家海以东村庄报复。敌人知道是我弄的鬼，扬言要剿我的家，其实我全家早已流亡。我发动姜家楼、石狮子、冯家楼20个村庄的群众和敌人相持打了半月时间，并叫群众宣传，说八路军大部队要来消灭李家庄的残匪。敌人吓跑了，投阳谷的投阳谷，余者拉走当了土匪。

1944年3月，治安军一个团从阳谷回聊城。得到情报后，我大队及军分区一个营夜间住到任岩寨，早饭后埋伏在聊阳公路东侧。当敌人来到鱼林赵附近向敌人发出冲击，吸引了敌人的主力部队。另派一个突击连，在鱼林赵掐了敌军后尾一个排，全部将他们俘虏，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十余支，子弹七千余发。治安军被打死打伤二十余名，其余逃窜。

打阿城据点

1944年2月，日寇从阿城郝武楼据点调走后，由伪警备大队副李洪图率队二百余人接替。李洪图系济宁人，异常顽固，坚决同我军作对。李到阿城不久，即杀害了我二区财经助理员李婉民。军分区刘志远司令员认为该据点不除不利，即采取了争取西据点、攻打东据点的办法。派敌工站长冯子肃对敌开展政治攻势，通过

敌工关系和政治工作，西据点伪军全部投诚。东据点李洪图顽固与我军对抗，我军挖沟至据点楼下。因楼底下都是下的柏木桩，挖不动，不得已用棺材装上炸药轰炸，也未把楼轰倒，我军撤出。李洪图势单力孤，而后也逃到阳谷城里。至此，阿城光复。

1945年3月，李洪图又调安乐镇据点，他派伪军搜查肖家坑村时，把我五区财助杨子良捕去，以解往阳谷审讯的名义，行至任岩寨村西枪杀后又剖腹摘心。我带队赶到任岩寨劫救，杨子良同志已壮烈牺牲，李洪图也逃跑了。我动员群众将杨子良尸体运回掩埋了。

打张秋据点

1944年5月，为了切断我六、八军分区之间的联系，伪治安军团长（第一任）赵××派一营（营长张某）约三百余人在张秋镇安设据点，经常四出抢掠，广大群众非常痛恨，要求我军拔掉该据点。7月间，正是天气炎热阴雨连绵季节，我军区七团开始以轻重机枪向该据点进攻，打了个三进三出，终未打下，敌我各有伤亡。聊城、阳谷两处治安军约三千余人前来增援。我军区七团撤走。那天，我与林路带领大队打阳谷的增援。阳谷治安军攻上来一个排，还有伪警备队一个中队八十余人。我们埋伏好队伍反击，把他两部分人压缩到郭魏陈小围子内包围，我军靠进围子投了一排子手榴弹，敌人交了枪，全部被俘。缴获轻机一挺，步枪113支，子弹八千余发，手榴弹二百枚。我和林大队副带队向北撤走，行至孙家楼，忽然迅雷巨响，我们以为是敌人的炮弹，卧倒在地，稍待片刻知道是雷声，我们二人又大笑起来，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路上遇着二团，团政委王克寇同志说，聊城援敌到达张楼住下了，他们尾追至孙家楼，敌人尚有一个连未走。是夜阴天，天很黑，队伍到敌军住的院内，敌人只说是自己人，措手不及，全

部被俘，缴获马大盖七十余枝，轻机枪二挺，子弹万余发。

端掉石门宋和鱼林赵据点

1944年下半年，日军大部兵力调到太平洋对美国作战，府县城只留下个别日军支持局面。治安军战斗力不强，又内部矛盾，为保持个人势力，互不支援。各县伪警备队、各区据点伪区团人数不少，但战斗力很弱。各据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的碉堡撤走，据点放弃。如七级据点怕我军攻打，偷偷撤走，七级至此全部解放。我们的根据地逐步扩大，人民欢心鼓舞，各区工作人员发动群众平封锁沟，我军开始反攻了。

7月一天下午4点，我带领5个战士，化装成伪便衣队闯进石门宋碉堡，伪军正在打牌。我们喊了声：“别动，缴枪不杀！”伪军说：“闹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八路军。谁给你们开玩笑！”伪军12人（一个班）才举手投降。鱼林赵据点有一个我村名叫张代的在里边当伪军，也同我们拉上了关系。夜间，张代开门放下吊桥，把我小部队引进去，伪军还在熟睡，老窝被全部端掉，放火烧了。这两个碉堡共缴获步枪22枝，短枪两枝，子弹二千发，手榴弹50枚。

大迷阵冲出敌人包围

1944年10月，刘继春带伪军五百余人，内有骑兵25人，计划袭击我三区队。为了弄清情况，我带领4名通讯员深入到小迷阵。为了缩小目标，我和刘春隐蔽在孙文礼家，其他3人分住到公路东付唐。第二天早晨5点，我和刘春到我村大迷阵，被在我村住丈人家的特务翟玉明看见。翟去城里报告，在五里庙正遇上刘继春的大队，便报告了我的情况。刘继春率队跑步进发包围了

我村。我村李春清大哥向我报告敌人已把我包围，要我赶快走。我俩闻报出院向北，行至街里，敌骑兵从村北头进来。我们开枪将敌人打下马来，便向赵堂方向大步走去。经过赵堂、宁仓、徐良府，前有骑兵堵截，后有步兵尾追，一路被敌人包围六次，都又冲出。至徐良府路沟里又被敌骑兵堵住，刘春腿部挂花，我掩护他出了路沟。走至该村石碑前，又有敌人在前面截住，被我打散。我叫刘春隐蔽在徐良府中街，我向东冲去，至村东头，也隐蔽在尹士珍（我地下工作人员）家后院半间小黑屋内草苫子后边，并找了一把三个齿的粪叉子，准备与敌人拼死。敌人到院翻了两次，但未翻小屋，我幸脱险。敌人撤走约二十分钟，我即又回到我村。刘春被敌人俘虏，缴去匣枪一枝。敌人又从城里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来解刘春同志。当时，我村准备救出刘春同志，因只有两发匣枪子弹，无力战斗，急得我火冒万丈，只有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敌人解走，随后，我只身一人奔赵家海去了。敌人把刘春解到阳谷城里，叫医生给他治伤，很好优待，并劝他投降。刘春同志说：“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的志气不可丢！我在你们手里，愿杀就杀！向你们这些卖国贼投降——你们死了心吧，绝不可能！”因刘春是个通讯员，加之我的营救，二十多天后就放回来了。

救二弟笔战董政华

1944年春，我二弟李春岳回家，被翟玉明查清报告了刘继春，刘派了一个中队把我二弟捕去。当日，我情报六分站向我报告了情况，我经过再三考虑，认为汉奸头子都是有钱户，一怕事，二怕死，怕抓家属，三爱财；抓住他们这三个弱点，决定以笔战的方法向敌人进攻，便立即向组织回报了自己的想法。经批准，向伪区长等汉奸头子发了8封信，施行了恫吓。信的主要内容是：一、说明了八路军的政策从来不危害敌人家属；二、八路军不怕抓，不

怕杀；三、抓家属是你们引起的；四、我的家属在5天以内你们要杀掉，如不杀掉5天以后把你们家属全部抓走。这个办法还真灵。伪区长开会作了研究分析，然后集中去找伪县长董政华说：李程九能争取，别人不好出去给他送信，他弟弟李春岳现在我们手里，最好让他弟弟送信把李程九争取过来。董政华听了这些伪区长的话，写了篇32页的长信，警察局长曹洪彦也写了一封三十多页，以请客的方式把我二弟叫去。吃喝后，把信交我二弟送出给我。我看后交给军分区胡政委，由他起草写了回信。董政华、曹洪彦接信见幻想破灭，从此再不来信了。

董政华在阳谷反共有功，1944年秋被提升为烟台道尹。省派来伪县长朱璞如，时间不长，朱被调走。又派来伪县长牛占成，不到7个月又调走了。最后一个伪县长是王润九，打开阳谷城被我们俘虏。

枪打特务翟玉明

翟玉明是阳谷城内西南园人，他岳父高星臣与我同村。翟自幼当土匪，而后干了剿共特务队，死心塌地为敌效力，专与我军作对，多次报告我军活动地址和情况，光报告我就有数次。我们决定把翟除掉。侦知翟玉明经常去焦家海东围子他仁兄弟刘二虎家（因与刘妻通奸）。1944年春某天我带手枪队20人，埋伏在城北郭庄。早饭后，翟玉明由东焦进城，路过郭庄西头，被我手枪队张万岩同志发现，当即尾跟，至谷庄用三把匣枪第一枪打中翟胸，第二枪打在其头部，翟玉明栽倒在地，鲜血流出，并流出来同脑子一样的东西。张万岩只说是脑子被打出来，认定翟玉明已死无疑。陈广增同志跟上，说再打一枪。万岩同志说，脑子都打出来了，一定不会活的，子弹不好买，不要再打他了。张、陈二人走出不到二百米，翟玉明起来就跑，跑出不到三十米又栽倒了。

城里敌人闻枪声马上接出。我整队到我村召开了个群众会，说明枪打翟玉明的原因，就回赵家海一带去了。原来翟玉明被打两枪并未伤及心脏和脑子，他早晨在焦家海刘二虎家喝的粉浆糊涂从口中吐出与血混在一起，张万岩同志误认为脑子被打出来。翟玉明不到五十天的时间医好了伤，又带着8名特务各佩匣枪至张家海逮捕了我情报员张俊田同志，用棍子拷问我和张万岩家属的住址，准备逮去与张俊田一块枪毙。翟把张俊田捆起来带到唐庄（付唐），由两个人看着在大路上等候，其余6名特务进了唐立朝的家。唐立朝的侄唐玉明正在屋内睡觉，被敌人一枪打死。那天我正在唐庄整站，隔着两条胡同，枪响打死人，我们并未知道。午饭是请张万岩爱人擀的绿豆面条，突然跑进一个小孩向我报告，说张俊田在路上，有两个人持枪看守他。我闻报即出胡同，看守张俊田的这两名特务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答是老百姓，一面从腰中取枪。其中有个叫唐天堂的认识我，喊了声：“不好，是李程九在这里。”二人向张俊田打了两枪未打中，即向南跑了。我把张俊田绳子解开，他即随我们参加战斗了。枪响后跟我的人都出来了，我命令张万岩向南追那两名特务。唐玉明的父亲在他大门外与我们使眼色，说家里还有人。话未落地，敌人从大门里向我射击。我喊声“冲啊”，敌人跑了。我带领5个通讯员追至杜家庄，王子仪据点的敌人接了出来。因为唐庄是敌占区，离城近，不便久战，我们撤回，敌人未敢追，我们集合回到根据地。我们刚走，城里的特务队长王宝乾（石门宋鲁坊人）带队支援，抢了群众粮食数车，包袱多个，撤回城里。这次战斗我无损失，军威大振。

打死特务刘二虎

刘二虎名刘根学，东焦海人，是日寇司令部探子。1943年他曾两次带领鬼子六十余人，全副武装乘汽车到秦家海抓我们的区

长张金榜同志，幸张金榜道路熟未抓住。我曾利用关系争取他，但未争取过来。日寇调走后，刘又给治安军作侦探，坚决与我军为敌。为此，组织上决定把刘除掉，派我带领5名同志各带匣枪至杜庄潜伏。这天小迷阵集，杜家庄布怀明赶集回家对我说，刘二虎在迷阵赶集哩。布是无心说，我是有心听，随派李清奇、刘春二人速去迷阵集上，恰巧正遇上刘二虎。刘春上去抓他，刘二虎说：“我是城里的探子。”刘春说：“我们是城里探子。你是城里探子，有证明吗？”刘二虎在腰里拿出了证明。刘春说：“咱们都是城里的，一块走吧。”刘二虎要去王子仪据点，刘春说：“咱们向东去吧。”刘二虎害怕了，大哭起来，哀求说：“不要打死我，叫我咋办就咋办。”刘春、李清奇把刘二虎带到唐庄高粱地里枪毙了。刘二虎本系李清奇的舅，李清奇看到刘二虎未死，说：“舅呀，舅呀，我再给您一枪吧。”照刘二虎头上打了一枪，刘气绝而亡。

铲除特务“赛貂蝉”

“赛貂蝉”本是敌人派出来的女特务，原是伪警察局长葛传祥的女人，长得很漂亮，人称“赛貂蝉”。她丈夫死后，受了特务训，后派到娘家董家营住，经常赶赵家海集，专门勾引我军人员。对“赛貂蝉”的情况了解后，我派李清奇同志接近她。“赛貂蝉”把李清奇引到家，先做好吃头给李清奇吃，然后引诱李清奇。“赛貂蝉”问李清奇：“你有爱人吗？”清奇说：“穷八路哪里来的老婆？”“赛貂蝉”说：“您要不嫌我，咱两个结婚好吗？”清奇答应说：“求之不得，但我的领导可能不同意。”“赛貂蝉”说：“你的领导不同意好说。我有小麦三千斤，款二千元，你带着匣枪我们两个去城里，最低受奖二千元。这样，我们两个有小麦三千斤，现金四千元，能维持半辈子生活。”并进一步说：“您知道，谁打死李程九赏金票二万元，这样我两个就能维持一辈子的好生活。”李清

奇对我回报了“赛貂蝉”这些企图，我们研究决定把她铲除。第二天晚上，我带领3名同志至董家营“赛貂蝉”住处，敲了三下后墙，“赛貂蝉”开了门。她见是我们非常害怕，我向她问明了李清奇回报的情况，“赛貂蝉”供认不讳，便把她当即处决了。

巧取周庄伪据点

周庄伪据点属二区。伪区长武子才，系城西武庄人，此人很狡猾，轻易不在周庄据点，却经常住在阳谷城里，由区团副卢其祥（外号黑头）住该据点。据点墙高一丈五尺，壕宽深各4米左右，设有吊桥，住有伪军一百余人，长短枪八十支，非常坚固，不易攻破。

1944年12月，林路和苏超同志升级后，调张致清任阳谷县大队副，胡泮生任副政委。县大队有两个连二百余人，后又从三区队升级一个中队，成了三个连。这时，我大队和三团都住闫楼姜家庙村。三团政委布克和大队领导张致清、胡泮生等同志一起研究分析，认为周庄离城近，有麻痹思想，城里伪军也容易增援，为避免伤亡，强攻不如智取。先由我带领刘春、李清奇、张俊田、小杨六等4名通讯员，化装成伪军特务模样，由我们派入的伪乡丁胡长寿同志携带面、肉，头前带领，五日下午约4点到了据点，门前4个岗哨喊了声“立正敬礼”，放我们进去。刘春同志随之下岗哨的枪，李清奇把守大门，以便打起来好出去。我带张俊田、小杨六进了据点找队长。正好卢其祥进城有事，不在据点内。我们找着伪小队长孟广月说：“我是李程九，今天来解决你们这个据点。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孟广月吓得浑身筛糠。我命令他把伪军徒手集合起来，孟广月照办了。伪军站好队，我喊了声“向左转一起步走”，把伪军开出据点门外向北墙东头集合，并拉起吊桥，伪军一个人也不能出入。等三团和大队队伍开到周家庄，把伪军带

到三教寺，晚饭请伪军会了餐，由布克及胡泮生二位政委向伪军讲了话，愿留的当兵，愿走的发路费，结果走了一半，留下当兵的约五十余人。此次俘虏伪军 102 人，缴获长短枪八十余支，子弹二万余发，手榴弹二千余枚。

攻打古柳树伪据点

古柳树据点设在地主家，内有堂楼 3 间，平房 30 余间，院子宽阔，围子高大，有两道围壕。壕深约一丈三尺，壕底安设两头尖的木桩，人掉在壕里就会被木桩穿透。为防我军攻打时好接近，据点周围一百余米的民房全部拆除。1945 年 2 月，为扫平城外据点，我六军分区刘志远司令员率领一、二两个团攻打古柳树、朱庄两个据点。古柳树守据点的是伪警备队中队长张子刚，约一百余人，枪支齐全，仗恃墙高壕深，围子坚固，量我军不易攻破，不听我军劝告。二团四连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起强攻，刘司令员站在据点壕沿上指挥，左手受伤。不到两个小时据点被攻破，张子刚和伪军全部被俘虏。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子弹万余发，手榴弹三千余枚。张子刚被押出据点，群众都拿剪子、刀子向他刺去，张子刚退到壕边掉到壕里，被木桩穿透胸部，死在壕下。

五打朱家庄，活捉孟宪章

伪八区区长孟宪章系阳谷城里南街人，在家礼二十二辈，认识人较多。孟与阳谷的国民党矛盾较大。我 1937 年由鲁南回阳谷做抗日活动时，孟宪章正被国民党押在监狱里。经人介绍说孟宪章这个人能够拉枪拉人，组织起来做抗日工作。那时还是韩复榘派的县长杨霁峰，我找杨霁峰提出来，孟宪章在抗日时还是有用的，请把孟宪章放出来，组织队伍抗战为好。杨霁峰将孟放出

来了。开始，孟宪章去莘县西争取过有三百人的土匪宋继成，未争取过来，又同我去薛家庄动员孙雅亭拉起来有二十八条枪。而后再动员组织布永言拉起了千余人，有长短枪千余支。范筑先把布收编为十九支队，以布永言为司令，孟宪章为参谋长。孟宪章身躯粗笨，当参谋长跟不上部队，范司令又调他到司令部被服厂任厂长。1938年10月聊城失守，孟宪章跑到济南开旅馆。这是孟宪章前一段的历史。

1941年孟宪章从济南回来，当了汉奸八区区长，在朱家庄东头地主李守正大院安设了据点，住伪军八十余人，枪支俱全。据点很坚固，有北楼五间、东楼三间，墙高二丈，院有大墙，沟深一丈五尺，沟外设有鹿砦，四不靠邻，很难接近，不易攻破。我带队伍曾经打过四次都未打开。1941年春，我们把榆树当中挖空装上土药和秤砣，用大车拉到朱庄据点西边，夜间喊话要孟投降。孟不听，我们就开炮了。炮响后，把榆木大炮炸飞了，未打成。第二次，用铁佛砣土火炮装土药，冯子胥造的茶碗大的木把炮捻炮弹，夜间去打朱家庄，炮弹打过了，未落在据点内，又未打成，把队伍撤回根据地大杨庄。1942年环境恶化，我们部队活动困难，我曾利用关系找孟宪章谈判。据点内只准我一个人进，刘春在我地下关系张景亮家等我。伪军排队站在吊桥以外，真是弓上弦，刀出鞘。我进吊桥后，孟宪章在门洞里等我，还有十一支匣枪警卫。我与孟见面后，被领进北楼他住室，我把枪放在铺上，他的警卫撤走了，我们开始谈判。我说当汉奸没有好下场，将来我军必胜，日寇必败，您要留出路。孟活动了。我提出我们个别人在紧张时来朱庄据点不要管，孟答应了。那时刚过旧历年，吃了他一顿韭菜水饺，他以点心两盒、茶叶一瓶送我出来。后来，我二区区长袁新斋在敌人扫荡时住到朱家庄街里，安然无恙。而后袁新斋同志在朱家庄征公粮，用大车往外拉。伪县长董政华知道后，说孟宪章通八路，要抓孟宪章，以后孟宪章变坏了。

1945年2月，军分区刘司令带一团主攻朱家庄，二团打聊城的增援，大队打阳谷的增援。上午8时，以轻重机枪、平射迫击炮作掩护，开始发起进攻。三次攻击，突击连伤一个排，迫击炮打燃据点内房子多间，浓烟四起。炮弹打完了，据点北楼尚未打开，聊城援军已到安乐镇。司令部首长研究撤退，我也参加了，并提出：一、据点房子已被打燃，敌人惊慌失措；二、我们有两路打援军的队伍；三、我们打不下，敌人更疯狂，老百姓吃不消；四、我们可以用政治争取的办法使敌人缴枪。首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派通信员去刘庄把郑云泽（与孟有关系）请来，我们二人进围子喊话，敌人不打枪了。我们要找孟谈话。孟身体胖，上不来楼，孟派代表杨寿山到楼上与我们谈。我们说明了八路军的政策优待俘虏，交枪不杀，我与郑作保。孟同意了，把队伍全部拉出来交枪投降，我领着孟见了刘司令员，把孟带到薛家庄司令部。首长请吃午饭我作陪，其他伪军按优待政策解散回家。这次战斗，俘虏伪军85名，缴获长短枪87枝，子弹万余发，手榴弹二千余枚，为群众除掉一大害。

打开阳谷城

阳谷城被敌人占据6年之久。城内住着重兵，除阳谷伪军三四千人外，还有朝城伪县长刘金岭和寿张伪县长各有伪军数百，经常四出抢掠烧杀，附近几个县的广大人民非常痛恨这些敌人，要求我军早日拔掉这个大据点。1945年旧历六月十三日，我冀鲁豫军区曾思玉司令员，率领一个纵队约五千人，除留一个团的兵力防备聊城打增援外，配有大炮、轻重机枪自东北城角发起攻击，炮声隆隆，机枪哒哒，响成一片。冲锋三次，均被敌人反击回来。第四次冲上去一个排，延伸至东城门楼，又遇敌人反冲锋，我军排长抱着机枪，从东城门楼上跳下，机枪摔坏，人也牺牲了。为此，

我军改变了战术，在城东北角佯攻，吸引住敌人重兵，却从城西北角攻进城内。敌人发现我军进城，刘继春率领伪警备大队二千余人撤回他的城内据点。治安军团长张玉环，带该团八百余人同我军拼杀，在苦奶奶庙前来回打了三个回合。治安军伤六百余人，张玉环率残部退入他的据点范家公馆固守，妄图负隅顽抗。我军占领了天主教堂制高点，向敌据点内射击，并喊话进行政治争取。张玉环一看不好，把他母亲、老婆、孩子集中在一起，全部用匣枪打死，他自己也自杀了。结果拿下据点时，俘虏治安军 72 人，其余全部被我击毙。我敌工部利用王耀一的关系，使刘继春部全部投诚。阳谷城至此收复。此次战役，俘伪县长王润九、日本顾问“大胡子”和伪政府人员全部，俘伪军二千余人、治安军 72 人，缴获迫击炮 6 门、轻重机枪 29 挺。城外据点看到大势已去，也全部投降。全县广大群众杀猪宰羊慰劳我军，敲锣打鼓庆祝解放。

回忆抗战期间，我军广大干部和战士同甘共苦，冲锋在前，不怕牺牲。仅我知道，在战场上牺牲的团级干部就有徐翼、齐南峰、林路、王克寇、刘克魁、赵刚、谭文朗等同志，营、连、排级干部及战士不下数百人。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是烈士的头颅和鲜血换来的。

附录：一、敌伪头子名单

敌伪县长 董政华，在阳谷五年

朱璞如，在阳谷两个月

牛占成，在阳谷三个月

王润九，在阳谷一个月，阳谷战役被俘

警察局长 曹鸿彦、葛传祥

特务长 王成山

督查长 卓云南

警备大队 总大队副刘继春、大队副王耀一、刘继梅、韩子

章、郭守坤（现在香港）

治安团团长 张玉环

大汉奸 郝师温、刘学来、张景凤、方明月、任道明、吕汉卿、熊仲甫

伪区长 吕继全、武子才、张万言、李序寅、岳子敬、郭安仁、郝超、孟吉丰、杨季昆、孟宪章、孙炳伦

二、我抗日县、区长和县大队领导人名单

抗日县长 齐南峰、徐翼、岳舜卿

书记 正申云浦、副赵凤升

正徐明、副黄主一

正靖浩然、副杨钦

正赵姚（与齐南峰同时）

正王伯谨、副杨钦

抗日区长 二区徐亚周 区队副姚宪章（宝章）

三区王筱湖、李志深、赵士森 区队副王月营

四区王子恒、姚士春、刘斌 区队副杨文胜（叛变）

五区武仲景、霍自勉

六区屠士奇、张金榜、刘瑞峰（刘钢） 区队副田庆海（叛变）

八区崔才、武子升

十区武克（兼区队副）

十一区霍兆魁、副区长刘秀峰 区队副吴文德、孙道盈

抗日大队副 李程九、王子奎、李春俄、林路、张致清

政委 张新吾、张健民、王良、苏超、胡泮生

三、1942年我区队副和指导员名单

区别	区队副	区队指导员
----	-----	-------

一区	薛庆河（现在家）	缺
二区	雷朝荣（牺牲）	缺
三区	刘清彬（现在林业部）	吴勇（据说现在北京工作）
四区	赵德胜（已死）	刘广福
五区	薛庆兰（已离休）	于军（牺牲）
六区	张继勇（现在四川）	缺
七区	缺	赵凤臣（现在阿城照像）
八区	杨顶章（现在河北省军区）	王永法（山西人，回家）

（李程九，阳谷县杨庄乡大迷阵村人，1995年病逝。生前系阳谷县政协驻会常委，本文是作者应政协文史之约所写的回忆录。）

我的经历

李程九

我叫李程九，原名李春鹏，现年84岁，中共党员，阳谷城北大迷魂阵村人。幼年时代，家庭地少人多，生活极为贫困，二十口人仅有二亩半沙地。9岁时承蒙恩师张守经，免交束修（即学费）准我入学，在私塾刻苦攻读7年半。虽然学业优良，终因衣食无着，生活困难，几位叔父带领二弟逃难东北，同年春我18岁时也去沈阳谋生，流落沈阳硫酸厂做工。因我勤劳好学，重义气，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该厂老工人地下党员逢焕宣于1931年春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刚刚占领北大营后，硫酸厂党的领导逢焕宣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立即带领本厂党员杜洪江（济南洛口人）等同志和部分工人转移通辽县，配合东北驻军二十旅参谋长×××（地下党员）和通辽警察局长蒋连瑞（党员），组建了近三千人的义勇军，番号是“东北义勇军第八路军”，蒋连瑞任司令，参谋长隋开运，我任副官长。由于党的宣传教育，部队士气高昂。

因为当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独霸世界的野心和战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产生了军事上的幼稚冒险行动，采取了固守城池的阵地战，但给疯狂的日寇造成很大威胁，使日军出乎意料，受到不能容忍的打击。日寇为了扫除障碍，顺利占领全东北，立即出动30架飞机，数十辆坦克，一万多步骑兵，进行了残酷的围歼战，我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幸存者无几。

我冲出包围圈后，在郊区的一个村，巧遇阳谷老乡董万河夫妇（爱人尹氏阳谷东街人），留住他家隐蔽起来，董万河帮助找部队，听说全军覆没，东北军奉命撤退关里，在东北无法存身，我便决定回关里来找组织。承蒙董万河夫妇多年积存的5块现洋送作路费，经营口到烟台。

在烟台旅馆遇到韩复榘第三路的一位军官冉传优，他见我天天扫院子，干零活，诚实勤快，产生了好感。经过数次交谈，又知道是跑散的义勇军，有强烈的爱国热情，敬慕之下更加喜爱。冉代我交房费，管吃饭，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至交。冉再三让我跟他到第三路军干事，但为了寻找党组织，我婉言谢绝。事后，冉移防掖县，约定安排好来信，叫我去找他。

我在烟台举目无亲，人地生疏，难以找到党的组织，又无谋生门路，于是决定去掖县找冉。抵掖后，冉传优热情接待，并又动员我参加第三路。就在这时见到冉和掖县警察局长黄云阁时常往来，关系甚密，我便托冉传优介绍到警察局当兵，冉欣然同意，局长也立即应允。警察局长思想较进步，有正义感，待我甚好。不久，适赶警察局长书记（即文书）请假不归，黄便提我接任。任职期间因公事常和法院书记官黄星一打交道，黄星一为人正派，有爱国思想，逐渐和我成为密友。黄星一因县长阴险狠毒，辞职去鲁南三专署投奔张里元专员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我在掖县很受局长重用，可是后来因查禁烟土和赤色嫌疑，得罪了地方势力派，局长设法让我脱险。离掖后我便去鲁南找黄星一，到黄家后经黄介绍结识了在沂水教学的汪洋（即汪洪波）和三专署行政科员崔和敏（即崔介，濮县人）。他俩是地下党员，时常到黄家聚会，汪洋同志对我了解后，又因是老乡，感情很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于1936年6月介绍我重新入党。入党后曾随汪洋和李××（掖县人）去青岛崂山一带进行工运活动。1936年我曾将徐化鲁（阳谷徐良府人，在临沂乡农学校任教官）介绍给汪洋，不久徐化

鲁也入了党，徐在抗战期间曾任淄博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7月中旬，汪洋派我去掖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去时通过军法处长黄星一领取了三专署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委任状和军衔、军服，全副武装前往掖县。抵掖后和老同事以及九中校长高象九经过一番努力，未能奏效，返回鲁南向党组织汇报。汪洋又考虑阳谷地处津浦、平汉、德石、陇海四条铁路的中心地带，比较偏僻，阳谷党的工作基础好，鲁西又富有革命传统，群众容易发动，于是1937年8月改派我回阳谷家乡进行抗日活动，并通过黄星一请示张里元专员，仍以三专署名义进行活动。

来阳谷后，我看到阳谷已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高潮。于是便立即和抗日救国会取得密切联系，又根据汪洋同志的意见和八乡师党员司银章、焦玉美见面。经过短时间的联络发动，有近百人自愿带枪参加抗战，我认为若以阳谷为基地，在鲁西拉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于是决定立即回鲁南向汪洋汇报。同时为了活动方便，更好地利用三专署张里元，又邀请了搞武装的代表杨寿山（外号杨胡子）、李春谭、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孟昭功（即孟子华）、孟光诰、段鲁猷等7人去三专署（除司银章因另有南下任务未去，其他都去了）。向张里元汇报后，他喜出望外，设宴招待，并主动拨款一千元活动费，发三百张空白委任状，鼓励我回鲁西大胆干，并嘱咐：和范专员配合好，你们走后我马上派人在六专署东阿城内设办事处；又说：经费不够随时派人来领，队伍扩充多了，我们可以给一部分枪支弹药。党的领导汪洋指示：继续利用三专署名义，依靠阳谷党组织。八乡师的学生焦玉美、段延铭、司银章、管修林、谷传员都是党员，东街孟广生也是，必要时找他们，阳谷党员很多，段延铭可能知道一些。注意和范筑先联络，范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为人正直，富有爱国思想，在沂水当县长时勤政爱民，两袖

清风，一尘不染，深受群众拥戴。做好他的工作，一定会和我们一同抗战到底，他在沂水时我已设法作了一些范的争取工作。张里元正统观念强，思想顽固，敌视共产党。对他要提高警惕，将计就计，采取利用反利用的态度，但是也要尽力争取团结。去鲁西后，环境可能急剧恶化，要有单独作战的精神。

起程前，为了工作需要，我在临沂买了二百条武装带，来阳谷后又买了一支三把匣枪。不几天张专员便在东阿旧城设立了第三专署办事处，范筑先专员责成专署经理处崔乐三处长专门和我联系。就在这时，社会秩序动乱不堪，旧政府、军警奉命南退，土匪四起，会道门兴风作浪，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稳定局势，我立即让孟宪章通知自愿带枪参加队伍的人员集合。以布永言为首的集合在大布一带，同时又通过城东薛庄孙雅亭发动了数十人枪，这时和三专署以及鲁南党组织已无法联系，范筑先也不愿我回鲁南，留我在经理处工作。

有了武装，我和崔乐三根据司银章和赵凤升的建议，借薛庄集合队伍之机，召开学生和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全体大会，动员参军参战。可是没想到薛庄自愿参加队伍的人不慎泄密。正当抗日救国会的人去薛庄集合的那天早饭后，薛庄周围各村的黄沙会带着红枪大刀集合在薛庄北门外，气势汹汹，看到外来的人就要杀要砍，我和崔乐三处长耐心地向黄沙会解释，避免了冲突。但是开会地点被迫转移到范海。由于黄沙会的干扰，很多来会的学生被截了回去，在范海集合不到一百人。对开会的人每人发了两元生活费，因参加会员未到齐，临时决定延期一天。可是当天晚上又被黄沙会包围起来，结果会未开成，仅将有枪人员带到阳谷西关，并和当地民团郭安仁部、土匪刘贵安取得联系，约定互不侵犯。

布永言拉起队伍后，因为我无暇亲自掌握部队，曾一度被国民党省政府内的汪派李英臣拉拢收编。

1937年冬，我和崔乐三随同范筑先专员去冠县收编了进步人士掌握的北杆石鸿典部，编为第六专区抗日第五支队（相当旅），后派盛北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又和范司令冒着生命危险，说服收编了冠县南杆韩春合和堂邑土匪栾省三部，分别编为第六支队和独立团（濮县七里堂战役后因栾有战功，将独立团改编为支队，栾提升为支队司令），这时我在六专署经理处工作。

1938年3月，农历二月二，布永言、刘贵安、毕金海、李英臣等部在国民党反动派纵容指使下，联合攻打阳谷。我闻信，特地赴聊向范汇报，行至石佛和范相遇，范司令正率队去围攻阳谷，我随同返回。独立营、五、六支队将阳谷城团团围住。围城第一天，我便请命进城说服匪部弃暗投明，范司令不忍让我冒险，经我再三请求，才得范的准许。我只身入城会见匪首，经数次往返，排除了国民党汪派的阻挠和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收编任务，编为十九支队，范调任我为十九支队上校军法处长。

1938年5月前后，范认为我有胆识、有能力，便责成我去河北省大名县整顿十五支队，开辟新区，扩大战场。我受命后仅仅带领3人就完成了任务，制止了该部司令的叛变阴谋，以及部下牵牛架户、扰乱社会治安的作恶行为，同时推荐杨寿山任大名县长。6月下旬，我去濮县前线王堤口村向范回报后，受到范司令的称赞和表彰，调我任十五支队上校参谋长，并责成我负责主持大名一带军政工作和地方治安。

1938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春和王金祥指使阳谷赵长衔（即忠孝团头子赵二虎）去济南勾通日本特务机关，攻进聊城，范筑先中计牺牲。聊城沦陷后，王金祥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共反人民，制造摩擦。他篡夺了专员职务，占据了阳谷、莘县、寿张、濮、观等县，在他盘据的范围内，排斥异己，残杀进步人士，扣留杀害共产党员。在莘县杀害莘县县长吕世隆和地委负责人张炳南同志；准备扣杀阳谷政治部黄主一、余文伟、豆洪年、张敬宇

等同志时，我闻信又借第三专署的名义，将黄、余、豆、张同志以及去南宫受党训的张新吾等十余人亲自送到莘县烟店，脱离险境。我回阳谷后，继续坚持活动，暗地发动群众，团结青年学生，阻止国民党反动派和我们争夺青年。

1939年春夏，我和赵凤升数次去冠县鲁西特委（当时冠县城内大隅首西南角是鲁西特委住地）、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即十支队）联系。阳谷沦陷后，我去冠县汇报情况，鲁西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指示：回阳谷后立即组织抗日游击队，迎接我们抗日县政府的成立。我回阳谷后不几天，发动城北三里庄张清彬等建立了近百人的抗日游击大队，和谷山游击队配合活动。是年秋，我发动和指挥联络阳谷丁团、王团、刘保敬部和谷山抗日游击大队转攻县城。丁团、王团攻西门，谷山游击队攻北门，刘保敬打南门，我率张清彬部攻打东门，并攻到东街小隅首。但是由于攻城部队多是新兵，没经军事训练，未能实现攻克县城的计划。

1939年秋，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不久，我配合地方党组织收编了近500人的民团和绿林武装，组建了阳谷县抗日独立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我任营长，张新吾任政委。

1942年调任军分区军事参议兼做军事情报工作，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了从城内到村镇直达司令部的军事情报网，对袭击敌人、打击汉奸，进行反扫荡起了重大作用。

1943年至1945年先后任阳谷、聊城大队副。

1945年冬，聊城、阳谷、东阿三县县大队合编为军分区二团，我任团参谋长，改编后接着对聊城进行了两年左右的围困战。直到聊城解放，鲁西平原的残敌全部歼灭，我才结束了戎马生涯。

1947年调四专署建设科工作。济南解放后任齐河县建设科长，在齐河县经邵俊东同志介绍再次加入共产党。我的两次失掉关系都是为战争年代和工作迫不得已而造成的，但是在暂时失掉关系时，始终严格地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出生入死，为党的

事业努力工作。

抗战期间，由于我们兄弟一齐参加抗日，又经常攻调堡，打据点，截击日伪，活动在敌占区，敌人对我恨之入骨。汉奸将我祖父杀害，全家逃难7年之久，抄家12次，为革命我家四人献出了生命。

全国解放后，我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遭到陷害，但始终坚信党是英明的，自己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粉碎“四人帮”后给我平了反，恢复了党的关系。我一生中虽受点挫折，但与无数牺牲的战友和革命烈士相比，我得到的太多太多。时已暮年，写点回忆录，为党尽微薄之力。

1989年11月

对关于李程九同志材料的更正

段延世

《苍山文史资料》第六辑赵昭同志在《抗战初期兰陵第一支队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斗争》一文写道：“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声，标志着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开始。我听到消息后，就从蒙阴坦阜东门到国民党临沂专员公署军法处去见崔和敏（即崔介）同志，并接受了任务，与李成九同志一起到平度、掖县一带，协助汪洋同志收编那里的零散部队。为了工作方便，通过军法处长黄星一，给我弄了个张专员少校副官的头衔。我们刚到掖县，李成九就带着活动经费不辞而别了。我只好独自去平度，但没有探听到任何消息，然后又到掖县找到了汪洋同志，当时汪洋手下并未收编到任何部队。汪洋同志介绍说，崂山里有一股土匪，我们想收编他们，并叫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当我到了青岛四方区，听说日本军队已经登陆……，我根本无法了解情况。当即乘车回到了潍县，次日骑自行车到了临沂，在崔介、韩云非等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7月下旬又派我协助杨只晨同志（即杨文同志，他当时弄了个张专员部少校参谋的头衔）在兰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3月……四支队的司令员洪涛、政治委员林浩接见了我们，把我们改编为一个小团，直接领导三个连，团长钱钧，政委汪洋，宋伟、谢辉和我分别任一、二、三连连长。”

其中涉及到李程九（文中写作李成九）同志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为了澄清历史和对革命前辈负责，特作以下几点说明，并简略介绍李程九同志的革命历程：

一、崔和敏（即崔介）是在三专署行政科任科员，并不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工作。二、黄星一原在掖县法院任法官，1939年去临沂投奔张里元专员，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先后任法官和处长，是我党的利用关系。原来黄有正义和爱国思想，经常和汪洋、崔介接近，思想比较进步，但是他后来倾向国民党和我们作对。李程九和黄星一关系较密切，是在掖县认识的。李在鲁南做地下工作时常住黄家，汪洋、崔介也常去黄家。三、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至韩复榘、沈鸿烈南退前，掖县、平度并无零散部队。韩复榘退后，掖县、平度是否有零散部队和派人收编就不知道了。四、1938年3月，鲁西、鲁南乃至山东全省国民党统治区域没有公开的党直接领导并实行政委制的部队，只有党秘密组织掌握的游击队。这种游击队，只是根据人数多少和编制大小，设政治部主任、教导员、指导员，通过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据我所知，李程九1936年由掖县去临沂重新入党后，随同汪洋（即汪洪波）同志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活动，并同汪洋和掖县沙河镇西门外路北的李××去崂山进行工运活动，李××被害致死。

芦沟桥事变后的第四天，因为李程九在掖县有亲戚，社会关系较多，汪洋派他去掖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去时是李程九单独前往。为了活动方便，行前通过黄星一领取了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军衔、军服及武装带。抵掖后活动了半个多月，先后和老同事以及省立第八中学校长高象九会晤（高是进步人士，曾因赤色嫌疑被搜查），他们都有抗日心愿，但是由于国民党县长刘国斌思想反动，控制严密，工作难以开展，高校长认为条件不成熟，建议李暂时回鲁南。

李程九返回鲁南向组织汇报后，汪洋又考虑阳谷地处津浦、平汉、德石、陇海四条铁路线的中心，党的工作基础好，鲁西富有革命传统，因而改派李回阳谷家乡进行抗日活动。经黄星一请示

张里元专员批准后，便于8月份以三专署副官的名义来家乡活动。

李程九来阳谷后立即和学生抗日救国会取得密切联系，又根据汪洋的意见和司银章（八乡师党员）、赵凤升等取得联系，利用杨寿山等经过短时间的联络和发动，有近百人自愿带枪参加抗日队伍。李看到阳谷群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认为以阳谷为基地，在鲁西拉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有可为，于是决定立即回鲁南向组织汇报；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三专署张里元专员，又邀请了搞武装的代表杨寿山（外号杨胡子）、李春谭、学生抗日救国会代表孟昭功（即孟子华、孟光浩）、段鲁猷、司银章等7人向三专署张专员汇报（司银章因党内有任务未去）。

走到曲阜城东××村常××家中给张里元打电话，张立即派车接到临沂，汇报情况后，张喜出望外，设宴招待，并主动拨发一千元活动经费（多是民生银行，山东省省库纸币）、空白委任状三百份，并指示李程九返回鲁西后，注意和第六专署配合，避免引起冲突，又说：“你们走后，我马上派人和范专员联系，并在东阿设立三专署办事处，经费不够时可随时派人来领，扩充的人多了，我们可以发给一部分枪支弹药……。”

李程九挤时间向汪洋作了详细汇报，汪十分高兴，并作了新的指示：“继续利用三专署名义，但是第六专署或其他方面有阻力，可随机应变。注意依靠地方党组织，阳谷党员很多，注意联系配合，协同活动。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范筑先专员原来是西北军冯玉祥部下，为人正直，在沂水当县长时，勤政爱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人士，做好他的工作会和我们一道抗战到底。张里元思想顽固，正统观念强，敌视共产党，我们要提高警惕，采取利用反利用的对策。万一和党失掉联系，要有单独作战的精神……。”

李程九等来鲁西前，为了工作需要，买了二百条武装带，回阳谷后又买了一只三把匣枪。来阳谷不几天张里元便派人在东阿

县（旧城）设了办事处，范筑先派经理处长崔乐三专门负责和李程九以及三专署办事处联系。

李程九领取的活动经费除了买武装带、短枪外，还支援学生抗日救国会三十元，发给参加薛庄会议的学生每人两元，其余用作路费，事实上活动费并不够用，后来活动所用多是李自备。我县的老前辈杨耕心、盛北光、申云浦、王筱湖、段延铭、孟广生、赵凤升等很多人都是自备费用进行地下工作和抗日活动的。

李来阳谷不久，山东省局势急剧恶化，各县军警奉命南退，与鲁南的党组织无法联系。此后程九同志在鲁西坚定不移地跟着地方党进行抗日活动。在范筑先将军牺牲前，协助范专员收编了一个独立团、三个支队，又在大名整顿了一个支队，开辟了新区，扩建抗日武装近万人。与此同时，向范筑先推荐了一名少将支队司令和一名大名县县长。聊城、阳谷沦陷后，根据鲁西特委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的指示，为迎接阳谷县抗日县政府的成立，创建了近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日寇占城不久，李主动联合本县丁团、王团、刘保敬部以及谷山游击队，攻打阳谷县城。阳谷抗日县政府成立后，李又为党收编扩建了近五百人的独立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李任营长，张新吾任政委。

战争年代，李曾任县大队副、团参谋长等职，驰骋疆场，浴血奋战，亲自率队攻击青杨李、西关、王子仪、石门宋等据点十余处，作战无数次。在李的影响带动下，其兄弟四人和前妻杨氏一齐参加了抗战。为抗日其祖父被汉奸杀害；二弟做军事情报工作，积劳成疾，早年亡故；三弟李伦转战南北，保卫延安战役中壮烈牺牲；四弟抗日杀敌时身负重伤，文革期间被摧残致死。战争年代被敌人抄家十数次，全家流亡七年之久。

据我所知，李程九同志从东北义勇军被敌人围歼后，先后两次为工作被迫失掉组织关系，两次重新入党，两次含冤受害，文

革结束后平反，恢复党的关系。在失掉关系期间，组织上和政府以民主人士对待，而他本人始终以党员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革命道路，即在文革期间被诬为反革命，挨批受害仍然不计个人恩怨，坚信党的政策，安心工作，以良心对待革命。程九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老同志，是党培养起来的好战士，阳谷著名的抗日英雄之一。程九同志投身革命，戎马半生，我县党史、文史都有关于他活动的大量材料。我们对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劳苦功高的革命战士，应该实事求是地给予公正的评价，以慰其暮年。

我之所以了解较多，是因为从 1937 年 8 月和司银章、赵凤升等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相识后相处数年，上述材料有的是彼此交谈所知，有的是侧面了解，大部分是亲眼目睹。

1989 年 10 月 26 日

我在抗日战争期间工作情况的回忆

周金铸

(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不战而退，放弃了山东。在鲁西北，爱国将领范筑先将军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收编土匪武装，建军建政，安定民心，打击日寇，建立了以聊城为中心的生机勃勃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鲁西行营参谋长廖安邦等奉新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鸿烈之命来到鲁西北运河名镇张秋。他们一方面横征暴敛，过着腐化奢靡、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此苟且偷安；另一方面，重用土匪、汉奸、会道门等反动势力，消极抗日，密谋反共，残害人民。

当时，对于国民党的种种丑恶行为，我深恶痛绝。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我积极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1938年7、8月间，经中共阳谷县党组织负责人申云浦同志领导下的党员徐凤岐的介绍，我参加了他领导下的交通站，光荣地成为党领导下的情报员，及时提供了当时国民党鲁西行营在张秋镇及周围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况及国民党鲁西各县党组织情况。

(二)

1940年1月，我鲁西八路军在肖华、杨勇将军指挥下发起了反顽作战，击溃了国民党原第十军团后改编为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的一部分部队，以及他们组织起来的反动民团和煽动起来的会道门武装，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山东省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等反动势力，解放了张秋镇以及附近几个县的部分地区。同年10月，以张秋镇为中心，划入东阿县的第二区、东平县第九区的两个乡、阳谷县的第五区、寿张县的第四区，在这四个县的结合部新建立了张秋县。当时的县委会（对外称政工室）县委书记是王化先，组织部长颜华、宣传部长雷震、农会主任周子斌、妇女会主任罗文。张秋抗日县政府也同时建立，县长是夏仲远，公安局副局长是李亚东，不久由李克东继任。县政府设五个科，行政区划设五个区。

在筹备建县的过程中，有些领导经常在张秋镇活动，有的还住在我家，在他们的教育下我提高了觉悟。这年7月，经罗文、周子斌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3月，县委决定我任张秋镇委书记。在此任期间，我先后发展了西街的黄登亮，南街赵常海，东街张洪波、张洪春、马树芝，北街的任保柱、秦立业、张金贵等人为党员，并进行了一些对党员的教育和党的理论政策的宣传以及社会调查工作。

(三)

1942年9月27日，日寇集中万余兵力以铁壁合围的战术对我濮、范、观中心区和昆山、张秋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之后，除昆山地区外，在我张秋镇及周围的孟楼、三官庙、郑三里、

曹堤口、叠波浪、石庙等地修建炮楼，安设了据点，加上以前敌人扫荡在我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斑鸠店、陶城铺、刘石庄、龙王庙、阿城、关山、苦山、戴庙、四里等地安设的据点，共二十几处。敌人在各据点间修建了公路，架设了电话网，互通情报，互相配合和策应。并较普遍地建立了基层伪政权，清查户口，使用良民证，编练保甲，实行连坐制度，村村设立情报员，组建反共自卫队，已迫使我县、区武装无法公开活动，党政组织转入地下，全县变成了敌人严密控制的敌占区。

对于以上这种严峻形势的出现，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关怀下，我张秋县委是早有预见和准备的。县委书记王化先同志运用他原在清平县敌、伪、顽统治区长期从事领导工作所积累的对敌斗争丰富经验，早在这次大扫荡之前，就采取了重要措施。一是不断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反复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教育广大干部党员树立最后必胜的信心，做好迎接最艰苦的斗争形势的思想准备；并且规定了应付敌人清剿、集训等相关的政策、纪律，使人人知晓，自觉遵守。二是坚定地依靠群众，组织联防，开展武装斗争，主动地打击敌人。如在这次大扫荡前的夏季，东阿县的敌伪军进攻陶城铺以南我区时，我联防武装奋勇抗击，曾将日寇县顾问仁保日出男以及伪县大队副击毙，取得了大的胜利。三是认真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包括地主、富农、开明士绅、各界知名人士到抗日斗争中来，从事各项有利于抗日的活动。如旧政府时的东阿县第二区的老区长火风诰，在我们争取下，始终团结在我们的周围，敌伪多次邀请，他都拒绝与之合作，成为影响一方群众的楷模。四是在敌人统治的边沿区建立为我所绝对控制的两面政权用以欺骗敌人，保护群众。五是重视做好敌伪工作。1941年春，县委就建立了敌工部，由颜华兼任部长，在其领导下，分别调周紫臣负责东阿、郭久明负责阳谷、魏福全负责寿张的敌伪工作。1942年春，我也从

张秋镇委书记调到敌工部任内勤。与此同时，王化先同志还亲自动手做派遣打入工作（如派中共党员马云涛同志打入东阿县伪二区部和伪新民会做地下工作），并亲自指示周紫臣利用在子路村的社会关系，动员和配合该村地主刘华亭争取了东阿县伪军营长刘振法率部起义。六是切实有效贯彻执行打击敌伪人员的首恶分子，争取教育多数，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正因为做了这些工作，有的地方的伪组织已能听从我们指挥，出现了敌占区无敌人的情况。因此，在这次大扫荡中，我县委领导上能做到敌情清楚，采取应变措施及时；基层中，有了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群众情绪稳定，坏人不敢乱动。所以，与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我们县所受的损失是比较轻的。

张秋地区刚刚变质后，我曾协助颜华和县委秘书郭昆，将不适于坚持当地斗争的外来干部罗文、赵克等十余人，依上级指示转移到濮范观中心区。回来后不久，县委即召开活动分子会，贯彻上级党组织针对地区变质后提出的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决定组建县武工队，指示各区、村创造条件建立秘密武装小组，以配合刚组建的昆张支队，深入敌人控制区，主动出击，打乱敌人部署，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同时，会议又提出全党动手进一步加强敌伪工作。一方面调查动员伪军人员的亲朋好友，劝说其“身在曹营心在汉”，促其弃暗投明，另方面有领导地选择有条件的对象打入敌伪组织，以取得情报，配合武装斗争，开展政治攻势，达到打击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根据这次会议的部署，我受县委派遣，打入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带张秋镇的敌伪组织，做地下工作。

（四）

在我打入张秋镇前，县委书记王化先同志向我交待的任务是：

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各种合法的手段靠近敌伪军、警、宪、特组织，相机打入其要害部门，发现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发展关系，取得情报，防止敌人对我党组织和群众的破坏。并给我规定了“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行为准则，要求我高度警惕，胆大心细，善于分析情况，识别各种人物，严格遵守保密纪律，防止敌人破坏等。至于打入后我的掩护职业，是早已打入的马云涛同志为我在伪东阿县新民会驻张秋办事处谋得的一个便于了解敌人机密，靠近各敌伪组织、负责各敌伪组织联系的内勤工作。当时他也调到这个单位，到了1943年初，马受上级党组织派遣打入敌人控制的济南市工作。他走前，又利用与日寇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张秋派遣队队长庞统华的交往关系，介绍我打入了这个要害部门。马为了我能控制该队的机密，还利用庞爱枪的特点，自己买了一支破枪从伪区部换了一支匣枪，交我转赠给他，从而使我当了庞的内勤。至于我和县委的交通联系，是由组织上指派在张秋以开饭馆为掩护的豆岩昌负责的。

当时我和马云涛同志还不认识，是组织上让颜华的哥哥颜世端（颜是非党员，无工作，他不了解马的党员关系和工作详情）领我到张秋镇和马联系的。我打入后，在马未离开张秋去济南前，有的工作我们是共同商量进行的，他走后我就自己工作了。从1942年10月到1944年4月22日我军进攻张秋我撤出前这一期间，我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我到伪东阿县新民会驻张秋办事处后，根据我的职务，即由主要负责人李建志领我与各伪组织联系。当时张秋镇的伪组织是按旧政府的行政区划设置的，东阿、阳谷、寿张三县伪军、政、警、宪、特、新民会都派驻了部队和机构，但他们又彼此互不隶属，各在自己县辖区内活动，除接受所属县的上级领导外，并在当地接受日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唯独日寇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

张秋派遣队则可以在各县境内活动。李建志领我先到日寇司令部直接领导的张秋镇三县剿共特务队联系的。该队长张龙发原系寿张县伪警察所的特务，队员有王惠民（又名俊德，原是我张秋县税务局的股长，本人出身游民，过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张秋镇人，非党员，九·二七大扫荡后投敌）、柴凤领（原是我张秋县公安局的看守班长，非党员，九·二七大扫荡后投敌）、赵子元、丁汉民、高登月、邢金玉、翻译马龙臣等共十余人。后来李又领我到阳谷县伪新民会驻张秋办事处主任吕斌三处以及驻张秋派出所所长秘仲萍处、寿张县伪新民会驻张秋办事处主任曾景春处以及驻张秋警察派出所所长张彦洪处，还有伪东阿县张秋警察派出所所长周脉荣等处联系。为了以后工作的需要，我当时与周还认了同族兄弟关系。通过以上联系，我认识了他们，即有意地主动与之交往，以了解情况，扩大影响，因之后来在张秋镇的敌伪组织和群众中即广为流传我当了大汉奸的说法，这对于掩护我的真实身份开展工作是非常有利的。与此同时我还找机会参加了在伪军伪组织中非常流行活跃的安清帮（即三番子）的帮会组织，通过认师徒关系以及与伪组织的头目和成员拜结义兄弟的形式广交朋友，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在以上活动中，我根据县委敌工部的指示，进一步调查核实了日伪军在张秋镇的兵力部署情况。当时的日军司令部修有四个炮楼，用约 29 米高的围墙和四周的封锁沟接连成一个大据点，四个炮楼下都修有地堡伸出围墙，作为掩体可以对外射击，形成上下纵横交错的火力网，易守难攻。开始驻有一个中队部，队长是小清水，后减为一个小队，到 1943 年冬，日寇为打通我平汉线聚集兵力，日军许多据点都由伪军接替，张秋镇的日军撤走，调来伪华北治安军第四集团军第九团的两个营约八百人接防。一营营长张育焕，三营营长张某，武器装备精良，每连有 7 挺轻机枪，步枪全部是汉阳造，另有机炮连配有重机枪 4 挺，迫击炮两门，还

有电台，弹药充足，非常骄横。各县的伪军，南门驻寿张县的仓永海中队共90余人；东门驻东阿县的王延柱中队共80余人，分驻两地，东门由小队长宋士俊率队驻守，中队长率其余兵力驻守在东门外新建的炮楼；北门驻阳谷县赵希圣、王省德两个中队，后换袁玉奇（原是我张秋县独立营第一连连长，他与第二连连长王春山都是我收编的游击部队，九·二七大扫荡中都率部投敌到阳谷县伪大队副杨朝元部）、刘东亮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不足百人；西门驻阳谷县郭安仁中队的一个小队，队长孟宪臣，郭安仁率其余部队驻张秋北的孟楼据点。另外，东阿县的伪军还在张秋外围的郑三里修建了炮楼，驻有房辉华的一个中队共90余人。在张秋外围的曹堤口、三官庙、叠波浪也修有炮楼，分别由所属县派伪军驻守，以上各县的伪军，都没有机枪。

在以上活动中，我还根据县委的指示调查了在这次大扫荡中党员有无叛变的情况。由于在扫荡前县委早已对党员进行了气节教育，我没有发现公开叛党的党员，但查清了个别的妥协分子，如顾庄的党员周延常，曾利用熟人关系，到伪组织内避风；张秋镇东街的党员马树芝到东街伪小学任教员，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该校的校长袁庆友为妻。以上他们都没有经过党组织许可。还有张秋县四区的武委会主任田仁来，虽然仍在我区工作，却与伪组织人员有联系。以上我都回报了县委，做了调查处理。

2、争取伪军伪人员的工作。当时根据我的了解，张秋镇的伪军伪人员真正死心塌地为敌人去卖命的是极少数，大部分是表面上应付敌人，内心存在极大的矛盾，想为自己留后路。为此，我通过与他们交朋友或通过其亲朋好友，并配合我县敌工队和主力部队组成的武装小分队即昆张支队对他们的打击和威胁相机开展了政治攻势，给他们宣传小册子或亲自向他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以激发其民族觉悟，并讲形势、讲前途、讲政策、指出路、经过多方面的工作，我先后争取了驻西门的阳谷伪军郭安仁中队的

小队长孟宪臣（阳谷县城附近城角孟村人），他接受了为我们工作的任务，并保证我方人员在该防区进出的安全以及可以随时接受我们的指示率队起义。我发给了他同情抗日证。另又介绍郭安仁（阳谷县城西北老庄人，曾任过阳谷县抗日武装的大队长，后当了伪军中队长）和敌工部长颜华见面，经教育，他也表示可以听从我们的指挥。此外，我还对驻北门的阳谷伪军赵希圣、王省德两个中队长进行了争取工作，后因他们被调往他处，由敌工部另派人接替了我的争取工作。至于寿张、东阿县驻张秋镇的伪军，县委敌工部指示仍由负责该县敌伪工作的人员进行，我未参与。有关各县驻张秋镇的警察派出所，我争取了阳谷的派出所长秘仲萍（河北省故城县人），他接受了为我们工作的任务，并接受了我派去的情报关系焦祥林、陈忠道在该所工作。县委提出为了我工作人员便于在敌区活动，需要一部分伪县警察所印发的空白良民证，是他会同我到阳谷县城取来了这些证件和钢印机交县委敌工部分别加印发放的。又有寿张的派出所长张彦洪（济宁市人）也接受了我派去的情报关系景庆云在该所工作。以上两人都答应必要时可以听从我们的指挥率部起义，我也发给了他们抗日同情证。另外，我还设法派情报关系汤世猷打入到三县剿共特务队，这些人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打入敌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张秋派遣队后还争取了该队队员张圣贤（台前县张方福人）、汤洪恩（台前县汤庄人）成为我们的工作关系，也发给了他们抗日同情证。并且在我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使该队的队员乔子明、杨广、赵保善直接和我县委敌工部长颜华见了面，并接受了教育，他们也表示了可以接受我们的任务。我还通过关系汤洪恩对该队队员张玉林进行了工作并由他对其指挥。总之，该队的队员大部分都已明确了给我们工作的关系。到了1943年冬因日军集中兵力收缩防线，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日本宪兵也全部撤走了。该队归属于中国人组成的情报机构华北文化研究所领导，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

改称鲁西文化研究所，负责人周某，在他领导下张秋镇设一分所，由我任所长，在苦山设一分所由乔子明任所长，这使我对这些队员，就便于掌握指挥了。

3、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以敌制敌，消灭、铲除了大叛徒、大特务、大汉奸和匪特分子，解除了对我县党组织和群众的重大威胁。

①1942年10月间东阿县大叛徒、大特务张子栋率领一帮特务到陶城铺、张秋镇活动，并网罗当地的一些游民、土匪，企图对我县党组织和群众，进行大的破坏。马云涛同志当时和我商量，认为他是对我县工作的重大威胁，必须设法将其尽快消灭。张子栋原是我平阴县独立营的连长，1940年环境恶化后率部投敌，任东阿县伪县公署日寇顾问仁保日出男的特务队长，曾在东阿县东南山区对我平阴县的基层党组织和群众进行过严重破坏和迫害，并参与过东阿日伪军对我铜城、广亮门、陈店子、斑鸠店、陶城铺等地的扫荡，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因其熟悉我们的活动规律，对我破坏的手段也特别阴险、凶狠、毒辣，如布置暗探，张网捕鱼，远距离奔袭等，对捕去的我人员又实施逼供诱供，酷刑吊打，极为残忍，此人是破坏我平阴、东阿县工作的急先锋。最为恶毒的是，当我平阴县的领导曾派一个叫辛泽的科长动员他的一个至亲代表我们劝说他“停止作恶，留条后路”的时候，他一方面对我们虚假应付说什么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另一方面则报告设置圈套，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策划了诱捕我们这个科长的大阴谋。他多次通过他这个至亲与我们联系，并提供一些虚假的情报。到后来，他提出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他这个至亲保证安全，与我们这个科长直接见面，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约定了时间地点，他却不顾他这个至亲的信誉，秘密布置了特务，待我们这个科长走到后就将其逮捕了，并交给敌人，押送到济南的敌人特务机关处理了。另外，他还在东阿县城关的伪组织和工商、街道、学校

广布特务，搜罗情报，经常罗织罪名，迫害无辜，恫吓群众，因而引起人人痛恨。正因其如此穷凶极恶，而得到敌顾问的特别信任，他则为此而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经常骑着高头大马，进出伪县公署，见了伪县长、警察所长、大队副等，甚至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长都不下马，招致了这些人对他的强烈不满，并且他还肆意侮辱过东阿县伪二区长刘振玉，造成二人很深的矛盾。就在这年夏天，他的恶运到了，他的强硬后台日寇县顾问在进攻我陶城铺以南的地区时，被我张秋县的联防武装连同伪县大队副张某都击毙了，他如丧考妣，这次到陶城铺、张秋来，就是抱着为其日本主子复仇的心理而来的，所以表现特别凶恶。刚到不几天就抓捕了我一个区长的家属，并吊打了几个群众，而恰在此时敌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长也到张秋视察工作来了。张子栋仍自恃事敌有功，对平井即不出面迎接也不向其回报工作。此时，伪二区长刘振玉也来到张秋，他与平井交往密切。为此，马云涛同志就提出了鼓动刘振玉激起平井的怒火，将张子栋除掉的打算，并让我迅速请示敌工部长颜华。取得了颜的同意后，他即迅速行动。不过几天，平井就将其逮捕了，并剿了他的家，搜出了他敲诈的几十万元的伪币，遣散了他霸占的三个妇女，将其押在了伪县公署监狱，但没有很快处理。马云涛同志考虑，张子栋毕竟是敌人的忠实走狗，敌人在不清醒的情况下而将其逮捕了，一旦冷静下来，可能后悔，如果夜长梦多，将其放出，则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为了除恶务尽，于是他又通过他的一个亲属（我东阿县委敌工部的工作关系）找到了伪东阿县长乔迪之，利用他对张子栋的不满以及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说服了他，采用派伪干警押解张出狱带路抓案犯他中途逃跑的罪名，将其击毙在东阿城郊，从而彻底铲除了一个大毒瘤。

②1942年12月间马云涛同志曾和我商量，并请示颜华部长同意，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将东阿县派驻张秋的代理伪县长周

奎齐除掉了。周原任东阿县伪大队副，东北人，早年在张作霖部当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伪组织，“七七”事变后到关内投靠东阿伪县长张勉之。此人奴化思想严重，认为中国迟早是日本人的天下，因此，他多次指挥伪军对我东阿、平阴地区扫荡，都是纵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罪恶严重。张勉之去职后，他又来张秋担任了东阿代理伪县长，指挥驻张秋的东阿县伪军政组织的活动，他本人是安清帮（三番子）的头目，在伪军中曾广招门徒，有一定影响，来张秋后又在地方上招揽了一些地痞、流氓、破落地主成为徒弟，企图靠这些人，对我们进行破坏，搞出大成绩。马云涛同志根据这些情况，认为此人是个野心勃勃的大汉奸，如不铲除是一大祸患。他了解到伪东阿县新民会驻张秋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李建志和周为争权势高低，相互间有较深的矛盾，而李又掌握了周在张秋附近东阿县所属的各乡镇征收了多年的田赋（即农业税），有以多反少、中饱私囊的情况。因此，马云涛同志即鼓动李抓着此问题，将其除掉。李同意后即将此问题上报了新上任东阿县公署的日寇顾问玉津，经他查实后即将其逮捕押入监狱，直到很久以后，他才花钱托人活动被放出来，并携带家属狼狈地回东北老家了。此后东阿敌人再没有人到张秋代理伪县长，群众因此减少了很多负担。

③匪特张子成（又名张世梦）与阳谷伪军中队长郭安仁、吕则信是结义弟兄，此人伙同郭的卫兵王二舜、另一匪特刘子清经常借用郭、吕的名义，在张秋镇一带，专门敲诈勒索我抗日人员家属，为害一方。因郭安仁是我的工作关系，我将此情况告知他后，经郭、吕二人商议，即将张子成枪毙在他们防守的据点附近。

④土匪苏继成（张秋县一区双庙人），霸占贾海一妇女，长期姘居，并经常对外说他是阳谷县伪县大队副杨朝元的至亲，又利用杨的名义，绑架勒索我抗日人员家属，对我危害极大。因我为工作需要而参加安清帮后，与杨朝元有师徒关系，我将此情况告

知他后，他即将苏继成暗杀在张秋镇北街。

4、为显示我政策威力，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张秋镇内，处决了忠心事敌的首恶分子，分化瓦解了敌人，鼓舞了群众。

1943年春，受张秋日寇驻军部队长直接领导的三县剿共特务队，反动活动非常猖狂，经常组织特务和警察，轮番封锁一定区域，清查户口，搜捕我进入的工作人员，对我威胁极大，其中尤其以叛徒王惠民、铁杆特务赵子元、翻译马龙臣气焰最为嚣张。当时经我了解，日军部队长小清水在其据点附近包揽一暗娼，经常在那里鬼混，有时回据点很晚，王、赵、马三人都有家属，分别在张秋镇街上居住。根据以上情况，我向县委汇报后，经过研究决定，为了震煞敌人的威风，显示我政策的威力，为群众撑腰壮胆，决定派县武工队进入张秋镇内，与我争取的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张秋派遣队的武装队员组成四个除奸小组，选定夜晚12时在张秋镇内处决日军部队长小清水、特务赵子元、翻译马龙臣，将叛徒王惠民捕获，开公审会处决，并于事前准备好我县政府公布其罪状对其处决的布告，处决后，就地予以张贴。为不暴露我的身份，只责成我办两件事：一是在当夜的11时由我通知张秋镇西门我所争取的伪军小队长孟宪臣开城门让我县武工队员进入；二是在处决前我负责侦察以上四人是否都在他们鬼混和居住的地方，如在，在他们的门口放半个砖头作为信号，不在不放。另外参加除奸小组的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的武装队员，由县委敌工部负责通知，县委并通知昆张支队派一个连于当晚布置在张秋镇四门的据点附近，在进行处决时，向据点佯攻，以牵制伪军不敢出炮楼。处决完毕后，县武工队由西门南500米处爬围墙撤出。选定日期后一切都按计划行事。在当夜的12时前经我侦查，以上四名罪犯都在各自的住地。但在临执行前日军部队长小清水却从其暗娼处回了据点，翻译马龙臣听到有人跳入他家，他即由住室的后窗逃往日军司令部。对以上二人未能处决成功。特务赵子元被

我击毙在他的住室内，我捕获叛徒王惠民后，带他出张秋镇，因他狂叫不走，只好将其击毙在米市大街北头饭店的门前。对以上二人处决后都张贴了我县政府的布告。

经这次对首恶分子处决后，三县剿共特务队长张龙法因怕被我杀掉，很快就逃回到寿张县城伪警察所不敢再回来了，翻译马龙臣于次日即携家属经东阿逃回其原籍老家，其余特务也都作鸟兽散，这一特务机构就这样自行解散了。据了解，其他驻张秋的伪军政人员都受到了很大震动，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不能做坏事了，群众也感到扬眉吐气，遇到伪人员欺压，敢于和他们辩理了。

5、营救革命家属。

①1942年11月间，我张秋县三区顾庄革命家属汪玉铭，他是汪洋同志的父亲，被寿张县伪新民会驻张秋办事处逮捕了，县委敌工部长颜华即通知马云涛同志和我进行营救（汪洋同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共产党，1935年曾在东阿县城当教员，领导和发动过反对国民党县教育局王占一贪污教育经费的学生活动，后到西安杨虎城部搞军运工作，“七七”事变后，在鲁中一带发动抗日群众武装起义，组建部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支队长、旅长、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解放后移葬于济南烈士陵园）。当时我们接到通知后，马和我即以顾庄属于老东阿县的行政区划，所有被抓人员都应交本县处理为理由前往交涉，结果将人要出来了，我们除对其安慰外，即让其家人领回家了。

②1943年初张秋县三区董庄抗属董舒梅伯母被平井宪兵特别工作队张秋派遣队庞统华部逮捕，当时我已打入该队，是以与之有亲戚关系的名义将其要出释放的。

（五）

1944年4月22日我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范春杨指挥所属七、八团和昆张支队围攻张秋镇，并有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团配合打援。在围攻前，军分区曾通过张秋县委敌工部派参谋找我全力保护和配合进入张秋镇测绘地形和敌人火力点的我方人员，同时因我在张秋镇内敌伪组织的住地靠近伪治安军的防地，是一个制高点，县委指示我要全力防守，待战斗打响，部队到达后，即将此地交给他们。当时防守张秋镇的伪治安军第四集团军第九团的一、三营在一营营长张育焕的统一指挥下，因对我军的意图有所察觉，曾企图逃回阳谷，行至张秋镇北王庄遭我昆张支队截击而退回固守待援。战斗开始后，因我张秋县委敌工部在此以前曾有成效地开展了敌伪工作，加上我所进行的争取工作，张秋四门和周围据点的各县伪军和警察派出所都很快全部缴械投降了。而阳谷县城派出驰援张秋的伪治安军一个营以及伪县警务队行至郭魏陈庄一带也被我阳谷县抗日基干大队进行伏击，全部退回了，唯独张育焕所统率的张秋的治安军凭借其坚固的防御工事，顽固抵抗。当时我军曾集中火力进行猛攻，但因久攻不下，我已伤亡40余人。在此情况下，因我与伪治安军三营营长有交往，八团团长齐丁根让我对其喊话，讲明政策，促其投降，但遇到了更激烈的火力抵抗。后来考虑因大雨连绵，久战不胜，对我不利，军分区领导决定全部部队撤出战斗。

此次战役中因我曾喊话，暴露了身份，故县委决定调我出敌区，经与军分区商议，派我到分区敌工科学习。两个月后，分配到分区敌工科所属兗济工作团任内勤干事。

1944年秋，张秋镇伪治安军九团一、三营主动放弃据点撤回阳谷县城，张秋镇解放。1945年7月20日，我军发起阳谷战役，

在此以前，伪治安军一营营长张育焕已升任第九团团长，在这次战役中被我击毙，阳谷县城也完全解放。

(六)

1945年秋我从第二军分区敌工科冤济工作团调回张秋县，任县公安局审讯股长。县委为了在干部群众中说明我在打入敌伪组织期间的真实身份和工作情况，决定分两次，一次是在全县的区党政负责人会议上，一次是在农历七月关帝庙万余群众参加的古会上，由县委书记高明、县长李克东、公安局长焦星跃公开宣布我是受县委派遣打入到张秋镇的敌特组织做地下工作的坚强共产党员，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在打击、分化、瓦解敌人，保护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从而使县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了解了我的真实情况，我也感到很大的慰藉。

(周金铎，1919年生，阳谷县张秋镇北街人。1940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工作，1980年底在聊城市商业局离休。现定居阳谷镇。)

关于抗日时期农民负担政策的回忆

李培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于事变后的第二天，7月8日向全国发表了抗日宣言，至8月25日又发表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十大救国纲领，其中第三项和第七项有明文记载：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济粮食。赈济灾荒。”等有关指示（见《毛选》第二卷，1991年6月第二版355—356页）。当时边区政府本此精神作了慎重研究，制订了人民（这里主要谈农民部分）向国家应负担的有关负担政策，以支援抗日战争。

在解放区执行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负担政策以后，效果良好，深得群众欢迎，从而起到了奖励生产，支援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团结群众，打击敌人等巨大成效，直至最后获得全面胜利。

原来民国时期的负担政策，是沿用了清朝旧制，在地丁钱粮的基础上，加以合并，简称“田赋”，对财产和人口征税，群众旧称“完银子”，即上半年叫“完赋”，下半年叫“完米”，其收据合称为“田赋”。名称的变化不作详谈。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抗战前夕，凡是国民党政府所辖地区都是按旧田赋执行。

旧田赋政策制订的原则是按财产征税，即：凡是农民买到财产（包括土地、宅基、坑塘、荒场、草原、荒山等），只要买到手中，办过了契约手续，就按照国家规定的田赋政策，向政府交纳

应交的“田赋”。如个别年头发生了重大灾情（如水旱虫雹等），报经政府核准也可以减免，但特别困难。一般说来，普通年景只要到期，农民不及时地“完银子”，政府即派员带着他的亩数册子找上门去（旧称出签），他们狐假虎威地到乡下闹腾一场，把个别无力交纳“田赋”的农民逮捕几个，拘留起来勒索敲诈，惨不忍闻。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农民征税（称救国公粮）实行的政策叫“合理负担”。由于当时的环境情况不同，执行的时间和地区范围也有差异，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多数地区是执行了这一政策的。

本来“合理负担”这一名词是民国时期某些进步人士提出来的，但并没有执行。党中央发现了这一提法后，作了详细探讨及研究，认为可行，即赋予新的内容，责成边区政府制订了试行办法，在执行中，随时总结经验，不断修订补充，加以完善，在保证战时收入的原则下，更好地提高平衡负担的政策水平。

至于“合理负担”政策条例的制订，是比较复杂困难的，执行起来问题很多。当时定的原则是：保证战时需要，结合当时解放区的生产水平，适当照顾各个阶层的负担能力。况且我们的政权所及，不断发生变化，处在广大农村，敌人盘据在各个大小城镇。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制订政策时，本着既按财产为基础，又结合收入（即收入多少粮食）再加上累进的计算方式，总称为“财产、收入、累进”三结合的原则为征收对象。当时的命名也称为“公平负担”，因为“合理负担”命名较早，在执行期间，一直称为“合理负担”。（见1994年《财政》第4期41页）

在制订“合理负担”征收政策时，主要精神依据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政策本身不是临时性的摊派，而是把过去旧的田赋变为稳定性的农业税收政策。当时由于货币不统一，一律以实物（小米）为主，统称“救国公粮”。

二、征收的依据，改变原田赋政策的对“财产征税”，而改为“财产、收入、累进”三结合的征收计算方法。

三、征收对象，农民以户为单位，以当年收入的粮食为计算依据。劳力、牲畜另订负担政策。

四、农民虽以户为征收单位，但在每一户中又以人口减去基本田，扣除一个标准亩的免征。

五、可耕田的优劣划分若干等级（表附后），规定一个起征点，不足起征点的不征，以示照顾。为调剂各阶层收入和奖励生产，又规定了累进政策，超过累进率的不再加征，以促进生产。

六、执行起来可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①摸清了解放区的人口和生产的地亩数，②虽然不划阶级，而把各阶层的底子了解得比较清楚，③为制订新的农业税政策，为查产定量作了充分的准备。

为了说明问题，特将阳谷县的执行情况作一累述。聊城专署所在地是1938年11月15日沦陷的，日寇占据了聊城，先后不几个月各县相继失守，我抗日部队相继转入了农村。凡是抗日部队所到之处，和先后建立了抗日政权的地区，就逐步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按新地亩账收公粮。（当时陈庆元政府按老地亩册子收银子，我们的政权就积极整理新的负担清册）。其具体的政策精神及做法、计算方式，分述如下：

甲：政策精神

（一）凡是种田的农民将自己所种的耕田如实报出来，以便计征负担（即公粮），不包括宅基、荒场、坑塘、荒地等。

（二）把可耕田按本村的地势习惯，划分若干大方，根据土质优劣程度、常年产量，评议成若干等级。

（三）逐户核实人口，凡是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并在家生活食用粮食的人口，一般每人除去一亩基本田不交负担（公粮）。

（四）除交足部署的公粮任务外，将多征收的少部分（地方

粮)向无地少地的农民(即赤贫及贫农)酌情分给一部分救济粮,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乙:做法

由国家干部先召集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把负担政策讲清楚,组成“三三制”(贫农、中农、士绅)的评议委员会,执行以下五项任务:

- (一) 根据土质优劣及常年产量划大方,评议出若干等级。
- (二) 逐户核实可耕田的地亩数。
- (三) 登记及核实应算及应剔除的人口数。
- (四) 评议出困难户救济粮的发放。
- (五) 编造合理负担地亩清册。

丙:(一)计算方法

将每亩可耕田按常年产量分别评议,收粮的计算按二年三收,再被二年除开,即为每年常产数,年产一百斤(以小米为标准计算再折合其他粮种),超过百斤以上的级距每级累率递增二十斤,一直累到二百斤为止。每亩劣田收入不足一百斤的,其下降率每级递减十斤,如九十斤、八十斤、一直至五十斤。不足五十斤的不计负担,免征公粮。详情可参阅下表。

项 目	优 田	标亩	劣 田
亩年产量(斤)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斤	90 80 70 60 50
优劣各分五类	1 2 3 4 5		1 2 3 4 5
通分子一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负担亩数	2 1.8 1.6 1.4 1.2	1	0.9 0.8 0.7 0.6 0.5
说 明	超过 200 斤者不多征,不足 50 斤不征, 起征点为半亩,最高累进为 2 亩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部可耕田共分两大类又分五个级距,以每

个标准亩年产百斤小米为准，优田每超 20 斤为一个级距，累至亩产 200 斤不再累计，内含有促进生产之意。劣田下降率每亩递减 10 斤，至亩产五十斤的按计亩计征，不足五十斤的免征公粮。

将每个农户的可耕田一律求出标准亩米以后，减应除的人口，即为净纳公粮的负担亩，乘全年应交公粮数，再分别按麦、秋两季计算，分别征收。

如遇有灾情年景或地区，另有减免政策，不在此限。但因各地区的环境好坏不同，所以执行政策的程度亦有差异，地亩的级距一般不作变动，而人口的计算则一年一次允许变化，如生死婚嫁等等。凡是抗日根据地区，均执行这项政策，一直执行到土改时期为止。

（二）关于人口的计算问题

1、凡是在本村常年参加农业生产而又在家吃粮的人，每口人均应扣除一亩基本田不纳负担。

2、凡是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员，如抗日军队的人员、教员、学生、后勤工人等虽不在家吃粮亦应扣除基本田。

3、父母随分居的子女吃饭的如划到一边的可归一家扣除基本田，两家轮流吃饭的可按一半扣除，但三家分担的不应分到三户，以防农户投机。

4、凡是不明确、不好扣除人口问题，本着有利抗战、有利团结、有利生产的原则由评委解决。

不应扣除基本田的人口：

1、凡是参加敌伪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准扣除基本田。

2、凡是常年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员又不在家吃粮的，一般不扣除基本田。

3、凡是在敌占区从事不明确的职业者一般不扣除基本田。

4、凡遇有来路不明确的人口，虽在本村参加农业生产及吃粮，一般不扣除基本田。

5、如有疑难问题可交评委酌情解决。

（三）交纳负担的计算

在核实耕田数，折算出标准亩，再核实了人口以后，每家农户为单位，每户由总标准亩内扣除应扣除基本田，下余耕田数即为负担亩数。按每亩乘应交的公粮数，就是应交的公粮。如全年应交公粮 10 斤，麦季预交 6 斤，秋季则再交 4 斤。全年统算，麦秋分交。

在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延用了征收公粮的名义及有关政策的规定，但这个负担政策，为查产定量作了充分的准备及基础，为制订新的农业税则作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抗日时期的合理负担政策，既不同于民国时期的负担政策，也不同于建国后的农税政策。它是抗日时期在特殊情况下制订的具有明确阶级性的负担政策，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以上资料不完善或错误之处，请知情同志指正。

附注：当时的村政权有的处到敌占或游击区者却很困难，敌人强制群众叫完银子，抗不过去，就用老地亩册子去敛钱上解；对待抗日政权就用合理负担的册子处理负担，所以不少村庄则有两套账本。

1988 年 8 月 1 日

（李培现，阳谷县阿城镇朱楼人，聊城市物资局离休干部。）

1946 年参加阳谷县土改工作队的回忆

崔衍双

我于 1945 年 8 月自阳谷县抗日第三高小考入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一分校一级乙班学习，住阳谷县城北街（即现在阳谷一中校址），分校主任即校长李玉慈（莱芜人），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崔才（又名崔存才，本县侯海人）。当时学校名曰中学，实则是培养干部的训练班，何时工作需要就抽出去帮助工作或脱离学校参加革命工作，没有规定毕业年限，没有正式课本，都是教课老师找些参考书编写成讲稿，让学生用蜡纸刻出油印讲义。1946 年阳谷县土地改革工作开始后，抽调我校学生三十余名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我是其中的一个。现将当时工作队的情况回忆如下：

一、工作队的训练

当时阳谷县辖十个区。城关区即城周围的一些村庄，一区大门庄，二区阿城镇，三区四甲李（现属聊城），四区七级镇，五区安乐镇，六区大布，七区闫楼，八区青杨李，九区仓子。因阳谷县干部缺乏，组成工作队的全体人员包括县区干部和以六地委民运部长纪登奎（又名张岱岭）为首的地直机关干部、以黄明吾（即黄流、阳谷县张寨人）为首的五地委支援的干部、泰安、肥城的支援干部，还有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一分校的学生，共计两千余人。在城角孟村进行训练，大家住在城关及附近的几个村庄。阳谷县属冀鲁豫边区六地委，行政上称第六专员公署。地委书记申云浦（又名申景玮，阳谷县安乐镇人）、县委书记王维群（冠县人）、县长马继光（泰安人）、县抗联主任辛晓村（肥城人）、

都先后在会上作报告。大体内容是：阳谷为土地改革重点县份之一，全县普遍开始土地改革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依靠雇、佃、贫农，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斗争地主恶霸，坚决团结中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党对富农的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雇、佃、贫农，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推翻封建主义大山，解除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长期对社会的统治，这是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二、工作队入村后的工作情况

工作队经过几天训练学习后就分配到各区、村进行工作，为了实现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地委民运部长纪登奎为首的驻五区胡楼，以县委领导为首的驻七区罗海。各区均有重点村，以取得经验向面上推广，实行以点带面。我和同学孟宪军（阳谷南街人，现在四川省万县地区土产经营站工作），还有肥城来的孔同志（记不清名字了），以孔同志为组长，我们三人被分配到六区老庄。当时区委书记张宗武、副书记李璧臣（肥城人，现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党校工作）、区长张金榜（本县六区秦海人）。六区的重点单位是大王楼，张宗武在那里蹲点。大王楼、老庄均属薛楼小区，也叫薛楼乡。

经过区里同志简单介绍了老庄的情况，我们三个人背着行李背包就进入老庄村。因当时村里的组织机构和民兵组织（那时叫模范班）还不健全，阶级斗争又很激烈，村干部怕出意外，开始把我们三人安排在村西头路南小围子里一个楼上住。这家地主姓梁，老头半身不遂，有大婆小婆两个老婆，一个儿子十多岁，有扛活的长工一个，还有种地的佃户一家，拥有土地150亩左右。我们三人跟着这家吃饭。为了多和雇工接触，我们就叫长工把饭送到楼上吃，利用送饭的机会和长工谈谈心里话，长工给我们送饭后，再回到厨房端着自已的饭到牛棚去吃。那时佃户回自己家里吃饭，佃户家属管给地主家打里工，即洗衣服、磨面之类的家务

活。长工管喂牲畜，在地主家吃饭，和地主吃两样饭，长工除麦后一段吃细粮，其余时间吃粗粮。地主有的叫小婆做饭，有的雇人做饭叫老妈子，实际和长工一样，也是和长工吃一样的饭。我们住的那户地主是小婆做饭。经过一段工作，初步摸清了村里地主、富农、雇、佃、贫农及中农的阶级状况和思想情况。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了更多地接近雇、佃、贫农和建立健全村里的各个组织机构，我们吃住就搬到村西头路北一户贫农家里去了，这样有利于接近群众，组织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不受任何限制进一步深入开展运动。这时雇、佃、贫农已初步认识到受压迫剥削的根源是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地主阶级是压在群众头上的大山，只有推翻地主阶级，才能永远不受剥削和压迫，彻底翻身。

三、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地主恶霸，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

当时发动群众的方法，开始在村里开小型座谈会、诉苦谈心会，个别串连建立健全雇、佃、贫农、青年、妇女、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再进一步串连发展到小区即乡也叫片村，以大区或小区为单位，集中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县里为了配合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及时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地主、恶霸召开几千人大会，在大集镇处决，以扩大影响。为配合六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曾在斜店大集上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公开处决郝楼村的汉奸恶霸地主郝道朋。县政府秘书尹耀东（泰安人）、六区区长张金榜均在大会上讲话，大力支持群众运动，坚决支持雇、佃、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坚决地向地主汉奸恶霸开展斗争。因郝道朋当汉奸队长，在六区丁庄安过汉奸据点驻过防，干过很多坏事，丁庄群众忍受了很多难以忍受的痛苦。公安队将郝道朋枪决后，丁庄的民兵又用枪对着郝道朋的头打了一枪，把头炸得粉碎，这才解除民愤。

大会后，薛楼小区及时组织群众召开诉苦大会，对郝楼郝道朋、郝延申、郝世温、郝世延等汉奸、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

开展斗争，宣布扫地出门。粮食、牲畜、大农具等财产当场宣布分配给各村的雇佃贫农；土地房屋待运动后期由小区再作统一分配。这样声势浩大的场景容易增强群众的信心，易于提高群众阶级斗争觉悟，利于破除“宿命论”观点和所谓“穷靠富”、“富靠天”、“穷富是命中注定”的骗人鬼话，树立以雇、佃、贫农出来掌握的领导权，还易于培养锻炼群众领袖，选拔群众领导干部。

小区会后我们就回到村里进行搬“石头”工作了。为了进一步地深入开展群众运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经过同雇、佃、贫农、农会干部商讨，凡是阻碍群众运动的地主恶霸以区为单位集中起来由民兵看管起来，没有他们的活动自由。待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斗争谁的时候，就由村农会干部到“石头”班里要回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诉苦批斗。我们老庄工作队三人，带领农会干部、民兵搬走了李××、梁××等五块大石头，送到区里“石头”班看管。当时县、区公安武装部门派得力干部到基层帮助搞好“石头”班的看管和管理工作，包括对“石头”们的教育，讲解我党对地主恶霸富农的政策，地主富农压迫剥削雇佃贫农和老百姓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推翻地主阶级即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他们教育的目的是为群众诉苦斗争大会奠定基础，教育他们只准老老实实听从群众摆布，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就有乱棍打死危险。我们工作队为便利工作，保护自己，树立工作队和雇、佃、贫农的阶级优势，为群众撑腰鼓气，当时的口号是“雇、佃、贫农的气可鼓不可泄”。孔同志经常在腰带上（穿的是老百姓服装，棉袄外边扎着一条皮带）挎着一支鸡叨豆枪，我们两个学生每人发给两个手榴弹也经常掖在腰里，随身带着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和袭击。

经过冬季几个月的工作，春节前学校放寒假，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同学回到学校，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

攻解放区，因阳谷县城距离黄河南的国民党军队较近，为给学生创造一个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我们学校全体师生，春节后就像部队一样背着行李、背包打起游击来。开始迁移到七级区大杨庄，后又到东阿县秦老庄，同冀鲁豫边区抗日第四中学本校（前身叫泰西公学、泰运中学）合并。因为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员公署直属机关都驻在东阿县铜城附近，目标太大，不利于防国民党军队的空袭，我们的学校又迁移到聊城县于集区的八大庄一带。以小组为单位也就是相当于部队一个班住一家农户，一个班相当于部队一个排，以班为单位吃饭，在树林里上课，每个人坐着自己的背包，膝盖当课桌，老师讲学生记笔记。因为居住上课吃饭太分散，没有特殊的重大活动，校长就不召开全校性的师生大会，所以说这所学校就是干部训练班，就是游击队。

时过四十余年，回忆难免有错误之处，因请孟桂宏（又名孟宪芳）、周金铭、李月芳（又名李子华）、段延世、田明远帮我回忆，特表感谢。

1989年3月10日

（崔衍双，1930年生，中共党员，阳谷县计委副主任，1982年离休。）

周子厚烈士传略

崔衍双 周金铭

周子厚（1911～1940年），是阳谷县较早的党员之一，是协助徐翼开辟聊、阳、阿三县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任中共阳谷县东北片区委书记（当时全县分四个区也叫片）、县委委员兼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动委会主任等职务。

周子厚名长宽，子厚是他的字。1911年生于阳谷县七级镇崔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父周广彩是一个地道的老实农民，在旧社会，自家土地少，不能养家糊口，因不识字，又没有其他谋生道路，只好租种地主的地赖以维持生活，受尽了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尝尽了不识字的苦头，所以决心让儿子上学读书。周子厚自幼就被送入本村私塾读书，在周子厚第一天入学时，其父就谆谆嘱咐说：“宽哪，到学里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像我一样，出力受苦，打的粮食给地主，目不识丁，到处受人欺骗。为出这口气，我再作难也要供你上学。”父亲这几句话，当时在周子厚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开始入校就很勤奋学习，加之天资比较聪慧，从识字学数开始，学习成绩都很好，到初小三、四年级就成了高才生。为了学好课程，他找了几个情投意合的同学夜间住校，坚持在晚自习之后继续学习，学校里没有床就睡在棺材盖上（房东开棺材铺），以便次日早起晨读。

这样勤勤恳恳在本村私塾读完四年级，又考入距本村七八里路的老韩庄（现属聊城市）高小，在招生考试时名列第一，又是

最先交卷（当时规定头卷外加5分），算术竟得了105分。于是，周子厚的名字就传奇似的传扬开了。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们都争相在学生中打听哪个是周子厚，非要认识一下这个高才生不可。待高小毕业后，从学习成绩讲升中学是有把握的，再考大学也很有可能，但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只好考入阳谷师范讲习所就读，目的是能早些时间找点职业以补家庭之困。

从阳谷师范讲习所毕业后，1933年至1935年同杨耕心（又名杨一斋）、王伯瑾（又名朱涛）、孙鸣兰（女）在阳谷县立第三高小（地址阿城北会馆）任教，1934年经杨耕心、王伯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前已系“中坚社”（党的外围组织）成员。自此名曰教书，实则是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为工作之便，决定先以学校为阵地，争取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和我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这一任务周子厚就主动担负起来了。当时为什么要以学校为革命阵地呢？因为这个学校范围较大，除去阿城镇上的学生以外，还有不少乡下的学生，影响面较广，高小班的学生多系15岁以上的同学，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当时的校长又是国民党员苑广德，他是学校第一个掌权者，如果我们不向学生进行党的抗日救国和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教育，学生就将堕入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卖国投敌的罪恶深渊之中，所以在阿城完小，周子厚为骨干，向当时的国民党校长苑广德一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周子厚脑筋灵敏机智，口才好，很健谈，经常有些思想进步的学生聚在他的宿舍里谈论革命道理，听取他的教诲，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学生开始懂得了什么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初步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四万万同胞必须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有些学生感到新奇，后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才是救国救民的好办法，都感到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新的东西，所以有更多的进步青年、教师都愿和他在一起。他

就借闲谈聊天之际，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道理和抗日救国的进步主张。

一次，周子厚在上常识课，苑广德以校长的身份听课（可能是觉察到周子厚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以借故找岔），周子厚只是轻蔑地瞥了他一眼，若无其人似地开始讲课。当学生在课本插图上看到城市的学生骑着摩托车穿着时髦的服饰上学时，一个学生带着惊奇迷惑的神情问老师：“人家城里那么好，咱校连个骑洋车子的学生都没有……”周子厚立即面对全班学生说：“那都是资本家的学生，在农村广大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人们饭都吃不上，连家中供养你们上学也都有很多困难吧……”下课后，苑说他在课堂上放毒，周说：“这是农村真实情况，我是按课本上的插图解释的，你认为是放毒，你向政府和出版社追究责任去……”几句话弄得苑语塞，无言以对，这件事在学校传开以后，周子厚的威信更高，苑广德在师生面前越来越孤立，以后就调走了。周子厚与国民党校长苑广德斗争的故事，至今还为当时和他上过学的学生们所传颂。的确，从阿城完小毕业的学生，在抗战初期，有一大部分在我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有的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如七级镇东田庄的田东明、阿城的陈赞臣（其党龄已经山东省委批示为“七七”前，是阳谷县为数不多的红军之一）、姬茂宣等。

1936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地的战争计划步步加紧，战争的硝烟已弥漫长城以内和整个华北，中国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险，人心惶惶，学校因此而解散。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卖国求荣，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相反，全国各地的广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发展队伍，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人民军队保卫祖国。此时，上级党派徐翼到阳谷县开展工作，曾去七级崔庄与周子厚接头联系。后来，徐翼在阳谷筹建起政训班，主任是王孟元，北大

学生，是徐翼同班同学，徐翼任副主任，周子厚奉命在政训班学习，作为里面的骨干。那时，所有共产党员都未介绍关系，仍和地方保持关系。因周子厚是骨干，徐翼就派他发展组织中华民族先锋队。工作还未开展，就遇土匪古历二月二打阳谷城，于是就从城里撤出，但周子厚坚决按党的指示继续发展民先组织，除自己东奔西跑地发展组织外，还联系比较知己坚强能干的党员共同做好民先工作。他的内弟张靖宇（又名白靖宇、张振环、张振生）随杨耕心南下工作失利后返乡，周子厚即刻通过党组织介绍他们到政训处（即聊城第六专署警备队政训处，里边的成员都是平津流亡学生），张积极在里面发展组织，周子厚不断和他们接头，想办法协助开展工作。参加民先的大部分是教育界学生、在乡知识分子等进步人士。当时，阳谷县是国民党右派王金祥委任的县长吕任道掌权，我党又派余文伟、窦洪年等与张靖宇共同发展民先。后来王金祥听说这几个人发展民先，就要追杀他们，他们就巧妙地离开政治部转移到冠县鲁西特委去了，但发展民先的工作仍没有停止，一直继续到范筑先牺牲后。在发展民先工作中，周子厚为我党的这一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周子厚于1937年上半年创建崔庄中共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有崔清滨、崔衍信、崔衍臣、崔衍岭四人，开始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都要求周子厚兼任支部书记，后因工作忙，由崔衍信接任。后来对崔庄党员的教育培养他仍很重视，每逢回村联系工作，总挤一点时间召开一下支委会，向他们进行形势教育，讲解我党的抗日主张、我军的抗日战绩，以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党员斗志。因为崔庄党支部是周子厚亲自创建的，又始终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党员较多，斗争性、战斗力也较强。当地很多工作都是首先由崔庄开展起来的。

周子厚很注意发展党组织，建立农村基层党支部，他在发展党员时非常认真慎重，对出身、思想状况、性格、心地等方面都

细心考察，特别是对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各项政策拥护与否，为主要的标准。对发展每一个党员都很慎重，就是遇到亲戚、同学、知己的朋友，即使偶而谈起党的问题，只要对方根底摸不透，就严守党的纪律，不轻易发表见解，更不流露个人共产党员的身分。据李一丁（又名李邦汉）谈：“1935年清明节前后周子厚在阿城完小教书，参加了阿城完小篮球队，到聊城与二中、三中的同学友谊比赛，他打球的技术还不错。此时我因受聊城二中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影响，看清了当时政治腐败的局面，认为应参加共产党，抵制日寇侵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才是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我向周子厚谈了我的看法，并请他帮助我入党。他对我观点点头称赞，并鼓动我要多动脑筋，但很快又说：‘四弟呀（因我排行第四，按崔庄我亲戚是平辈），你现在年龄较小应以求学为主，少过问政治。’这说明他政治上已成熟，怕自己不小心惹出祸事。他这样说也使我明白了当时处世之道，并给予我以希望，指出了未来的道路，不过没有直说就是了。1937年七七事变，在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冬季周子厚常到我家与二胞兄李向平（又名李邦恒）谈抗日救国问题，他颇有正确见地。1938年初春，我二胞兄成为党员发展对象，不久说他已由周子厚介绍加入共产党。此时我才明白他早受到了周子厚的影响，也才知道我二哥已是中共党员了，并请他告诉周我的党组织关系应从聊城转到阳谷，以便开展工作，周接受了我的请求。从这件事上，现在回忆起来，周在当时政治上已成熟，已是做事稳妥、老练的共产党员了。”

周子厚除了帮助徐翼开展工作外，在县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工作经常很忙，但他仍非常注意在农村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他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活动阵地，还说发展党组织必须以宣传为前导，首先得了解党，才能加入党，入党后还必须向每个党员进行教育，才能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所以经

他发展的党员绝大多数都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他直接指导下的崔庄党支部，在当时革命战争年代是党坚强的堡垒村。当时周子厚抓了两个农村基层党支部，一个是他的家乡崔庄党支部，一个是崔庄西北十里的辛李村（现属聊城市）党支部，这两个村党的基础好，同时又是阳谷县最北边，和聊城市南边接界。因家乡之便，首先抓了崔庄的工作，办起了农民夜校，就设在共产党员崔衍信家里，参加学习的人员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比较穷困的农民，不仅有男的还有女的，参加夜校的人根据其接受党的教育的程度，多数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后来向附近村庄发展党员创造了条件，崔庄成了七级一带革命的摇篮。崔庄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家入党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有：赵芳，又名崔清泮、崔一清，1938年入党，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阳谷县青抗先负责人、昆山县（后改为梁山县）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处长，现已离休，行政14级。崔茂如，又名崔存林，1938年入党，当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阳谷县城关区公安助理员，1946年南下，现任湖北省沙市长江修防处主任，行政14级。崔秀容（女），又名张跃华，1939年入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开始在阳谷县做妇女工作，后来和部队干部董志诚结婚，又到部队工作，全国解放后夫妇二人调北京工作。张靖宇，郭屯乡王营人，周子厚的内弟，由于受周的影响，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开始任阳谷县公安局长，1949年南下，任南京中山陵区公安局长、南京市司法局长、劳动局长等职，1984年去世。另有一部分党员始终没脱产，坚持在农村基层工作，当时对增资增佃、减租减息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崔清滨1937年入党，崔衍泽1938年入党，带领崔庄党员和群众成为土改支前的先进村。还有的参加了游击队，如崔衍居、崔衍高、崔玉平、崔存仁、崔衍刚，在抗日战争时期，由周子厚介绍，分别参加了阳谷、聊城的抗日县大队。崔玉平1939年参加阳谷县大队，于1943

年簸箕柳战斗中牺牲；崔衍居曾任聊城县大队中队长，后来转业；崔衍高曾任聊城县大队班长，后来转业务农。可以说，在扩大党组织、开辟阳谷县东北区上，周子厚作出了贡献。

据李一丁同志介绍：“我的家乡辛十李党支部，1938年春夏之交在周子厚亲自扶持领导下成立的，我二胞兄李向平任支书（李向平同志曾任阳谷县农业局副局长，离休后去世），在周子厚领导下发展党组织，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我军抗日战绩等。周子厚常来布置检查工作，同二胞兄和我谈许多问题，有时夏天我们在地边停止耕作就谈问题，太阳晒得出汗，喝口冷水，也要把问题谈完才能返回。1939年冬他已患肺病，在找我大胞兄李邦庆诊病时，仍不忘和我们谈工作。为了工作之便，11月调我到崔庄教书，实则开展党的工作，叫我暂兼任支书，并提出如何把党的工作做好，还指出教育青少年学生抗日爱国是主要任务，不能只教他们识字，只读古书，也不能因避日伪检查，而钻故纸堆。也可教一些科学知识。”最后李一丁同志颇有感慨地介绍：周子厚有口才，有知识，无时无刻不想着工作，上头的工作忙，基层工作又亲自抓，他的肺病可能是这样积劳成疾的。崔庄、辛十李两个党支部都凝聚着周子厚的心血。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揭开了向中国内地侵略扩张的序幕，国民党蒋介石置国家危亡而不顾，命令其军队纷纷南逃，当地土匪蜂起，堪称兵慌马乱的年头。农民群众为避土匪危害，并想保卫家乡，不受日寇侵略之苦，纷纷加入封建迷信会门“黄沙会”及以此为基础而成立的“忠孝团”。周子厚根据上级党的指示，让我们加入“黄沙会”，参加“忠孝团”，掌握从村到团的领导权，把团、会抓在我们手中，使其成为革命的抗日力量。在他领导之下，开展了统战工作，争取了开明人士刘书宝（刘集村人）和徐某某为正副团长，我和建成等党员三人均为副团长，建立“第七忠孝团”。各村会门负责人（名为掌盘的）都为我党员出任。为摆

脱旧乡政权掌握此会门的领导权，我们以聊阳边界和阳谷各村由我党支部领导的各村庄，打破了旧乡界，单独成立了“第七忠孝团”，形成了西自聊阳路，东至大运河一条线我党领导的基地，成为日后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1938年聊城失守后，我们“第七忠孝团”和我党掌握领导权的“第八忠孝团”，冲击了向国民党顽固派王金祥靠拢的十四支队。周子厚让我团和“第八忠孝团”一样，立即集中一批青壮年农民，准备拉到南宫我八路军驻地，编入我军，壮大力量。当时以大户为筹粮秣、柴草对象，这些都是周子厚根据上级党的意图让我们干的。

周子厚经过阳谷县政训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后，进一步体会到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遂于1939年同冯子肃（又名冯洪池）、冯鲁民（又名冯德勋）协助徐翼在阳谷县七级区刘湾村建立了一支人民的军队——鲁西抗日第四大队，当时周子厚亲自动员崔庄党员崔存仁、姚皋党员姚万一等，到四大队作骨干。大队长徐翼，副大队长冯子平（七级镇刘湾人，冯子肃之胞兄，已去世）、顾寿祯（安乐镇人，曾任清平县长、聊城地区疗养院长，已去世），创建时仅有7个人7条枪，因周子厚利用在七级一带人地两熟，党员情况具体掌握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对四大队的创建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年又和冯子肃共同创建了七级区农民一大队，大队长赵玉乡（郭屯乡赵园人，曾任闫楼区长、县民政局长等职，离休后去世），副大队长刘福林（七级镇簸箕柳村人）。初建时的枪支是周子厚亲自说服官桥口地主刘轼玑交出来的，后来农民一大队升级为阳谷抗日县大队一连。同年，周子厚又亲自派共产党员崔衍臣打入孟尝乡北焦庄焦维贤领导的忠孝团（因崔衍臣和焦是亲戚），并动员枪支，第一次未能成功，崔衍臣向周汇报后，经考虑决定与崔衍臣同去说服焦维贤。走到焦维贤的家，只见焦正凝神躺在圈椅上，大概也是在考虑此事，见面后互相寒暄几句，周子

厚就开门见山地谈到帮助枪支问题，从“忠孝”二字，谈到抗日救国，几经周折，终于说服了焦维贤，把忠孝团的枪收缴过来，装备了农民一大队。

周子厚非常注意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回村后除与支部成员谈论工作外，还有时到一些较贫寒的农民家里询问生活情况，有困难想法给予解决。对邻里纠纷也往往予以调解，特别是村上开群众会，只要他在家就一定到场，借机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组织起来反抗日寇侵略，推翻剥削制度，翻身做主人的道理，所以人民群众与之有着深厚的友情，有事情都好和他商量。

1939年的一天，徐翼带领四大队进驻崔庄，在村里的墙上、围子门上，张贴了很多抗日救国的标语，在太阳西下的时候，部队移防离村，在村北柏树林子里集合，有一个战士忘下了东西，忙着跑回房东家去拿，正遇上农民崔清风拿着锅铲端着脸盆在围子门上撕标语，战士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徐翼，当时怀疑是坏人搞破坏，于是就命令将他捆起来，准备拉到柏树林子里处决。这时崔庄的老百姓见状都吓呆了，因为游击队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集合时有很多老百姓围观，有的人只知道周子厚与徐翼不错，但不知道周子厚的身份，就飞快跑到村西头叫来周子厚。当时周子厚告诉徐翼，这个农民是贫农，老实庄稼人，没什么问题，准是因为他家在围子门里边，怕游击队走了汉奸来时受牵连。于是就将这个老实农民放了。这件事对周子厚触动很大，他感到，虽然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但还不够深入人心，还不够普遍，不能使每个人都真正地受到教育，于是就面对众多的围观群众，大讲了全民动员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每个群众都应该支持八路军开展宣传。从此，崔庄的老百姓对周子厚更加敬重，对徐翼和游击队更加热爱，进一步加深了共产党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1939年，筑先纵队二营（因营长姓刁，经常在阳谷境内活动，老百姓称刁二营）在胡楼袭击了敌人，战斗从凌晨一直战斗到黄昏。当时周子厚因到县委开会，也被包围在里边，投入了激烈的战斗，齐南峰县长兼县大队队长、副大队长岳舜卿、刁营长、李程九同志，都参加指挥了这次战斗。经过激战，日本鬼子竟灭绝人性地放了毒瓦斯（当时叫臭弹），有些战士中了毒，当时周子厚也被熏昏过去，与被熏的8名同志被护送出来。因这次被敌人毒瓦斯熏昏，再加有肺结核病，自此身体愈来愈不佳，但他仍坚持带病工作。后来，只能在庭院坐着或拄着棍子到街上站一站，到夜校、党支部活动活动，当上级来人探病、联系工作时，他仍支撑着接待，研究工作，谈起话来似乎满有精神。但终因操劳过度，病情愈加重，于1940年12月故去，年仅29岁。徐翼等同志得知后，亲自来慰问家属，说：“我们阳谷失去了一位年青的好党员，好干部。”崔庄的群众为周子厚的去世，都吃不下饭去，可见全村群众对周子厚的死多么痛心，对他是多么敬重。

周子厚是阳谷早期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党的优秀干部，对阳谷县的抗日工作，特别是对七级区党组织及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积极作用，他为阳谷县的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光荣业绩将永远在阳谷县，特别是在七级一带人民群众中间传颂。

1992年5月

（周金铭系周子厚侄，1931年生，中共党员，任七级镇大杨庄联中教师，1981年离休。本文材料由李一丁、段延世、姚传岭、李程九、赵方、陈赞臣、崔清滨、崔衍泽等同志提供，并经阳谷县民政局孟宪周同志核实。）

侯继荣同志传略

杨绍英

侯继荣，阳谷县西湖乡侯庄人，1916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中农家庭。其父侯传林，是一老实肯干勤俭治家的农民，一生富有正义感。这给幼小的侯继荣很大影响，为其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侯继荣自幼即主持公道，打抱不平，上小学期间，由于扶持弱小，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后到阳谷第一高小学习，打抱不平、申张正义的义举得到了充分施展，在赵凤升、申云浦等人的指导帮助下，侯继荣在学习之余，除做好学生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接受新思想的洗礼。由于活动积极，思想活跃，表现突出，被学校以“激进”、“危险”为由开除学籍。后经阳谷地下党的帮助，进入战前阳谷中学（在文庙内）学习，继续从事学运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阳谷县委的指示，侯继荣随赵凤升同志去寿张开展抗战工作，被派往寿张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学生张贴抗日标语，抵制日货，对寿张的抗战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阳谷、寿张沦陷后，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指导下，侯继荣在家中设立了地下联络站，其父任联络站转送员，负责接待隐蔽和转送党的领导干部，有些干部曾受到保护和护送。在此期间，侯继荣受党的委托，同徐茂礼县长办起了阳谷干部训练班（在文庙内，属共产党领导），侯继荣负责组织和联系工作。布永言攻占阳谷城后，该班停办，但在此班受过训练的人，大多参加了抗日工作，给阳谷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力量。

1938年,侯继荣家的联络站被毁,他遂到馆陶、冠县一带参加了八路军,在先遣队工作。同年,由赵凤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冠县先遣队工作期间,他敢打敢冲,又善于计谋,受到同志们好评。后来,由于部队行动走漏了消息,不能久留,即转移到冀中平原开展抗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组织先遣小组(共五人,侯继荣即其一),回阳谷组建阳谷县抗日人民政府,同时组建阳谷抗日武装谷山游击队。齐南峰任阳谷县长,兼任谷山游击队大队长,岳舜卿任副大队长,侯继荣任指导员。在任谷山游击队指导员期间,他处处身先士卒,敢打敢冲,给战士们做出了表率。他和队长们周密设计作战方案,严密布置作战行动,行动快捷,突发奇兵,使敌人闻风丧胆,使谷山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阳谷一支抗日的主力军。

1940年间,阳谷城东韩洼村,有一股顽固势力活动猖獗,经常骚扰百姓,县政府决定由政治干事李志琛去做收抚工作。此时正值李志琛身染感冒,不能前往,收抚工作就由侯继荣同志负责去做。他首先派人先做策反工作,与那些有正义感的人取得联系。在侯继荣同志进驻韩洼村后,被顽固分子暗杀,牺牲时年仅24岁。

侯继荣同志牺牲后,葬于韩洼村。1950年清明节,值其牺牲十周年祭,才将遗骨迁往侯庄安葬。侯继荣同志为阳谷的抗日工作和阳谷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阳谷人民永远缅怀他。

侯继荣同志1939—1940年任谷山游击队指导员一段历史,在阳谷的党史资料和党史讲座中均未出现,有的材料中没有提到谷山游击队指导员一职。有的党史材料中指导员一职不是侯继荣同志,而是其他同志,这其中可能有误。侯继荣任谷山游击队指导员,这是1950年曾任行署监察委员的赵凤升在亲笔信中提到的,后来,曾任菏泽行署专员的赵凤升的女儿以及李志琛都曾给侯继荣的妻子和儿子侯庆臣谈及过这段历史。

(杨绍英,阳谷县郭屯乡杨庙村人,西湖乡政协工委副主任。)

红岩英烈冯鸿珊

王泽文整理

三四十年前，一部《红岩》小说流行全国，书中的“疯老头”华子良原型就是家在阳谷的韩子栋同志。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位牺牲在渣滓洞中的冯鸿珊烈士。

冯鸿珊，阳谷七级镇刘湾人。在历史上，鲁西一带人民便富有反抗精神，水泊梁山农民起义，席卷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在这里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津津乐道地传颂着，成为他们的骄傲。冯鸿珊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耳闻目睹，接受了早期教育。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洪流风起云涌，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整个民族蹂躏于日军铁蹄下而不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1941年1月，冯鸿珊所在学校国立六中校本部的特务为打击革命斗争，连续制造三次纵火案，并嫁祸于进步学生，逮捕了8名学生，押解到成都监狱。为了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国立六中的学生冯鸿珊、李仲达、陈河镇、石作坚和国立六中毕业后任三分校职员苏文玉，于1941年3月下旬离开学校，经5天徒步跋涉，来到重庆。一行五人在去寻找沙坪坝一位同学时，被六个军统特工和特警队的人抓捕，关在军统局一所房子里，半小时后，五位学生被送到白公馆，从此他们便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

白公馆是一幢二层小楼，原为四川大军阀杨森部下一个姓白的师长在歌乐山脚下修建的一所避暑别墅。1939年11月，在白公馆设了看守所，从此，这里就变成了军统的集中营。后来，军统局又把白公馆定为死刑监狱，成为关押政治犯的秘密据点。

冯鸿珊和他的4个同学被关押在白公馆二楼拐角最后一间，双层床上是潮湿发霉的稻草。囚室房门紧闭着，只在门上开一小窗口，供特工看守们观察犯人动静。犯人们每天白天放风一次，只准在小楼下面的院坝上走动，吸口新鲜空气。

五个人被抓来以后，最先提审了苏文玉，由于他意志不坚强，被特工收用后做了狱中图书管理员。其他四个人对国民党的一套软硬不吃，不肯屈服，并以绝食与敌人对抗。看守长“猫头鹰”杨进兴派了一名看守劝说学生，在争执中被脾气暴躁的冯鸿珊甩开右臂打在脸上，气急败坏的看守恶狠狠地溜出囚室，向上司汇报了挨揍的情况。一小时后，“猫头鹰”杨进兴带着两名看守和排长杨钦典来到5号囚室，给冯鸿珊铐上双镣带了出去。杨进兴临出囚室门恶狠狠地对其他人说：“谁想绝食，就和他一样。”

冯鸿珊被特务们带出后，关押在楼下小便所里。小便所是供犯人放风时小解用的，面积极小，只有一平方米多一点，从未洗刷过，里面臭气难闻。冯鸿珊在这里咬紧牙关支持着，难友们看到这种情况都自动不在里面小解，他们被这位不满20岁的刚烈青年感动了。

冯鸿珊被关后，同室的难友仍然以绝食相对抗，在难友们的强烈要求下，冯鸿珊被关闭36个小时后释放出来，送回囚室。这时，排长杨钦典动了恻隐之心，劝几个学生不要再绝食，学生也接受了这位军人的规劝。杨钦典是由国民党内警二旅旅长罗广文派来负责白公馆警戒任务的，他不是内层特工，也不是国民党员，只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老家在河南堰城，16岁被国民党抓壮丁拉来当兵，虽然十二年的行伍生涯使他性情变得很粗野，但他仍保留着北方农民的诚直与厚道。

冯鸿珊在国民党特务的魔窟中度过第七个岁月时，中共地下沙坪区学运负责人罗广斌被捕了，他被安排在5号囚室，和冯鸿珊、李仲达等人关在一起。后来典狱长知道罗广斌就是二旅旅长罗

广文的胞弟时，马上将情况汇报给罗广文。很快罗广文便下了手谕给看守长，要求看守长“给我严加看管。”尽管这样，罗广斌还是比其他犯人有了些方便，有时他白天不完全被关在囚室内，可以要求出囚室到楼下庭坝子上活动。

罗广斌初进监狱时，对冯鸿珊等学生们不了解，但因为罗广斌是搞学运工作的，所以对学生们的情况很感兴趣。可学生们知道他与国民党官方有关系，都不愿接近他，对他抱有警戒之心。为能与学生们沟通，罗广斌主动介绍自己的情况，并要求自己能为难友们做点事。经罗广斌与学生们不断沟通，冯鸿珊和李仲达改变了对罗广斌的看法，并慢慢成为好朋友。罗广斌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他胞兄罗广文为收买利用他，把老母亲接到监狱与罗广斌见面。罗广斌对胞兄的企图看得十分清楚，胞兄是想利用自己搞政治阴谋，来让自己从狗洞爬出，拍一张母亲接他的照片刊于报纸，来骗取社会舆论。见到母亲时，他向母亲讲明了道理，坚持自己留在狱中，为此，冯鸿珊等人对他更加敬重，就连国民党排长杨钦典也为之动情了。

随着罗广斌与学生们感情不断加深，他们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罗广斌告诉他们外界的一些情况和革命形势，冯鸿珊等人也向罗广斌讲述自身家世和老家的一些情况。

一天，罗广斌问冯鸿珊的哥哥是否叫冯鸿璋，并且告诉冯鸿珊，一名曾在渣滓洞干过杂役的犯人逃出狱外，这人叫韩子栋，家是阳谷，和冯鸿璋是同学，是1936年在北平被捕的。冯鸿珊知道以前在狱中有个干杂活的老头，没想到是自己家乡人，又与哥哥是同学。现在听说他逃出了这个活棺材一样的魔窟，心中甚为高兴。

为鼓舞斗志，冯鸿珊托罗广斌弄来一支箫，罗广斌也会吹箫，不久，5号囚室便飘出《苏武牧羊》、《满江红》、《九一八》等曲子，悠悠深情而又壮怀激烈的箫声回荡在每个难友心中。原东北军黄显声将军听到《九一八》曲子后，被感动得激奋异常，拿起笔来写了

“虎入牢笼威不倒”七个大字,然后贴在墙上,站在那里沉思。黄显声将军原在东北军任副军长,因西安事变后多次营救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特务逮捕入狱,他的副官李英毅也被押在这里,平时他们不准会见。黄显声将军为人豪爽,他曾在苏联留学,学习军事。热情的黄将军在狱中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难友。他常常利用放风之际教小萝卜头(宋振中)和冯鸿珊学俄语,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冯鸿珊脾气不再暴躁了,在罗广斌的影响下,他决心用两三年时间学完大学有关文理科课程,以便将来为国家作贡献。在狱中,冯鸿珊还撰写了《复员后铁路、公路所需人员之估计》,希望能给新中国建设铁路、公路事业时作参考。

当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好转时,白公馆内出现了《挺进报》白公馆版,这是因为《挺进报》负责人陈然被逮捕入狱,和狱中同志取得联系后编辑出的。陈然同志在双腿受了重伤的情况下,巧妙地躲过特务的监视,伏在床上,用一只短短的铅笔和一张香烟纸,用仿宋体把外面的革命形势写下来。深夜时分,在狱房的板壁上轻叩三下,这份报纸便出现在隔壁难友面前。报纸用小字注明:看后原路退回。

当同志们看到这份特殊的报纸时,他们都为之振奋了,于是监狱里出现了充满胜利激情的歌声。特务们面对这种形势,又开始大发淫威。一天,特务们搜查时,搜到5号囚室,一个看守对罗广斌说:“我们要搜查,你如果有违禁的报刊,如《挺进报》什么的,要交出来,不然就对不起了。”罗广斌则和看守据理力争,讽刺特务们害了恐惧症。因为罗广斌有特殊身份,特务们好像留个人情给他,就转身搜查冯鸿珊的床铺和身上的囚衣。冯鸿珊说:“我不知道什么《挺进报》和违禁报刊,7年前我随身带的《新华日报》已被你们没收了,那是公开发行的报纸,也给没收,在你们身上没有什么公道可讲的。”在争执中,特务的无理取闹又一次激怒了这位山东汉子,

于是他甩开两臂，对着特务就是两个耳光，气急败坏的特务悻悻地离开5号囚室。不久，冯鸿珊再次被禁闭在厕所里。第二天早饭后，杨钦典悄悄告诉鸿珊说：“5号囚室的人，包括罗广斌，为要求释放你，都在拒绝吃饭。”鸿珊知道，别人绝食特务们可以不管不问，但罗广斌绝食特务们会十分重视。他料到自己不会被关太久。果然不出所料，在狱友们的顽强斗争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第三天早晨，特务就解除了对冯鸿珊的禁闭。对于罗广斌大义相救，冯鸿珊十分感激，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位好狱友，在罗广斌的鼓励下，冯鸿珊始终保持了坚强的革命斗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消息传到渣滓洞，国民党特务在穷途末路之际做垂死挣扎，10月28日至11月14日，他们相继杀害了王朴、陈然、成善谋等几十名革命志士，来掩盖内心的恐慌。11月中旬，刘邓大军的二野部队直逼重庆，炮声震动了歌乐山，黄显声将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入白公馆，大家兴奋异常，不断振臂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黄显声将军还用中俄文写下了“还我自由”、“还我民主”、“中国人民胜利万岁”等标语。

1949年11月15日，蒋家王朝的政权已是土崩瓦解，雾都重庆降落了蒋介石的专机，同来者还有毛人凤，这次他们是专门布置屠杀民主进步和革命人士的。屠杀任务由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杨进兴担任，决定于11月28日前把狱中人员分两批执行完毕。

1949年11月27日，在这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残无人性的特务们开始了他们蓄意已久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年仅27岁的冯鸿珊光荣地献出宝贵的生命。

冯鸿珊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无愧于家乡父老乡亲的期望，无愧于我们的民族，他与他的战友们将永远被人民铭记在心中。

（根据冯之琨《大运河丛集》中《狱炼》一文整理。）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哈利生

王泽文整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时,曾经有一百多位外国著名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来到解放区,极大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今天,许多外国代表团来中国时,还要到他们的纪念地去瞻仰,这是因为他们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感动了后人。这些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为了捍卫正义、捍卫和平,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1947年,在冀鲁豫边区的阳谷县城北郝楼村成立的哈利生总医院,就是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哈利生大夫命名的。

哈利生大夫全名铁尔生·莱孚·哈利生,1888年1月7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铁尔生镇,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尔伯特大学,是著名的外科大夫,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哈利生大夫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先后在世界许多地方支援了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后来,他不远万里,从太平洋彼岸来到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大地,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于1947年1月10日在送医药物质时病故于阳谷县张秋镇。他的英勇事迹在阳谷一带广泛流传,成为中加人民伟大友谊的有力见证。

哈利生早在14岁就参加了美国西班牙战争。1912年,他来到中国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后来,哈利生大夫离开中国后,曾经参与了墨西哥的班邱维拉暴动。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时,他又服务于加拿大陆军,到法国参加沙眼和癫痫病的防治工作。三十年代初,哈利生再次返回中国,在天津、上海行医。1936年,西班牙战争爆发,他参加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国掀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日高潮,为帮助中国人民粉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阴谋,哈利生大夫毅然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在新四军从事医疗救济工作。在工作中,为了避开日本军国分子的监视和迫害,1941年他在香港参加英国海军。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长期以来,哈利生大夫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对伤病员倍加热忱,用他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医术拯救了许多中国战士的生命,并给了他们亲人般的温暖。

1946年4月,哈利生赴北平筹备援助解放区的医疗物资,8月31日,携带280箱医疗物质由北平出发,当日到达石家庄。行前,叶剑英、黄华为他送行。9月4日,他离开石家庄去邯郸,受到邓小平、薄一波等冀鲁豫边区领导人的热情招待,他的到来为刘、邓大军南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军需医药品。12月4日,哈利生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国福利基金会、加拿大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等机构委托,将40吨医药、2吨纺织品由上海乘火车押送晋冀鲁豫军区邯郸国际和平医院。

接到通知后,哈利生大夫马上行动,于1946年12月19日由上海抵达开封。到达开封后,哈利生大夫和同行者以及携带物质被国民党政府军队扣押。12月的开封,正值冷风刺骨,哈利生大夫在那里饥寒交迫,受到非人道的折磨。由于寒冷和饥饿,他身患重病,同行者劝他先回上海治病,他说:“我许诺过两月后把医疗物质运送到邯郸,解放区医院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他们在那里迫切等待着,我就是死在解放区也是幸福的。”

经过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哈利生大夫及同行者被放行,他

们马上带着满载医疗物质的两辆卡车去邯郸。由于前方军事行动的影响,卡车不能通行,他们不得不改装在牛车上绕道而行。经过一路艰辛,饱受了疲劳和病痛折磨后,哈利生大夫行动已十分困难,只好由同伴搀扶行进。1947年1月9日,他们终于将医疗物质运送到邯郸国际和平分院所在地——张秋。

1月9日,哈利生大夫受到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行署卫生局长李奕同志的亲切接见。哈利生大夫因旅途劳苦,倍受饥寒而身患重病,于1947年1月10日凌晨病故于张秋镇席市街北首路东教堂内一张普通病床上,终年57岁。

哈利生大夫去世后,冀鲁豫边区采取了各种形式来纪念他,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并且由行署主任段君毅批准,在阳谷城北郝楼村成立“哈利生总医院”,纪念这位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

(此材料根据卫生局史志办供稿整理。)

志愿军“活烈士”李玉安

盛星辉

李玉安，原籍山东省阳谷县，现居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他于1946年7月入伍，在解放四平、天津和渡江作战中，多次荣立战功，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很少向人提起自己的光荣历史。

1950年10月，李玉安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任某部副班长，这就是以后打出了军威的“万岁部队”三十八军。1950年11月，美李军虽遭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次迎头痛击，但麦克阿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侵略野心，又在12月24日开始了圣诞节新攻势。在他亲自部署下，侵略者集结了二十余万人，大举向北进犯。为了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在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11月25日夜，我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这天，我军在球场北重创敌人后，美2师、24师、25师从新兴洞出发，坐着汽车向南逃跑，我军冒着敌机和炮火不分昼夜，翻山越岭，跟踪追击。部队在没有人迹的高山峻岭中雪夜急行军。鞋子破了，用一块毯子包着脚走；毯子破了就赤着脚走。志愿军脚上的鲜血，点点滴滴洒在朝鲜雪白的土地上。抢渡清川江时，李玉安所在的第三连，接受了牵制敌人、阻敌逃跑的任务。前面到了清川江，没有桥和船，同志们就脱下棉裤跨过清川江，大家都感到水是冰凉冰凉的。敌人打枪，大家也不去管他。上岸后，由于要迅速投入战斗，同志们棉裤也顾不上穿。这时敌人已被我军打得乱七八糟。阵地上敌我交错。战士们拿着手榴弹，尽找敌人多的地方甩。江边敌人筑有三道工事，但只有一个团，主要是炮兵和坦克。敌人以为被破坏了，严寒季节江水就是天然屏障，

没想到我军冒着严寒，涉水渡江，一举突破。11月30日清晨，我军追到了价川、军隅里、飞虎山、书堂车站、松鼓峰一线，绕到敌人面前布置了一张天罗地网。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半石半土的小山岗，阻挡敌人。

敌人的汽车纵队象一条巨蟒，匆匆而来。他们决不会想到，在他们自己的战线后面，竟然埋伏了一支劲旅。汽车进到三连阵地前沿几十米处，机枪手杨文明对准第一辆猛烈射击。五、六班迅速冲入敌阵，向汽车队猛掷手榴弹。几十辆汽车同时喷出黑中透红的浓烟，车上的敌人四散滚逃，汽车队瘫痪在狭窄的公路上。后面几百辆汽车顶撞在一起，挤得水泄不通，美国大兵纷纷跳下车来，一伙伙一堆堆地乱跑着。

美2师、美25师、骑一师在一片混乱之后，开始明白他们从价川至平壤的道路被切断了，不冲过这一关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敌人已判明眼前的处境，要下最大的本钱来抢占三连光秃秃的没有坚固工事依托的阵地。于是开始拼死反扑，三连就这样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敌人的第一次反扑是在飞机与迫击炮掩护下进行的，很快就被三连打退。

这时空中来了八架蚊式飞机，地上敌人的坦克由远远的车队后面爬到前面，几十门用汽车牵引的榴弹炮也对准了三连的山岗。敌人展开了战斗队形，士兵们在七八辆坦克掩护下向前跟进。炸弹和炮弹一齐倾泻到三连阵地上。李玉安和同志们不声不响地守在工事里，用毯子盖住机枪，用身子掩护住步枪，防御纷纷乱飞的烟幕一样的尘土。弹片打在七班长潘治中的额头上，鲜血沿着脸颊流下来，流着流着就冻成了冰。战友们劝他下去。他说：“共产党员，不能下去。”依然继续射击。战斗如此激烈，以致使三连的伤亡不断增加。指导员杨绍成、副连长杨万海看准火候，及时跑到最危急的地方去鼓励。李玉安和战士们都说：“首长放心，有我就有阵地！”

敌人第四次反扑开始了。炮击过后，三百多敌人从三面围攻上

来。战士们忍受了长时间的集中轰击，都正咬牙切齿。当李玉安等看到敌人的步兵进到阵地前沿三四十米时，便集中一切火力突然袭击。手榴弹的硝烟腾起一片黑色烟雾，机枪弹密如连珠，使得大部分敌人开始溃逃。但有几个冒险的敌人竟敢闯入二班阵地。只见副班长隋金声端着刺刀迎了上去，吓得敌人抱头鼠窜。敌人的四次反扑又被粉碎了，阵地前沿堆起了三百多个美国兵的尸体。但三连连的连长、副连长、指导员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全连只剩下20多个同志。

敌人的第五次反扑是最凶恶的。已打了4个小时，敌人很懂得时间对于他们的意义。这时，他们集中了32架飞机，18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同时向这个不大的山岗轰击。20分钟内阵地上落了三四百发炮弹。敌人投下了大量的汽油弹，长着藓苔的岩石都被烧焦，阵地上变成了真正的火海。敌人的集团冲锋开始了，但李玉安和战友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面前。敌人的死尸象谷个子似地堆满了山前，血也把这山岗染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溃灭。这场战斗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李玉安牢牢记住了指导员牺牲前和他们说的豪言壮语——“有我就有阵地！”他和战友们继续坚守着。三排阵地上只剩下负伤的七班长和战士张学荣。两人一面射击，一面互相鼓励：“为了保卫祖国，决不后退一步！”汽油弹落在一排阵地的重机枪上，射手李春发的衣服全被烧坏，脸上起了水泡，眼睁都睁不开了，也仍然坚持射击。

又一阵炮击过后，一营敌人从三面一齐往上冲。李玉安所在的排只剩下六个人了，手榴弹早已打光，子弹只剩下一点点。熊全光打完最后一梭子机枪子弹，李玉安打完最后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两人都端起没有子弹的枪冲入敌群。六个同志带着身上、帽子上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和敌人摔跤扭打，整个阵地上充满了令人胆寒的喊杀声，敌我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同志们子弹早已打光了，

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打，枪托打断了就用石头砸，石头砸完了用牙咬，用手卡，用脚踢，用头撞。他们又一次杀伤了几十个敌人，不少同志躺倒在山岗上。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的，有双手把敌人摔倒在地下的。他们和敌人烧在一起，倒在一起。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鼓峰战斗或叫书党站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三连只剩下六个没有负伤的人，敌人死伤六百余，敌我伤亡为六与一之比。三连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坚持到了友军从四面八方合拢，把敌人圈到了死亡的口袋中，为主力部队聚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在松鼓峰阻击战中，李玉安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头部被弹片炸伤，右胸被枪弹穿透，昏死过去，当时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7小时后，他苏醒过来，爬下松鼓峰，被朝鲜人民军一位司令员相救。1951年1月3日，他被友邻部队辗转送回国内，进入一面坡兵站卫生所诊治。当时病历记载：李玉安全身情形恶劣，呼吸困难，伤口脓液多而臭，诊断为“右胸部贯通枪伤”和“脓胸”。卫生所主治军医林之虎、军医房保罗对他进行了治疗，但限于条件没有动手术，伤情未能控制，趋于恶化。

1951年5月10日，李玉安被转到武汉。上午11时，进入中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前身）一外科。他入院后，科主任王彤、主治医师夏彭春、住院医师孙洪山、尹潘、程振中等立即对他进行全面检查，诊断为：一、右侧脓胸；二、右11肋和11胸椎横突骨折；三、右胸部贯通枪伤；四、左额炸伤异物存留；五、右第十肋骨慢性骨髓炎。当时，浑身的复合伤和严重的伤口感染，使李玉安不能平躺，不能动，处于极度痛苦中。他严重的伤口感染和脓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败血症，导至生命危险。

为了让李玉安尽快摆脱死神的威胁，5月17日，主刀医师黄仰隆和助手姜兆思、尹潘对他进行了首次手术，取出了李玉安头部

存留的黑色弹片；5月25日，对李玉安进行了第2次手术，切开背部大脓肿，清除腐肉脓液；7月3日，进行了第三次手术，清除右胸贯通枪伤的碎骨残物，引流胸腔脓液。

在救治期间，李玉安曾多次出现体温骤高，腹部剧痛以及头昏乏力等败血症征兆，严重威胁生命。在此情况下，医护人员严密观察，采取有效护理措施，并多次为他改变伙食结构，增加营养。在李玉安自己的努力配合下，经医护人员93天的精心救治，终于痊愈。在广州军区总医院病案室沉睡着的22万余份病历中，就有保存了40年共33张的李玉安的病历，完整地记载着他“复活”的过程。

1951年8月11日，李玉安出院归队。1952年7月，他转业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粮库当工人，默默无闻地工作着，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不过，在当时战斗频繁的情况下，松鼓峰战斗结束后，他所在部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就认为他牺牲了。所以魏巍同志当年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便把李玉安同志列入了松鼓峰战斗牺牲的烈士名单。40年来，作者始终没有更改过，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作品中点到的李玉安这位英雄，仍活在人间。

李玉安已于1980年退休。1990年他已67岁。这年2月，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他原来所在的老英雄部队当兵，人们才发现这位“烈士”还活着。当地政府收到部队证明李玉安身份和功绩的信函时，才知道这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老工人，原来是朝鲜战场的一位无名英雄。

1990年4月19日，老作家魏巍在他的寓所高兴地接待了李玉安。魏巍端祥着眼前这位身着蓝色中山装、满腮白胡茬的老人，惊喜地说：“李玉安同志，想不到你还活着！”李玉安激动地说：“活着活着，这不看您来啦！”两位老战士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李玉安讲述了自己在朝鲜战场松鼓峰战斗负伤的情形。临别时，魏巍把一部精装的长篇小说《东方》和一部《魏巍散文集》送给他。书的扉页上写着：“李玉安同志，你是松鼓峰战斗的光荣参加者。过去

我以为你成了烈士，今天才知道你负伤后被救起了。这次我能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1990年4月，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传遍神州：“李玉安还活着”，“李玉安隐姓埋名几十年，为革命默默奉献……”一时间，人们惊奇、赞叹、钦佩、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盛星辉，志愿军复员军人，在湖南益阳谢林港中学工作。本稿是1990年9月盛星辉寄阳谷政协的。据作者说明，本稿写作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朝鲜通讯报告选》2—3页、《湖南日报》1990年4月23日4版、湖南日报社《文萃》308期6版。收到本稿后我们曾给盛星辉去信询问有关情况，盛同志于1990年10月复信简答如下：“我并不认识李玉安。情况是这样：在刚出国作战中李玉安在38军（今北京卫戍部队），我在炮一师，这是解放军两支王牌部队（属原四野），所以我炮师经常配合38军，敌人也有‘消灭38军，打垮炮一师’之说。这就可见两个部队关系的密切。在第二次战役（包括松古峰战斗）中由于敌人坐汽车逃跑，38军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敌人前面，而我们炮太大（榴弹炮），跟不上，待我们到书堂车站时已只有战场可打扫了。我们负责埋葬了双方死去的亲人，收拾了残留的武器。其场面就如魏巍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些也就是我的经历和特殊感情，所以向你们及时写了这篇稿件……”本文以及当时报纸上的报道都称李玉安是阳谷人，李玉安也一直自称阳谷人。李玉安老家是吴坝，原属阳谷，1964年后先后划归河南省范县、台前县。本稿我县曾转寄台前县政协。）

坡里暴动前的韩建德、曹万年

杨绍英

在郭屯乡西北角，北临京杭大运河，西靠韩庄扬水站灌渠，有三个自然村：韩庄、曹庄、杨庙。韩庄是坡里暴动的农民领袖韩建德司令员的故里，韩庄村南一华里曹庄是坡里暴动农民领袖、共产党员曹万年副司令员的故里，曹庄往东一华里杨庙村是坡里农民暴动的集结点。我家在杨庙，自小就听老人们传说坡里暴动的故事。对暴动后的情况多有文章记述，而有关暴动的准备，尤其是“绿林好汉”的情况材料甚少。农民领袖的后裔，有的在“文革”中受到不应有的迫害。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告慰英灵，启迪后人，特根据耳闻及访问撰写此文。

一、私塾屋里的吵闹声

韩建德于1889年（己丑年）出生在韩庄村西路北一位普通农民的家里。父亲韩克久讲道德重情义，给其子取名也有这种寓意。三年后韩克久又添一女。由于积劳成疾，韩克久夫妻先后去世。韩建德叔婶韩克吉夫妇便负起了养育这对小兄妹的责任，并供养韩建德进私塾读书。

曹万年于1890年（庚寅年）出生在曹庄路北东胡同一个中农家庭里。他有一弟一妹，在当时生活条件一般偏好。曹万年从小入私塾读书，和韩建德系同班要好同学。曹万年佩服韩建德思维敏捷，大胆敢干；韩建德赞扬曹万年稳重沉着，办事牢靠。

在旧私塾读《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韩建德、曹万年都背得滚瓜烂熟，还能抽出时间看《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孙子兵法》以及有关洪秀全起义的书，在他们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反抗、起义的种子。私塾先生有事外出时，韩建德就组织同学玩个够。他叫同学把桌子对到一块，上边放桌子，桌子上再放板凳，他坐到上边当“朝廷”。他亲自封文武官员，哪个不听拉出去非“打”即“斩”。私塾的吵闹声传出墙外，庄乡知道此事的，均佩服韩建德有本事，长大能干一番事业。为防先生知道后打骂，韩安排好同学看大门，先生来时有信号。若知先生来时，他能第一个一切安排就序，看不出破绽。有的笨手笨脚的学生往往遭到先生的打罚，韩建德、曹万年从未受打罚过。

二、韩庄西头的哭声

韩建德，中等身材，身体偏瘦，行动伶俐，眉清目秀，从小扎一小辮，四外八乡都叫他“韩小辮”。韩建德在其叔婶的抚养下长大，成家立业，分家另住。其妹也嫁到薛寨，却因对其婚姻不满而自杀身亡。本村地主韩丕显、韩丕厚依靠人多财广横行乡里，对从小失去父母的韩建德更是愿什么时候骂就什么时候骂，愿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打。有一次韩建德还地租晚了几天，韩丕显就把建德的一窝小猪赶走抵债。打架打不过，打官司打不赢。为此事其叔面对苍天喊冤叫屈，围观者敢怒而不敢言。韩建德也曾为此彻夜不眠，忍气吞声活下去，太没滋味，庄乡邻居看不起，亲戚朋友也断路，如果同他们拚，拚不过也是家破人亡。考虑再三，选择了卖地买枪“拉杆”逼上梁山的路子。首先把妻子儿女安排到亲戚家居住，接着把土地卖掉，再卖掉房屋。这时本村邻居韩登玉家贫如洗，无房居住，无地耕种，要饭为生。登玉母亲提出给建德看家，建德答应给他留两间土房居住。从此韩建德因受地主压榨和官府欺凌，愤而拉起“杆

子”与地主豪绅抗衡。

在北伐革命兴起、华北大乱的情况下，家是阳谷郭屯乡梁庄村一个下野的北洋军阀徐登朝在家招兵买马，企图献媚统治山东的张宗昌。韩建德未解其意就盲目投靠了他。但不久，韩就对徐登朝极为不满。徐不但处处横行霸道，而且吃喝嫖赌，最使韩建德讨厌。韩建德和徐登朝是截然不同的两路人，故他和徐的参谋长程宗岳密谋自立。

曹万年在其三十而立之年，为自谋职业，开阔眼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曾到法国当过华工。据其子曹永华谈，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回国后当地还未有党组织，因而失掉了组织关系。曹万年回国后利用行医为职业，宣传“人人平等”、“平分土地”，说明曹万年在法国入党是有根据的。曹万年从事革命活动的遗物，解放后由王月营（建国前老干部）带去存入博物馆。据有关党史资料记载，曹万年1927年12月参加工作，1927年10月入党。其子女现享受烈属待遇。

三、于家店的笑声

正在韩建德走投无路的时候，阳谷县早期共产党员郭屯乡九都杨村杨耕心特派长工杨保善与韩建德取得联系，并说明两家的亲戚关系。韩、杨二人越来越密切。杨耕心从阶级压迫的现实，阐明共产党的主张，动员韩建德放远眼光，立志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干上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韩建德觉得非常对胃口，表示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倾向。程宗岳也深表赞同，并委托杨耕心与党组织联系。

在郭屯街中心坐西朝东有一家于家马车店，店主于永年原籍阳谷镇五里庙人，因做买卖定居郭屯，他有二子于长胜、于长乐，皆为人正直，善于结交来往英雄好汉，仗义疏财。因马车店来往人多，

不会引起敌对人员注意，故杨耕心选择此处为鲁西县委赵以政、聂子政同韩建德、曹万年接头。韩建德、曹万年对见到县委领导人如同黑暗中见到光明，非常兴奋。经过交谈，赵以政同志抓住他们的特点，因势利导，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旧军阀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话越谈越投机。他们问：“共产党能否派代表和我们取得联系？”赵以政笑笑说：“我和聂子政同志是代表共产党和二位商量进行起义救国这个大事的。”他们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马上整顿队伍加紧操练，准备随时听从党的调遣。交谈中韩建德谈到阶级压迫被逼得无家可归时两眼落泪，当谈到为穷人打天下的党组织负责人就在眼前时韩站起同赵、聂一一握手，当谈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打天下时紧握拳头，慷慨激昂。一切安排就绪后，韩、曹二人还准备酒宴与党代表共饮，这时店内传出饮酒时的笑声。

正当韩建德、曹万年积极筹备暴动事宜的时候，作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韩丕显、韩丕厚等敌对势力也正在密谋活动，妄图把暴动扼杀在摇篮里。听说韩建德在家，他们就勾结杂牌军王奎一在盛夏把韩庄包围。这时韩建德见人马来，临危不惧，戴着破草帽，穿着粗布衣，抗着耒迎着围剿马队去地里耩地。经搜查知道抗耒的就是韩时，调转马头再追，韩建德已无影无踪了。

一次韩建德去郭屯葛集活动，被民团包围，要对外出人员逐个清查。这时韩建德化装成普通农民，戴着草帽没有沿，背着粪筐没有底，里面铺着席片，手里提着两只鸡，不慌不忙地去赶集，没有盘查就出村了。一块去葛集的同伙本村老乡外号叫二哑巴（韩守宇）往外跑时被枪杀到苇棵里。以后关于暴动时间韩建德要求提前是有根据的，是由当时敌我双方局势决定的。

1927年12月，省委对坡里暴动做出指示，决定公开宣传“以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与夺取政权之主张”。省委丁君羊专门来聊城了解暴动的准备情况，并亲赴阳谷与韩建德会面，商谈暴动具体

事宜。

四、杨家庙的吼声

根据鲁西县委的指示精神,征求了韩建德的意见,确定暴动由原定的1927年腊月三十(古历),提前到腊月二十二。在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方面,集结点的选择成为当务之急。在韩庄韩建德已无立足之地,况且同韩丕显、韩丕厚对立是不利因素;在曹庄曹万年家,其父母不可能支持暴动;在其他家里若暴动失败会带来灭顶之灾。经过多方面考虑选择杨家庙村的老古庙条件最佳。其有利条件是:①杨庙村路南是富户,有围墙。前几年富户主杨东善的大儿子杨绍春,被土匪架走,经济损失甚大,故到天黑紧关大车门。路北是穷人,对韩建德、曹万年的杀富济贫的行动很佩服和支持。②古庙在村西,同村不连结,平时(特别晚上)富户人家不去玩,穷户人家很少去玩,尤其是小孩,大人教育有鬼有神更不去玩。看庙的老道叫刘振清,老家是苦山刘文的后裔,因家庭贫寒流落到这里看庙,同韩建德、曹万年关系尚好。③杨庙村的古庙离曹庄不足一里,离韩庄有1.5里,形成三角形。况且暴动人员大部分是邻近几个村的,便于集合和分散。

韩建德、曹万年首先同看庙老道刘振清见面,讲明这次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举行暴动的意义,经过教育刘同意在这里为集结点,并答应帮忙。其次,暴动人员于腊月十八傍晚到达集结点的。据知情人员回忆,共有四十余人,穿戴一般,可是个个精神抖擞,身强力壮,说话和气,办事利索。韩庄村还有韩建春、韩建忠(系建德堂叔伯兄弟)、韩金池,曹庄村还有曹保真,杨庙村杨德清(暴动失败后去北京南苑),邢庄村邢二,王把势村王志本,坡里村张文贤,河南的姬达明。姬达明年龄二十余岁,聪明、好说好笑,大家都叫他“鸡打鸣”。韩建德说:“姬达明,就是我们的打鸣鸡吧!”于是他

成了临时的“号兵”。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庙外由队员打扮成拾粪的观察情况，庙内队员开会、吃饭、休息的地方有站岗的。在集结点的四天里重点做了三件事：一、由聂子政上政治课，讲当前全国革命形势，劳苦大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将来建立人民政权，才是最光明的道路；二、韩建德为主利用仅有的几天时间搞好暴动训练，讲解注意事项等等；三、曹万年讲在法国当劳工时所见新闻，使暴动人员开阔眼界，阐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杨家庙至今还传颂着韩建德的两件事：

一、对地主恨。集结时因铺草不足，韩建德的侍卫杨万奎去该村杨绍和场里弄麦秸铺铺，因没找到人就动手了。地主杨绍和知道后语言不恭，经解释劝说不起作用并发生口角，杨万奎掏出手枪要毙了他，当时吓得杨绍和筛糠磕头求饶。韩建德知道此事后激动地说：“穷弟兄们的麦秸不经同意随便拿是错误的，谁违犯的军法无情。杨绍和是我们穷弟兄的死对头，这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要不是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暴动，需要注意影响，讲究策略，今天就是他见阎王的日子。”（杨绍和曾任汉奸队长，解放后被捕，释放后逃到东北，现身亡。）

二、对穷人亲。在杨家庙集结的时间里，是姜邢庄姜××（家庭贫穷，依靠蒸馍馍维持生活）送馍馍。暴动队员马上出发，馍馍帐如何还？还吧，暂时经济条件不具备；不还吧，是违犯群众纪律的，况且也对不起为暴动服务的穷兄弟。韩建德考虑再三后亲自到本村找到韩双德（韩学孔，中农）说：“你先把姜邢庄姜××的馍馍帐还上，若革命能成功，我一定想着还你帐；若革命不成功，由我个人还你帐，若我没条件还你帐，我下辈做牛当马给你拉一辈子套也得还帐！”韩双德当场答应。然后二人挥泪话别。

五、坡里教堂的枪声

为保证暴动成功，韩建德于腊月二十一日晚派王志本、张文贤回坡里了解情况，防止出现意外变化。1927年古历腊月二十二日傍晚韩建德、聂子政、曹万年召开了简明扼要、气壮山河的战前动员会，然后告别刘振清，冒着严寒，沿着徒骇河向坡里进发。

到坡里北一里许的徒骇河湾，王志本、张文贤早已在此等候，汇报情况之后，由韩建德率领十余人组成的尖刀排，策划扮做晚祷的教徒混入教堂，伺机行事，然后以枪声为号，大部队迅速接近教堂，实施暴动计划。

夜幕拉开，星星挤眼。韩建德率领杨万奎、邢二、韩建春等组成的尖刀排，悄悄逼近教堂大门。这时教堂两扇偏门未关，但晚祷已近结束，两名守卫不许入内。邢二一刀将一名守卫刺倒，另一名也迅速被绑上塞进门楼。尖刀排遂一拥而进，占领了门楼。韩建德打响了暴动的第一枪。埋伏在河湾的队伍听到枪声，在聂子政、曹万年的带领下迅速赶来，在一片喊杀声中占领了教堂。

1999年4月16日

丁团、王团收编始末

訾蔚林口述 郑清铭整理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犯我华北地区，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率部南逃，当时的阳谷县长杨霁峰也受命南撤，只有聊城地区国民党专员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地区竖起了抗日大旗。于是大批的爱国青年志士投到范将军门下，辅佐将军抗日，当时的莘县县长吕世隆就是其中的一名。吕世隆是中共党员，由于他积极主张坚决抗日，遭到国民党投降派的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不少中共党员和爱国民士，这就是有名的“莘县事变”。

“莘县事变”过后不久，我受鲁西北特委的指示，从冠县回到我的家乡阳谷县城北訾海村，先与王培琛取得了联系。王培琛是杨霁峰县长的传达长，和绅士交往较多，便于展开联络工作，他家住在訾海北面的崔庄，特委让他作为我和特委之间的联络人。和王取得联系之后，便按特委指示，着手组建游击队。

杨霁峰县长时代，按梁漱溟“校政合一”的主张，国民党阳谷县政府规定各乡村“每五十亩地要有一棵枪”，建立自己的护家队，而我们訾海村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三十亩地一棵枪。“七七”事变后不久，杨霁峰县长及退驻阳谷的国民党二十九军都受命南撤，此时的阳谷人心惶惶，土匪四起，群龙无首。为了抵御土匪的抢劫，邻近乡村之间的护家队都建立了联系，成立了联防。

根据上述情况，我和我的同学杨怀青、孙晋昌以及我的几个表兄弟积极联系，准备利用各村用于护家的枪支拉起自己的游击队。

可当我开始筹备枪支时,才知道,我们訾海及附近村庄的枪支都让丁钦铎征去了,于是组织游击队的计划困难了。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停止自己的活动,而是时刻注意着丁钦铎及其武装的行踪,并利用各种关系和他联系。

丁钦铎是灵王庙村人,在訾海村西南不远。杨霁峰曾委任他为一区民团团长,并曾做过乡长,在阳谷城里东街开过钱号,在我们附近几个村有点声望。我小时候曾在他家读过书。他的女婿訾乃伦就是我村人。他对我堂哥訾修林比较尊敬,这也是我后来便于对他展开工作的一个条件。

1939年二月初六,从村南门来了二三十名带武器的人,突然将我村围子的三面门落了锁,来抓訾乃伦(訾乃伦,毕业于农业技术专科学校,抗战前任阳谷县政府四科科长)。訾乃伦知道不妙,就跳过围子墙东北角逃跑了。来的人是郝楼郝师温的人,郝师温是当时的刀笔人物(也就是架案子、写呈子的),1939年正月初四日本鬼子占领莘县后,郝师温就去莘县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与郝师温素有怨仇的丁钦铎,听说郝师温去莘县投靠了日本人,便让自己的女婿訾乃伦到郝楼收了自己亲戚的枪和村上其他人一些枪,但是没有收到郝师温的。郝师温从莘县回来知道此事后,便来抓訾乃伦。

不久,日本鬼子就用伪军在郝楼安了个伪据点。1939年八月初,日本鬼子占了阳谷县城后,从莘县出发,带着炮和重机枪去打灵王庙,还没有打开围子,就受到灵王庙西南邻村郭子洛九宫道的人包抄,日本鬼子被迫撤走。灵王庙两名无辜的百姓被日本鬼子打死。

九月初,日本鬼子从阳谷到丁庄去收枪,丁庄不给,和日本鬼子、汉奸打了起来,枪声一响,邻近各村的联防队员吹起了牛角号,打起了鼓,放起了鞭炮,并到丁庄去助战。战斗中击毙了一名日本鬼子。当丁钦铎赶到丁庄时,日本鬼子已经撤走。丁庄及附近老百

姓怕日本鬼子回来报复，男女老少都纷纷转移到北面亲戚家，家里只留下青壮年守家，丁钦铎也离开了丁庄，到了北面的宁仓。在宁仓继续按五十亩地一棵枪的老规定征集人枪。这时候，老百姓议论纷纷，有人说：“咱们打死了日本人，鬼子肯定会来报仇的，干脆我们拉起来吧，鬼子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打。”在这种情况下，丁钦铎正式宣布抗日成立丁团，由自己的家族亲戚组成第一中队，由征来的人枪组成第二中队，第三中队由任海的九宫道组成。丁团成立后，向北走第一次驻吕超范，吕超范的吕鸿滨当过乡长，在吕超范训练过常备队，有过去征枪的名单，这样便于征枪，扩大抗日武装。

丁团成立后不久，李程九和岳舜卿同志就和丁钦铎商量主动出击阳谷城。李程九部负责打东门，岳舜卿的谷山游击队负责打西门，丁团负责打北门。当时丁团有十多个人打进了城门洞，突然日本鬼子打来了一发炮弹，当场炸死4人，炸伤3人，于是便向北撤了。

不久，日军由汉奸带领第二次从南门攻打灵王庙，丁团没有守住，日本鬼子打进了村庄，将丁的房子全烧掉了，但是并没有围住丁团。

九月下旬，丁团住吕超范，汉奸带领日军从聊城来，经沙土集、管海、魏庄之间去打丁团，带有装甲车和重炮，丁团从南门撤退，日本鬼子进了吕超范，实行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吕道耕家的十五间房子被烧得一千二净。

就在日本人打吕超范不久，筑先纵队二团二营（团长王长年，政委是阳谷城北熬盐场的盛北光）去郝楼打了伪据点，没有抓到郝师温，抓了郝的小老婆（后释放）。

九月末，筑先纵队二团二营驻管海（送郝小老婆回来），我们家住了一位指导员叫张涛（现在云南省军区副政委），我向他谈了我的身份和我的任务，叙述了自己组织游击队的经过，并介绍了日本鬼子残酷的三光政策，说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只有丁团。他说可以

帮助我组建游击队。我说我们这一带都拥护他抗日，但是老百姓都怕他住在庄里，怕引来日本人。第二天部队离开了瞥海。

十月初，日本鬼子由聊城经石佛去打贾庄。贾庄有个外号“二疯子”（当过营长，疯过，加入丁团时好了）的枪法很好，两枪击毙了两名日本机枪射手，后自己也被打死。贾庄之战后，丁钦铎征来的人差不多走光了，但是把枪留了下来，以后陆续又来了一些人，队伍固定在二三百人，一中队长是迷阵张红鲁，二中队长曹瑞祥，三中队都是任海的九宫道。

贾庄之战后不几天，日本大扫荡，筑先纵队二团二营又来到瞥海，我就带他们到了瞥海东北便于隐藏的地方，骑兵和坦克无法通过，并告诉他们丁团住在王皋如，可去联系。

十月中旬的一天，崔庄的王培琛叫我，说筑先纵队来人让我去一趟，我见了来人，通过介绍知道此人叫张子元，是筑先纵队宣传科的。于是我和张子元就到王把势找到了丁钦铎，丁很客气地招待了我们，张子元向丁钦铎从“八一”宣言讲到西安事变，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并鼓励丁继续抗日，对丁的帮助很大，对我们以后的收编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久，日本人在青杨李安了个据点，委任郝为八区区长，这是日军占阳谷后在阳谷城北建得最早的据点。

十月末，丁团住在瞥海北面的化庄，汉奸从莘县引来日本人打化庄，没有打开。后来丁团住大坑王，又有汉奸带领的日本人从聊城来打大坑王，丁团被迫撤退。

十一月初，卫河支队的四个人忽然来到我家，说是崔庄王培琛让来找我的。我从一个做小生意的人那里了解到当时丁团住在五杨庄，就领着他们到了五杨庄见了丁钦铎（他们是了解丁的活动情况的），给他讲了一些游击战术，如封锁消息等。并让丁团自己带粮，减少群众负担。

不久，汉奸郝师温的儿子“衙役”带了几十个人从青杨李到郝

楼去,丁钦铎得到消息后,就在他们必经之路王海滨和薛庄之间打了埋伏,结果抓到“衙役”的一匹马。

1939年十二月,日本人经沙土集去睡虎,准备经睡虎去打北面的王皋如。沙土集的联防队员在日本人未进沙土集时,就将消息传给了北面睡虎的护家队长王本昭,王本昭一面通知住在王皋如的丁团,一面组织力量反击。当时睡虎村上有自己的几十条枪,还有青杨李乡放在睡虎的几十条枪,王本昭利用这些枪,组织力量做好了准备,等日本人到时,就开枪和日军接上了火。丁团接到消息后,就派部分人绕到睡虎西南的冯营,从后面袭击日本鬼子,打死了一名日兵和日本鬼子用来拉炮的一头牛(沙土集吴登堂家的)。日本鬼子被迫退回阳谷。这时,睡虎的老百姓议论纷纷,说:“日本人吃了亏,不会和我们算完的,我们干脆拉起来吧,日本鬼子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和他打。”在这种情况下,王本昭去和丁钦铎商量了一下,就利用庄上的人枪组成了王团。以后,丁团、王团联合行动。

十二月中旬,阳谷抗日政府县长齐南峰和一科科长武子升到了丁团。据当时丁团的警卫员李瑞文(现健在)讲,齐县长和武子升在丁团住了两三天,和丁进行了交谈,交谈的具体内容不很清楚,但是记得丁说过:“我们的人枪都是西边的(聊阳公路以西),在西边我们人熟地形熟,我们不愿到东边去。”齐县长和武子升走时,胥光和胡学伦也跟着走了,他俩是征枪时来的。

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当过乡长的葛海葛瑞轩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前些天他们缴了国民党高树勋十军团的散兵游勇的枪,准备拉游击队,让我和县政府联系一下。我说有枪就行。由于当时正赶上过春节,我没有马上去联系。到1940年二月初,葛瑞轩又突然来到我家,让我找齐县长,说他们的游击队长让齐县长的县政府抓去了,说是土匪冒充八路军。第二天,我就骑车去安乐镇东三官庙以南不远的一个村庄,找到了县政府,在门前遇到了老同学万凡

臣。万说他是齐县长的警卫员，便领我去找齐县长。离很远，我看到齐县长走路时一只脚用脚跟走路，便悄悄地问万凡臣：“齐县长的脚怎么了？”万说：“前不久打青杨李伪据点时，不小心自己手枪走火打的。当时丁团已作了配合，负责西面的警戒。”说着话，走到了齐县长跟前。我对齐说：“我叫警蔚林，是鲁西北特委派回家组织游击队的，你们抓来的人，曾经和我联系过。”齐县长立刻让万凡臣出去看看抓来的人枪毙了没有，结果万还没有出门就听到一声枪响。万凡臣止住了脚步，大家沉默了一会，齐县长生气地说：“不久前，张炳元来阳谷，说过警修林的弟弟被鲁西北特委派回家乡组织游击队，可是他不知道你的名字，你又不来，拉游击队也不和我联系。”说完，拿出一个长条的印章让我看，上面刻着“阳谷县抗日游击队”几个字，意思是表明他枪毙抓来的人没有做错。我无话可说，可心里却很生气，过了一会，齐县长说：“你把党组织关系转到阳谷来，留在县政府别走了。”我生气地说：“不，我不想转。”说完就走了。当时已是中午，我肚子饿了，于是便向北走，到三官庙我亲戚家去吃饭。

刚进三官庙，我就遇上了警乃伦，他领我去见了丁钦铎和王本昭。我见到丁、王两人脸色阴沉，便问发生了什么事。丁说，前不久胡学伦拿着委任状回到丁团，让丁团到东面去接受县政府的改编，当丁团走到蒿铺时，遇到了八路军杨勇、肖华领导的 334 旅部队，丁团拿出了委任状，但被一战士抓走了，而且八路军鸣枪示威，让丁团交枪。当时正值夜晚，丁团中胆大的便持枪跑了，胆小的都做了俘虏，被带到了大杨庄，丁钦铎和王本昭就是乘乱跑到三官庙的。说完这些情况，丁钦铎便让我和丁述之去县长齐南峰那儿谈判，说还是按原来的谈判条件，不编散，不离开原地，接受县政府领导，县政府把枪交丁、王团。说完话，我吃了几张丁让人做的面饼，便和丁述之重新返回了县政府，让丁述之和齐县长进行了谈判。谈判很顺利，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齐县长召集部队和机关干部，宣布任

命丁钦铎为抗日县大队三中队队长兼任一区区长,任命王本昭为八区区长兼四中队队长,队伍不编散,还在原地活动。当时我很奇怪,丁钦铎和王本昭都不在场,只有丁述之听了这个宣布。

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丁是为了将八路军带走的人枪要回才和齐县长谈判的。丁钦铎后来没到职,由他的儿子丁述堂代替。为什么丁钦铎没有到职,现在可能只有胥光(现在上海)清楚。

1940年六月,我从东阿回到阳谷,听说改编以后,丁、王团就到西面去活动了。

1940年秋末冬初,郝师温的小老婆从堂邑引来日本人打化庄,当时丁钦铎住化庄。日本鬼子用五六挺机枪封锁了丁团的出路,丁钦铎在李瑞文等几个警卫人员的帮助下突围。据说在突围时,丁钦铎被打死。日本人兴许是对这位丁团长比较敬佩,将丁埋葬,并用木块给丁立了碑,上面还写了时间“昭和十二年”。后来,郝师温的儿子“衙役”扒开了丁墓,将丁的人头割了下来。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有关丁团、王团收编的一些情况。

(菅蔚林,阳谷县大布乡菅海村人,成都铁路局老干部处离休干部。)

丁振声先生抗战事略

赵景尹

丁钦铎，号振声，于民〔元〕前二十年出生于山东阳谷县城北二十里灵王庙村，世代耕读相传，也可谓诗书门第。生有三男三女，长子复孝，次子复堂，三子复尧，皆以务农为本，虽然不算富有，也可谓小康之家。生性爽直的丁振声先生，平时在家乡邻里间守望相助，乐善好施，乱时常组团协助县府打击犯罪，为民除害。如薛匪盘踞鲁西南数十县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当时省主席韩复榘派兵一团围剿，丁振声先生也曾组织民团及红枪会千余人相助，将薛匪逐走。从此丁先生在民众的心目中，得到无比崇敬的爱戴。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对日抗战开始，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带领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山东局势为之大乱。地方土匪揭竿而起，征税征粮，民不聊生，幸有六区专员范筑先先生未随韩某而逃，以专员之声望将鲁西土匪收编成三十几个支队，占据了鲁西数十个县城，有莘县、阳谷、寿张、朝城、范县、冠县、高唐、夏津等。

日军于民国二十七年动用大军侵占了鲁西几个县城，利用汉奸组成了地方行政单位，划分区级乡镇，广掳民众。范先生的支队实行游击战，时常滋扰或打击他们，于是日军及汉奸只能设占据点，游击队可以在广大的面积上任意活动了。

丁振声为保护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和日军及汉奸的欺凌，号召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民国二十九年组织拥有步枪二百余支、自动手枪五十余支的民间抗日武装。虽然在武器和人员方面与日军汉奸的对比太悬殊，可是他们是一支

能征善战的子弟兵,尤其是丁振声的哥哥丁钦明及三个儿子复教、复堂、复尧,都使汉奸闻之丧胆。贾庄一役(那天我中午十二时参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被日军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团团包围,多亏有道寨墙,里面有六十几支步枪和二十几支自来得手枪。我们抵抗着日军,相持了五个多小时,击毙了司令一名,炮目一名和士兵十余名,我们的弟兄只阵亡一位好枪手。日本人回了县城,我们也只好从西门太阳沟里撤退(因为寨门已关闭)。丁先生先出去,即被预先潜伏的三名汉奸打了一枪,幸未击中,丁先生随即将其一一击毙,解救了一整队弟兄的危机而安全撤退。贾庄一役给日军汉奸们一个当头棒,从此丁团的声威为之大震。城北二十五里睡虎有位王本昭也组织了一百多人枪,准备保卫家乡。日本人闻听后也组织了一百多人瓦解他们,丁振声闻听后即率领全部人枪,支援侧击了几个小时,除决的汉奸计有八十人之多。从此后,汉奸们没有日本人的壮威扫荡,不敢轻易出城扰害百姓。

民国三十年十月间,杨勇旅长以召开会议之名,要丁团全体人员参与盛会,丁团长因病未能参加,未料人枪一百多被杨旅长收编。自此后丁先生带领二三十人枪,在城北化庄驻扎。后被汉奸通报,带领日军部队追杀身亡,那年是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一代抗日英雄永别人间。事隔五十年再去回顾这段令人痛心的往事,难免挂一漏万,听说丁先生的三位公子现还在世,谨写片段作为参考。

(赵景尹,阳谷县大布乡吕超范人,定居台湾。1998年去世。本文系阳谷镇政协工委文史组1992年征集供稿。)

回忆青山港阻击战

王树功

1945年4月，日寇占领鄂北重镇老河口后，妄图西进均县。情况紧急，急需堵击。可当地驻军少，顶不住。当时坐镇指挥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黄埔军校八分校主任李宗仁将军，当机立断，命令学生总队开赴前线，正面阻击敌人。

分校的同学们接到参战命令后，个个群情激奋，斗志高昂，在操场上接受了李宗仁将军兼校主任的检阅。同学们以中队为单位站成方队，李主任身着黄呢军大衣在逐列横队面前走过，仅与同学们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大家很受感动。当即摘下“军校学生”圆领章，换上背面注有自己名子的大符号，带上轻重武器开赴鄂北战场。4月的鄂北，阴雨连绵，当时我们已换上单衣，早晚冷气逼人。武当山脉，错落起伏，道路难走，再加上军情紧急，同学们的心情似火烧火燎。在一没雨具二没钢盔的情况下，同学们脚蹬单鞋，肩背着玉米面锅饼，急行百余里，到达青山港，进入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做好了痛击来犯鬼子兵的准备。校部先期派遣过河的侦察队，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发现数百名日本鬼子，正向我阵地前沿运动，潜伏在丹江河对岸，意欲乘夜偷渡奇袭，并有一股后续部队尾随紧跟。

夜幕降临，日军开始偷渡。曾参加过台儿庄大会战的黄总队长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常态，严令各中队的学生“不在有效射程内不准开枪开炮，一定在其半渡而击之。否则按军法处治。”由于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都是第一次与日本鬼子正面

作战,加之求战心切,不时地向教官报告日军橡皮艇与我阵地的距离,意欲及早击沉它,可教官举握手枪,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好象没听见我们的报告似的。命令如山,没有一个敢轻举妄动的,屏住呼吸,不敢咳嗽,更不敢碰响任何器物。顷刻,信号弹划破天空,指示我们,日军已半渡了,可以尽情地射出仇恨子弹的时刻到了!刹时,轻重机枪齐鸣,迫击炮、火箭筒、掷弹筒、枪榴弹的弹丸象蘑菇云和霹雷一样在敌人的橡皮艇上、头顶上、对岸敌人的掩护阵地上炸响。一场强渡和反强渡的激战在惨酷地持续着,打翻的汽艇、击毙的死尸飘浮在血腥味加火药味的江面上,象瘟猪群一大片,一大片。左翼阵地上有几个爬上岸来的敌人,也被交插火网全部击毙,无一生还。敌人强渡受挫,仍不甘心,又几次组织强渡均被击退。

敌我都知道这次决战胜败的重大意义。如日军强渡得逞就可长驱直入,占领川陕,指日可待。而我阻击失败,大西南的最后堡垒岌岌可危。由于学生总队学生多数来自沦陷区,倍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吃够了做亡国奴的苦衷,抗日心切,求战心切,跟日本鬼子打起仗来,不要命。再就是我们同学已接受了一年半的入伍生训练,素质良好,对各种武器都能拿得起,用得好,都有各自为战的能力,上自总队长下至区队的领导,很大部分是从抗战前线调回来任教的,能独立指挥,调遣自如。

青山港阻击战胜利结束,部队接防,学生总队撤离战场。我们八分校随即迁校到武当主峰西边的房县新校址继续学习。

(王树功,阳谷县阎楼镇王庄人,黄埔军校八分校毕业。第五一八届县政协委员。)

我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见闻

李建白

真假蒋介石

1935年约七八月间，我在交通兵第一团有线电信大队电话第二队三排任建筑兵。随排由成都调到军事委员会峨嵋军官训练团设置电话总机。总机设在团本部所在地的报国寺院内。这个寺院的面积很大，总机设在寺院内西南角的几间小屋内。团长是蒋介石，他住在距报国寺约二三里路的伏完寺内，办公室在报国寺的后院内。

一天中午，我和其他几个建筑兵正在整理通信器材，忽然听人传说：“委员长来啦，看委员长去。”我们这几个人过去都没见过蒋介石，听说后，都跑到通向后院的正路上，在路旁停立。这时路旁已有些人等在那里了。不一会工夫，就见一群人拥簇着一个身材高大，身着草黄色哗叽军装，束武装带、佩短剑，戴着白手套的军官，从门外向里走来；随行人员中，有穿军服的，有穿中山服的，也有穿学生装的，走在委员长右侧稍后一点的是委员长的侄子少校列官蒋孝先。他过去后，看的人也就陆续散去了。我刚回去不久，忽又听人传说：“看委员长去，先过去的那个是假的，这次来的才是真的哩！”我们几个又跑到原来的地点去看。不一会，果见又有一群人拥着一个相貌、身材、装束完全一样的人从门口走过来。走在他身边稍后一点的是委员长的侄子少校列官蒋孝忠。

不久，我调到新开寺“委员长公馆总机”值勤，多次见到蒋介石和这个假蒋介石。假蒋介石是蒋介石的中将侍卫长何云，原是杭州公安局长。由于他貌似蒋介石，为蒋特务机关发现，因而被调到委员长身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提升为侍卫长的，平时的衣着和蒋介石不同。后听传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中风瘫痪了因而去职。

青年军第二〇五师始末

青年军的全名是青年远征军，原来是想派出国外为盟国（英、美）军队共同作战而组织的军队。不意 1944 年秋世界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苏德战场上苏军全歼了入侵斯大林格勒的敌军，扭转了战局，转入了反攻；在印缅战场上，大片失地被收复，日寇节节败退，整个形势有利于世界人民而不利于侵略者。这时蒋介石基本上倒入英、美的怀抱，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妄图凭借中国的土地、人力和战争资源，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因此它集结兵力，向蒋管区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由于蒋介石多年来假借抗战名义排除异己，屠杀人民，横征暴敛，置人民于死亡线上。更兼蒋军士兵多系被捆绑而来的壮丁，仅能维持生活的口粮复被大小军官们层层盘剥，以致食不裹腹，衣不遮寒，冻饿而死的千百倍于战死的，官兵关系极为恶化。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所以与日军一遇，立即溃退，南北两线，莫不如此，形成了溃败竞赛。虽有少数军人持爱国热忱，奋力抗战，也无济于事。然强弩之末不能穿缟素，日寇在北线逼近西安、南线打通粤汉线后，终以进展太快，战线过长，补给困难，兵力不继而被迫停止前进。蒋介石一看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不讲情面，如果地盘失尽，自己也就随之垮台，就不能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吮吸人民膏血了，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为了继续鱼肉人民，他声嘶力竭地喊出“挽救祖国于危亡”的口号，呼吁知识青年从军共赴国难。许多热血青年，尤其是学生和小公务员们，以及一部分

教师、教授，在这美丽的口号迷惑下，纷纷走出机关、课堂，踊跃参军，也有极少数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教授、教师、特务、职业学生等参加了青年军的行列。很短时期，建成了从二〇一到二〇九共9个师。后来由于盟国全面进攻，收复不少失地。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给予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击，扭转了战局。日本帝国主义在1945年8月15日发出无条件投降的请求，青年军因而没有参加战斗，于1946年夏全部复员。并成立了青年大学补习班（数目不详，在贵阳的是青年第二大学补习班），专为青年军中的高中肄业学生转学而开办的。复员的士兵都给以少尉预备军发的军衔，另设预备干部管理局管理，局长为陈诚，后为蒋经国，最后可能是贾亦斌（贾在1949年起义，任全国政协委员）。1948年间有部分复员的士兵被收回组成“青年救国团”。以上是第一期青年军的概况。第二期的士兵完全是由蒋管区拨来的壮丁。

1946年青年军复员后，二〇四与二〇五师合并编为二〇五师。1947年秋从湘粤一带调到台湾，1947年冬该师绝大部分士兵又以高初中的知识青年充任，接受孙立人的美式训练，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训练的仅有一个师。1948年夏又分成两个师，恢复二〇四师和二〇五师番号，称为三十一军。1948年9月，三十一军调北平，经青岛时，第三绥靖司令官刘安祺（原系一期青年军二〇五师师长），羡慕美训新军的虚名，坚决将二〇四师留在青岛，最后参谋总部允许了刘的请求。1949年初二〇五师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为解放军。二〇四师在4月由青岛开赴上海，5月26日全部在上海解放。

球场风波

——贵州省主席杨森吃耳光

1946年的一天，贵州省府篮球队与青年军第二〇五师六一三

团二营五连篮球队作友谊比赛，在贵阳北门篮球场举行。

消息传出，没比赛前，看台上就已挤满了人。两队相继入场，五连有四五十个士兵携带冲锋枪，坐在了看台的一边。贵州省政府主席杨森是个体育爱好者，这天也到场观看这场比赛。开球后，两队互有胜负，不料在比赛进行中，突然为了一个球，两队争执起来，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裁判员调解无效。杨森见此情景，遂出面调解。争执中的青年军队员，喝问他：“你是什么东西？！”杨森立即回答说：“我是杨森！”他满以为自己是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大名鼎鼎的杨森，在贵阳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抬出这块金字招牌对方当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谁知这个太子兵不吃这一套，嘴里说：“什么杨（羊）森狗森的！”甩手过去，只听得啪啪两响，两记耳光重重地落在杨森面颊上。杨森的卫士立即掏出枪来。青年军也不示弱，四五十只冲锋枪都推上了子弹。眼看就要发生流血事件，看台上的观众，也都骚动起来。杨森见事不妙，立即厉声叱责他的卫士说：“谁开枪我枪毙你们谁！”随后，杨森在他的卫士保卫下冲出人群，仓皇地逃回省府。

二〇五师师长刘安祺得讯后，立即赶到六一三团。但他也不敢惩办肇事的青年军士兵，因为他们直接可以去见蒋经国，而且他们之中，声息相通，如果一经串连，整个师的士兵都会自动地团聚起来闹事。到那时，刘安祺更加吃不消。因此他把五连连长胡其节捆绑起来，亲自送往省府，面见杨森请罪。杨森也知道，这些太子兵，他惹不起，于是也就借阶下台，令刘安祺把胡其节带回师去，自行处理，借以表示他宽宏大量的政治家风度。刘安祺把胡其节带回师部后，押在军法处内，并引咎报请青年军军总部惩处。青年军总部官样文章地电慰了杨森，申斥了刘安祺，不痛不痒地把这问题处理了，打杨森的那个太子兵连一根毫毛也没动。只是胡其节仍然押在军法处内，听候处理，直到1947年春二〇五师由贵州开驻湖南，胡其节才从军法处释放出来，并立即升任了副营长。

捡了芝麻，丢掉西瓜 ——采纳李汉萍的意见，二兵团不会全军覆没

1948年徐州剿总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作战略转移，南进蚌埠，以期缩短战线，集结兵力，寻求有利时机，粉碎解放军的攻势，扭转战局，确保首都南京的安全，因此从徐州撤退。

徐州剿总的主力兵团第二兵团从徐州向南撤退，第三天宿营后不久，二兵团的参谋长李汉萍拿着一份电报来到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处，说：“兵团的后卫部队九十六师被围，郭师长急电申请派部队解围。”邱清泉听到后，立即令李汉萍派两个师去解围。李汉萍却提出不同的意见说：“根据情报，共军现集结重兵在我周围，我军处于极不利的形势中。不如趁其尚未完成部署之际，迅速南进，到达预定阵地，与友军靠拢，方可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为了一个九十六师而停留在这个危险地带，派部队去救援，即使战争顺利，往返也要三四天的时间，对我军极为不利。现在应当为全局着想，丢卒保帅，扔掉九十六师向南疾进，这才万无一失。”由于郭师长是邱清泉的爱将，因此邱清泉说：“郭师长是一员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忠贞不二的勇将，迭立战功，这样的人材不可多得，如果我们这样把他丢掉，以后谁敢跟我打仗？！”李汉萍反复陈述利害得失，力主丢掉九十六师，但邱清泉坚决不从，因而作出解救九十六师的决策。

其结果，虽然把九十六师接出来了，但因此延误了四天时间，解放军的兵力部署已经完成，二兵团再想突围已经突不出去了，因而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邱清泉也死于这次战役中。

上述材料系根据我在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时，听李汉萍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回忆写成。

（李建白，1946年夏任驻贵阳的青年第二大学补习班文书股

少校股长,后转入二〇五师一团任督导室一股股长,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任二〇四师搜索营政工室少校主任。政协阳谷县第三—五届委员。已去世。)

宋长胜攻打阳谷县城

杨元璐

民国初年，别看山东当时教育落后，文化低，学校少，可是武运昌隆，各种部队特别多，真是什么环境就产生什么人物，什么社会就有什么情况。在那个社会里，盗贼蜂起，遍地有武装。有的打着国军的旗号，由军阀们供应薪饷和武器弹药，公开地杀人放火，敲诈勒索，为害地方，无恶不作。有的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亡命之徒，啸聚在一起铤而走险，几十个人一群，几百个人一杆，杆有杆子头，牵牛绑票，劫路抢人，甚至攻城陷阵。另外有一部分人，是地方上的义士，草莽中的英雄，因不甘忍受军阀的欺凌，或是遭受当权的迫害，因而聚众成军，举起义旗，这样的部队，虽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仁义之师，却也深明大义，当仁不让，为地方上办了不少值得称道的好事。当时阳谷县境内，确有这样的武装和这样的杰出人物，我这里先不说名道姓，请看下文，自然明白。

1919年八月十三那一天，阳谷城外突然枪声四起，守城的地方武装像老鼠见了猫一样，一枪也没敢还击，就跳下城来，跑得一千二净。城外的部队，砸开城门一涌而进，县城丢啦。我祖父仓卒闻惊，不知该藏到哪里才好，走出院外见墙边有几棵大树，树周围有一圈砖，是为了保护树用的，不管能不能护住身子，就跳了进去，结果被攻城的人们搜出来了，关了一夜。第二天天一明，这支攻城部队就要出城撤退，我祖父随着这支不知是哪里来又向哪里去的部队走出城外。我祖父被看押，又惊又饿，熬了一夜。浑身发软，一出城不远就四肢无力，寸步难行，坐在地上不动了，告押解的人说：

“我是七十岁的人了，年老体弱实在走不动了，你们行个方便吧！”那个看押的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子要打。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忽然从后边窜过来一支马队，马上一个为首的人停下马问：“是怎样回事？”那个看押我祖父的家伙，把枪放下，学说了一遍。那个马上人看了我祖父一遍又一遍，忽然叫了一声“唉呀”，滚鞍下马，扶起我祖父来连问：“你是杨进士吧？我叫宋长胜，你大概听说过我这个人，你老人家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老人家。我们一进城，就派人去保护你，可是没找到你，不想在这里遇到你老人家。受惊了吧，挨打了没有？”说完猛踢了那个看押人一脚说：“瞎眼的东西！连杨进士也不认识，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认真人。”说完又要打，我祖父劝阻说：“这不怪他，怪我没通名道姓。”宋长胜说：“这不是叙话的地方。快请上马，我送你老人家回家。”说完叫人牵过一匹空马，宋长胜亲自把我祖父扶在马上，带着马队，把我祖父送回家来了。这天正是八月十四中秋节前夕，自从阳谷县城失守，我全家正在焦急万分，侦骑四出，寻找我祖父的下落。万想不到老人家被送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到了极点，准备割肉杀鸡，沽酒买菜，酬谢来宾。不想宋长胜三军不可一日无帅，急于要回去，连酒也没喝，饭也没吃，只喝了几杯茶，吃了点水果和月饼就带着人马走了。

这个宋长胜是什么人物呢？他这支武装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他怎能认识我祖父呢？须要在这里追叙一番。据说，宋长胜是山东郛城县人，是梁山第一把交椅宋江的后人，是个远近闻名的孝子。两岁丧父，母子俩生活，一老一小，家贫无靠，已经够苦的了。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又双眼失明，全瞎了。常言说：“从小瞎了还好说，半路瞎了苦难言。”他母亲一瞎只能坐在炕上摸索，有时下地打个吊，不但什么活也不能做，房门也不能出，一切生活重担，全压在十二岁的小长胜身上。宋长胜除下地干活，回家做饭外，还要伺候母亲吃饭穿衣上厕所。别看小长胜年龄小，志气却不小，无论生活多苦，工作多累，总要把母亲的生活安

排放在第一位，母亲说的话，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也要婉言解释，从未有当面顶撞过。

十五岁那年他母亲死啦，长胜入伍当了兵。当兵后，因为他胆大心灵，苦学苦练，在操场上，各种教练，样样领先，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更兼他枪法有准，百发百中，是部队中有名的神枪手，所以被破格录用，由兵升任班长，又由班长升任排长。不久他那个连连长阵亡了。当时部队的编制是三三制，一个连有大、二、三三个排长，长胜是大排长，按官位，按能力，按战功，都该由长胜升任连长。可三个排长中有一个姓耿的排长，是本营营长的内弟，这就发生问题了，耿排长野心勃勃，一心要当连长，先找他当营长的姐夫，他姐夫不答应，又找他姐姐。他姐姐根子硬，有后台撑腰，与本师参谋长发生过暧昧关系，是参谋长的干闺女。他姐姐把他姐夫叫到面前，面对着耿排长，连训加骂地问他那个当营长的丈夫说：“水有源，树有根，吃水不要忘了掘井人。你这个营长哪里来的？不是我求我干爹，你能当上营长吗？不管你怎么说，这回非叫我兄弟当连长不行，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求我干爹，撤掉了你这个营长。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老娘与你一刀两断。”这一下可把营长难住了，只好连声答应说：“是，是，是，还是你说的对。”这个营长接受了“内阁”命令以后，为了遮掩人的耳目，叫宋长胜和耿排长进行考试。第一场是两个人在操场里喊口令，指挥全连操作制式教练，正步、跑步、齐步前进，左右转法，变换方向，变换队形，长胜指挥如意，精神振作，口令洪亮，能落在点子上，来了个满堂彩。耿排长虽然也照样来了一套，但在口令动作各方面，都相形见绌，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高低，偏偏遇上一个瞎了眼、偏了心的考试官，把他两个人的成绩划了一个等号。第二场在考试技术的时候，宋长胜铁杠、木马样样精通，耿排长却样样稀松，在对比的情况下宋长胜占了上风。最后只剩下比射击这一场了，宋长胜是部队中有名的神枪手，按理说最后胜利是有把握的，当时打的是三百米距离的环靶，

打一枪由看靶的人，用旗子报一次环数，谁知这个看靶的人是营长预先安置下的心腹人，宋长胜十环报成两环，耿排长一环报成十环，结果是宋长胜失败落榜，耿排长胜利升为连长。

宋长胜升官不升官倒满不在乎，可是这口恶气始终咽不下去，全连的官兵也为此不平，在暗中议论纷纷。偏偏耿排长又是个不识时务的人，认为自己有后台，当了连长就是一连之主，对排长施行高压手段，动不动就给你个小鞋穿，给你个颜色看，把士兵当作奴隶，不打即骂，更引起宋长胜的不满和全连官兵忿恨。在发薪饷的时候，耿连长把薪饷扣下一半，为他姐姐打金银首饰买衣料，报答他姐姐提拔之恩。官兵们得不到薪饷，知道这个消息，个个怒火填胸，有如一顆拉了弦的炸弹，迟早非爆炸不可。有一天晚上点名，耿连长正要讲话，忽见部队一阵骚动，黑暗中有人高声喊：“姓耿的，你这个连长哪里来的？是用你姐姐的尿换来的！”又有人高呼：“我们不是嫖客，你姐姐为什么花我们的钱？”耿连长正要派人捉拿，喊话的见情况不对扭头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宋长胜举起枪来，瞄也没瞄，一扣板机，只听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正击中耿连长的脑袋，耿连长的脑袋像烂西瓜一样开了花。宋长胜这一枪可真显出本领呀，一则黑夜之间目标不明显，二则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打中一个人，好像是子弹有眼一样，不伤害其它任何人，这就不容易了。这种枪法，叫超越射击，子弹从人们头顶上过去，击中目标，如果子弹从人缝中穿过去就叫间隙射击。在那个时候，拿枪杆子的人虽然很多，但是怀有这种绝技的人，只有宋长胜自己，别人是望尘莫及的。所以武行耍枪杆子人，提起宋长胜的枪法来，无不啧啧称赞，心服口服。再说宋长胜见耿连长已死，大声喊道：“弟兄们，这里是不能再呆了，不愿干的快回家，愿干的随我来！”全连的官兵一听，除耿连长身边两个亲信人员逃跑去到营部报告外，其余的全数官兵都集结在宋长胜周围，愿随宋长胜行动，听从宋长胜指挥。宋长胜停也没停，立即整队出发，等到营长带领人马赶到时，宋长胜

率领所有人员已经走远了。宋长胜把一批人马拉出来后，在阳谷、寿张和河南边界地区活动，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人强马壮，又有从官军手中夺到的武器弹药，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硬旅。这次攻打阳谷县城，就是为了夺取武器弹药，由宋长胜策划指挥的。宋长胜当兵时在阳谷驻扎过，久闻我祖父的大名，也见过一次面，所以在城南旅途中见到我祖父，就认识是我祖父，把我祖父从苦难中救出来。我在前文中提到在乱军营中，也有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人物，就是指宋长胜这个人和他领导的这支人马说的。

（杨元璐，阳谷县郭屯乡杨庄人。1928年考入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阎锡山部任军职，直至少将副师长。解放后曾任太原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59年被判刑，1971年刑满回故里。九十年代初写有《民初侠影》、《乱世奇人》等多部书稿，199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阎锡山军閥揭秘》一书。此篇和《杨万选办学》、《魔术师戏耍袁世凯》均节自杨元璐手稿《乱世奇人》，三篇题目为编者拟加。）

薛 传 峰

郑清铭整理

薛传峰，小名海秀，阳谷县高庙王乡前薛庄人，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活跃在鲁西的一位军阀将领。

青少年时，他即因罪被捕入狱，出狱后和其兄弟窜往山西，拉起了四五百人的队伍，投靠了河南省督办寇英杰，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北伐战争开始后，寇英杰退往河北，薛传峰部作为寇的后卫部队退到朝城时，自带一团人马占领了朝城，筹粮筹款，招兵买马，盘踞朝城三年之久。后来薛被寇调走，薛交出部队后，跑到天津外国租借地去了。

1930年春，北伐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将军部下军团长石友三为了扩充战斗武装力量，从天津召回了薛传峰，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先遣军第一军军长，在鲁西一带联合地方武装、社会各阶层参加军事政治地方行政工作，以掀起反蒋斗争高潮。当时，冯玉祥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长沈克也来到阳谷一带驻扎。因沈克反对以地方民团为主力的薛军，引发了内战。武台一战，薛军夜袭沈克得手，缴获了沈军的部分枪支，并将沈军赶走。从此，薛军的力量越来越大，在阎冯组织的国民政府领导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石友三直接领导下，在鲁西各县建立了军事行政组织机构，安定社会秩序，大得民心。

先遣军第一军军部驻阳谷西街县立第一小学，军部设八大处。阳谷县安乐镇的申鸿渐（号集磐）任秘书处处长，他的长子申伯锦（又名申荷生、申笑）任政治处处长，专做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薛军

鼎盛时期武力扩充到八千多人，声威传遍山东省。薛军所辖的鲁西各县的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统归阎冯组织的国民政府领导的山东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委任。

薛军驻扎莘县、朝城、观城、范县、阳谷、濮县、寿张各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鸡犬无惊，市场繁荣。受冯玉祥将军的教诲，薛军军纪风纪严格，军政人员黎明即起，操练战斗技术，军歌声高入云霄，声震四郊。

薛传峰任人唯贤，在阳谷县长王寿如离任后，把他的警卫员王某任命为阳谷县县长。王任职不久，曾贪污公款现大洋一百多元，被人告发。薛军长派人明查暗访，得到切实的证据，便将三十多岁的王县长逮捕，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1930年，薛军反蒋后，所有国民党员都逃窜远遁。这年夏秋之交，王仲勉奉国民党派遣秘密来阳谷侦察暗探，被薛军察觉，派军部执法队逮捕，经王本人供认不讳，充当蒋军的国民党特务，企图颠覆薛军的政权。因此薛传峰以通敌有据的国民党特务罪名验明正身将王枪决。王仲勉原名王禄勤，阳谷县城西南王庄人，在1928年国民党攻占阳谷后，在县长吴夺标、团长陈光川血腥统治阳谷时，王仲勉是国民党阳谷县党部执行委员。

1930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奉蒋介石指令向薛军反扑。国民党军驻聊城，先用飞机来阳谷轰炸，同时采用收买手段，派人到阳谷跟薛军和谈，准备收编薛军为中央第六军，委任罗明斋为鲁西冀南总指挥，让薛军全体官兵都带上“中央第六军”的袖章。但薛传峰立场坚定，坚决不投降，他遵照冯玉祥的指示，将兵力分散，划整为零，令各县民团各回乡间，化装潜伏，得有利时机再集合起来打蒋介石，自己则带少数警卫转移天津潜居，待机而动。后由于粗心大意，被韩复榘的国民党特务诱捕，押解济南处决。

（本文系根据李子厚等所写材料整理。）

王佃臣其人其事

赵凤臣口述 刘子长整理

王佃臣，又名王老佃，四棚乡魏台村人，1937年左右是阳谷县有名的杆子头。其人有两大特点：一是狐疑多变，行动诡秘，即使对同伙、亲友也不说真实行踪，即便是到某处已住下，觉察到有人发现，立即挪移，决不迟疑；二是面善心毒，表里不一，心里对谁越不好，面上对谁越亲热，是个笑里藏刀的伪君子。看以下这两三个事件，即可知他的为人。

打张秋背后击毙于其水

1937年冬，名义上为了抗日和维持治安，当局号召成立民团，规定按地亩出人出枪。阳谷县征集了一百来口人，有一百来支枪，集合到张秋文庙受训（那时张秋属阳谷县）。此事被在范县一带活动的杆子头于其水知道了，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想深夜袭击文庙，收这个民团的枪。当时于其水有二三十口人和二三十支枪，怕势单力薄不能取胜，便邀仁兄弟王老佃一同去打张秋，言明收了枪，人和枪各分一份。王老佃听说此事，欣然愿往，于是带领了五个人五支枪，与于其水一块深夜去打张秋。几十口子人迅速围了文庙，一时枪声大作，在民团惊慌失措、还没弄清情况的时候，于、王的人就进院收了他们的枪，只剩下中队部的五六个头头坚决抵抗。这时王老佃一看胜利在握，胜利后，如按人、枪分成，自己人少枪少，是小麻雀跟着夜猫子飞，有熬的眼没吃的食。于是

便产生了图财害命、独吞胜利果实的恶念。他一面鼓励于其水坚决彻底消灭他们，一面趁于其水一心猛攻毫无后顾之忧时，在于其水背后开了枪，于其水当时毙命。人人都认为于其水是被敌人打死的，谁也不怀疑王老佃搞的鬼。王老佃见于其水丧命，马上泪流满面，放声痛哭，并对大家说：“一定要拿住最后这几个顽抗的敌人，为于大哥报仇。”一举攻破了团部，全部收了枪。于其水一死，不仅这些胜利品完全归王老佃所有，就是原有于其水的人和枪也都归王指挥。民团成员，多是富家子弟，不愿入伙为匪，后都拿钱回家了。这时王老佃有钱有枪，又补充了些人，声势一下子大起来了。他知道于其水的两个护兵是于的亲侄，故在此二人面前佯作伤心落泪，不进茶饭，并有时表示痛不欲生，此二人也大为感动，反劝王老佃节哀，保重身体。

宴故交收枪暗杀崔连文

自收张秋民团的枪以后，王老佃的势力越来越大。1941年秋，同伙中有个叫崔连文的，跟王老佃拉二把。不久，崔与王因故闹别扭了，崔不辞而别，拉出去一些人，投靠阳谷独立营。后崔因受不了苦，又拉出去当了杆子头，经常在莘县一带活动，不久崔又把人马拉到阳谷城东高庙一带活动。高庙离大碓臼和狮子阁不远，汉奸区长的区部就安在狮子阁。崔听说王老佃正住在大碓臼，便带了四个护兵去找王老佃接头叙旧。王见崔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设宴款待，饮酒之间王老佃以解手为名，到外边急速部署自己的人冒充杨团的人入宴席收了崔连文等来人的枪。崔对王说：“我与杨区长无仇无恨，为什么突然收我的枪？请你到杨区长那里问个明白。”王老佃说：“兄弟你放心，我到朝元哥那里一句话，准能还你的枪，咱一块到狮子阁去见见杨区长吧。”于是崔、王和随从一同往狮子阁去，边谈边走，忽听背后一声枪响，崔连文已倒

地，头开了花，于是崔连文的人和枪，又都归了王老佃所有。

临去世遗嘱交枪免后患

王老佃是1942年去世的。在临死之前，把唯一的儿子叫到跟前说：“我死了之后，你杨大爷一定来吊丧（王老佃和杨朝元是仁兄弟），在他来了以后，你把咱家的四支枪（两支匣枪两支手枪），统统交给他。不交你也守不住，并且还可能有大祸，交了枪，就等于交出了祸患，你以后的日子能得安宁。”子遵父命，在杨朝元来吊丧的时候，其子用托盘端着四支枪，对杨朝元说：“这是父亲的遗物，现在父已归天，我留这也无用，请杨大爷收下用吧。”杨来吊丧，本有此意，没等开口，已如愿以赏，便顺手牵羊收下枪支，心中很高兴。于是把问事的叫来说：“佃臣弟不幸逝世，小侄年幼，无力料理丧事，别叫他遭难了，一切花费由我负责吧。”便立即召开了各乡乡长会，杨朝元在会上强调王老佃生前很维护各乡的利益，我们对其丧事，应有所表示，便部署某乡负责买馍馍，某乡负责买菜物，某乡负责买棺材，某乡负责运石立碑，各负专责，不得有误。宣布停丧七日，亲朋都来祭奠。发丧那天，七班喇叭，大吹大擂，铁炮轰鸣，声振四方，声势之大，花费之巨，为过去所不易见。

1988年4月28日

（赵凤臣，阳谷县十五里元赵洼人。刘子长，阳谷县四棚乡刘堂村人，县广播局副局长，退休后应县政协聘帮助文史工作，1989年去世。）

陈二杠子

段延平 段延世

冯玉祥的西北军刚开始控制鲁西时，遍地土匪抢劫烧杀，劣绅土豪横行乡里，地方官腐败无能，甚至残民害理，藏垢纳污，再加兵匪勾结，致使民众怨声载道不得安居。有鉴于此，冯派遣了一批军佐去地方治安施政。陈广川就是此时受命来阳谷的，任“阳谷保安大队”大队副（后改编为阳谷人民自卫团，陈任团长）。当时，因他惯用杠刑，人送外号“陈二杠子”。与他同时来阳谷任职的，还有县长吴铎标等，他们都是西北军梁冠英师长的部下。

陈广川原任旅部执法处长，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特别是对残民害理、藏垢纳污的贪官恨之入骨，其性情刚强暴烈。他们来阳谷后首先拜会贤达名流，了解地方情况，征求治安意见。进而派人明察暗访，短时间查清了阳谷的匪情和官方弊端，接着抓差办案，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转眼间混乱不堪的局面，又增添了紧张的空气，尤其歹徒恶霸们惊恐万状，无所是从。

陈广川在审理案件中，本着乱世用重刑的原则，只要查明罪状，就先砸三杠子，打个皮破血流，不承认再打，一天打一次，直至交代为止，而且多是亲自动手。

一次同时审讯三人，当堂砸死两个，一人打后不认罪，便捆了个老头看瓜，他用大刀向其臀部连砍三刀，肉裂血流押入牢房。因此犯人闻听提审便心惊肉跳。

在处决犯人时，他独出心裁，花样百出，采用了十分残酷的刑罚。第一次是在南门外会盟台东北角，大卸八块“窝家”冀小

丘。他亲手用大刀砍了左腿，又卸右臂，四肢砍掉而后割头，最后腰截三段。第二次他采用活剥、油炸、点天灯的办法。并于事前大张旗鼓地传扬四乡，故意让人们来刑场观看，刑场设在火神庙前的梁家坑（当时无水）和庙西的空地上（即文昌阁后）。届时城乡男女老幼争先恐后赶到刑场。在百米方圆的空地上以及去现酒厂纸厂的大道上，人山人海挤压不动。转不进来的就在四街听消息。观众之多两万有余，超过历年古会。

活剥的是邢二，因牵牛驾户、劫路处死，将他绑在火神庙门外西10米远的白杨树上，面向西方。陈用杀猪刀先后割了左右乳房，刀离肉白。邢二骂不绝口，他便一刀将嘴撬开，鲜血淋漓，接着一刀一刀地零割。其状之惨难以形容。

油炸的是孙二憨。本来想油炸邢二的儿子，以斩草除根，提差时吴铎标县长说：“小孩子别杀啦！换一个吧！”于是将通匪的孙二憨拉出去服刑了。孙原系收编的土匪，恶性不改，给土匪通风报信，内外勾结，坐地分赃。油炸时陈亲手先用大铡将其两腿铡断由护兵放入油锅（大铡放在火神庙路南坑边上，油锅设在坑下），接着铡两手和臂。铡头时陈已筋疲力尽，再加颈软难铡，几次未能铡断，他命护兵找来一捆麻杆塞到头里开铡，结果仍未完全铡断，最后由另外一个护兵两手抱头一脚蹬肩，猛力将头拔掉放入油锅，过油后头大如斗。油炸之后送进火神庙内，祭奠剿匪作战牺牲的兵士。

最后是用犯人田二点天灯。田犯因杀人、放火、偷盗、劫路和调戏及强奸妇女等罪处死。将他绑赴火神庙前的梁家坑西北角，用褂子包头蒙面浇上煤油，从头顶点燃，火苗升起，田二暴跳如雷大骂出卖他的小白龙。这时保安队的士兵不断地用大碗往田二身上浇油，不一会骂声停止，倒身在地。满筒“美孚牌”煤油烧完烧尽，人烧的焦头烂额全身烧毁。

围观群众看到种种酷刑，有的吓跑，有的流泪，有的晕倒或

休克，也有的高兴甚至拍手称快。

陈广川在阳谷任职整整一年左右，杀了十多人，阳谷的大小土匪歹徒恶霸，不得不逃亡外地。有钱的住到上海、天津租界地，没钱的下山西去东北，直到“七七事变”还有很多作案在逃的人不敢回家。动乱不堪的阳谷，顿时秩序井然，全县出现了一时的太平景象，陈广川调离阳谷后安定的局面持续了数年之久。

在缉捕盗匪严惩歹徒加强治安的同时，陈广川不知何故对阳谷县党部极为厌恶，对党棍的行动作为严加监督，并派他的亲信每天去邮局检查国民党县党部的来往信件。但是他对同盟会员申集盘先生、国民党左派人物申荷生（即申笑）都十分敬重。

陈广川在阳谷虽然使用了目不忍睹惨绝人寰的酷刑，但是阳谷的民众对他没有怨言，没有痛恨，而对他显著的治安成效，都是感念不已。

陈广川从阳谷到聊城驻防后，不久被叛匪王金法杀害。

（程延平，阳谷县阳谷镇西街人。1994年去世。）

关门口黄沙会暴动事件

周金铸

1944年间在关门口村以白朝仁为首领成立了一个黄沙会（也称红枪会），有19个佛堂，六百余名道徒。

寿张解放后，我党在各地农村建立了基层政权，实行了民主民生斗争。当时，关门口村也成立了党小组（创始人李登田），建立了自卫队，在县区抗日政府的领导下，他们带领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大力进行捐浮财（即让地主按土地多少给自卫队捐献枪支弹药等），发动贫雇农起来革命。这样一来就损害了地主的利益，同时也就损害了黄沙会的活动，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共产党抗联干部（工、农、青、妇、文）和群众积极分子。

鉴于这种苗头的出现，为了及时掌握黄沙会的活动情况，我抗联干部李凤海同志派给地主扛活的长工刘守富打入了黄沙会，入了会道门，成了道徒，以便及时为我传递情况。

1945年古历三月中旬，黄沙会头子白朝仁召集下层头目吴登银、吴维宾、吕伟江、吕伟汉、侯传江、侯朝忠、王新忠等人在吕伟江家秘密召开会议，商定趁自卫队集中开会时进行暴动。这一情况被刘守富得知后，立即报告了自卫队长李登月，他迅速把情况汇报了县政府和公安局，随后何县长和公安局长赵新亭、三支队政委黎光于三月二十日带领三支队三个连赶到关门口前来做工作。上午及时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宣传了党的政策方针，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指明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出路。一些会员受到了感化教育，但少数顽固分子拒不接受，就在当天下午

制造了事端，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这天午饭后，我三支队干部战士和带队领导都在休息，自卫队长李登月，农会长李登田和几名自卫队员收佛衣刚回到村南部，发现黄沙会头子王新忠带领数百名道徒手持大刀、红樱枪，从下堤气势汹汹地向上堤冲杀上来，自卫队员当场被黄沙会道徒杀死，显然黄沙会暴动了。

在这种情况下，李登月和登田同志返身冲上大堤口，朝南北方向上空各鸣三枪，这时王新忠带领一伙抢先扑向了李登月，要他缴枪，李登月毫不畏惧，喝令他们撤退解散，但王不听，拿着红樱枪刺了过来，在这危急时刻，李登月躲过王的袭击，朝他打了一枪，王被当场击毙，其他道徒退了下去。此刻，另外一些道徒已越过堤，窜到村上到处冲杀，堤北的道徒同时也行动起来，冲到三连伙房杀害5名炊事员。由于我干部战士没做准备，对暴徒们的进击没组织好反击，因而十几名队员战士先后被杀。三支队的曹连长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急忙投了二颗手榴弹，组织队伍很快撤出了村庄，在西沙河滩里进行了集结，何县长、赵新亭局长、黎光政委弄清事态后及时向干部战士们讲明了黄沙会暴动的情况，并争取了李登月同志的意见，共同作了研究部署，组织部队兵分数路对道徒们进行了反击。面对道徒们反革命暴动后的凶恶行为，干部战士们无比愤慨，英勇冲杀，很快把道徒们的暴动打退了，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最后，把他们全部包围在村北头大地主王老怨的院子里。战士们及时抢占了房顶和高墙，进行了政治攻势，让其缴械投降，但一些人仍负隅顽抗，随后，战士们把点着火的秫秸、柴草投进屋内，浓烟滚滚，加上打枪警告，道徒们感到吃不消，一呼噜窜出房屋和院子，向北拼命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剩余的百余名道徒在白朝仁的带领下，如同丧家之犬逃进了阳谷城内。

经过这次战斗，黄沙会道徒被击毙42人，我三支队和自卫队

牺牲了十多人。虽然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对其他土匪、会道门组织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对我党农村基层工作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阳谷解放后，逃进县城的道徒大都被遣送回村教育改造，但黄沙会头子白朝仁等人不思悔改，于1947年5月1日被政府以法处决，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难忘的一年

李维勤口述 李道达整理

1944年秋，我在阳谷县抗日第八区区队当战士，那时刚16岁，是年龄最小的娃娃兵。9月13日区队驻在阳谷城北坡里村，第二天拂晓，伪阳谷县政府集结了大批日伪军，对我区队四面合击。因众寡悬殊，区队被迫退出了坡里，我和班里的四名战士同时被俘入狱。同年9月20日，我被押解日本国埼玉市当劳工。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把我解放出来。现在虽时隔45年，可在日本国的苦难生活犹历历在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暴残忍，终生难忘。兹将我这一年的经过，叙述于下：

北坡合围

1944年9月14日，我阳谷县抗日第八区人民政府进驻阳谷城北革命发源地——坡里村。本来这里是县边沿地区，西接莘县，北邻聊城，徒骇河在该村之北绵延北伸，能进能退，有险可守。但由于定水镇据点的汉奸区队长徐清泗向伪阳谷县政府密报，这天深夜，我们受到了治安军一个团、伪县大队刘继春部十个中队和由济南调来阳谷的日本炮兵一个营约近3000人的四面包围。当时抗日第八区区长是程培元，区队长杨鼎章（九都杨人）因开会未回，其职务由王队长代理，区队六个班，共70余人。探知敌情后，马上出发，程区长命令向北突围，以占领徒骇河堤岸。第一班向东，声东击西，引诱敌人。谁知区队向北冲时，日伪军已势如蚁

群，机枪密集，炮声隆隆，向我方猛击。为了保存实力，区队折回，沿定水镇村西，迂回向西撤去。

我第一班在班长李丙献的带领下，在坡里村东坚持约10分钟后，与区队失去联系。这时坡里村内犬吠鸡鸣，人声呼号，知日伪军已进入村内。在此情况下，我班只好向东撤。这时已是秋后时节，田野间一望无际，幸好一行行的荫柳，南北纵横，呈现碧绿仍未砍伐，还能隐身，我班决定撤入距坡里村3里远的徐庄，以观动静。进村后稍停，又探得大坑王、北李、张大庙一带的敌人，如鱼网一般对徐庄、坡里包围，并已逼近。我班在这里已不能停脚，立即退出徐庄向西。刚出西门，发现南面100米处，炮兵向我班猛轰，北面机枪排向我班扫射，这时我方已进入被夹击之中，首尾不能相顾，虽经顽强抵抗，终因敌众我寡，最后被俘。同时被俘的有李丙献、魏培义、丁钦来、冯贵感和我，共5人。我们被送回阳谷城内，押入监狱南室。敌人几次审讯谁是班长，我5人都谎称班长请假回家，敌人也没法奈何我们。

押解日本国

就在9月20日，我们吃过早饭，坐在地铺上，怀着忧惧的心情，唯恐敌人再向我们审讯。不一会忽听汽笛呜呜，人声喧哗，开来了5辆大卡车。日伪警察把我5人五花大绑连在一起，推上了汽车，前两辆和后两辆完全是日本兵，我们在中间一辆车厢里，前后站的也是日本兵，头戴钢盔，脚穿皮靴，武装齐整，持枪而立，严目以视。汽车发动后，由东大街开出北关，沿聊阳公路北驶，下午天尚未黑，住在茌平。第二天上车前，给我5人带上了脚镣，这可能因为我们是八路军要犯，又加带了刑具。因汽车烧木炭，在路上常坏常停，到济南时已经天黑，把我5人押在洛口以西黄河岸旁大监狱里。

这个监狱规模宽阔，戒备森严，周围电网密布，碉堡林立，能容数千人之多。在这里押着的人，都是20岁左右的青壮年，多是从农村抓来的壮丁。有一个年约18岁的王益三是肥城县人，被捕前在区队里当侦探员，在侦察敌情时被俘入狱，我和他的感情最好。

9月26日，日兵又把我们发往青岛，坐的是火车。这批共350人，编成了一个中队。这时我们5人中，只有我和冯贵感了，他们三人不知到何处去了。在青岛待了3天，29日登上了轮船。我是第一次坐轮船，也是初次见到大海，真是水光天色，一碧万顷，惊涛骇浪，好不吓人。有的人私相议论，“莫非把我们抛到大海里”，“这回有去无回，九死一生”。这些人都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在海上9天，到10月初8日登了岸，才知到了日本国的大坂。

一年的劳工生活

大坂这个地方，本是日本国的重要市区，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扩张，致使日本在物质上、经济上、军事上损失殆尽，国内空虚，人力维艰。大坂这个地方同日本国其他地方一样工厂关闭，商业萧条，人民生活困乏，一片凄凉景象，所以从国外抓来壮丁或战俘，充当劳工，支持生产，为他们卖命。据说，近年来已从中国和朝鲜发来几批劳工，都是以大坂为基地，向各地分发，我们这一批在大坂住不几天，就分到了埼玉市。

埼玉市和大坂一样，经过多年的战争，青壮年奔赴战场，伤亡严重，以致市内人烟稀疏，绝少男人，街道行人多是妇女，工厂、码头也都是老弱之人维持生产。因此把我们这批人送到码头装卸轮船。据一个朝鲜人说：“在这以前是我国人在这里当劳工，以后挑选出精壮劳力当兵，到中国去打仗，这是叫你们来换班的。”

在码头上装卸麻袋，每只就是 200 斤，还得走撬板，力气小或不小，就会摔倒，如果带队的看见不打即骂。每天劳动 10 个小时，吃的多是玉米面，每顿发给两个小团子，饱不饱没人问。住的是周围木板的草顶房，地面潮湿，多生疥疮，有的惨遭不幸，累饿而死。与我同去的冯贵感，就是受不了劳累饥饿的生活而于 1945 年 2 月病死的。

1944 年的阳历年，日本人也过这个节日，但不放假，也不改善我们的生活，元旦这天，仅能吃到的是大米面蒸的团丸子，每人两个。这也和日本人一样，实行配给制，就连平常也是家无存粮，按人按月定量供应。

曙光出现

1945 年 8 月，日本在国际上和中国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和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的无情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欢欣鼓舞，欢喜若狂，满腹仇恨，一泄为快，于是在饭馆、商店、戏院、电影院随便出进，尽情吃喝，尽情欢乐，无人过问。这样自由的生活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开来两辆汽车，也不知是美国人和苏联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据说是联合国总部的人，对我们讲了话（有翻译），他说：“日本国战败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一切听从我们的处置。日本人虽然把你们抓到这里，过着劳苦饥饿的生活，但他们已是战败国，我们要实行人道主义，第一不能伤害，第二不能抢夺，第三不能破坏，要遵守国际法规。今后你们的生活，由我们负责，很快遣送你们回国。”从那天起发给了生活费，局面稳定下来。

胜利归来

10月里的一天，联合国总部的人向我们讲了话，大意是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明天就送你们回国和家人团聚，今后不再受日本人的气了。当天发给了路费，我是按军人发给了薪金、服装、点心、香烟、毛巾、肥皂，一应俱全，用之不尽。我们都笑逐颜开，欢欣异常。第二天我们坐印度轮船，从崎尾上船，到塘沽登岸，住在天津，第三天坐津浦火车到达济南。在路上见到的是“江山依旧，人事全非”。我们这些患难与共的人，怀着眷恋之情各自分手了。与我同路回家的有本村李维山，我俩是在轮船上萍水相逢，不期而遇的。他也是1944年被俘，在日本国当了一年多的劳工，不过我们两相隔离，不在一起，回国相遇，万分高兴。

回家不几天，适逢阳历年，阳谷县人民政府通知我去县开会。元旦这天，县长岳舜卿、科长李智深等领导人接见了我们，并进行了热情的招待，对我被俘押解日本国，表示无限感慨和亲切慰问。

（李维勤，1927年生，阳谷县石佛乡青杨李村人，现务农。李道达，1925年生，石佛乡青杨李村人，1948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曾任中心校长。1982—1987年在县文化局编写文化志。现离休。）

痛苦的回忆

李朝选口述 李道达整理

1945年的春天，我在村里担任民兵队长，经常联合各村民兵协助抗日第八区（区长程培元）与日伪作战，兼搞地下工作，秘密发动群众和宣传党的政策。在这一年里，敌伪面临日暮途穷的局面，对我抗日第八区进攻更加猖獗。盘据在阳谷县境西北部，如郭屯、石佛、定水镇、草寺敌伪据点，经常出动，疯狂地进行扫荡、烧杀、掠夺、抓丁，无恶不作，致使我八区群众居无宁日，抗日第八区活动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我的工作十分繁忙，了解敌情，传递情报，是我的首要任务。

记得是1945年2月的一天上午，这天恰是定水镇大集，我奉八区的命令，刺探盘据在这里的汉奸区长丁述堂（灵王庙人）的情况。在赶集的路上，就有人对我说：“你的情况很紧，要躲一躲，不要去赶集。”我想，受上级的指派，关系到全区同志的安危，革命力量存亡，虽赴汤蹈火，也不能辞，不入虎穴，难得情报。我便毫不犹豫地走到集上。这天天气晴和，集上行人拥挤，我从西向东走到东头，站在高处，正在观察汉奸据点敌人的情况，冷不防从我背后出来三个人，身穿便衣，手持匣枪，将我逼住，五花大绑，送到区里苦受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将我押到城里大监狱里，经过多次严刑拷打，逼我供出八区组织名单。后来，敌人又利用哄骗、封官许愿，软硬兼施，我始终闭口不言，使敌人束手无策。就这样在这里秘密押了20余天。同我在一起被押的就有40余人，据透露还有三四处

被押的，不知共有多少人。

一天上午，开来了4辆大卡车，把我们赶到车上，车上满是鬼子兵，持枪而立，监视着我们。当天一直把我们送到济南，押在早就准备好的一个黑暗监狱里，在这里住了几天，又坐火车押往天津，接着在塘沽上了轮船。在同一船上的有800余人（其他船不详），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折磨，在途中死了近100人，死者都被扔在海里。虽然我幸免于死，但也因受折磨得了一次严重的疾病，奄奄一息，幸赖同难者精心照顾，才不致于死。在船上待了7天，才到日本海岛，记得是名“南琉球”的一个岛屿，这个岛上住着很多中国人，他们都是无辜的老百姓，被抓来日本国。据一个来自河北省年约30岁的人，声泪俱下地对我们说：“我们来在这里已近半年了，有的当了细菌试验的牺牲品，有的在这里当劳工，真是苦罪难熬啊！”

我们这批人就留在“南琉球”当了劳工，共编成了“12寮”，这可能是以来的早晚排的寮。我们干的是放山、抬石子等既危险又劳累的苦工，定的活，如果完不成，不打即骂，或是受罚。吃的是橡子面（橡子是橡树上的种子，略有甜味，晒干加工成面），还给定量，饱不饱没人问。穿的衣服补了又补，缝了又缝，褴褛不堪。住的是草顶房，如在冬天，地面潮湿，寒风刺骨。吃橡子面后，肛门热，发烧，口渴，没办法只有喝冷水，于是腹泻，也不给治疗，这样死去的到处都有。他们就把死者的尸体堆起来，浇上油，堆上干柴，烧尸成灰，把事先准备好的骨灰盒摆在地上，每个盒里抓一把灰，就算一个中国人。在前期，还有一种“肉丘坟”，劳工死后，成批地埋在一个坑里，这种“肉丘坟”有劳工的地方都有。日本投降后，中国迫令日本人挖出火化，但已臭不可闻。我们在当劳工时，稍不注意，被日本人看见，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残忍至极，不寒而栗，现在想起浑身发抖。

1945年夏天，我们受尽了日本人的摧残折磨，挨饿受累。劳

工们虽敢怒而不敢言，却都义忿填胸，身在日本，心怀祖国。有压迫就有反抗，先是由耿队长（河南省人，未去日本国时曾任八路军某部营长）秘密地发动劳工，准备起来反抗，群起逃跑，结果被日本人发觉，未能跑出，只打得劳工死去活来，此后有一寮120人被害，仅剩下10人未死。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劳工们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直至秋去冬来，日本突然放松了管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也得到了自由。以后才知道日本已经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中国已经胜利。劳工万分高兴，欢欣鼓舞，庆祝胜利，满怀愉快的心情，随便可以看电影、洗澡。

大约是1945年11月里的一天，来了些外国人（以后才知道是联合国总部的人）让劳工们回国。第二天我们整好行李，在南琉球登船到塘沽下船（忘记了在船上历时几天），重见天日，回归祖国，结束了劳工生活。回国时死者的骨灰盒带来了也有一个车皮，同时回归了中国，这数以万计的劳工活去死来，日本人多么残忍。我们从塘沽到天津，住了几天，步行讨饭经济南回到了家乡。

我被捕押解日本出劳工，这一段苦难的生活遭遇，虽时隔46年，仍铭记我的心中，脑海深处还能记忆犹新。

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承认屠杀中国人民，美其名曰建立东亚新秩序，建设东亚共荣圈，妄图掩盖历史事实。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劳工死无葬身之地，生还的劳工受尽了苦难，这是我们要牢记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一笔血债！

（李朝选，1902年生，阳谷县石佛乡西孙村人。1942年任民兵队长，土改时任贫农主任。现在家。）

清末民初阳谷教育点滴

李玉法 高澄波

清末县考与府考

清朝时主管教育的机构，中央设礼部，省设西司，县设礼房（专管档案及学田收入）。另外县设教谕一人，专管本县教育，学官一人，专管本县考试。县里有考棚，能容纳很多考生。在县学官的督导下，每年有数次的集县考试，被录取的县设宴请吃酒席，这是县考，作用是鼓励学生。县考录取的第一名，到府考时，学官保送，准能考上秀才。

清时，山东十府划为十个考区，阳谷划归兖州府。每府辖十来个县。府考是京里派学院大人下来考秀才，每次考期是固定的。县教谕也亲临考场，监督学员。同时还带去本县品学兼优的老秀才，帮助阅卷，再就是当考生的保证人，保证考生的身家历史清白。如果考上秀才，这个保证人也成了老师。考上的秀才，还得向本县教谕交一份贺敬礼钱，如不交或少交就受惩罚。清朝规定秀才名额是大县 16 名，二等县 14 名，三等县 12 名。这个死框框，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清末省考与京考

府考是考取秀才，省考是考取举人和拔贡。省考的主考官，是

京里派来的礼部侍郎。考秀才的叫小主考，考举人和拔贡的叫大主考。考秀才的试场设在府城，考举人和拔贡的试场设在省城。考秀才是三年两次，考举人是三年一次，考拔贡则是十二年一次，所以拔贡比举人更稀罕。考举人和拔贡的资格，必是秀才补过廪的。考举人和拔贡时，也是调各县的老举人、老进士帮助阅卷，阅卷人把堪中举的好文章，交给礼部侍郎主考大人复审，叫做“荐卷”。清末山东有一百单八县，正取生也不过一百零几名，有名额限制，如果被推荐的卷子多了，主考大人就从堪中的考卷中，闭着眼听天由命地往外抽，抽着谁谁倒霉，剩下合乎要求数量的卷子张榜公布为正式举人。举人称老爷，小孩称少爷，光耀门庭，亲友都沾光。正取之外，还有一二十名副取，叫副榜举人。考举人的试场，每人一间房，很小，仅容一桌一椅，试卷面上，只写第几房，不写名。考拔贡比考举人难，条件是：人才好，写的字好，作的文章好。考举人报考人不限数，考拔贡每县不过两人，顶多三人，叫做“争拔贡”。因为考拔贡花钱多，须富裕之家。贫寒子弟，纵有才学，也不能参加。据老人谈，拔贡场第一写的要出色，诗、词、歌、赋各样都行。在考场里本人只有写的时间，没有作的时间，二者矛盾，所以事先必须雇好“枪手”代庖，考试官也明情，只要不露马脚就行。“枪手”都是举人进士等老手，到时奔赴试场，出卖文章，当中也有经纪人，讨价还价，好手不贱卖，一篇文章一二百两银子，逢贱卖的就不保证。如果拔了贡，称老爷，门前立旗杆，非常荣耀。晚清，阳谷的文风不振，不如外县，举人只有孔广海（字仙洲）、孔广沐（字芷湖）兄弟二人，广沐之子孔昭渠（字荷生）是副榜举人。孔广海著有《周易史论》、《读史先》等书。孔广沐著有《诗经质怪（？）》等书。进士杨万选（字子青）在安乐镇高小教书时，写了几篇文章，无著作。

阳谷县的拔贡有熊绍舟（阳谷南街人，书法很出名，后来又中了举，做过江西某县县长）、李占淇（北李人）、孙彝智（城南

孙庄人)、王作梅(城西北大王楼人)、闫玉峰(闫庄人)、张蕊榜(张楼人)。孔举人兄弟教了一辈子书。除熊绍舟、张蕊榜当过县长,其余的几位拔贡,当时仅当过县府里佐治人员,如现在秘书、科局长等职。

省考以上,就是京考。京考,也叫会试,会试以后还有殿试,试场设在北京的金銮殿上,皇上亲临试场点名监考,考头名的为状元,二名为榜眼,三名为探花,以下通称为进士,前几名多留京任用,其余进士即放知县,不用候差。阳谷杨万选先生即因考上进士出任云南邱北县知县的。

科举时代的罢考风潮及科举制的弊端

科举时代,往往发生学生罢考风潮,考生写标语,发传单,号召大家誓不再考。原因是政府对考生规定的制度不合理,如要求考生家庭历史清白,对唱戏的、当过吹鼓手的、剃头的、当过奴仆的都视为下贱人,禁止其后代参加考试。因此,激起考生的怒火,掀起罢考风潮,誓不再考。有少数人被劝入场,放宽对其录取的尺度,这叫在罢考风影响下考上的秀才,低正式秀才一等。

科举制度的弊端是很多的。有钱的人找人替考,叫做“扎枪”。也有的通过关节,向主考官买秀才。这样,无钱的人只有名落孙山。所以那时考生有因落榜愤而自杀的,有因受刺激而得精神病的,也有因气愤终身誓不再考的。以科举拔取的人才如当外交官,因孤陋寡闻,被洋人看不起,造成丧权辱国严重后果的也有人在。

科举时代阳谷考棚地址

阳谷的考棚在东南园北面指挥洼东部,是坐北朝南的大院,北

有堂房，南有过厅，中间两旁是厢房。两厢房很宽，又很长，是县考的试场，能容千人左右。民国时期，利用考棚的房子，略加修理，办起一处私立崇实小学。

谈旧社会的私塾教育

在满清封建王朝，私塾是吃得开的。塾而名之曰私，其不合理可知。那时的塾师多数是秀才。教私塾有“约东”，是管给塾师介绍学生的。每年正月十六日开学，约东联合学生家长摆宴席请老师，约东也跟着吃。在吃饭以前，老师领着学生先给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磕头，然后学生再给老师磕头。在开学以前，给老师下聘请书。对给老师的“束修”钱，也是有等级的，初上学的八九岁儿童，每年三吊钱，到开讲以后，能写二三百字的文章时，束修钱比小学生多二至三倍不等。才上学的小学生的课程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学韵语》之类，大学生的课程是四书五经之类。到年底（腊月十六），各位学生家长再摆一次席请老师，学生们再给老师磕一个头叫“谢教”。此时约东代表学生家长该说话啦，如果老师教得好，就留任老师继续教，并给老师增加工资，如果教得不好，约东就代表学生家长意见，把老师辞掉，叫做“解聘”。所谓“勤力久住，滑懒一年”。

学生如果考上秀才（叫进学），照例拜客，先拜奶师（秀才），后拜举人、进士一类的老师。清制，翰林、状元是京官，留京任用，没有教书的，俗所谓“有状元徒弟，没状元老师”者是也。

旧社会的老师，常年受苦受累，并受束缚，有不得已之苦衷。莘县有个举人名蔡铎者，曾写过“村师苦”一篇文章。其词曰：“茫茫苦海，寂寂愁城；乡里学斋，人间地狱。近时之物价都增，独有文章贱卖；市上之雇士难觅，最是学问易求。何处舌耕有进，纷纷如趋炎之蛾；是谁硯田偶荒，累累如丧家之狗。脱儒服而下

厨房，不男不妇；弛学规以媚子，又瞎又聋……。”蔡先生这篇文章，写得淋漓尽致，可为塾师诉苦之代表作。

满清王朝，设私塾以治国，不但遭到塾师之反对，对它也不利，这时列强急于灭亡中国，正是因为中国腐败无能，无科学无政治。

清末民初废私塾兴学堂

清朝自鸦片战争后，外交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不是割地，就是赔款，国将不国。有志之士，亟思救国，认为再读经书学孔孟，无济于事，非改良政体，发展科学不足以图存。康梁之变法，虽告失败，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莫之能遏。在清末民初时，私塾废学堂兴，如雨后春笋，一发而不可遏。

当时正值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对办学堂，尚无一定经验，只好采用东洋日本学制，初小采用四年制，为义务教育，高小三年制，中学四年制（不分高初中），师范五年制（不分前后师），大学四年制，另外研究院二年。

清末民初时，阳谷办了两期6个月毕业的训练班，叫做单级，毕业后在农村教初小，接着又改办一年制的师范讲习所一期，二年制的师范讲习所两期，还是教初小。以后改办四年制乡师班兼招三年制的县中班，实行一校两制，乡师和县中班毕业生，成绩好的能够教上高小。教初小的，县教育局分春秋两季检查，也按成绩两次发薪。头等每季四十元，二等三十元，三等二十元（另外村里学生还有一份补助）。教高小的县教育局按月发薪。这时清末的秀才，考入县办单级养成所者很多，毕业后教单级小学。年轻的秀才有志上进者，继续学习，考入高等学堂（大专院校）毕业生，本县有几个人经考试当上本县的县视学（教育局长），如常秀桂、吕华冕、李序宝和进士杨万选；有几个人考入山东公立法

政专门学校毕业者，经考试当上了县知事，如范献琳、李锡峻、朱汉升等；有几个人考入山东农业专门学校毕业者，以后都当了县建设局长，如崔耀南、王存平、魏凤山等。先进者占上风，他们都得到好的工作。以后升学者日渐增多，工作就比较难了。

阳谷私立崇实小学

民国七年（1918年）9月，范书田先生捐银洋一万元，创立崇实两等小学堂。校址在城内东南隅旧考棚。当时范氏委孟传瑾（孟与范家是姻亲）为校长，孟干了一段，因事辞职，他介绍杨兰亭当校长，杨因与范家三少爷不合，乃辞职而去。接着换了李序宝当校长，李系范家的旧部下。这一万元只能在外放帐，所获利息作为聘请教员之薪金，即吃利不吃本。县教育局按私人办学条例，每月还有一份补助。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称范氏私立崇实小学。民国二十年（1931年），范已去世，其后人想把捐洋原数收回，上级有令不准，改为私立崇实小学，把范氏二字去掉。

该校教师教学成绩较好，升学率也较高，比公立高小还强。原因之一，是李序宝校长在清宣统年间，即毅然剪去发辫，考入兖州师范，回来后当上了阳谷第一任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思想先进；其二是知人善任，所用教师均能胜任；其三，教师中除其本人外，还容纳机关职员中的优秀人才作兼职教师。该校发展到高级三班初级二班，学生230余人。到七七事变时才停办。

阳谷培养师资的学校

从1912年（民国元年）起，本县办单级养成所，为小学培养师资，6个月毕业，办了两期。接着又改办师范讲习所，也是培训师资的，有一年的，也有二年的。师范讲习所停办了，又改办期

限较长的乡村师范，为高、初级小学培养师资。后值“七七事变”，乡师停办，代之而起的是伪政府的师范。

阳谷捐资兴学的进步人民

阳谷城里东街范书田（字耘经）先生捐洋一万元，在指挥洼考棚处办了私立崇实小学，先后委孟传瑾、杨兰亭、李序宝当校长。从民国元年起，到“七七事变”止，扩充高、初级十余班，聘请优秀教师，培养不少人才。范曾任过冀榆镇镇守使等职。

安乐镇区陈集（现归石佛乡）陈耀汉捐洋四万元，在安乐镇办了一处第四职业学校，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七七事变”起，该校停办。解放后，原校舍改为安乐镇中学，现为阳谷七中，陈曾任过国民党五十八师师长。

本县热心教育帮助办学的人

安乐镇申鸿渐先生，是清朝秀才，民国初年考入山东省立师范讲习所，当过阳谷师范讲习所所长，事变后参加抗日，解放后任专署参议。民国初年，在庄严寺拆庙拉神，创办了安乐镇完小。后来受陈耀汉委托，又在庄严寺西边和尚坟地，把历年所埋和尚骨身，一一掘出，盛在木箱里，移埋他处。在原坟地面上创办了阳谷第四职业学校。当时人言啧啧，谣传纷纷，而申先生却安然不顾。

（李玉法，阳谷县安乐镇袁庄人，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已去世。高澄波，安乐镇人，第一、第二届阳谷县政协副主席，第三届阳谷县政协常委，已去世。）

国民党统治时期阳谷教育点滴

李玉法 高澄波

阳谷县小学教员检定制度

军阀和国民党时期，高初小学教员，均须参加定期考试，叫做“检定”。这主要是测验小学教师业务水平，督促学习，提高教学质量。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积极意义。我在教小学时，曾在崇实、城关两次参加过检定考试，以后也曾当过襄试考人家。特把当时经过介绍如下：

其行政组织是山东教育厅内设的“小学教育检定委员会”，该会的主任，由厅长兼任，每五个临近县划为一个考试区。当时，阳谷是与寿张、朝城、观城、范县划为一个考区的。全省共划为 22 个考区，临考前指定一个县作集合考试地点。具体办法是：头一年的 10 月份省厅即通令各县教育局，根据该县现有小学教师数目，把他们的资格简历（什么学校毕业）缮写花名清册，上报省“小学教育检定委员会”；省检委会根据报表分成三个类型，凡高小、短师、师训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定为全部试验（国文、算术、常识、教学法、教授案等），初中、初师毕业的定为部分试验（只考主科一、二门），高中、后师毕业以及专科毕业的全部免试。省检委会根据各县报表，制成全部试验及部分试验两类的各科试卷，一样一份。试题都是用仿宋字体铅印在试卷上的，中间留有答案的空白。试卷封面上沾有报考者姓名浮签，以便发卷，卷到个人

手里，即行撕去，以免发错卷。另外卷脚上写有本人姓名，折叠好，用浆糊沾上，以免阅卷人作弊，阅完卷，才揭开。以上说的是头一年的考前准备。

第二年3月，即到了考试期，省检定委员会在主任委员（厅长）指令下，调下边的省中、省师校长来省集合任各考区的主试委员，人不够时，再由厅内职员中配备。各主试委员于考前一两天，携带试卷奔赴各考区。至于试题内容，连主试委员也不知道，他不过奉命而行罢了。每一考区的主试，发给二百元的考试费，作为请襄试会餐之用。这时考区内的各县教育局长，也带领本县学员于前一天报到作襄试，并照顾本县教师的一切。在考试期间，主试带黄符号，襄试带红符号，以示区别。

考试期间，凑一个班级多的完小作试场。对各县来考的小学教师，参加全部试验的分在同一教室，部分试验的分在同一教室，每样教室人数多少，根据编好的各科试卷的数目而定，也就是各教室人数不是固定的。每考完一科，收卷后，当时封好，由襄试盖章，以后有人揭发，由他负责。待全部考试完毕，主试委员带着全部试卷，回省交旨，他算完成任务啦。

下边再说一说检定考试的严格和过当行为。凡在试场内带小抄、纸片的，交头接耳商量的，外边传草的，一经发觉，即时遭到训斥和处分。冒名顶替的，即时关入“禁闭室”，考完后取保释放，把被替人教师资格给取消。在我参加检定时，有本县一位姓瞥的女教师，考教案时，她把作好的一张教案铺在桌上抄，被监场人夺去撕碎啦，她感觉教师无望，于当天夜里就疯啦，以后终身成为废人。又有一位姓孟的，替他哥哥考，经发觉关入“禁闭室”，以后把他哥的教员给一笔勾销。每考完一科，搜出的夹带摆出一堆。这种过左的教育政策，在军阀和国民党社会是常见的。

3月里检定，到本年10月，省检委会把试卷看完，才将考试结果发到县。80分以上的为头等，有效期4年，发给及格证书，由

厅长署名；50—60分的，为代用教师，有效期2年；不及格的即时停发补助。

1929年阳谷国民党办教员训练班概况

1929年，山东省教育厅通令各县凑秋假期间，训练全县高初小教师，阳谷自不例外。

阳谷训练班地址，是阳谷城内西街县立第一小学。训练班主任是王仲勉，他是聊师毕业，国民党员。课程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讲师有熊纪明、李维德、朱之梅、翟仲范、王雨亭以及县党部委员董峨卿（外县人）一系列的国民党员。讲师中，王雨亭最弱，高小生，没学问，熊纪明曾嘲笑他说：“孙中山姓啥，家在哪里？”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全县不过二百人，女教师占少数，也有些单级养成所毕业的老秀才。那时我是高小毕业后在本村任初教，也参加了受训。教室里讲台上挂着孙中山的像，每星期一必全体肃立，读总理遗嘱，读完静默三分钟，然后上课。王仲勉在班上一开课时说：“过去是狗式教育，现在才是人式教育。”传到外边，惹得阳谷街上老先生们乱骂。每天上课时，各位讲师，按教材提问题。每天早上，由管体育的老师领着跑早操。管教音乐的老师，在上音乐班时，教“打倒列强除军阀”等歌曲。训练期满后，举行结业考试一次，才散会回家。

阳谷县民众教育馆和讲演部始末

在北洋军阀时期，阳谷各大集镇，如阳谷、安乐镇、阿城、七级、张秋、仓上等地，都设讲演所，县里派专人负责，订几份报叫人看。每到集期，赶集的人，愿意听讲就听讲，愿意看报就看报，人民借此可以了解国内军阀战争和世界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斗

争及其侵略中国的情况，这正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大事。

1928年，国民党北伐统一全国，各县始设民众教育馆。馆内设馆长一人，由教育厅委任，与县教育局是两个部门，一个管学校教育，一个管民众教育。馆长下设讲演、图书、健康出版各部，各部主任由馆长任免。各乡镇之讲演阅报所，与军阀时期相同。

阳谷民众教育馆馆长屡次易人，有本县人，也有外县人，他们的工作，一切听从省厅社会教育科的领导。国民党时期的民教工作，仅是个外皮，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1936年后取消民教馆，设民教辅导员一人，并入教育局，另外只留图书管理员一人，往外借阅图书。

但是民教馆讲演员也有不少爱国人士，他们在“九一八”事变、“五三”惨案、“七七”事变等发生后，除在大街上写黑板报外，还苦口婆心地向群众宣传帝国主义的罪恶及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族观念，有很多为人称赞之处。及国民党反动派被打倒，共产党统一全国，政令一新，民众教育馆和讲演所都告结束。

阳谷短期小学的发展

短期小学，是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办起的，阳谷县当然也不例外。它发展于193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而告终。短期小学，不属于正式教育系统，其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贪心不足，于1934年悍然出兵侵占我长城外的热察绥三个自治区，同年唆使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伪组织，1935年又进窥我平津，强迫我方订立“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两个卖国条约。至此，中国将不国，危机四伏。南京国民党政府，抵抗无力，对敌无方。中央行政院为权宜之计，认为在中国未亡之前，向全国青少年埋伏下一粒种子，叫他们认识祖国，不忘祖国，将来不要认贼作父。于是命令中央教育部下达指示，通令各省县

招考短期小学教员，成立短期小学，培训一个月，分配到农村教短期。每人月薪 20 元，由县教育局领导，县教育局发薪。上级规定：短期的学生招收的年龄是略大一些的青少年，灌输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课程也只是语、算、常识一类，比较简单。阳谷于 1936 年秋才招考短期教员 40 名，于聊专统一集训，膳、宿、书籍由县供给，结业后分配到农村去。这一措施，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初步表现。至“七七”事变起，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果然一枪不打，望风而逃，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他却极力反对。

日伪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7 年侵略中国开始，由于我军民奋勇抵抗，1940 年 3 月才侵占我阳谷县城，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止。在这 5 年当中，日军既以他优越的军事力量，侵占我国的地面，又以文化侵略方式，在地方上办日伪小学，与我抗日政府争夺教育阵地。阳谷县城以大汉奸董政华为首成立了汉奸县政府，董自任县长，“高瞎子”（一只眼，胶东人）任伪教育科长。接着在阳谷各区成立伪高小，乡间成立伪初小。当时京伪教育部也制订了伪“教育主旨”（即汉奸办学的伪教育方针），印发各小学，一律张贴在教室内作办学指南。并印发小学教育课本，作儿童学习之用。另外还提倡尊孔读经。一切无非是消灭中国人的革命心志，使之奴隶化。高一级的日伪学校，还推行日语课，学生学日文。据了解，伪满州国时代，中小学师生一律说日本话，否则就打。1944 年阳谷有伪中一处，伪师一处，伪高小十处，日伪学校加强奴化教育。以后随着我游击区的扩大，逐渐改为抗日小学或两面派小学。当日伪时期，因我抗日政府屡次在七级一带开教员会，阳谷汉奸教育科长“高瞎子”领着鬼子司令官在安乐镇伪完小也开教员会，成立“反共同盟”，与我争夺教育阵地。

阳谷县不同时期的教育情况

李玉法 高澄波

我县小学在北洋军阀时期,全县只有一百多处,教师不过二百人,那时高初小学教材,无中心思想,缺乏政治性,但教材全国却统一,连南洋华侨小学也都用中央教育部审编的课本,统一发行。国文内容,无非是和睦乡邻,国民公德,祖国山河,自然情况以及历代名人故事等。另外还有读经一门课程。县设教育局,局长一人,督学一人,视导员9人,文书、会计各一人。官立小学全县六处,校长及教职员工由县局委任,薪金也由县开支,其余乡村小学每年两次发薪,上半年6月,下半年年底,成绩头等的全年80元,二等的60元,三等的40元,村上每年凑一部分缺给老师,叫做民办官助。

北伐成功后,北洋军阀被打倒,国民党代替了军阀,教育又变了样。秋假期间,在城里训练全县教师,训期一月,灌输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实行党化教育,初中和初中以上学校,非党员不能当训育主任,其尊孔读经与军阀同。军阀和国民党时期的教育方针,都是智、德、体三育并进。其官立小学和乡村小学教师待遇与军阀同,小学读经,仍不禁止。

汪伪时期的小学教育,其教材中心,不外王道乐土,中日亲善,中日共荣,把侵略说成是帮助,是圣战。高一级学校添设日语,尽量麻醉中国人民。其办学方针,叫“教育主旨”,内容是尊孔读经一类东西。

在军阀、汪伪、国民党三个时期,无论中学毕业生、师范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其职业由个人自谋,政府不管不问,所以是“毕业

即失业”，每年中国各大城市，有厌世悲观者、愤而自杀者大有人在。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设在延安，大城市由敌人占据着。全国划为 19 个解放区，小学教育服务于抗日中心。当时是游击环境，物资缺乏，纸张印刷极感困难。为此，我县游击政府，免去本县石佛区的鲁庄、刘园、孙庄几个村的出差任务，不出战勤，不抬担架，另外补给原料叫纸商户抄麻纸，供给我县及冀鲁豫边区政府作印刷文件及中小学课本之用，以救燃眉之急。那时课本无统一教材，各县教育局自编适合当地环境的乡土教材，还有新编的小调抗日歌曲，均油印出版，以激发学生战士抗日热情（惜原材料无保存）。在抗日战争时期，小学生为抗日政府送情报、传通知，教员招待干部食需，晚间帮助干部转移，掩护送人。本县有些教员如武仲景、孙老师（忘了名），以共产党的嫌疑被捕坐牢，灌凉水，受尽了痛苦。那时敌人与我争夺教育阵地，汉奸教育科长高瞎子（胶东人）与日本司令官在安乐镇完小下通知召集本区教员开会，说小学教员都成了八路军，同时成立了“反共同盟”（在以后土改时，把反共教员头目薛子亮枪毙，其余免于追究。其实那种反动组织，也是在敌人屠刀威吓下成立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另一种情况，小学教员被派帮助担架队当供给员，过黄河上前方，深入敌后。前方伤兵转到后方，小学教员带着学生伺候伤员，端尿端屎。当时阳谷是大后方，有几个野战军医院，当时医生奇缺，由于敌人封锁，外药进不来，只用凡士林掺些消炎药上伤口，用粗布条包伤口，疼得伤员净骂。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教员待遇，都是供给制，每月发小米 60 斤，无薪金。直到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转薪金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曾发起大生产运动，所有小学教员响应号召，手持铁锹同人民军队一同开荒种地，增加粮食收入，减轻人民负担。

全国解放后，小学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毛主席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中小学统一教材，统一发行，进行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灌输新的血液和新的教学方法。

在军阀、敌伪、国民党三个时期，中小学课本内容都是长期不变，原因是那时社会的一切是静止的，停滞不前，所以教材前后无所更动。直到解放后，社会在前进，事物在发展，教材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其势然也。

解放前阳谷六处县立高小

李玉法

一、阳谷县立城关小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知县肖启祥创办高等小学堂，地址在城内西街旧仓房。民国七年（1918）改称高等小学校。民国十四年（1925）改称县立模范小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改称县立第一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改称县立城区小学。民国二十五年（1936）该校高级四班，初级二班，共学生 262 人。

二、安乐镇小学：该校是由地方士绅发动于民国四年（1915）成立的，初为乡立。经费来源，以安镇西五里“孟母庙”24 亩祀田地租，再加上县里将安乐镇街的行税拨归学校作为学校教职员薪金及办公费开支。学校成立校董会，由申德修、李瞻太、申鸿渐、高永太等 7 人组成。教职员工由校董会聘请和罢免。初称安乐镇两等小学堂，后改称蔚文小学，但仍为乡立，其教员待遇与官立同。一任校长杨万选，二任校长李瞻太，三任校长毛文衡，四任校长杨兰亭。该校高级一班，学生 30 人，初级两班，学生 64 人。校长一人（兼高级课），高教一人，初教二人（内一人兼事务），伙夫二人。

民国十七年（1928）该校改为县立第二小学。一任校长武仲景，二任校长武子升，三任校长杨元瓚。高级二班，初级四班，至此教职员工均增加。七七事变起，校院为日军占据，学校停办。

三、县立第三小学：校部地址在阿城镇北会馆，民国十二年（1923）创办，名为共立育贤小学。民国十八年（1929）改为县立

第三小学。民国二十二年（1933）该校高级一班，初级三班，共学生 160 人。

四、县立第四小学：校部地址在七级镇东街三义庙内，民国十八年（1929）9 月创办。初为县立第四小学。民国二十年（1931），改为七级镇小学。该校高级一班，初级二班，共学生 150 人。

五、县立第五小学：该校民国十八年（1929）创办。校址在王营王氏祠堂内。初为王营第五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改为王营小学。该校高级一班，初级二班，共学生 120 名。

六、县立第六小学：地址城南孙庄，该校民国二十年（1931）2 月创办。民国二十三年（1934），有高级一班，初级二班，共学生 120 人。

另外，县立女子小学一处，该校校址在阳谷城内文庙明伦堂后边。民国二年（1913）王景贤创办阳谷县立女子模范小学。民国十三年（1934）改称县立女子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改称县立城区小学。民国十七年（1928）该校高级一班，初级二班，共学生 96 人。

阳谷县立第三高小始末

陈赞臣

阳谷县立第三完全小学（当时简称三高）于1926年创建于阿城北镇的北会馆。它是新文化运动后“废私塾，兴学堂”的产物。现根据我的记忆，将三高情况记述如下：

（一）三高的创建情况

民国十六年（1926年）阳谷县国民党教育局派阳谷城东老唐庄秀才唐纪冠老先生来阿城北镇，利用社会关系，邀请当地的绅士名流韩肇基团长（相当于乡镇长）、拳师杨廷乐、商会会长邢怀信、地主杨庆余、南镇高广林团长等知名人士为校董，负责三高的筹建工作。

校址就选在北会馆。该会馆分为前、中、后和西跨院四个大院，除西院外，一律是高大楼瓦房。前院进山门是面向北的高大戏楼，左右是与戏楼连接着的東西两座高大的看戏楼，戏楼正北是一座有十台级的高大的过厅，专供地方官员绅士等人看戏之处。大过厅的东西两端都有便门去中院。中院正北是一座十几台阶的大殿，殿内大殿中间深处内山门里（该大殿分里山门和外山门，中间隔得很远）是一座木制大阁，阁内塑有丈余的金色关公神像。东西两座厢房也是带台阶的高大瓦房，塑有周仓、关平两座丈余的站像。大殿东西两端又有便门去后院。后院紧靠护城壕，长年积水。过厅北端又有通往西院的大门。西院有向南的大门，但平常不打开，有平房数间。中院东西两厢的南端还有不带台阶的瓦房数间，东为老和尚住室，西为徒弟住室。因建校，校董会将两个

和尚动员到戏楼底下去住（后这两位和尚去了东阿县香山子大寺院了）。

根据北会馆建筑布局，筹委会决定利用前院大过厅为高级班学生教室，室内讲台上壁挂有孙中山的遗像，像左右挂有国旗、国民党旗，黑板两端贴有国内外地图。学生每两人一张长条桌（后改带抽屉的）。每班学生 45 至 50 人。利用东西两座看楼的北端上层为高级班学生自习室，每两生一张大方桌，桌上放大吊灯一盏（后期改汽灯）。学生的一些学习用具及课本都放在自习室里，上啥课拿啥课本和用具，上完课再带回自习室。自习室下层为学生宿舍，安有木窗。中院北大殿和东西两厢房被用来作为初小一、二、三、四年级教室（当时学制是六年制，五、六年级为高级生），教室内设备和高级班大致相同。两厢房南端东瓦屋三间为校长室、伙房、图书室；西瓦屋几间为高初小教员住室、娱乐室、储藏室。后院为体育场。

（二）学制和课程

高级班为两年制，初小为四年制。高级班学生的课程起初有英文、古文，不久取消，改为国文、算术（起初有三角、几何、开方，后来只有分数、比例，1930 年增添珠算）、地理、历史、自然、体育（1930 年曾增添国术）、歌咏、图画、手工（后为劳作）。此外，每周由校长上三民主义课一节，每周末作文一节，每天有日记、大仿、小仿。三、四年级的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后改自然）、图画、手工、体育、歌咏。每天有日记、大仿，每周作文一节。一、二年级只有国语、算术，其余除不写大小仿和作文、日记外，和三、四年级学生课程相同。

课文的内容都是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发展编写的。每周的星期一上课前，校长将全校师生集合在一个大教室里（多数在高级班大厅里），由当司仪的教师喊开会，向孙中山总理挂像行三鞠躬，后向革命烈士静默三分钟，静默毕后，由校长领念总理遗嘱，念

完散会。

（三）该校的扩建和发展

1930年该校在西跨院建女子小学一处（为该校女子部）。来校学习的女生多系思想进步的富裕农户和商户的孩子，小者八九岁，大者不过十五六岁。第一任女教师为本镇西大街的贺玉岭，第二任教师是阳谷城里西街的孙鸿兰。来校女生都是放足、剪发，个别留一个辮子。在服装上冬穿旗袍，夏穿黑裙子或蓝裙子，上穿白褂或带色的褂子。

男生的服装1930年后也有改变，多数是在缝纫店里制作的中山服、八角帽。个别贫苦的学生是自己手工仿造做的中山服、八角帽。还有一队童子军（类似现在少先队），穿草绿色带红杠的裤褂，帽子是圆形带红杠。

1930年后，学校在体育、乐器、娱乐等设备上也有所发展。体育场增设了篮球、网球、足球（用脚向空中踢，看谁踢得高）、双杠、跳远、跳高、秋千等设施。乐器室由原来的四把军号增添为马拐子号四把，大洋鼓一个，小洋鼓两个。娱乐室添置了乒乓球案子、脚踏风琴、各种弦子、琵琶、口琴、大小笛子、箫等，还有军棋、象棋、跳棋、克郎球。校内成立了音乐队，可演奏《梅花三弄》、《小放牛》、《苏武牧羊》、《春天的快乐》等歌曲。

学校还开辟了壁报栏，点将表扬栏等等。后又在储藏室安上了油印机。

（四）该校历届校长和聘任教员及校役情况

各届校长都是由县教育局委任的，他们都是国民党员。每年的教员由校长下聘书聘任或辞退，校役由董事会保送。

第一任校长王漠庭（老韩庄人，现归聊城），第二任校长阳谷城东北东焦海的张镇堂，第三任校长于××（外号于大憨），第四任校长又是王漠庭，第五任校长是七级西焦庄的焦广普，第六任校长是安镇西苑店的苑广德，第七任校长是黄河南林坝的荣祥云。

高级班教员，第一任是阳谷城南中孔的孔范奇，第二任是刘湾的刘世基，第三任是于××（于校长的兄弟，近视），第四任是阳谷城北九都杨杨一斋（即杨耕心），第五任是安乐镇西朱庄的朱立朝。

初小教员的更换次序记不清了，记得有唐纪冠、赵鸿勋（我初上学时名廷襄字赞臣就是这位老秀才起的）、吕秉君、王伯瑾、周子厚、史方臣、张方文、查子堂、魏宗尧、申兰生。

校役，第一任伙夫是本镇的李文友，第二任是王永德的父亲，第三任是王永德，传达员兼上下课打铃、侍候校长是王月恒。

（五）该校当时政治活动情况

自学校成立那天起，师生们就开始了抗日爱国活动。1932年，老共产党员杨一斋来校高级班任教后，校内掀起了爱国热潮。杨一斋老师在课堂上利用历史上“岳飞抗金”的故事，结合当时“一·二八”事变，向学生们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揭露了蒋介石假抗日的反动嘴脸。课下，杨老师还不断选择一些进步书刊上的文章油印成册，供学生们读，增加同学们的爱国知识。到1934年夏，杨老师还秘密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坚社”，派社员杨玉坤在阿城东大街开设“晨光书店”，购买了一些进步书刊供在乡知识青年阅读。1934年秋后，因我们这些学生在杨老师教育下爱国热情不断提高，于是要求外出游行，趁庙会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但遭到校长苑广德的反对。我们派班长姚继瑞同学代表我们向校长讲理，校长以不服从领导为名将姚继瑞开除学籍。这件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经讨论，次日全校师生大罢课，要求学董驱逐校长苑广德。由于苑在县里势力大，此事惊动了阳谷县长杨霁峰。他带领二区区长邵汉卿、学董杨廷乐、镇长杨庆魁、商会长邢怀信等来校做说服工作，在我们教室里和我们全班同学对话。我们全班同学有次序地面对面地和杨县长进行说理斗争，讲得这位县太爷理屈词穷，不得不调走了苑广德。

1934年以后该校还添设了剧幕、锣鼓，成立了一个临时话剧社，每年节日或有国家重大事件时，便以演戏为名向群众宣传，如1935年日寇入侵华北傅作义将军在绥远和察哈尔的百灵庙与日寇大战的情景以及汉奸殷汝耕卖国等一些国家大事等等，增强群众爱国主义思想。在该校戏楼上演。记得参加剧社的有校内的师生和校外的在乡知识青年，及镇上的一些爱好戏曲者，如刘镇南（打扁鼓子）、杨玉珂（拉弦子）、张慎荣（拉弦子）、贺纪新（拉弦子）。演员有杨玉坤、张汉章、赵子信、董介臣、解守先（唱丑）、涂士奇、陈赞臣、张玉峰、茅镇岱（也拉弦子）、查子党等。

1935年杨一斋老师调安镇二高执教。但他走后并没有中断和学生们的关系，在他的教育下，我和张玉峰（即张冠军）同学，还有在乡知识分子涂士奇、查明哲（后脱党）都参加了共产党。杨老师的学生早期参加党的还有韩相洪、万开铎、姚传德、颜世平、房广隅、房翊立、朱学智（后脱党）、林之信（后脱党）、胡长保、邵金旺等同学。在阿城一带遍布了革命的火种。

杨一斋老师走后不久，魏宗尧、申兰生两位党员来校任教，他们结合杨一斋老师发展的在校党员王伯瑾、周子厚、孙鸿兰老师，在三高继续传播抗日救国的真理，教育广大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阳谷县政府南退，三高被迫解散。北会馆在1941年秋后被汉奸洪玉申、李德成等占用，后被破坏，成了一片瓦砾。

（陈赞臣，原名陈廷襄，阳谷县阿城镇人。历任小学校长，银行营业所主任、粮所主任等，已离休。）

阳谷县立第五高小始末

王印传口述 李道达整理

阳谷县立第五高级小学创办于1929年春，后改为阳谷县立王营小学。于1938年春布永言占了阳谷县城后停办。共招收五年级学生，办学成绩较为显著，素有城北革命摇篮之称。根据个人回忆，简述其始末概况。

一、创办过程及校董会

原来我村王营有一处初级小学，伯父王英臣（字俊民，县讲习所毕业）任教师。1929年春，父亲王翰臣（字文园）在县第五科（即教育科）任视学委员时，考虑从县城北至朱老庄边境七十余里之间没有高级小学，乡村学生上高级，近的至安乐镇二十余里，远的至县城有五十余里，甚感不便，且学生多贫苦，住校搭伙上学，多数无力负担。因此与祖父王景星（字奎五）商议，拟在我村创办一处高小。祖父系前清秀才，且是兖州府案首，又热心教育，乃欣然同意。于是联合乡里热心教育人士杨兰亭（字竹泉，系杨耕心之父，当时是阳谷教育界名流）、李学诗（李超之祖父，当时系其村小学教师）、宋云汉（字卓甫）、朱恒月、宋金川（字笠泉，又名励华）、史长吉（字恩泉）和邵广仁（字惠泉）等人组成校董会，公推祖父为董事长；随即筹措开办基金，主要争取把朱庄大寺（我村西三里许）庙田和辛集庙田（我村西南二里许）作为校田，朱庄大寺庙田由于校董朱恒月的努力，完成较为顺利，而辛集庙田颇费周折。此外，校董又带头捐助了一部分。开办费筹好，即以王营初小校址（系借用王氏祠堂，有宽敞的北屋

三大间，西屋三间和亩余的庭院）为基础，又买了东邻空基亩余，新建北屋三间办公室，南屋三间高级教室与一间教师宿舍，西屋三间学生寝室，原王氏祠堂北屋仍作初级班教室，西屋三间作伙房。又拉起了院墙，盖了大门，成了方整近三亩的一个校院，也挺像个学校的样子。修建期间，校董带头，号召周围附近群众帮工献料，周围五里内的群众踊跃出本挖土运料，帮工打墙盖屋，制作教具，热烈的场面极为感人。校董定期开会，研究办学事宜，常宴请老师，听课，检查学生作业，鼓励师生勤于工作和学习。

二、办学条件

教师的条件较为优越，除较年长的是秀才外，全系中等学校毕业，且大部分是师范专业，不仅称职，且都积极努力。

校董会成员多是既懂教育又热心的人士。

办学经费，除政府发的经常费和临时费外，尚有几亩校田的收入作为补充，与当时兄弟学校相比，亦属于优越的。

校舍校具尚敷应用，教室宽敞明亮，就是寝室由于后来中年级有不少同学住校，增建院内已盖满，没有地基，住得拥挤一些。

桌凳多是新做的，整齐实用。体育设施较好，由于校东、北两面全是场院，除我家的外，多是族中近门的，都情愿借用给学校，因而有篮球场、网球场和排球场，就是缺足球场，校内有乒乓球。教学用具，各科用的图表、标本、仪器基本上齐全。学生课外阅读，除订有《益世报》、《山东日报》两份日报外，还有几份刊物，并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音乐课教学有风琴一架，乐器还有锣、鼓、大小二胡、月琴、笛、箫等。

三、发展过程，成绩及贡献

开办时是初一、高一两个班的规模，后发展为两高（五年级、六年级）和两初（低年级、中年级）四个班的完全小学。校舍又增建了五年级教室（南屋）三间和中年级教室（东屋）三间。

教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学习，因而成绩较为显著，各级毕

业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比率高于兄弟学校。特别是第二级毕业时，适逢全国实行会考，五高获得了全县团体和个人双第一名。学校发奖旗一面，学生杨景翰得了奖状和 30 元现洋的奖金。会考时，由于主办班子工作失误，曾闹了一场罢考的小风波。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各校用的课本不统一，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按规定出题范围限制在两种课本都有的内容以内，而常识科试题有一题超出了范围，发下题后，五高学生王凤桐发现有一题本校实用课本内容没有，虽然自己会答也不答卷，认为自己会不等于其他同学会，这样不公平，考不出真实水平，当即向监试人声明，退出试场，向本校校长杨元瓚老师作了汇报，杨校长随即找主考人员交涉，经劝慰后，学生始回场应试。从而主试和监试人员亲眼目睹了五高学生的真实成绩和认真负责精神，事后传为阳谷教育界的佳话。由于夺魁的优异成绩和这一小风波，五高在全县名噪一时，招第三级时，报考人数增多，而且纷纷要求到五高上中年级，创造升高级的条件。

五高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并有不少人成为高级干部，还有几位同学成为烈士，对革命有较大的贡献，因而五高赢得城北革命摇篮之称。王营周围的小学教师，也多系五高毕业的学生，对发展当地的教育亦多有贡献。如果没有五高，附近不会有这么多的高级毕业生，象蒲吉五、张振声、张月桂等贫苦同学，很难说能到外地上高小。就拿我家来说，全家兄弟十人，都是就读该校，从大哥王敬传至九弟王九传七人上高级，最小的三个弟弟，只赶上读初级，未升高级就停办了，在大哥带动下，先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果没有五高，这是不可能的。

四、历任校长和教师

1、校长：第一任王敬之（到任不久离校），第二任宋云汉（字卓甫，三师讲习科毕业），第三任高汝藩（字屏仲，二中旧制

毕业)，第四任杨元瓚（字瑟如），第五任李益增（字进修，三师前师毕业），第六任王翰臣（字文园，三师讲习科毕业）。

2、教师：

一级 国语兼历史，唐继官（秀才）、高屏仲、李进修；算术兼自然，宋卓甫、李进修、杨瑟如；地理，王俊民；音体，高屏仲、杨瑟如。

二级 国语兼历史，李帮庆（字晋吉，李一丁长兄）、孙芳庵（字反兰，秀才）；算术兼自然和音体，杨瑟如；地理，王俊民。

三级 国语兼历史，李进修；算术兼自然，杨竹泉；地理，王俊民；音体，张振声。

四级 国语兼历史，杨竹泉；算术兼自然，李道川（扶轮中学毕业）、李维基（字振之，三师前师毕业）；地理，王俊民；音体，张振声。

五级 国语兼历史，张嵩岭（字云峰，聊师毕业）；地理，王俊民；算术兼自然，王文园；音体，张振声。

五、学生情况

1、生源：各届学生多系王营周围附近村的，即王营、九都杨、梨园、洪刘庄、邓楼、张寨、辛集、前后李、焦集、宋堤口、朱庄、姜堤口、王堤口、邵楼、蒿科李、二甲张、韩庄和杨庙等村的，多是走读，也有的中午带熟食搭一顿汤伙。较远的西南有青杨李和王皋如，东南有西李楼，东有苑店，东北有四甲李，北有金营，西北有辛成海等村，方圆三十余里。

2、历届学生成绩及贡献：

第一级毕业或肄业共40余人，升入聊城二中的有张月桂、杨宗震、王印传（字相心）和洪怀清（字冰鉴）4人；升入阳谷简师的有王敬传（字伯谨，化名朱涛）、李登岐（又名李超）、张振声（字震寰，化名白敬守，又改张靖宇）、蒲昌祥（字吉五）、李传心

(字贯一)、李广钧(字子厚)、李长民、杨继坤和蒋庆德(字润生)等人。

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高干王敬传(抗战时期任阳谷县委书记，后任沈阳市委书记)、李登岐(抗战时期任×县公安局长，后任沈阳市铸造厂书记)、蒲昌祥(抗战时期任观城县长，后任北京市防疫站书记)和张振声(抗战时期任阳谷县公安局长，后任南京市法院院长)4人；李洪春、史书成、李贯一(任县公安局长时牺牲)和张怀顺(范司令的警卫，与范司令同时殉国)4人；高级知识分子杨宗震(工程师)1人；县区级干部王薪传(又名王新)、张月桂、薛庆洼、李鸿举、赵学启(字尧民)、郑继武、王印传、张金翰(又名张新之)和杨继坤(后叛变)9人；一般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王铭传、洪序亭、洪怀清、盛玉文、张锡昌、李广钧、朱符瑞、宋兆滨、张广增、王玉美、杨连镇、李长民、周凤山、汤庆兰和李贵亭15人。共33人。

第二级毕业40余人，升入聊城中学的有杨冠卿、杨宗汉(字志宏)、杨景翰、杨景湘、张岱岭(化名黄流，后改黄明吾)和王文华(字祝三)6人；升入寿张八乡师的有张运昌(在校入党，未毕业病故)1人；升入县简师的有宋丕介、杨庆祥、王冬生、陈令仪、于海伦、朱立纶和刘太真(字真民)7人。

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高干王缙传(字官云，又名王云，抗战时期任连指导员，后任舟山前防司令员，师级)、张岱岭(抗战时期任先纵四支队教导员，后任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和杨景湖(与李超在抗战初期一起赴延安抗大学习，与任弼时侄女结婚)3人；县区级干部杨金亭、于海伦、刘太真、刘玉泉、李登云、宋士俊、宋丕介、邵金旺和李玉峰9人；一般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杨宗汉、杨景翰、杨庆祥、邢桂昌、张岐岭、张斐然、陈令仪、陈清柱、张金润、王文华、李鹏来、李润涟、李裕亭、高之津、高之淇、宋士杰、宋丕亮、杨盛文和王冬生19人。共31人。

第三级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高干王勤传（又名王勉，抗战时期任冀鲁豫区党委油印科长，后任扬州地委书记）和杨鼎章（字泽民，抗战时期任八区区队副，现任河北军区副司令员）2人；烈士王长瑞1人；县区级干部徐鸿恩（又名徐鸿）、杨怀卿、王月泉、朱立绅（字化民）、李振祥、王武胜、李广鸣和宓庆琦9人；一般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姜芳兰、杨景芳、谢文忠、王英、宋炳召、王洪彦、杨修身、韩登海、李登岫和宓庆修10人；共22人。

第四、五两级参加革命工作的有：高干孟范章（××地委书记）、刘汉民（聊城师院书记）和王纪唐（土改时任三区书记，后任德州地委组织部长）3人；县区级干部李振山、杨鼎维、宋士华、王耀庭、王登一和刘长胜6人；一般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王九传、刘国栋、高纪臣、王清涵、高序班、高登魁、王怀义、王秀生、王清田、邵长居、史书杰、刘长清、邵金雁、祝登峰和徐登光（又名徐光）15人。共24人。

就个人回忆和粗略统计，五届学生参加革命工作的有110人，实际人数要比这个数目多。

六、工友和炊事员

一至四级的工友是王怀亮，五级时是李贵臣。

炊事员依序是宋书宝、李永平、邵廷玺、宋书宝、王丙寅。

因年长日久和知情所限，讹错和遗缺定然不少，希知情者补充修正。

杨万选办学

杨元璐

我祖父在清朝官员中，是属于康梁一伙的维新派，他主张变法维新，发奋图强。他说：“穷则变，变则通，家事国事都不能死守成规，一成不变。”一天传来了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我祖父欢喜若狂，连说：“从此又见到揖让盛世，征诛时代已经过去，家传天下也亦灭亡。共和共和，人民当家作主，于斯万年，可喜可贺！”马上派人请来几位开明秀才高维嵩、王作孚、申鸿渐、任保太等，置酒作贺。我祖父即席赋诗，诗曰：“皇帝王朝从根断，共和政体及时兴。三民主义指明路，五色国旗凌空升。四海兄弟皆平等，亿万人民乐无穷。国家大事民作主，唯望世界早大同。”在坐的人各有附和。喝了几杯酒，我祖父乘着酒兴向在坐的人说：“现在是民国了，人民当家作主，废除了历代王朝的科举制度，要建立新式学堂。我们都是文化人，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建立一个学堂。你们看怎样？”未等人回话，我祖父又面对申鸿渐说：“办学堂在你们安乐镇最好，安乐镇是县北第一个大镇，交通方便，人烟稠密，最为合适。”申鸿渐一听，连声答应说：“好！好！”他想了想又说：“可惜没有现成的房舍，如果教室宿舍食堂等全部盖新的，地方倒是有，那就花钱太多了，就是县里能拨给一点款，杯水车薪，也无济于事。”我祖父想了想说：“你们安乐镇，不是有一座大庙吗？我知道这座庙有大殿有廊房，大殿能作讲堂，廊房能住学生当宿舍，不用动工修建，只要把神像拉倒，清理出来就行了。”申鸿渐说：“好是

好，庙产是公产，一两个人不能作主，况且还有很多人烧香上供，信神信鬼。我回去和他们商量商量再定。”过了三五天，我祖父为了建校的事，又亲自到安乐镇找到了申鸿渐先生和社会名流李瞻太等，在他们的创议下，得到不少开明人士的拥护，战胜了一小撮守旧、迷信、顽固分子，建校的问题定下来了。随后又商讨了教育经费、聘请教员、招收学生等问题。诸事办妥，把这个学校定名为阳谷县安乐镇高小学校。在拆除神像、整修房舍那天，我祖父和申鸿渐、李瞻太先生亲临现场，首先动手拉倒一座神像，有几个信神信鬼的人，先放了一挂鞭炮，要我祖父作一篇祭文。我祖父说：“这些木偶泥胎，无知无识，写了祭文给谁看，给谁听？”有人说：“韩愈不是祭过鳄鱼嘛！鳄鱼有知，安见得木偶泥胎无灵乎？”我祖父说：“好啦！写祭文还得长篇大论，费纸费墨时间也来不及，我就念几句诗吧。”有的人点燃了一柱香，烧了几张纸，我祖父念道：“香火供奉已多年，不见人间有神仙。拉倒泥胎除神像，腾出屋舍育英贤。如敢兴妖来作怪，天大祸事我来担！”念完祭文，众人一齐动手，七手八脚该改的改，该修的修，该建的建，不几天就把一座破烂失修的古庙建成一座崭新如新、能容纳一二百多学生的学校。于是请教员，招学生，正式开课。我祖父被推为校长。这个学校一直开办了多少年，社会虽然发生变迁，这个学校却从来没停止过，给国家培育出不少英才。

我祖父任安乐镇学校校长不久，被提升到县任县视学，也就是后来的县教育局局长，掌管全县教育工作。当时县城内，不但没有中学，高小也只有一座学校，也就是阳谷第一高小，偌大的一个阳谷县，教育情况如此，文化落后，斯文扫地，也够可叹了。我祖父为了解决儿童和青少年失学问题，要振兴教育，大办学校。可是要办学就得有经费，这笔款从那里来？靠省教育部门拨发吧，督军省长老爷们，都是些目不识丁的货色，是靠捋枪杆子发家的，只

图武功，不讲文治，正忙着招兵买马，购买军火，抢地盘，打内战，就是有点工夫，也要盖房买地，娶姨太太，吃喝玩乐，哪有闲心管这些呢！靠县里吧，县里早已民穷财尽，政治不稳，县长们一年几换，来当县长的不是为了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哪把教育事业放在心上。可巧这时县城北街，有一位范大人，名叫书田，字耘经，在北洋军阀阵营中当过镇守使，镇守一方，广有钱财，为人仗义开明，热心兴学。在我祖父动员下，慷慨解囊，捐献现金一万元作为经费，利用县城南园考院房舍，建立了一个高级小学校，取崇实黜华之意，定名为崇实学校。我祖父为了表扬范大人这种见义勇为热心教育的精神，亲自撰文立碑，碑立在校舍前院。第一任校长是孟传瑾，二任校长杨兰亭。这个学校，一直办了很多期，培育出不少革命志士和社会名流，如《红岩》书中的华子良，正是当年在崇实学校读过书的韩子栋，是人所共知的。

毛文衡先生传略

李玉法

毛文衡字子鉴，以字行。阳谷郭店屯北毛家营人（现划归聊城）。无党派民主人士。1917年，毛先生聊城三师本科毕业后应聘来安乐镇小学任高教。

那时正值北洋军阀时期，安乐镇小学只有高级一班，初级两班，系乡立，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学校以安乐镇西平坊村孟母庙24亩祀田地租和县里拨给的安乐镇街的牲畜屠宰税和本镇四个粮店上交税款，作为学校教职员工薪金开支之用。校长李瞻泰系清廪生。毛先生到校后，担任了算术、地理、英文、音乐、图画、手工、体操等各科。他在任职期间，除秋麦假外，从未回过家，有以校为家之思想。对同学循循善诱，诲而不倦，从未发过脾气，其态度严肃，人人敬服。校长李瞻泰年逾古稀，他告老还乡以后，毛先生接任该校校长。学校改名蔚文小学，但仍为乡立。他在安乐镇教学十余年，从未转过学校。他的学生，出名人士，参加西坡（编者按：即坡里）暴动的有王寅生、申兰生，留学东洋的有李寓鸿、高树校、申仲铭，省委书记有申云浦，大学及专科毕业的有顾时清、申荷生等。

1928年（民国十七年），日军悍然出兵侵我济南，屠杀我军民数千人，制造举世闻名的“五三惨案”。我方不得已，山东省府乃转移到泰安办公。这时北洋军阀被打倒，已换成国民党掌权，当时主席系孙良诚，四个厅也随着移到泰安去。教育厅长何思源在那里培训各县教育干部，教育长系杜光坝（聊城人）。当时阳谷去

的有毛文衡、刘式瑗（三师后期）、高明镜、孙宪铸等人（均系初师）。结业后，领导以毛文衡教学时间长，有成绩，委毛为阳谷教育局长，刘式瑗为县督学，其余为教育委员（视察小学）。毛局长任职期间，办事认真，待人态度和蔼。当时有一位在安乐镇小学与他一同教书的初教去找他备案再教初级，因受经费限制，他只好婉言谢绝。

当时各县教育局督学一人，阳谷县党部又添给一个王仲勉（国民党员），毛因向上级辞职，说：“王仲勉净吓我，叫他当局长吧。”上级有令不准，结果把王调走。当时阳谷国民党有南派北派之分，王系南派，紧告毛局长，毛不得已辞职而去。以后改任馆陶县气象观测员。

毛晚年任聊城东关小学初教。以师徒关系，我去看他，他说：“我在这里教书，连我村的人也不知道。”在教小学期间，他很得市民家长的爱戴。解放后，任聊城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涵养好，享年九十余岁。

武仲景同志传略

李玉法

武仲景，原名武金铃，以字行，安乐镇区于家营人，中农成份，党外人士。

他系聊城省立第三师范毕业，被分派到安乐镇小学任高教，该校系乡立，以后转为县立第二小学，校长毛子鉴先生升任阳谷县教育局局长，他接着升任该校第四任小学校长。乡立时代，只一班高级，两班初级。武接任后，扩建教室，增添班级，计高级三班，初级四班。他在第二小学任职时期最长，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建国人才。以后莘县教育局秋假期间办小学教员训练班，聘请他任训练班主任，就在这个时刻，安乐镇小学校长易人。训练班结束后，他往济南省教育厅报考“山东省社会教育服务人员训练班”，结业后留厅任用，任厅内“义务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干事。1933年秋，又从厅内调济宁“乡村教育实验区主任兼中心小学校长”，区内有小学20处，教员任免和发薪，都归实验区。这时他叫我任实验区会计兼中心校教员。办了两年。在韩复榘主鲁时期，信用梁漱溟的计划，把济宁和西南几个县，划归乡建派，实行“乡农学校训练兵制”，于是非乡建派人员，一律停职，武仲景自不例外，以后听说他又到阳信县教育部门工作，那我不清楚了。

1939年秋，鬼子占据阳谷县城后，有人告发，说武系八路军，武被逮捕后，敌人对他灌凉水，逼口供，受尽了折磨。以后翻译官对武说：“武先生你的官司快打出来啦！”果然，司令官叫武写了简历，写的是过去师范毕业，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司令官说：

“你还是办教育当教育科长吧。”武告鬼子说：“我得往家去看看，免得家中挂念。”许以三天就回城。于是司令官告武说：“如果漫道里有人敲诈你，别花小钱。”送他到东关头上，站在那里看着武走。据武说，走到一里外的司营，回头一看，司令官还在那里站着咧。武到家后，告知家人说，快走。他自己跑到范县受八路军训去啦。鬼子见武三天未回，派了一辆汽车把武的家放火烧了，武的全家逃到东乡根据地内避难去啦。

受训期满，县长岳舜卿委武为安乐镇区游击区长。他参加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历尽了艰辛，这是他一生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我在本村教抗日小学时期，夜里他到我校去闲谈，写了一个纸条盖上章，叫本村村干拨给我小米90斤。有一次，他和他的护兵正在我村李玉龙家歇脚，正碰到安乐镇一群汉奸进院去要烟（李玉龙以擀烟为业），武和护兵躲在东头一间小屋里，拉开手榴弹弦，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后汉奸兵真要去，被擀烟的工人喊回，说那屋里没烟，结果免于流血。又一次，头天一个夜里，他和于指导员，持枪截击大汉奸李宏图的汽车，但未命中，李宏图坐着汽车跑啦。1943年，我在邢庄（离我村一里）教小学，武区长带领区队白天里住邢庄，庄东汽车路上过汉奸兵数百人，村里的老百姓争着往西跑，武区长说别跑，我把区队拉出去在村外打，结果汉奸往阳谷走啦，他们根本不知邢庄有八路军。武区长在敌伪时期，恨敌如仇的精神，皆如此也。

解放后，他被委为阳谷县教育科长，在城东司营训练全县教师一个月，当时我也参加训练，期满后，每人填写鉴定，组里通过。以后他又调寿张县农业科长。有一次，在他回寿张的路上，俺俩相遇，他丧偶已多年，托我物色老伴，我说你候信吧。后来找了一个离婚女教师，该女人很同意，于是我写信通知武，他俩相见后，都很同意，约定在我校（赵海）结婚。婚后生子一，接武的班，这是以后的事。武旋调聊专建设科长，一年后，又调东阿

县第二副县长。文化大革命起，有人诬告他是国民党，受了辩论，被遣回家。东阿县府往济南调查岳司令员（岳舜卿），岳说：“我没听说过他是国民党，快出去！”武县长在家住了一年，我往于营去看他。正碰上他的问题弄清以后，东阿县府来了一个干部，问武谁叫你回家的，请你快回东阿。我一看谈问题，就辞武走啦。武回东阿后，我曾去过一次，住了两天。

武之一生，前阶段是办教育，后阶段是办行政。在东阿三十多年，生活朴素，待人忠厚，每次出发，手巾包着几个馍馍提着，深受东阿县人民的爱戴。晚年精神有点昏迷，于1987年在东阿逝世，享年86岁。东阿各界为之开追悼会，殡葬之日，花圈送来一汽车，极为哀荣。

孙膑拳传人杨廷岳、杨廷栋

郑清铭整理

杨廷岳，字钧韶。杨廷栋，字明斋。廷岳为兄，廷栋为弟，二人生于阳谷县阿城镇北街，祖上乃是七级镇大杨庄人，相传为宋朝保国忠臣杨家将的后人，是穆桂英扫北时留在北方的一支，号为“三德堂”。

兄弟二人因从小受封建恶势力的欺辱，便立志学武。当时南来北往凡到阿城镇上打把式卖艺的，他们都要请到家里管吃管住，为的是向人家学几趟拳路。后经过勤学苦练，功夫日渐长进，便自己上街习武卖艺。一日，兄弟二人练完拳，听到围观群众中有一老头“哼”了一声，便上去接问是好是坏，是否能够指教，这个赶集的老头练起孙膑拳（大袖子拳）。兄弟两个一看，果然是精，便诚心诚意地将老者请入家中指教。此老者姓萧，乃堂邑县肖集、侯镇一带人，是孙膑拳的传人。他见兄弟二人天资聪颖，诚意拜师，就将孙膑拳 32 手、64 手、96 手三套拳路秘密传授给了兄弟二人。兄弟二人从此加倍苦练，练就了一身的功夫，精通太极、查拳、形意、罗汉、洪拳、埋伏拳、孙膑拳等等的拳路和钉靶子、四节流星镗、七节鞭、刀、枪、剑、戟、虎头钩、齐门棍、三节棍、月牙铲等十八般兵器，并谙习“铁板桥”、“揉锤贯顶”等硬气功。

1917 年，马良任山东济南镇守使时，为发扬武术事业，创办了山东武术传习所，搜罗武林高手任教，当时名扬全国武坛的武术大师韩桢生任总教习，王子平等拳师任教习。1919 年前后，杨廷岳闻信后，先来到济南投考，经过与总教习和教习亲自较量，成

为武教官，入国术研究所研究学习武术，成为比武时的评判员。一年后，他介绍自己的弟弟杨明斋也来到济南山东武术传习所，经王子平等推荐担任教习。但是，到此担任教习，必须经过总教习的亲自较量比武。总教习韩桧生武功非凡，在江湖上有“韩绣花鞋”之称，又因其行走如飞，故有“草上飞”之名。与这位名扬海内的总教习比武，并非一般拳家所敢为。但身怀绝技的杨明斋并不气馁，他们俩在马良面前约定三拳两胜。两人你来我往，不分胜负。后来杨明斋使用孙膑拳中的“崩打尖踢带反砸”，韩以为有隙可乘，便乘机而入，不料杨明斋又用“劈打蹬”击法连胜两次。从此，杨明斋闻名武坛，孙膑拳的独特技击法也得到世人的公认。

1925年，因马良下台，山东武术传习所解散。杨廷岳、杨明斋漂泊江湖。杨廷岳先后到天津、烟台等地打拳卖艺。杨明斋则到上海等地打拳卖艺。后来，杨明斋闻知韩桧生、王子平等拳师在青岛教拳，便来到青岛看望。当时韩桧生在馆陶路齐燕会馆内的国技学社（拳房）教徒，杨明斋来后，韩桧生因年老多病，又素知杨明斋武艺高强，即让位与他，由杨明斋任国技学社拳师，并兼任北京路小学武术教员。此时的杨明斋白天在北京路小学教学武术，晚间在国技学社授徒。所教拳中有埋伏拳、罗汉拳、查拳、形意拳以及散打等，有时也传授孙膑拳；在器械方面，根据学员的爱好传授，为青岛市培训了如韩冠英、纪雨人、祝正森、孙玉秀、徐自良、高伦士、栾秀云等大批功底深厚、蜚声青岛市武坛的武术骨干。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团结全国武林人士，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并通令各省市设立地方国术馆。1929年，山东各地纷纷成立国术馆，此时漂泊江湖的杨廷岳担任了烟台市国术馆副馆长，杨明斋则被聘为青岛市国术馆的编辑科科长，著有《孙膑拳谱》、《武术气功》以及跌打损伤秘方等。

1933年7月，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新建体育场开幕。作为青岛市国术馆的代表，杨明斋在会上表演了上乘气功“铁板桥”和“揉锤贯顶”，受到了时任青岛市长兼国术馆长沈鸿烈的亲自表彰。杨明斋的弟子栾秀云、祝正森、高伦士等也在会上表演了拳术与器械，博得了观众的喝彩。

据杨廷岳之子杨庆东讲，1936年前后，杨明斋还曾受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嘱托到上海参加了斗牛比武大会，击败了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俄国大力士，受到了上海、浙江省主席的传令嘉奖，浙江省主席亲自赠给他一把剑。山东省主席和浙江省主席各送他两块大匾，匾长3米，宽1.5米，一块上写的是“我武维杨（扬？）”，一块上写的是“振武传新”，两块匾上分别刻有“山东省主席赠”、“浙江省主席赠”字样。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后，杨明斋在青岛武术界兴起了反日活动，并因此曾被日军捕去关押了十一天，后经青岛市长沈鸿烈的出面交涉，始被释回。此后不久，杨明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阳谷阿城镇。当时他的哥哥杨廷岳也因烟台失守回来了。同年12月，沈鸿烈奉命撤往鲁西南抗战，途经阳谷阿城镇，亲自到杨家动员杨氏兄弟抗战，杨明斋满怀抗日救国热忱同自己的侄子杨庆先一同投奔了抗日战场。后来，杨明斋不幸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于临沂罗店。

再说杨廷岳，回家后不久，就被当时的阳谷县国民党县长杨霁峰聘为阳谷县国术馆馆长。他一方面传授武功技艺，一方面做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他动员阿城的商人和大户捐款重修了运河大桥和闸门，在土匪横行的年代，加强了阿城镇的防卫，只要晚上关上闸门子，任何人进不得街去。他还是当时在阿城北会馆成立的阳谷县第三完全小学的学董，聘请荣祥云为校长，聘王伯锦等进步人士为老师。亲自找了王月恒给学校打铃，王永德当伙夫，并亲自动员女儿杨庆环、孙女杨文铃带头入该校女子班学习，同

时动员了解春先、温忠贞、仇春井、赵春芳、贺贵兰、贺西仟，涂月英等入校学习，培养了一大批于国家于革命有用的人材。涂士其、贺西仟、涂月英等后来都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里教学的老师，后来有七八个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有的还成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

1939年，徐翼到阳谷东北一带组建129师先遣纵队第四游击大队，杨廷岳捐献了三支枪。此后，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敌伪内部活动，曾先救过林秉孚（解放后任冠县水利局局长）、孙星生、李良盈、张道岭等共产党员和一些无辜的群众，为我县的抗日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杨廷岳不仅自己爱国反日，他还时常教育自己的弟子反抗日本的侵略。他程村的弟子、外号“能吃五斤干面”的马安庆，在天津码头凭借自己一身的武艺，抱打不平，教训了两名欺负中国百姓的日本兵；他阿城街的弟子李法山在1939年阿城二月二抗战中，就曾白手夺枪，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廷岳又回到青岛谋生。在黄台小学任国术教员。解放后，任某业余学校教员。后又在某村庄小学传达室当工人。1965年退休回家，后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终年84岁。

（本文根据青岛《市北文史资料》和杨廷岳子杨庆东、孙杨文良提供材料整理。）

杨明斋与青岛武术

王第荣

我国武术历史悠久，据传嵩山少林寺为武术的发祥地，其练武主旨是祛病益寿、强国强种。至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少林寺涉有灭清扶明之嫌，曾被两次焚毁，僧徒死者达数百人。少林寺经浩劫，徒众散走四方，各以本身武艺传授于穷乡僻壤或深山古寺。因畏清朝之专横，深恐祸及身家，故各立宗派，以求脱离少林关系，如武当派、太乙派、昆仑派、峨眉派等不一而足。因此，武术在全国各地流行来，擅长武术者除传授徒众外，有的卖艺江湖，有的投身镖客，分门别派，缺乏团结精神。

青岛自 1898 年开埠后，在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占领统治下，不许民间习武，故无武术之可言。到 1922 年我国收回青岛后，始有韩桢生、杨明斋等先后来青授徒，其中以杨明斋对青岛武术贡献较大。

杨明斋系山东省阳谷县人，武术世家出身，家中开设拳房，以教拳为业。杨明斋兄弟姊妹均自幼学拳，对武术造诣颇深，除十八般武艺件件俱通外，杨明斋还谙习气功工夫，能表演“铁板桥”、“揉锤贯顶”等项目（注）。更可贵的是在全国几至失传的“孙膑拳三十二手”，经杨明斋的秘传，得以保留下来。

1917 年，马良任济南镇守使，成立山东武术传习所，韩桢生为总教习，广招武林高手任教，杨明斋经该所教习王子平介绍前往投考。投考者须与总教习比试武功，杨明斋与韩桢生对打时，运用孙膑拳独特技法连胜二次，马良即挥旗停止比赛，录用为教习，

从此杨明斋名闻全国。嗣因马良下台，山东武术传习所结束，众教习星散。韩桢生前来青岛馆陶路齐燕会馆设立“国技学社”授徒，杨明斋则到上海等地打拳卖艺，闯荡江湖。后闻韩桢生在青岛，遂于1927年来青岛看望韩桢生。适因韩桢生年老多病，无意继续授徒，素知杨明斋武艺高强，乃将国技学社让与杨明斋任教。

此时杨明斋又被本市北京路小学校长胡镇中聘为武术教员，白天在北京路小学教学武术，晚间在国技学社授徒。所教拳中有埋伏拳、罗汉拳、查拳、形意拳以及散打等，有时也教授孙膑拳。在器械方面，刀枪剑戟、七节鞭、三节棍等，根据学员爱好进行教授。国技学社为本市培训了一批武术骨干，如韩冠英、纪雨人、祝正森、孙玉秀、徐自良、高伦士、栾秀云等都是功底深厚、蜚声本市武坛的高手。1929年在杭州召开的全国运动会上，获武术最优奖者26人，本市即占4人，他们是祝正森、高守武、高作霖、纪雨人。随后又有曾在山东武术传习所任教习的高凤岭来青，在四方路三江会馆设场教授猴拳、醉拳、金刚拳等，也为本市培训了不少武术骨干。由于杨明斋是少林派，高凤岭是太乙派，两派门户观念很深，各行其是，不相往来。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团结全国武林人士，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张之江任馆长，并通令各省市设立地方国术馆。青岛市国术馆于1929年10月成立，馆长由当时青岛市长马福祥兼任，副馆长由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李郁廷兼任。下设总务、教务、编辑三科，总务科长李丹亭，教务科长高凤岭，编辑科长杨明斋。科员八人为王芹塘、王介山、刘英华、王旭东、纪子舟、周鼎臣、侯甫增、田占魁。办事员十人为傅赞训、高作霖、王琴轩、韩冠洲、臧醒吾、李景尧、纪雨人、祝正森、邵复圣、常秉毅。国术馆的宗旨是：（1）扩大武术宣传，树立武术基础，增强民众勇武精神。（2）打破传统思想，消除门派观念，齐一步伐，认清目标，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

开始时，青岛市国术馆并无正式馆址，暂借包头路小学为办公地址。至于经费，市政府每月仅拨发 300 元，因此馆长及科长均为义务职，其他职员只津贴少数车马费。另外每月有 200 元器械购置费，用以购买器械及补助经费之不足。

青岛市国术馆最初计划在全市设立武术练习所三十处，推广武术的学习，为了培训武术师资，国术馆成立了教授班，借恩县路育英小学操场进行学习。第一期教授班于 1930 年 3 月上旬开学，学员一百人左右，多系曾在国技学社及三江会馆学习的武术爱好者参加。课程分学科及术科两种。学科有杨明斋著述之《孙膑拳三百六十式》、高凤岭著述之《金刚十八式》以及武术道德等，术科有长拳、器械、散打等。教员由杨明斋与高凤岭担任，学习期限为一年毕业。

1931 年 12 月沈鸿烈任青岛市长兼任国术馆长，市党部常务委员李先良任副馆长。当时适逢“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沈鸿烈为提倡尚武精神，非常重视武术发展，将市北区广东路 1 号公产房屋拨给武术馆作为正式馆址，通令各中小学增添武术课程，选派第一期教授班毕业的学员到各校担任武术教员。青岛国术馆又举办第二期教授班，继续培训师资，将全市武术练习所增至一百九十个。其中有两个女子练习所，由栾秀云在平原路设立第一女子练习所，由姜爱兰在禹城路设立第二女子练习所，一时之间，不分男女，苦练武功，尚武精神笼罩岛城。国术馆为考核练习所成绩，每季派视察员到各练习所检查成绩，报请市政府发给奖金，以资鼓励。奖金共分四个等级，一等三十元，二等二十元，三等十元，四等五元。1933 年 7 月，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在青岛新建体育场开幕，大会有武术表演项目，青岛市国术馆组织代表队参加，杨明斋在会上表演了绝技“铁板桥”和“揉捶贯顶”，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女队员栾秀云和姜爱兰表演剑术和双钩，姿式优美，疾徐自如，博得好评。其他队员如祝正林、孙玉秀、高伦士

等表演了拳术，基本功扎实，武艺精湛，也博得了好评。

自 1933 年至 1936 年，本市举办了三次打擂比赛，分五个项目进行：(1) 散打（三局两胜），(2) 摔跤，(3) 长兵，(4) 短兵，(5) 笔试（作文）。第一次比赛在平度路新新大舞台举行，参加比赛者有 48 人，举行两天，市长沈鸿烈到会主持。比赛结果，第一名是韩冠英，其次为纪雨人、孙玉秀、祝正森等。第二次比赛也在新新大舞台举行，参加比赛者有 400 人，会期原定一个星期，因日本人提出抗议，后来只举行了三天即行结束。中央国术馆李烈军来青主持，比赛结果第一名是钟寿山，其次为刘慎恩等。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青岛市国术馆特从北平聘来武术专家尹玉章编制《砍刀术》，向各武林练习所、各学校以及我国海军陆战队传授，一时之间，人手大刀一把，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因而引起日本对我国武术馆的怀恨。1937 年 8 月 14 日，日本海军士兵数名行经德县路天主教堂附近，其中两名被人阻击毙命，日本军舰即卸下炮衣，准备武装登陆，并于当晚到武术馆抓人，杨明斋因单身在青住在国术馆内，被抓至停泊前海之日本军舰上。此时沈鸿烈一面命令我国海军陆战队作紧急准备阻止日本海军武装登陆，一面与驻青日本领事馆交涉。日本见我有所准备，为确保其在青各大纱厂不受损失，未敢采取军事行动，并将杨明斋释回。

1937 年 8 月底，日本在青岛的侨民全部撤回日本，将其所有财产交由市政府负责保管。1937 年 12 月 18 日沈鸿烈奉命撤出青岛，在撤退时，挑选各武术练习所人员组织爆破队，将日本纱厂全部炸毁。本市国术馆人员，一部分以杨明斋为首的跟随沈鸿烈撤往鲁南抗战，杨明斋在临沂罗店为国捐躯；一部分以高芳先为首的跟随李先良撤往崂山抗战，高芳先任崂山青岛保安队（简称青保）总队长。

1938 年 1 月 10 日，日寇登陆，青岛沦陷，因日本对我国武术

素抱仇视态度，市民不能公开练习武术。到1940年，有曾在战前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获得查拳第三名、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获得武术全能第四名的孙玉君，以祛病健身为名，申请设立太极拳研究社，经伪教育局批准，在高唐路22号（第三公园内）开业，由孙玉君教授各种拳术。日本海军士兵常来参观。有一次，一个日本海军士兵来与徒弟摔交，徒弟数人都被他摔倒。该日本士兵洋洋得意，扬言要与教师比试。孙玉君无奈，当即出面比试，只经一个回合，即将其摔倒在地。该日本士兵爬起来之后，便灰溜溜地走了。

1944年，日本采取怀柔政策，在太平路天后宫成立了健民社。因崂山“青保”人员多系武术人员，日本意图利用武术，以优惠条件引诱“青保”人员来降。但不久日本投降，其梦想终成泡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接收青岛，恢复了青岛市国术馆的工作，馆址仍设在广东路1号，馆长由市长李先良兼任，副馆长由“青保”总队长高芳先兼任，下设三科，第一科长是臧醒吾，第二科长是杨庆先，第三科长是钟寿山（后改为孙玉秀）。在发展武术方面，由于老一代武术人员或效死抗日疆场，或另有工作，因而师资严重缺乏。于是青岛国术馆连续举办了二期教师班，培训师资，接着又成立了近100个武术练习所。

为激励练武人员的热情，本市于1947年举办了第四次打擂比赛，比赛办法与战前的三次相同。比赛结果，第一名是李月明，其次是王利可等。

这一时期因接收大员忙于“劫收”，货币贬值，物价直线上涨，影响了武术事业的发展，使之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

我国武术是一项传统的、有益于人民身体健康的活动。青岛解放后，人民生活安定，在公园海滨自发出现了许多打拳练武的人群，他们挥臂踢腿，舞剑耍棒，学练不懈，我市武术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气势。我市在武术组织方面，解放初期曾有拳师孙玉君、胡健夫、孙文彬、王玉彭等在高唐路22号成立国术研究会，

研究武术理论，整理武术拳种，为发展武术做出不少贡献。到了八十年代，在市体委领导下成立了青岛市武术协会，会长刘金海，副会长薛举进、马文章，秘书长徐学礼，各区也成立了武协分会。同时为了培训武术骨干，拳师徐学义在芝泉路设立了东方武馆，新兴农工商公司在山东路设立一武术学校，校长为拳师张炳斗。各区武协分会也在公园海滨等处设立武术队，由拳师传授拳术，学员认真学练，武术气氛空前高涨。

青岛武术历居山东前列，每次比赛都能取得较好名次。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青岛武术正在日新月异，为振兴中华做出更大贡献

注：

“铁板桥”是仰卧在木凳上，腹部放置一块大石条，另一人用铁锤将石条砸为两半。“揉锤贯顶”是在头部放置红砖五块，用铁锤将红砖砸碎。

（原载青岛《市北文史资料》第一辑，题为《青岛武术史话》，现题是本书编者新加的。另据1996年第4期《民俗研究》载，青岛市武术文艺研究会有孙膑拳表演队，可见青岛武风之盛与孙膑拳的影响。）

拳师杨明斋与国技学社

徐自良

1917年马良任山东济南镇守使时，为发扬武术事业，创办了山东武术传习所，这是山东省最早的一所官办武术专门学校。该所创办后，集武林高手任教，当时名扬全国武坛的武术大师韩桧生任总教习，王子平等拳师任教习。

1920年拳师杨明斋闻讯该所招聘各路武林高手任教，便来济南投考，经王子平等推荐担任教习。当时到此任教的拳师，并非一般平庸之辈可跻身其内，必须经过总教习的亲自较量比武，杨明斋自然不能例外。总教习韩桧生武功非凡，无论少林、太极、八卦、形意等拳，以及十八般兵器无所不能，在江湖上有“韩绣花鞋”之称，又因其行走如飞，故有“草上飞”之名。他的基本功扎实，每天经常要踢腿数百趟，能用一个大拇指点地倒立，与人高的墙，他举手一扶即能越过。与这位名扬海内的总教习比武，并非一般拳家所敢为。

杨明斋在马良面前与韩桧生比武，他们规定三拳二胜，两人你来我往，相扑摔打，经过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后来杨明斋使用孙膑拳中的“蹦打尖踢带反砸”，韩以为有空可进，便乘机而入，不料杨明斋又用“劈打蹬”击法连胜两次。马良立即挥动手中小旗停止比赛，大家一致赞扬杨明斋的孙膑拳独特技击法，认为可以胜任教习之职，从此杨明斋闻名全国武坛。

1925年山东武术传习所解散，杨明斋漂泊江湖，曾在上海等地打拳卖艺。后来闻知韩桧生、王子平等拳师在青岛教拳，因此

来济南（青岛？）看望。当时韩桢生在馆陶路齐燕会馆内的国技学社（拳房）教徒，杨明斋来后，韩桢生即让位与他，由杨明斋任国技学社拳师，并兼任北京路小学武术教员。

1929年，青岛市国术馆成立，杨明斋被聘为编辑科科长，著有《孙膑拳谱》、《武术气功》以及跌打损伤秘方等。他在青岛所教徒弟不计其数，拳种有埋伏拳、罗汉拳、查拳、形意拳、孙膑拳三百六十手、摔打擒拿点穴方法、以及散手对打技击法等。

芦沟桥事变前后，杨明斋反对日寇侵华，在青岛武术界兴起了反日活动，因此曾被日本捕去审讯，他毫无惧色，后经市长沈鸿烈出面交涉，始被释回。

1937年12月，他随沈鸿烈撤往临沂抗战，任敢死队队长，在一次掩护撤退中，不幸在鲁南罗店阵亡。

（原载青岛《市北文史资料》第一辑。）

武术名家杨明斋

李成银

杨明斋，阳谷人，1882年生。自幼随家人习武，学习罗汉拳、黑虎拳、埋伏拳、硬气功，后拜张景春为师，学习孙膑拳。尤以孙膑拳而著称，被公认为是孙膑拳的一代传人。1917年在山东武术传习所比武时大获全胜，从而使孙膑拳蜚声武林。1922年后，曾先后在曲阜师范、青岛北京路小学任武术教师。1926年开始主持青岛国技学社，是青岛国术馆的创始人之一，并兼任该馆编辑科长、教师等职。

1933年参加第17届华北运动会，获得特别技能冠军。1937年，组织抗日义勇队，奔赴抗日前线。1942年在河南永城大柳庄对日阻击战中英勇牺牲，终年60岁。

（李成银，1953年生于聊城市于集乡李古全村。北京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武术教授，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点创建人。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武术气功与传统文化。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论文138篇，出版专著4部。其有关孙膑拳的论文曾获“全国孙膑拳学术研讨会”特等奖。）

孙膑拳的创编和分布流传

李成银

孙膑拳是中国武术中起源较早的拳术之一，相传是由战国中期军事家孙膑所创。因其演练时穿长袖衣，故又称之为长袖拳。

孙膑是齐国阿城（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人，是春秋末期军事家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涓为魏惠王将军，忌妒其才能，诬他到魏，处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

孙膑曾拜鬼谷子先生为师学习军事兵法，由于为人忠厚正直，勤奋好学，深得鬼谷子先生厚爱，密传兵法十三篇。后来孙膑被齐威王任为军师。他设计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阵杀庞涓，制服强魏，名显天下。他主张“战胜而强立”，提倡“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在战略战术上强调“必攻不守”，主张激励士气，团结士众，采用各种方法使敌人骄傲、疲劳、迷惑、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在《十阵》中，他还论述了十种阵法的特点和作用。主要著作有《孙膑兵法》（《汉书·艺文志》称为《齐武子》），久已失传，1972年《孙膑兵法》自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有竹简440片、11000字。

据说，在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避实击虚”、“围魏救赵”的战例后，他便隐居到石闾山去了，而孙膑拳就是在此时所创的。

《孙膑拳谱》中曾记载有关拳理方面的文字：“孙膑留下长袖拳，三百六十手相连，鸡腿龙腰泼猴性，鹰眼猿臂象鼻拳。”练习时要求“静”似轻翔平衡的雄鸡，“动”像吞吐伸缩灵活的龙腰，“灵”似机警敏捷的泼猴，“神”似凝神锐敏的鹰眼，“放”要松肩

抖腰，像那放长击远的猿臂，“止”于中指突出的象鼻拳（“象鼻拳”，中指突出成锥形，取意于《孙膑兵法》中的“锥形阵法”：“锥形者，所以冲坚毁兑（锐）也”）。

清朝末年，孙膑的故乡——山东阳谷县有一位青年武士杨明斋，曾拜在山东省馆陶张家楼的一位赶马车的张师傅门下，学得该拳。后来杨明斋去鲁西地区以及济南、青岛等地开始传授此拳。孙膑拳分为“八架”、“八段”，八架是大架（96手）、中架（32手）、小架（74手）、四架（108手）、五架（55手），合称为365手。六架、七架、八架为对练套路。目前在社会上流传的主要有“三十二手”、“六十四手”、“九十六手”三套。该拳风格古朴雄浑，尤其注重技击，在实战上要求“边打边防，边防边打，打防结合”。动作基本上是连发性的，很少有单击动作，独特之处在于动作大体都是一侧手脚同时进攻或防守，与一般长拳中习惯性的套路练习截然不同。特别讲究“三出而一主，两臂一腿并发”，其中有一主要动作。与敌交手时，要求侧身对敌，“侧身对敌一字形，交手须知保三中，护住头、胸、腰三位，顺势技击不留情”。战术上以“空、诓、虚、实、晃”为主，以动作迷惑对方，有真有假，有虚有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欺诈疑惑，击打对方。此拳发劲强猛，动作剽悍，攻击力强，畅通无阻。在手型上多出现“锥子拳”和“挫拳”，在腿法上多出现“侧铲脚”和“尖子脚”。

孙膑拳长期以来分布流传于山东的鲁西、聊城、青岛、济南、淄博等地。《孙膑拳谱》载：“孙膑留下长袖拳，一代一人往下沿，千金莫与恶人传。”此拳门规甚严，一般不肯轻易外传，故现在会此拳者已不多见。近些年来，在武术挖掘、整理的强劲东风指引下，已整理出孙膑拳的“三十二手”、“六十四手”、“九十六手”套路，其他套路的整理还在继续努力之中。

（原载《中国武术咨询大全》，李成银著，山东教育出版社。）

关于孙膑拳的传承、拳理和手法

一、孙膑拳传承

在古代兵法、拳术并重的时代，孙膑或许也有可能习练武术。然而，孙膑师从鬼谷学习“通背拳”，并且自成一派，编创孙膑拳，则却无从查考了。

1991年《中华舞（武？）史研究》1—2期载《孙膑拳精华》说，清末山东省茌平县张景春传下孙膑拳。师祖张景春，自幼习武，四处游走，经商为业，广结天下英雄豪杰，与人切磋武艺，常以孙膑拳致胜，在冀鲁一带赫赫有名。其毕生仅授徒三人：大弟子张金岭，二弟子魏金凤，三弟子杨金栋，即杨明斋。

杨明斋（1882——1941），字廷栋，孙膑拳门派排行“金”字，武学名为杨金栋，山东阳谷县阿城人。杨廷岳是其胞兄，高作霖、孙文宾、孙绍棠是其弟子。杨明斋先生在中国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武术比赛中获特技第一名。1928年建青岛国术馆，馆址青岛市广东路一号，杨明斋在国术馆任职期间，择徒授艺，使孙膑拳自此在青岛传播开来，故青岛有“孙膑拳市”之称。

杨明斋是一位爱国武术家，他投身于抗日战争。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在河南省永城县罗寨战役中为国捐躯。

恩师孙文宾，学名孙鸿梓，生于1899年12月18日，卒于1978年5月14日，原籍山东省黄县城关镇。七岁在家习练六合螳螂拳，后至大连从著名拳师刘多山学七星螳螂拳。又在烟台跟张太原拳师精练八年少林长拳，1930年应邀来青岛跟杨明斋研习孙

螳拳法。孙文宾老师，一生从事武术事业，传授中华武术，培养出大批武术人才。解放后，任青岛市武术研究会主席，1952年青岛市首届武术比赛运动会，他为大会主席。1953年11月，成立国家武术队，他是队员，获第一次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奖。1954年3月，在国家民族体育班任第一任武术教练，成为国家武术队的第一个专业教练。1957年回济南，担任山东省武术协会主席、武术高级教练等职。孙文宾老师在青岛授拳时期如下：

1938年，在台东区德盛路26号院内授拳，其间主要弟子有张孝宽等人。1942年，在潍县路、四方路附近教场授拳，主要弟子有张万福等人。1947年春，在东仲家洼操场及南仲家洼寿康里后院授拳，主要弟子有孟宪堂、孟宪珠、孟宪书、张万福等。1949年，在北仲家洼小学操场传技，又有新徒白梓恩等。1950年，在台东六路小学小操场，所授弟子有刘峻骧、刘振厚等。1953年，在市北大庙山授徒，有于东明、于恩庆、于永顺、曲天武等从其学艺，1975年至1977年孙文宾老师在青岛疗养期间，又热心传授自己终生武艺。其间除孟宪堂、刘振厚，还有一些老徒弟受益匪浅。

现在，孙螳拳在山东济南、聊城、菏泽、安邱、曲阜、明水、淄博、莱阳、莱西、烟台、青岛、德州，及湖北省沙市等地，和国外的日本、美国、德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处，已经普遍流行。台湾更为盛行孙螳拳。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专门设有武术课，内有孙绍棠教授传授孙螳拳大、中、小架和其他武术套路。

二、孙螳拳拳理

孙螳拳是流传于山东的主要古老拳种，也是全国稀有拳术。它在演练上和击法上都独具一格，朴实无华，结构紧凑、攻防显著、弹簧劲力、发鞭梢劲，螺旋手法，采取打架统一方法。故具散手、武术精华之特点。

孙膑拳创始于何时，至今各说不一，但共同认为由杨明斋先生流传至今无异议。（见孙膑拳传递系统表）

据记载：“杨君精于大小架子拳术，此拳流传极少，即北方亦不多见。显技时，须衣特殊之长袖衣，又精于孙膑三百六十手。”故后人又称孙膑拳为“长袖拳”。孙膑拳吸取武林各门派很多击技特点，运用《孙膑兵法》“内得民心，外知敌情”、“必攻不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等理论。加上在战略上运用“空、诓、虚、实、晃”，在战术上用“速、巧、软、绵、小”的技法。所以孙膑拳又称“精华拳”、“散手拳”等。但总起来，还是借战国军事家孙膑之名，称孙膑拳为正宗。

（一）练法：三节胳膊二节腿（上下肢灵活），鸡腿（轻翔、安静），龙腰（矫健、灵活），鹰眼（敏锐、精神），猴相（机警、敏捷），象鼻拳（肱长突出、击远）。独立相似燕，发拳拧绞缠旋钻，拳出瞬时即放松。起如风，落如箭，迅猛刚烈，打巧劲，刚柔相济。在路线上，采用行拳在一条中轴线上，直来直往，进退起落、转折全在一条线上进行，以走圆弧来概括，动作走弧线，圆中带方（直），方中带圆（柔的走化），刚柔相济。

练时还须注意，拳法自然，脚步雄健，精神、意识、气力要集中，招熟心要活。攻防进退以侧身为主。步法，逢进必跟，即“进之则逾长”，抢占彼方有利方位，取有利自己之攻防形势；后退必撤，在跳跃后退中，后脚一落地，前边一脚必须向后拖带半步，即“退之则逾促”，也就是退缩的更短些。

（二）手法二十四字：崩、弹、钩、挂、点，缠、挑、碰、劈、截，拉、抄、瓦、摆、捷，抓、掏、封、砍、摆，旋、捅、钻、堵。

（三）腿法十二字：踢、蹬、踹、挫、截、踩、扫、摆、拱、碰、挂、播。

（四）打法：蹬弹劈打带捋式，双手捆捶反顶碰，累捆捆击崩截磨，三中五形，五脏六腑，三十二经络、七十二腕骨，三百六

十骨节。

运用拉上线，打上桥，就地取材，变化无穷招。有“一着成熟，百战不殆”，“轻易不动，一动就中”，走内点击彼方筋骨、穴道的要诀。

故曰击技法——不招不架迎面直打，你打我也打，走内不走外，摇肩折身，灵活智变，进而求直，攻防合臂，手脚并用，出手即发，一发连发，上下协调，三出而一主。发长冲拳，靠身短手，手手相连，侧身对敌，发鞭梢劲，迅猛刚烈。

歌云：出入起落未求实，行走闪打无定势。见机行智多巧变，万万未要僵化式。

孙膺拳风格概括为：行拳出手顺达流畅，手足并进力逼四稍，结构严紧有循尚好，风格独具尤为重要。

孙膺拳传统套路有基本功法，单手练，大架，中架，小架，捶谱，六十手和孙膺拐。为了把孙膺拳普及开来，使其体系趋于完备，根据《孙膺兵法》，综合武术各派要点并吸取其部分套路，除本书介绍的一路孙膺拳（埋伏），一路孙膺刀（四封），一路孙膺剑（子午），一路孙膺棍（迎门），一路孙膺枪（五虎），一路孙膺日月燕翅圈，一路孙膺钺外，还有其余的套路未作介绍，这将在今后再版《中国孙膺拳》时，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把孙膺拳体系中的其它几路拳法简介如下：

①二至八路孙膺拳：

- | | |
|-----------|-----------|
| 二路孙膺拳（罗汉） | 三路孙膺拳（串拳） |
| 四路孙膺拳（查拳） | 五路孙膺拳（黑虎） |
| 六路孙膺拳（钟拳） | 七路孙膺拳（通背） |
| 八路孙膺拳（玄乙） | |

②二至四路孙膺刀：

- | | |
|-----------|-----------|
| 二路孙膺刀（少林） | 三路孙膺刀（陆合） |
| 四路孙膺刀（少林） | |

③二至四路孙膑剑：

二路孙膑剑（穿云） 三路孙膑剑（戚门）

四路孙膑剑（玄乙）

④二至四路孙膑棍：

二路孙膑棍（风魔） 三路孙膑棍（伏虎）

四路孙膑棍（达摩）

⑤二至四路孙膑枪：

二路孙膑枪（少林） 三路孙膑枪（陆合）

四路孙膑枪（岳飞）

⑥二至三路孙膑日月燕翅圈

⑦二路孙膑钺

⑧孙膑器械介绍十八般兵器中的九种：

棒、铁尺、钩、流星、鞭、铜、锤、斧、叉。

三、孙膑拳手法

孙膑拳同其他拳术一样，具有自身的手法、掌型。手为身之矛，攻人之锐，防身之盾。攻防都依两只灵敏、锐利的手，手在拳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手法二十四字，已在“孙膑拳拳理”列出。下面分述孙膑拳掌型及拳型。（下略）

（此材料系山师大体育系李成银教授提供。）

齐鲁旧闻缀记

李玉法等

曹州教案

曹州教案也叫巨野教案，当时巨野县属于曹州府统辖。1897年11月，巨野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下乡传教，中途为巨野县一个农民杀害。德国人借口于第二年强占我山东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的修路权（胶济铁路）和开采矿产、兴办各项工程的特权，把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这个被杀的传教士，埋葬于济宁县城西北戴家庄天主教堂内。1954年我在济宁城北兴文镇小学教书时，星期天我们几个老师不断往戴庄教堂去参观。该教堂规模很大，分两个院，东院住女，有教堂医院，西院住男，有中外神父数十人，什么洋猪洋牛也很多。该被杀传教士，埋葬在西院。墓系平顶型，约二尺高，上植花草，墓后立有英汉文碑一座，文系横写，上边写汉文，下边写英文。其汉文上写着：传教士某于1897年11月往巨野传教，中途为贼所害。当满清时代，敌强我弱，杀他一个人，惹下大祸。现在我中国人民政府不许外国人进内地传教，是有道理和事实根据的。

大军阀张永成轶事

张永成字松山，阿城西岳庄人，为北洋军阀中的耆宿，满清

时代的军官，到了民国，历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等职。在北洋军阀中，别看官位不大，但资格最老，军阀中的将领，多数出身其部下，与大总统曹锟是仁兄弟，大军阀吴佩孚是其旧属，满清复辟的张勋是其如侄，浙江省督办卢永祥是其儿女亲家。为人善练兵，计划周到，力持节省，就是怕打仗，当与国民党混战时期，一有战争，马上请病假。他晚年退隐，在济南盖了一所住宅，叫八卦楼，名噪一时，现在就微不足道了。在寓居济南时，有他的旧部连长，以张的名义造了一封假信，去见曹锟，曹乃送到营中当连长。后来张与曹在京见面，此事被揭露，连长被撤职。该连长怀恨在心，到八卦楼行刺，张身被数刀未死。张即时把连长眷属逮捕扣押，经张师长胞兄劝说，终于完全释放，未行报复。在军阀中有此义举，实属不多见。

施从滨和孙传芳

在孙传芳任山东督军时，施从滨是他手下的山东警备旅长，以后施又叛孙投奔别人。在作战时，施从滨被孙传芳俘获。在孙坐堂审问施时，孙开玩笑地问施说：老施，今天如何又落在我网中了呢？本是无意杀他，一位旁边陪审人说：给他说这么多的话干啥！一句话，提醒了孙的杀机，以后把施拉出去砍啦。施死后，又把他的人头挂在津浦列车上，来回撞荡了几天，藉以示众。以后孙传芳当了五省（闽、赣、浙、苏、皖）联军总司令，干了几年，后来国民党军出师北伐，孙的五省地盘尽失，于是孙不得不通电下野。下野后，他同北洋军阀靳云鹗、靳云鹏等在北京居士院为僧，表示自己从此不问政治。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女子，她见有机可乘，遂生为父报仇之心。一天孙传芳正在佛堂里跪下祈祷（一说孙在电话室里打电话），施趁门岗无人，闯进寺内，一枪把孙传芳打死，为父报了仇。这件事，一则是施

剑翘为父报仇，达到目的；二则是施受蒋的指使，借她的手以除孙。事件发生后，把施押起来，押了几个月，就把她释放了。

郑继成枪杀张宗昌为叔报仇

当韩复榘主鲁时期，张宗昌又往济南来，韩认为张有野心，怕夺他的主席。过去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时，冯玉祥派他的军长郑金声来山东交涉事情，一时因言语矛盾，张宗昌把郑金声枪毙啦。后来郑金声之侄郑继成，在韩手下任省府参议，韩因憎恶张宗昌，特假手郑继成为叔报仇以除张。一天，张宗昌又来山东济南，韩复榘和石友三等陪着张宗昌打牌喝酒，一夜没睡觉。第二天，张宗昌带着他的随从搭胶济车走，临走时，张有一颗好手枪，石友三拿在手里紧夸好枪，张说送你吧，石顺手接过来，这样，张就无可恃啦。张上车后坐在车门间，手执文明杖；郑继成装成农民，身穿大褂子，头戴大礼帽，左手搬柱上车，右手掏枪，张宗昌眼快，一手杖把枪打落在地，下车就跑，郑在后紧跟，一枪把张打倒，初尚有点气，及抬往医院就死啦。据说，张宗昌的兵没数，姨太太没数，多达四十余人。我当年在济南求学时，同学们常谈此事。

刘珍年占据胶东活捉褚玉璞

当韩复榘主鲁时期，刘珍年是个叛变的师长，司令部设在牟平县，以此作为中心，共占着胶东五县。韩复榘曾亲临指挥，打不了他。后派下野的督军褚玉璞（当过河北督军）前往，但褚不是刘的敌手。据说，在作战时，刘珍年把队伍分成三路，两路作左右翼，埋伏在两旁，中路与褚军作战，装作败北状，褚军在后紧追，时机一到，左右两路埋伏军在后边包抄，中路军回头反攻，褚军误中敌计，结果胜利属于刘军，生擒褚玉璞和他的八大处人

员，一并看管起来，要多少万元，才能买，其实擒虎容易放虎难，纵然钱交够，也是杀他。褚玉璞是山东汶上县南站人，土匪出身，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进关时与张宗昌同是旅长，以后张升山东督军，褚升河北督军，失职后仍不甘心，又重整旗鼓，梦想东山再起，把在济宁南门里盖的一片楼院，卖给直系军阀潘子和（济宁人，吴佩孚的军长），换了三千支钢枪作本钱，所以才能与刘珍年作战。褚既被擒，他的胞兄褚玉凤，是个老实农民，闻弟被押，赶紧生法治钱去买，先找褚的几个姨太太要钱，褚的上海银行存折，在她们手里，坚持不给，不得已，褚玉凤才把褚玉璞在徐州买的几百顷地花完，一心把弟救出。钱交的差不多啦，一天，刘珍年把褚玉璞放开，叫他的各位处长陪着逛大街散散心，各街逛完后，又逛北街，离北门不远处，有个往西小道，褚就害怕啦，问：“刘司令是不是有别的意思？”答：“没有。”走着走着，坑早挖好啦，于是把褚活埋在那里。据闻，褚在河北任督军时期，每年加粮加征，敲骨吸髓，民不聊生。

此材料系我在济宁教书路过褚的老家南站时，地方为我说之。后来在濮县县府任职时，建设局长巩敬人先生也谈过，当时他在牟平县任县立中学校长，亲见之。

我所知道的张苇村

张苇村，山东人（县名不详），省立曲阜第二师范本科毕业，以后加入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大会的时候，北方国民党人参加会的，唯张苇村年龄最小，因此孙中山很重视他，当时与张苇村合照一像。张苇村开会回来，因之声名大噪，一跃而为国民党界重要人物，升上了主任委员。他曾在济南办起一处私立中学，叫建国中学，张自任校长。

山东国民党省党部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各拉派

别，住省党部常委中，有张苇村、李文斋、张淑东三大系统，各成一派。1933年夏，国民党中央特派陈立夫来济南调解山东党务，解决好了没有，外人不得而知。在此期间，陈立夫于夜间在济南民众电影院，讲授他的“二元论”伪哲学，通知政学两界人去听讲，当时我也随老师去听。当时陈的年纪不过四十岁，身穿杭绸大褂，留着洋头。他讲时，在黑板上划了大小不等的圆圈来解释他二元论的哲学。后来见过他的哲学著作，与所讲的一模一样。一直到夜十二点才散会。

再说张苇村这个人，在山东办建国中学，无恶不作，强奸女生。他在山东省党部竞选时，凡山东各县党部委员，属于他一派的人，开条盖章发“分”，在济南逛窑子不花钱，交“分”就算。待选举结束后，再派人往各窑子收“分”，按“分”付款，这是人所共知的张苇村的恶劣行为。

1935年，山东省党部在济南进德会开会，张苇村于夜间先往进德会作布置。进德会在济南市西南部，离省府有六七里远。进德会西院本是个戏园，省府要人也借作会议地方；东院是荒场，只有几棵柏树。当张苇村夜间穿过柏树林时，刺客对张的卫士打了一枪，只打脚踝上，第二枪才打着张苇村，当时毙命。这时西院正在唱戏，一听枪响，人们都往外跑，凶手也混在人群中跑啦。当时省府接到卫士的电话，说“张委员被刺”。省府汽车手枪队马上开到进德会，但这时人已跑光，只有张苇村的死尸躺在地上。

事后，省党部开会研究凶手问题，认为是内部的人办的。办法是验手枪，结果是省党部职员中有个叫湛俊臣的，他的匣枪膛内有烟迹和烟味，证明这支枪刚打过，因此，刺杀张苇村的凶手，肯定就是他。当时逮捕起来，后来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山东主席韩复榘也是省党部常委。据《济南日报》载，张苇村埋葬后，他亲自骑马往济南郊区张的墓前致祭，这也许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吧！

张莘村被刺时，我正在济南上学，进德会我也去过。

韩冯密闻

1932年下半年，我在师范上学，国语教师李文龙（本名李宝昌，莘县黄楼店人）在讲完课后曾讲了一段时事政治：

冯玉祥总司令在1930年阎冯反蒋失败后，通电下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集合旧部参加抗战打日本，在热河抗战失利后又通电下野。当时蒋介石下了通缉令，扬言通缉冯玉祥，冯玉祥不得已化装进关，乘火车到山东来。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听说冯来山东大为惊慌（韩是冯玉祥部的叛将），以为冯是他的老上级，见了面不好说，很感不安，便坐了火车到天津迎接冯玉祥。在车站上韩给冯玉祥双膝跪倒在地，问总司令好。冯问韩复榘这算什么，韩复榘说，总司令不开恩我不敢起来。冯说，过去的一切付于流水，我不怪你，站起来吧。韩赶快起来说，我对不起总司令，请到山东住几年，一切生活上的问题由我韩复榘负完全责任。冯随韩到济南后，韩对冯招待得很殷勤。在济南住了几天，冯要登山休养，到泰山上不接见宾客，每天读书写字，写白话诗，安闲休养，韩对冯的生活招待备至。在此期间，冯的老朋友随从秘书熊观民（本名熊梦宾，阳谷南街人）当时任韩的教育厅厅长，与何思源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不是一派人，说话很少。熊因为冯到山东来长了精神，公余之暇，便到泰山见冯，亲切侍奉在侧，倾吐内情，冯把内心的话也告诉给熊。冯怕再中了韩的诡计，暗嘱熊观民密访暗探韩投降日寇当汉奸的阴谋勾当。待日军打进关里，韩早已和日寇接头联系多次。自从冯登泰山后，蒋介石大为不安，便暗暗解除了通缉令，并曾多次派代表到泰山邀请冯到南京去给蒋帮忙，冯不得已下山上南京。当时冯已把韩卖国当汉奸的勾当调查完备。蒋请冯担任副委员长职务，但是有职无权，说了不

算。冯在街上白天里打着灯笼，别人见了问冯是什么意思，冯说：“黑暗世界也，不打灯笼看不见，到处碰壁。”从这里证明蒋冯政见不合。冯的威望在全国比蒋介石高得多，就白天打灯笼一事来说，对蒋的讽刺打击多严重，但蒋内心里忌怪冯，表面上无奈何。冯向蒋透露了韩复榘在山东搜刮民脂民膏贪污自肥，卖国求荣当汉奸的罪恶事实。蒋便派人到山东侦察。在日寇进攻山东，打到德州时，韩不抵抗。在此紧急关头，蒋冯的密探得知韩复榘有两大卡车满载着现大洋从济南运到徐州转送西行，便在郑州将其查获，全部充公开往武汉了。

从那时起，韩和日寇勾结得更密切。国民政府下令调韩到武汉去，韩抗不前往。蒋冯派军警到济南把韩复榘秘密逮捕，解到武汉去。蒋冯在武汉组织好军事法庭，委任鹿钟麟为军事法庭庭长，专案审判大汉奸韩复榘的罪行，事实面前难以抵赖，勉强招认，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换了沈鸿烈（沈原来任驻青岛海军司令）。

韩复榘在山东对革命运动的镇压 及所谓“清乡”、“禁烟”运动

韩复榘主鲁时期，山东省党部豢养着一批“捕共队员”，他们下县巡逻，逮捕共产党员。韩复榘系山东省党部常委之一，所以他对山东的共产党人极力镇压，制造了一些流血惨案。他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在山东的防共办法：凡中级以上学校，设训育主任一人，尽管校长不是党员，而训育主任必须由党员充任，目的是严防学生中出现共产党。凡学生课外读书，必须由他来检查，如发现违禁书籍或秘密会议，他可以直接向上级党部汇报材料，进行处理。但也有好的校长或

主任，为正义所感，发现校中有共产党，装瞎装聋。党员被捕，也有被株连的，例如寿张八乡师学生王福昌（阿城富安镇人）的被捕，即系外校同学供出的。1936年逮捕王福昌时，济南韩复榘派来的人夜间包围了校园，觉察者早就跳墙跑啦，只逮着王福昌，结果被韩复榘枪决于济南。当时寄埋济南郊区，解放后，才移葬于济南烈士陵园。

党员被捕后，法官首先叫自首（出卖组织），根据口供，再逮他人。然后个人再登报声明退党，才能保你不死。韩复榘主鲁时期，中级以上学校不断发生类似八乡师杀害共产党员的事件。王福昌仅是一例。

当韩复榘时，其清乡办法，尤为厉害，对触犯其刑律者，一律砍头，用的是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绝无教育意义。当时社会制度不良，贫富悬殊很大，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贫民与地富的矛盾很大，不得已而为匪，架户勒索，以解妻子冻饿之虞。在韩复榘主鲁时期，鲁西驻防军系八七旅荣光兴旅，清乡时每一个乡划分若干片，派营连长包片清查，先开乡长会，告诫有匪不报者与匪同罪。凡匪架户从中说合者、窝匪者、与匪作眼线者，弄清后，一律砍头，往往一次砍数十人。俗话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总之，他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其他鲁东、鲁南、鲁北的清乡，都是一样。

再谈谈韩复榘禁烟情况。当时他所禁的烟，不是鸦片，而是东洋日本人自制的白丸（海洛因），吸上瘾其毒甚于鸦片，这是日本人一则为了赚中国人的钱，二则是为了毒害中国人。1935年，我在济南上学时，济南市日本毒品洋行有三家：三轮洋行、华北洋行和三本洋行。这些洋行，仗恃济南日本领事馆的权威，专门制造毒品，以毒害我山东人民。

洋行门外边，有中国警察站岗，到门岗时他不查，那是日本洋行花钱买透的。走不多远，警岗发现形迹可疑之人，就遍身翻，

查出来的，送交济南市公安局，立即枪毙，如此洋行买卖小啦。日本人又生法，凡下县往济南贩卖毒品的，日本人开着汽车，拿着猎枪，带着洋狗，假装打猎，车内装的是毒品，送到你县境离你家不远的地方，从汽车上把大麻袋装的毒品掀下来，回车就走，再遭事就不管啦。据了解，山东各县死在贩毒上的，每年何止数千百人。阳谷县，据知道的光安乐镇区就有两个。有清乡时被杀的，有平时被杀的。日商敢于在济南公开出卖毒品，根源还在济南日领事身上，当时敌强我弱，韩复榘不敢向领事馆交涉，以制止日商这一非法行为，却一味屠杀中国人，办法是极其错误的。

韩复榘主鲁时期，对鲁西南 灾民救济情况

1934年山东临濮集黄河决口，国民党中央派水利委员长许世友（满清文状元）来堵口，老弱灾民嗷嗷待哺。据当时报载，有一妇女，怀揣一个小孩，喊“委员长救命吧”，从怀中掏出小孩扔在水里啦。许世友凄然泪下。据了解这个口门长达二十华里宽，从两边绑上架子，镶上木板，上压土石，将要合拢时，又冲开啦，如此多次，经过很长时间才堵上。

关于救灾情况。鲁西南金乡、鱼台、嘉祥等几十县，尽成泽国，成千上万的灾民，无家可归。韩主席下令，将灾民分发到无灾民区，各县收容灾民，组织起来，派专人负责灾民吃住问题。阳谷在张秋街设灾民收容所，由张兰华等负责。下县布置完了，下余的一大部分灾民，由韩主席负责安排在济南市大明湖西边的一片空地。办法是：在平地广场上，用秫秸和木棍栽成墙，用泥泥好，上覆苇席作顶，再盖上油布，以防雪雨。里边铺上麦秸，再铺上苇席，睡觉一顺头，不远留个门，以便出入。男女分居，有

条不紊。凡济南市的古庙闲房，全住上灾民。

关于灾民的生活。各街有大伙房，吃饭的时候，政府派专人负责，男的与男的同队，女的与女的同队，往伙房吃饭时，在大街上分队而行。

冬天灾民棉衣生虱子，韩主席令人用闷头罐汽车，与灾民薰虱子。隔几天叫灾民轮流洗一次澡。青年男女每人发识字课本，凑戏楼和公共场所，挂上黑板，叫灾民学点文化。谁要是吓唬灾民，灾民就说，主席叫我们来的。

到了1935年春三月，天暖和啦，水下去啦，该种地啦！韩主席又按人发给他们种子和一部分口粮，叫回家种地去，并由济南用公家火车送到固定地点，遂各自回家。

那时我初次在济南考上学，关于与灾民上班，我轮着两次。以上材料，是我当时的亲身经历。

1940年鲁西讨伐石 友三战役的见闻

讨石战役是1940年1月打响的。当时石友三是国民党第十军军团长。它直辖三个军，即高树勋军、毕军、石个人自兼一个军，足数有八万多人。这三个军，分住在山东的范县、濮县和河北省的濮阳，清丰、南乐等几个县。枪支齐全，每连一挺轻机，每营一挺重机，每团一座迫击炮，另外还有大炮，据说是日本给他装备的。这次战斗，十军团是预先有准备的。1939年旧历年底，石友三的部下，在濮县城北郊三里店驻地，演试迫击炮，群众往观，这时我在濮县县府（范专员新属县）工作，随人去看。

当时打石友三的八路军是聂荣臻部队115师的一部分，约六千人，其中有不少的骑兵，再配合郛城驻军杨勇将军一个旅、肖华支队和鲁西地方八路军，约三万余人。在作战前，因八路军的

枪支不足，即把县属区乡的武力一律缴械，以补不足。濮县城墙早已铲去大半，只留五尺高。这座城，早为十军团所占，大街上挖好了防御工事，准备打仗。这时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春也正在濮县城里。石友三的指挥部，设在濮阳一个村镇上，地名叫柳下屯。濮阳与濮县，隔一道金堤，柳下屯离濮县城不过二十里。李树春对战争想作调解，一面给杨勇写信，劝其休兵；一面与石友三写信，叫送信兵跑步去，令其快派兵来支援，当时只来了十几匹马队。两面派的李树春这手段怎能使得上。在战争发生前上午，县长写给我一张字，说快开仗，你可到朋友家避一避。本城一位同事，接我到西关他家去。结果在1940年正月二十日夜晚8点，八路军攻上来啦。这时李树春同濮县县长一同出北关，直奔濮阳柳下屯找石友三（李与石系朋友），石握手接到司令部去。再说濮县战斗，机枪声、手榴弹，响个不停。门外就是战场，我们几个人，夜里爬出了危险地，一鼓气往西北走，到天明，过金堤口奔到河北濮阳一个街店上，地名叫这合寨，住了一夜，天不明，村上就叫走。刚出西门，见有穿绿军装的十军团约一营人，在一个空地上，长官正在讲作战计划，他也没问我们。往北走约二里地，地名叫小寨，庄前有个穿灰色军装的岗兵，让我们到村里去。这个村驻的是八路军，正在扫街，嘻嘻哈哈，口音很蛮，其长官说，政委发落。政委在庄东头民宅里，把我们叫到屋里问话，他问我干啥工作，我说教员，他说兄弟也是教员出身。拿出军用地图叫我看，石的本部驻哪里，其某师某旅驻哪里，都用红铅笔标上。由此可见八路军的侦探工作做得好。接着说，这次为什么打石友三，因为他卖国勾结日本，在察北卖给日本四万石小麦，这次讨石，是奉蒋中央的命令（1940年尚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他又说，现在正是吸收新同志的时候，我说我眼近视，战争紧急，夜里行军不行，他说不勉强。这时战区几县的枪声、手榴弹声响成一团，比旧历年鞭炮声还要热闹，路上行人断绝，鸡犬不鸣。两方的军队

也是插花驻扎，例如这村是十军团，那村是八路，一触即发。八路军所经之地，沿途贴标语，散发宣言书，揭发石友三的叛国罪行，说这次战役是“打叛军”。展开政治攻势，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制胜武器。经过一段激战，石友三力渐不支。

在这时，重庆蒋介石给高树勋拍来一封密电：“投敌叛国枪毙”六个字，叫高乘机图石。高接电后，与毕军长商议，由毕军长约石友三往高军长处去玩（三个军不驻一处）。到了高军长防地，马上把石友三扣压起来。石对看差人说，我下处有两个枕头，满装银元票，你要放了我，给你一个，够花一辈子，看差人那里敢。某日夜里，石友三正在吸大烟。卫兵说，请到外边去。石答，我明白，过足瘾。出来后，见坑已挖好，说，我跳吧，石友三遂被活埋。石死后，其弟石友信（石的师长）亦被枪毙于濮县城。

石友三死后，驻重庆的孙良诚、孙连仲等人，与蒋介石吵闹起来，因为他们与石友三都是第二集团军老同事，系冯玉祥的部下。

后来在豫北潼河战役中，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他是国民党军起义最早的一人。以后党中央批准加入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工作。后来死在北京，享年 78 岁。

旧社会各省的检考、普考与高考

在旧社会（军阀和国民党）时期，为了不埋没人才，对知识分子定下了三种考试办法，以补学历不足的空白。这些任务，由中央考试院掌握，并制订《考试须知》一书颁发全国。

一、检定考试：这一办法，是对无学历资格，自学成材，有相当程度者设想的，但有资格者也准考。每年一次，在全国各大城市轮流举行。比如今年在青岛，明年在开封，余类推。检考及格者发给及格证书，准参加普通考试。

二、普通考试：凡无资格者经检考及格后，准参加普考。当然有高中后师或大专资格者更准考。考试及格者，以科局长任用。普考的轮流，同检考一样，一年一次。至报考科目，须看《考试须知》。

三、高等考试：也称高等文官考试。它招考的方式不是全国轮流。军阀时期，在中央所在地北京举行。他有权往他所在地分派县长或其他职务。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在南京举行的高考，能往全国分派县长或留京任用。无论军阀或国民党社会，各省主席也有权单独在本省举行县长考试。但录取后，仅能在本省分派职务。以阳谷为例说明，如朱汉升，本是清末老法专毕业，但他自学成材，在汽车、火车上也学习，山东考县长时，三场都是第一名，被委为济宁县长。又如清末拔贡张蕊榜，未入过学堂，也是自学成材，考上了县长，当过湖北通山县县长。如李锡峻也是清末的老法专，自学成材，考上了县长，当了浙江省上虞县知事。一般新式法科大学毕业生，却多半名落孙山，此例外省也有。

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和各县 民众教育馆概况

一、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1933年到1934年，我曾在该馆招考的馆员训练班学习，学员30名，八个月毕业，系官费，每人伙食费五元，目的是为下县的教育馆培养服务员。其业务学习与后师同，每日五节课，课余时间排演戏剧。

1、该省馆是业务机关，不是权力机关。当时省馆长系董渭川（名淮），山东邹县人，北京师大毕业，著述丰富，是中国有名教育家。馆员班也有他的课，教材是他自编的。1933年曾奉派赴欧洲考察民教，一年的期，回来后写了两本书：《欧游印像记》和

《世界成人概观〔教育?〕》。

2、馆址在大明湖西数十步。里边另外有几排瓦房宿舍，供教育参观者住宿。馆内设有假山水沟，亭台池榭，风景幽美。畜养了一些珍禽异兽，供游人参观。

3、人员组织分五部：总务部、讲演部、新文字部、电影戏剧部、出版部，每部设主任一人。

4、馆内有图书馆、动物展览馆（已死的禽兽，剥后制成标本）、卫生展览馆、讲演所（府东一处、馆内一处）等。

5、有民众电影院（在本馆南），每晚先演戏，后演电影（教育片）。其戏剧是本馆编的，馆员班学员配合馆内职员演出，票价一角。

6、有民众教育实验区，在城东五里祝甸乡，由馆内派专职数人负责民众教学。

7、馆内出版部出版《民教月刊》，朱智吴任主编。馆内出版《化装讲演集》六卷，讲演部主任赵波隐任主编，闫折梧任舞台指导；山东大鼓，马立元任说唱，他兼任济南市书词联合会会长。馆内出版《国音》和《世界语》报刊，萧迪忱、孔繁均（女）任主编，萧是中央国音统一委员会委员。

8、省馆每年春秋两季，往下县出发一次，叫“巡回讲演团”，分两组，由馆内主要职员领队出发，带着戏剧、电影、大鼓、说唱，配合馆训班学员，每组学员1—15人，每县出演4天，每组出发四县。我跟着出发一次，是往鲁北，另一组是往鲁东。

二、各县民众教育馆：在国民党社会，山东共有108县，每县设民教馆一处，共有108个县馆。县馆长由山东教育厅训练合格的人员充任。但也有例外，就是下县国民党份子，具有初中以上程度的，依仗党权当上馆长的，但是少数。

1、县设馆长一人，总管馆内一切事务，由山东教育厅委任。

2、下设四个部，即总务部、讲演部、图书部、教学部，每部

设主任一人，由馆长聘请任用。有的县馆还设出版部，照常出《民众周刊》。

3、另外在各县乡镇上，设讲演阅报所一处，每处设讲演员一人，订有报纸多份，每到集期，讲演员向乡间赶集的人，讲时事政策和国际国内消息等。县馆人员，也不时到下边检查工作。

4、另外县馆还在大集镇上，办乡村民教实验区一处，负责办理成人学校和农村夜校等。

5、到1936年，由厅令把各县民教馆一律撤销，只留图书管理员一人，其馆长一职，并入县教育局内，称民众教育辅导员，职位和待遇与县督学同。1936年我在“山东地方行政人员民教班”毕业后，即被委为县民教辅导员，不久就赶上七七事变，中国的教育也转向抗日的方向去。

山东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

韩复榘主鲁时期，于1935年至1936年，办起了一处行政人员训练所，是为各县培养县佐治人员的。韩自任正所长，民政厅长李树春、财政厅长王向荣、建设厅长张鸿烈、教育厅长何思源、秘书长张绍堂5人，任副所长。谢宝楨任全所总训育长，总揽行政和教学等一切事宜。

所址在济南郊区千佛山北约二华里，占地面积约五十亩，门朝北，日日夜夜有岗兵把门。地基原来系葬埋义地，把尸骨起去，平了平，盖起一处崭新的红砖绿瓦高等学校。据说，这所学校，系包给济南建筑公司的，限一个月完工，价款为五十万元。所内有大厨房、大饭厅、大礼堂、大会议室，另外有会计室，有事务员室，有学员宿舍15座，有各班教室15座。

全所学员编为五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班，置大队长一人，每一班为一个小队，置小队长一人。大队长和小队长均系退职的旧

军官，在大队长中，有当过师旅长的，小队长都是连排长级的。其管理制度：由大队长和各班小队长负责，各科教员，均系济南市大专院校及各厅局的人员充任；也有青岛和大城市的专门学者，来所上班。无论谁，每点钟是1.25元的待遇，但他们下了班坐上洋车就走。长期住校的，还是大队长、小队长和杂职人员们。

其班级编制：民政厅的三个班为第一大队，财政厅的三个班为第二大队，建设厅的三个班为第三大队，教育厅的三个班为第四大队，秘书处的三个班为第五大队。

课程方面：在学科上，因各厅的要求而不同。在术科训练上，有军事操，有太极拳，有自行车训练，这些科目，各班却相同。临毕业期，还练习打靶，作实弹射击一次，夜间练习摸营等。

1935年招的第一期学员，资格限高中、后师毕业或大专毕业生，各班相同。考试时，由各厅组织考试委员会，外省也准报名，先审查资格和毕业后工作证件，合格后，再下通知书，准予参加定期考试。试卷均系密封卷，在批阅试卷时，有营私舞弊者，准予匿名揭发。对录取第一榜生，再由各厅长作一次面试，作为录取标准。当时我报考教育班时，第一榜是全省第四名，但考前的体检，八个项目中均是丙，经口试，正取生落到20名，算考上啦。

1936年第二期学员，不再招新生。办法是，由山东各县在职人员带薪学习，调谁谁来，不来的撤职，由第一期毕业学员分下去补充。

总之，这样的训练机关，既学文又学武，比过去前进一步，是韩复榘有意识地训练应付战时需要能摸枪打仗的。

在国民党时期，山东省从县长班到科局长班，都是各厅自办。这次行政人员训练，是各厅综合性的训练。

1936年山东设六个民众 教育辅导区

韩复榘主鲁时期，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将山东划为六个民教辅导区。原则上是两个专区设一个。山东省十二个专区，自然辅导区划为六个。计济南为第一辅导区，主任是董渭川；青州（益都）为第二辅导区，主任是杨希文；临清为第三辅导区，主任是杨象久；商河为第四辅导区，主任是吴级臣；第五泰安，主任屈凌汉；第六菏泽，其主任不详。

辅导区办公地点称办事处，其组织如下：每辅导区，设主任一人，总管本区民教一切事务。主任下，设辅导员三人，干事六人（以上系厅委），会计一人，事务一人，文书二人（由主任聘请）。民教辅导区，有权在另一专区所在地设分办事处，无论总办事处或分办事处，在附近农村，均设有民众教育实验区，派专职人员负责民教工作。临清第三民教辅导区先设在临清，后又在聊城（六专区）古楼南设分办事处。其两个地区，都设有农村民教实验区各一处。

总办事处内设有总务部、图书部、电影部（教育片），按时往各县出演电影作宣传。辅导主任有权召集两个专区的各县教育局长和民教辅导员开辅导会议。届时各辅导区的主任和山东教育厅厅长，都来参加。会期三至四天，在会上制订一些规章制度，交流经验，以利开展工作。

山东各民教辅导区主任，薪金每月 160 元，一等辅导员 100 元，二等 70 元，三等 60 元，干事 40 元。全省六个民教辅导区，刚成立一年多，到 1937 年芦沟桥一声炮响，遂告结束。各人员遂另奔抗日前程。

以上是我在临清三辅区一段记实。

有关济南齐鲁医院的资料

济南的齐鲁医院，是济南齐鲁大学的附属医院。齐鲁大学是美国用“庚款”办的，所以齐鲁医院也是一种教会医院。齐鲁大学，由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神学院等组成，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在各学院中，其他学院一般，而医学院独佳，它与上海的同济、北京的协和相媲美。

1935年，我在济南上学时，得了肠伤寒病，该病属于急性传染病。因此住上了齐鲁医院。住院条件是：①先找铺保，保证单上注明，本人死了户主不在，由铺保领尸，所欠药费，由铺保负担。②入院后，先交住院费20元。我刚一入院，由院夫役领着先洗澡（澡塘就在楼上病房里边），洗完澡，给穿上号衣，睡在床上，那床腿是带轮子的，能推动，我病重期，床不断移动，怕传染他人。床框上挂着三个木牌，一个是主治大夫美国人，一个是佐治大夫中国人，另一个是实习大夫（齐大医科毕业生）。每个病号都立有病历，病历是带格的，用红笔划线，注明病人每天体温升降度数。大夫诊前，护士先散病历，放在床的下端，不叫病人看，怕影响病人情绪。重病号每隔几天，由女护士二人，端着一盆热水，用毛巾肥皂浑身给擦洗一遍；重病号不会端碗，每天三顿，由女护士来喂饭。当时我吃的饭是每天三汁，即豆汁、藕粉汁、牛奶汁，每汁都掺有白糖，我不喝，护士不走，紧劝说，总得喝了这一碗，才算完成任务。我问她为什么不叫吃咸味？她说怕吃断你的肠子，你吃的是“无盐饭”。危险期过去，我的饭单又变啦，每顿吃的是馍、面条、牛肉、水豆腐，一直到病好，才叫出院。在住院期，每下午枕冰袋，据说，怕热伤大脑。只用饮食疗养，很少吃药。住院两个月，共花洋四十元。过去有人写齐鲁医院的材料，说外国人心肠多么毒辣，齐鲁医院大夫故意把病人治死，解

剖作试验，显然不真实。据说，肠伤寒危险性很大，是九死一生的病。济南有个高中生，肠伤寒住院，因偷吃咸花生仁，致肠穿孔出血而死。

我在住院期间，每天大夫和护士都作祈祷，上午时间一到，一人抚风琴，大家念诵主诗词，祈祷完了，再照顾病人，宗教色彩极其浓厚。

齐鲁医院也有缺点，每天晚上，大夫护士都回家休息，病房的值班人，仅留几个使役，听着病人动静。病人死了，用电话通知家属或铺保来领尸，将死尸装在活底木棺材内，由旁小门推出，尸抬走后，再把公棺材抽回来备用。

清末名医宋淮滨的医疗事迹

我村老人李清冷先生，在世时（土改时去世）常谈及他当年在兖州府考秀才的事。清例，投考者叫童生，保送人是廪生，叫廪保。他当时的廪保，是本县阎梦河，年已七十多岁，在兖州得了重病，暗中流泪，死在这里怎么办！清冷先生说，请先生看看再说。当时下县到兖州投考者，都是赁屋而居。清冷先生问房东：“兖州府有先生么？”房东说：“你算问巧啦！我有个表兄叫宋淮滨，他是行三，人都称他宋三先生，他是名医，兖州一带官府的病，净他看。”清冷先生说：“咱能请来吗？”房东说：“有我！”一会请来啦。他年八十有余，鹤发童颜，走路如青壮年。来到店里，说：“把病人架过来吧！”一诊脉，宋问：“病人是你的啥人？”答：“母舅。”宋说：“遇见我啦，不然，叫别人看，管叫你带灵柩家走。”开的处方是：甘草一两二钱，其余的药味，每样都是几分。开完处方，宋说：“您都看着吧！”李心里说：老糊涂啦！俺家里先生开单，甘草不过一二钱。当时他说：“我念你听听吧。”当念到甘草一两二钱时，放大声音。宋说：“以此为君，其余都是佐使。”清

冷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开完处方，把病人送到病房。宋先生说：“吃我的药，好是好，到半夜还得添点咳嗽。”到了第二天，又把宋请来啦，问病人吃药后怎样，病人说：“诸病皆去，就是添了点咳嗽。”“啥时候？”“半夜吧。”宋说：“我说的怎么样？对不对？”又改了改单，一付痊愈。

当时兖州知府，每三天给宋请一次安。宋在给阎梦河诊病时，外边开道锣响，知府坐着轿来啦！宋说：“正忙，我把他迎回去吧！”其医术见重于人如此。

当时赴兖州考的，有本县古柳树村王功臣。他王家青壮年多半是吐血病死的（遗传性），一直到解放后，还是如此。在宋给阎梦河诊病时，也叫宋给诊断一下。处方内有“真朱砂四钱”，王说我手中钱不多啦，宋说药不能换，你借着也得吃。吃了宋先生的药后，他的血症永没犯过，大概是人定胜天的道理。以后王功臣见了我村清冷先生，说：“这位宋先生真是名手。”

我村清冷先生问宋先生：“我家有位叔父，中指发肿。”宋说：“他一定好喝茶叶水，是急中风之兆，病在心脏（现在高血压症），无药可治，你回家可早作后事准备。”据清冷先生说，他老人家喝茶水，必须血红血红的。后来我村新娶媳妇，三天回门时，他去看，一头栽倒地上死啦。

宋先生说：“我看不好的病，京里御大夫也别想看好。”宋先生给人诊病时，先问吃过别人的药么，头一付药先纠正前药的错误，第二付再作正式治疗。

宋先生被请到北京与皇室贵族治病，他来时，翰林院里四驾翰林给合写一把扇子。当时他拿出来，叫清冷先看。其见重于人若此。

宋先生自我介绍说：“我家有地三十顷，我是行三，年到16岁时，给提亲事的很多，于是偷跑到了峰山（在山东邹县）寺院里依靠老和尚。老和尚也是名医，药书摆满了全屋书架，看病的人，

应接不暇，我在那里整天跟老和尚学医，看药书，学医三十年，和尚老啦，说淮滨换你吧，从此接上老和尚的班。

宋先生给清冷先生说：“我看你怪熟医学。例如中风分七路，分中嘴、中手、中足、中心……我把治法开给你，你家是大户，贴在《纲鉴》书皮上，有人得中风时，你就是名医先生。”因当时疏忽，没叫他开，以后见本村中风的人，后悔莫及。

宋之医学，可与本县的孟西园氏，前后相媲美。宋一生对人的保健工作，作出重大的贡献。

赞曰：长沙歿后圣道阻，先生医术足继武。年几弱冠峰山避，千金巨富东流付。寺中高僧称良医，孺子可教授素书。晦冥风雨三十载，皓皓神医一世无。

宋先生治疗验案很多，特录其阳谷部分。宋系哪里人，其籍贯不详，大概属于兖州府所辖县分。

（以上宋先生的治疗材料，都得自清冷先生之介绍。）

我所知道的聊城海源阁

满清时代，中国有四大藏书家：四川一家，江西一家（一说安徽），湖南一家，山东聊城一家。在四大藏书家中，聊城海源阁为第一。民国初年，会道门头子李太黑（沙镇人）占据聊城时，海源阁的书损失一部分；民国十年，土匪头子王金发占据聊城时，海源阁的书又损失一部分。因为时局不平静，杨氏后人把书运到聊城西南其乡庄子上一部分，再以后把书完全运到天津和济南保险的地方去啦。

1948年，人民解放军打聊城时，毛主席从延安拍来一个电报：“打开聊城，千万把海源阁的书籍保存好。”及打开聊城，海源阁的书一本也没有啦，杨氏后人也都不在家啦。

解放后进行土改，杨氏书籍，都归济南省图书馆及北京图书

馆保存，收归国有。

杨家大院在光岳楼西南数十步远。我早年往聊城时，从外边数了数，杨家院子共六排瓦房，大门南向。海源阁在后一排上，系一座楼式，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存放杨氏祖先的神主，“海源”二字，是取木本水源，不忘祖先的意思，下层才是杨家藏书的地方。

海源阁的书是怎样得来的呢？原来藏书的创始人，名叫杨以增，是一位文进士，很有才学，后来升任陕甘两省总督，治地二百顷，接着清皇帝委为运粮官（把南方征收的漕米，从运河里运到北方来，叫做河员大人，官职倒比省级大）。在这时，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专心收买古书，不惜金钱，有书就要，把社会上稀有的古书，都买到手中。据说，杨家海源阁的书，古人的手抄本也不少，蕴藏量极其丰富，唐朝文学家韩愈作《原道》的草稿，也被买到手中。但他的书不外传，聊城历史学家傅斯年，借过他的书，看了几本，再借就不给啦。聊城东街几家大书店，也想借他几部绝版书刻版印刷，付他一定的报酬，结果也未得允许。由此看来，杨家不过是一个守书奴而已。据说，杨家每年暑天晒书时，大门落锁，不准外人进院，他只落个藏书的名，其实他不看。我曾听老师（秀才）说过，杨家后代怕外人耻笑他有书不看，没学问，曾雇人专为之掀书，这样书页上揭过几遍，留有指印，就算他看过啦。

我听友人高铸九（阳谷人）说过，杨氏后裔杨少轩（高的朋友）解放前在济南住闲，因没钱花，两本手抄本卖了五千元，买主又一转手卖给另一家，得洋六千五百元，一转手赚了一千五百元。可见其书之珍贵。

解放后，杨家书院住了军区司令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家书院被拆完。人民政府成立后，有人建议在海源阁故址，立个纪念碑作为历史的见证，这亦未尝不可。

解放前聊城几家大书店

在满清科举时代，聊城古楼东大街有几家大书店，供应鲁西各县私塾学习用书，以至胶东各县用书也由书商贩运去。这几个书店，版本俱全，经史子集、星相医卜，应有尽有，聊城在过去有“山东文化城”之称。

书店名称如下：（一）书业德，（二）善成堂，（三）有益堂。这几家书店，以书业德版本最好，纸头好，刻画清楚，无一错字，所以价格也略高一些；其次是善成堂，印出来的书也不错；再其次是有益堂，印出来的书，常有讹字，所以销路也差些。

这几家书店，门外都立着通天招牌，以引人注意。其印书的木板，都是用枣、梨等木雕刻的。字型为宋体正楷。所用纸张，系毛边纸和南方竹纸，经久耐用。板写好后，再雇人刀刻。在封建社会，印刷事业是极困难的，也是不科学的。

军阀时期以至国民党时期，号召尊孔读经，中小学及大学，都聘请满清遗老、老秀才老举人，讲国文兼讲经学，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聊城几家书店的生意，还有可观。及共产党来啦，实行土改，农村的古籍，被搜出来烧了一部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除四旧，农村的古书，几于绝迹，现在想找一本古书看，却很困难。

以上几家书店，均系外省买卖，有陕西的，有山西的，有南方的。据说其印书的木刻板的存放，须十几间房屋。土改后，刻板和存的书籍，不知如何处理的。

（文中各篇除李子厚所写《韩冯密闻》外，其余均为李玉法所写。大题《齐鲁旧闻缀记》系编者所加。）

阳谷旧闻随笔

李玉法等

阳谷文公祠

阳谷县城大隅首西，约半里道北，有祠堂一座，那就是文公祠。1931—1933年，我在文庙上师范时，这座祠堂还在。祠堂瓦房三间，内塑文公神像，东西两边配房各三间，外围短墙，大门向正南。

文公即文颖，是满族旗人，文进士，与清室为宗亲，清咸丰年间被委为阳谷县知事。传说当他坐轿来阳谷上任时，想进东门，前站马先进去探视一下，回报东街正有一家叫收生婆接生的，认为不吉祥，于是文公命轿夫调转方向，改进南门。进了南门，认为没事，可巧有家出丧的，抬着棺材，孝子宾客，满头戴孝，白花一片，至此势难再回，命轿夫抬着进吧。旧例，新官上任，先拜大堂，文公一磕头又把缨帽磕掉了，真是一连串的不祥事件。这位文公上任才三天，紧接着捻军攻打阳谷城。县城失陷后，这位刚上任的文知事，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搬了把椅子，坐在大堂上，正襟危坐，神色不变。起义军一进衙门，知道是县知事，就一刀把他杀了。紧接着砸监狱，释放犯人，焚烧县衙门。据县志记载，阳谷旧县治在城内西南隅，以后县衙移至阳谷东街路北，是城南马家庙张家一处民宅，1933年时，里边还是一片土房，后来

才建筑一新。

这位文县知事死后，清政府为褒扬其尽节忠烈，为之立祠，叫做“文公祠”，并尊称他为“文太爷”。

其子赵尔巽（清翰林），任满清大臣，纂修清朝国史，官至东三省总督，次子赵尔震、赵尔丰，俱各居要职。当清末民初，赵尔巽在北京时，阳谷人赶考的去拜见赵尔巽，赵一见就问阳谷文公祠可还在，有一人答不知，赵一摆手请出。又一人见机生情，赵又问，这人答称文公祠刚修饰一新，马上往家写信，嘱咐把文公祠重修一下，配房里安上两班小学，照了张像片，寄往北京，赵尔巽一见大悦，结果这人当上了县长。以后阳谷东街李世恺常往北京找赵尔巽，赵见到非常亲近，留住半年，回家还送路费。

满族宗室本姓爱新觉罗，以后演变为金、文、赵等姓，所以文公姓文，儿子又都姓赵，父子不同姓。

史得名参加反清斗争的事迹

满清时期，洪秀全抗清于南方（俗称长毛反，因为都蓄发），捻军抗清于北方（俗称红头反，因为他们都头包红巾）。当时捻军有东捻军和西捻军之分，东捻军头目任化邦转战在山东登州、莱州一带，被叛徒杀害失败。西捻军头目张宗禹奔驰在山东的平原上，清廷派僧格林沁（旗人）围剿，该员为西捻军击毙（济宁的僧王府是他的总部）。

西捻军在阳谷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与清军斗争。据老人传言，安乐镇西南三里史家楼西头的史得名，家庭富有，他参加西捻军，有众数百人。当时他与其他友军联合，与清军战斗，立下了不朽功勋。他在起义之初，在史楼庄西路北小庙间，摆着一面铡，派人传令全村要人，不去的铡头，属于暴力革命。当时我村指名要去三人，有李清江、李清泽，另一人忘名。史与清军多

次战斗，失败被擒，临死不惧，就义于阿城北刘家楼。史牺牲后，其后人迁居到七级刘家楼去，从此，史家楼没有姓史的啦。

旧社会的监狱

在旧社会，人犯了法，官府判罪，分有期与无期两种徒刑。每天晚上睡觉时，犯人都得上大链，头和脚都得锁在两头大梁上，梁上头有铁环，臭虫咬，蚊子叮，不准翻身和抓痒。无期徒刑坐监长了，熬成链头，专管此事。

囚犯有固定的囚粮，吃不饱，家里送饭接济。死期犯人，在监狱里做针线活，凡鞋、袜、裤、褂都做，其活坚固结实，农民很乐意买。清末民初时，我村一个杀人犯在阳谷坐监判成无期，以后熬成链头，其母半月去拿一次。

在明清时代，阳谷旧县署在城内西南隅，清同治年间红头造反（捻军起义）时给烧啦，以后才把县府挪到大隅首东边来。1931年（民国二十年），我在阳谷上师范时，城西南隅之旧监狱院子仍在，墙头上遍插棘针，附近一位老人说，这就是旧监狱。这个清代旧县署被烧后，土有丈多高，面积有十多亩地大，国民党时期，上边遍栽洋槐，号曰“中山林”。事变后，阳谷汉奸大队长刘继春把土打成围子，深沟固垒以自卫。1945年阳谷县城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此地成立县社。

总之，旧时代监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不注意教育劳动改造，你要是向司衙（管犯人的）花几个钱，想把狱中的仇人治死，那是很容易的事。所以从清代至民初，阳谷几次失县城，造反队进城先砸监狱。民国七年失城后，监狱砸开，一个犯人肚里很饿，喝了南街一个卖豆沫的两碗，没钱还账，卖豆沫的要扒他的棉袄，以后这个人进城，先把卖豆沫的一枪打死啦。

历届旧官府陋规、赋税、徭役

在封建社会，满清末年一直到民初，县设大堂，台高四尺，后有屏风，旁有甬道以便上下，是县太爷问案子的地方。凡打官司者，都得跪倒在地，以便审问。如果犯人回答不当，县太爷把惊堂木一摔，说声“打”，站堂的衙役们，把大板抡起来，“一二三四五……”地喊着，接着再问，必须问出结果才完，这样有很多人屈打成招。问案时，县太爷在正座，旁边坐着一位文案师爷作口供记录，罪轻者罚，罪重者杀。案结后，其案卷一案一宗，叫作卷宗，存起来，备以后查考。这正是旧官府之陋规。

再说赋税吧。旧社会，每亩打粮不过一二百斤，除所上肥料钱外，所剩无几，还得向官府缴纳地亩税，每年是两季银子一季米，满清时代是交真银子（银元）真米，民国时代是按价折款。县府设有漕粮房，专管此事。交银米费时，县衙门墙外临街处，开有几个小窗户，哪几天收哪几个里分银米费是固定的。到时花户持预先发给的银米票据去交款，交足款，才给销账。阳谷旧时南北百里，北至朱老庄，南至寿张城南，寿张城南是阳谷的五区六区，阳谷本境是一、二、三、四区，共六个区。这种划法，是互相监督，怕人造反。其行政区划，全县分为若干里分，里有里长，县里有公事，先开里长会议，布置任务。旧政府时代，阳谷地有九千九百顷（老亩），三十六万人，一千零二个村庄。洼碱地除外，上级不要粮。农民把洼碱地上粪施肥能长苗啦，县府就迫令农民补粮升科，与好地一样完粮，省里不知道，这笔收入便归入县长私囊了。

提起徭役来，旧政府时代，不是官家运输物资，就是军阀内战拉军用品。省布置到县，县再分配到各里分。究竟阳谷县有多少个里分，无以查考，只知道俺这个里分，是四个自然村，里长

是俺村的地主。全县一千零二庄，其里分之多，可以类推。里有里长，省里有公事到县，县长开里长会议，如果要大车（骡马车），叫大官车，要小车（人推车），叫小官车。事后，县府按民夫出差天数，人的口粮和牲畜草料，都折款登价，爱面子的甲长如数下发，不爱面子的，就饱入私囊了。里分取消后，阳谷县划分几个区，区设区长，每区再划分几个乡，乡设乡长，其行政系统完全变了。

清末民初阳谷的城防驻军

清末民初，阳谷驻军系“后路巡防军”一个团。团长时永胜，字建勋，外号时大麻子。团部设在阳谷大隅首西范家祠堂内。那时一团三营共一千五百人，分驻在阿城、七级、安乐镇、张秋、沙土集、定水镇几个镇店上。安乐镇街上在完小东边修了一座长方形的营房，我在安乐镇完小上学时，经常听到过堂审匪的号叫声。驻军在各村的寨门上张贴布告：“照得本军驻防是境，职在剿除贼匪”云云。

北洋军阀时期，有陆军，也叫常备军，是管打大仗的，有巡防营，是下州县剿匪的。这位时团长，很会拉拢，很会使钱，在阳谷地主豪绅中结拜了七八名仁兄弟，以便有事时从中说项。这些士绅们为了显脸，在阳谷大隅首东路北为之立生祠，叫作时公祠。当时犯人里边，最重的是架户的土匪，被擒后多半是砍头或枪毙；其次是窝主、底线、说合人，架了户，按成分钱，这些人花钱可以买命，花不起钱的也是枪毙。时团长经这些把兄弟们说合，在阳谷使了不少的钱。头些年我与鄄城人谈话，问及时的情况，他说时家败人亡。

阳谷土匪和会道门活动

在旧社会，政治黑暗，剥削阶级当权，贫富不均，有一部分人遂起而为匪。那时官府当权者，只有剿除一法，别无弭盗之路。就阳谷来说，每年到麦季青纱帐起，土匪就猖狂起来，少有资产者，连门也不敢出。但土匪对待户主，也分时期而不同。民元至民国七年一段，土匪对被架户，尚不残害人命，经中间说合，交上钱就马上放回。民国七年后至七七事变时，土匪绑架人质以后，用铁丝系上两手，耳朵灌上蜡，捂住两眼，下在地窖里，白天“窝主”看守着，人想跑也跑不了，经中间人说合，钱交足，才把人放回。到日本进关后，时局混乱，土匪与汉奸混合在一起，匪徒们怕有后患，将所架之人，用绳子勒死，用盐腌起来，或者偷埋在地里，叫户主花钱买死的，更有甚者，土匪们生法破坟架死尸，移埋他处，叫户主花钱来赎。

当时军阀政府或国民党政府，只有剿杀一法。阳谷曾驻着一个时团长，叫时永胜，是鄄城县刘家寺人。带着巡防军一千五百人，团部设在阳谷城里，部队分驻在本县阿城、张秋、七级、安乐镇、定水镇、沙土集等几个大村镇街道上，拿着土匪及窝主或说合人，凡与土匪有沾连的，重者砍头，轻者罚款。国民党时，阳谷大队部队长陈广川，办着土匪过堂时，先打两杠子再问，因此外号“陈二杠子”。他杀土匪讲花样，什么油锅烹、大卸八块、白布裹身点天灯，以后又生法叫铁匠打铁钉，往城四门上钉，未及办，因有反映，就调到聊城去了，聊城的苏大队长调阳谷。

阳谷的会道门，从军阀时期到民国，直到解放初期，曾猖狂一时。其门类很多，有黄沙会、圣旨道、大同龙华会、忠孝团等，但都是烧香磕头吃法念咒，搞迷信一套。多系无知愚民，受有权势之人的哄弄，聚众作乱与政府作对。阳谷的黄沙会，门类也不

一，有耿家门，有关家门，但他们捉拿土匪不怕死，往往获胜，有与清末义和团相类之处。一贯道传道人称点传师，解放后，人民政府把他们教育一番作了结，其点传师，只判徒刑一两年。圣旨道不吃葱不吃蒜不吃肉，女子有终身不嫁者。大同龙华会，系有组织的反动武装会道门，阳谷阎楼有几个人受委为河北大元帅，身藏武器，或替人当打手，或杀人害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枪决。阳谷的忠孝团首领，是安乐镇丁家庄刘清泉、刘清渭、刘清岚兄弟三人和方外其他人等组织而成的，也是很反动的会道门组织，他们有做官当老爷的野心。当时山东省国民党主席沈鸿烈住张秋镇，他的部下民政厅长李树春住安乐镇，李与刘清岚交往很厚。聊城专员兼司令范筑先将军与共产党合作积极抗日，不走沈鸿烈的道路，于是沈李借会道门之势力以除范。沈讯知，鬼子集合部队快攻聊城，便在安乐镇与红枪会打了打气，于是忠孝团暴动起来，攻打阳谷城，聊城自然派支队去平乱。聊城空虚，鬼子数万人配合伪军从东阿鱼山搭浮桥过黄河攻聊城，这时聊城外无援军，守军仅有几百支枪，弹尽援绝，范专员遂告牺牲。

阳谷妇女之天足运动

旧政府，中华民国时代，阳谷县党部开始成立放足会，由王瑞集（阳谷南街人）率领，拉着大车，车上插着青天白日旗，车上坐着几个天足的女学生，下乡宣传放足的好处，这不过起着启蒙作用，效果并不大。

只有1949年，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妇女才宣告解放。阳谷自不例外，已缠足的中年妇女开始放足，一般幼女没有再缠足的啦。农忙时中青年妇女下地从事田间劳动，男劳力能办的事，妇女都能办，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寿张南台事件

原寿张县城东南隅城墙里有块土台，面积方圆不过两间屋子大，地方人叫作南台，河南省的台前县即根据这命名的。

寿张县有个大地主名薛殿魁(外号薛大牙)，办起了地主武装，是由原寿张十三个民团拼凑而成的，人数五百余人。在装备上一色钢枪，士兵一律军服，按营、连、排编制；在供应上，官兵按月发饷。他们都不事农业生产，这项军需，上级不管，还是出在寿张老百姓身上，按季随粮带征。这实际加重了寿张人民负担，人民敢怒不敢言，连历任的寿张县长，也无可奈何。

1928年(民国十七年)，蒋介石北伐，统一全中国，随后各县成立了县党部。寿张的县党部，认为剿除贼匪，国家自有巡防营管理，如再成立地方武装，徒加重人民负担，有动于衷，决心为民请命，于是纠合农村红枪会千余人屯聚郊区，县党部指挥部设南台。薛殿魁也调动民团屯集城外。这时寿张县的建设局长申笑(阳谷安乐镇刘庄人，国民党员)出面调停，他到薛殿魁那边，就说：“县党部净些小屁孩子，胡治八治。”到党部这边就说：“薛殿魁大老粗，无故科敛民家，罪大恶极。”这样一激，两边干起来啦，结果双方都有伤亡，党部这边，有三个党员被打死，被狗食尽。究竟党部和民团都是本县人，两边经人一透气，才知是申笑有意挑拨看热闹。于是两边想捉拿申笑以泄恨。申笑为人很机警，见事不妙，夜里跳城墙泗城壕里水跑啦。

经过这一大的事故，寿张县党部往济南去告状，省来电指示，把薛殿魁押解来省。省党部在大街上贴标语喊口号，要求枪毙薛殿魁。薛殿魁有钱有势，上边有人，判了几年徒刑了事。而寿张县的人民负担却减轻啦。

荣旅清乡

1935年日本侵略军加紧扶植汉奸进行活动，勒令冀察政委会派大汉奸殷汝耕将冀东各县划为防共自治区，把国民党军队编为保安队，作为华北特殊化的试验区。另一方面，日寇通令华北五省行政官吏配合军队到地方上清乡，为日本占领华北鸣锣开道，扫清道路。韩复榘派荣光兴到鲁西清乡。史占一团长和阳谷县长杨霁峰对穷苦的老百姓下了毒手，他们在东大寺大广场上高搭戏台，召开全乡保甲长会议，令保长甲长签名划押写出保证清匪的保证书，要清除犯八大款的罪人，写出歹人的姓名。什么是犯八大款的罪人呢？通匪、窝匪、底线（与土匪勾连通信的）、土匪、吸老海、卖老海、贩运老海，给他讲买卖的八种人都是犯八大款的歹人——罪人，清出来就枪毙。

大会开过后，军警下乡清乡，全县外逃的穷苦老百姓成千上万，人心惶惶，国无宁日，社会秩序紊乱得不可收拾。在当时，有钱的大烟鬼，凡资本家大地主的老太爷吸老海不算犯罪，偷偷地给地主官僚送大烟行贿的也不算犯八大款的，要抓的就是穷人。像熊仲甫的老太爷熊四先生吸大烟，谁敢说他犯八大款呢？

那时候，在阳谷东街抓了王世范、布有余，还有王世范的老母亲，南街于保元、孟继怀也被抓去了。监狱里大有人满为患之势。在那一段时间里，成群地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一次十人、二十人、三十人不等，王世范、布有余、于保元、孟继怀都是那时候枪毙的。王世范的娘押死在监狱里。这些人多是无地民、赤贫农，没吃的，偷卖大烟老海，做点小买卖，为了吃饭，饿的没门路。没被抓获的，杨迷糊张贴布告下了通缉令，连老贫农理发员马来巧、无地民李金法也登上了通缉令，像这样的多得很。所谓荣旅清乡，害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啊！

梁漱溟乡建运动在阳谷的影响

梁漱溟由菏泽六中校长王鸿一引荐来山东后，逐渐得到山东主席韩复榘的信任，先在鲁西南菏泽、郛城、济宁等县做试验，叫作实验县，推行乡农学校，以后推行全省。

当时阳谷县各区的乡农学校普遍设立起来。每区设乡校一处，校长一人（必须乡建院毕业的），下设佐治人员若干人。规定地富每五十亩地出一颗钢枪，没枪的买枪，枪弄了还不要，户主非常为难。地多的多出枪，地多人少的允许雇人代替。由部队退伍兵做教练员，三个月毕业，如此轮流下去，叫做“训练兵”。依梁的意见，这样全国皆兵，可以抵挡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强盛起来。其实这种办法很幻想。当时韩复榘的各厅厅长很反对，说“梁的办法是祸国殃民，训练的兵可一拳打倒一个”。独韩主席很信任，说：“鲁西南黄河决口，乡校学生去救灾，很能吃苦，我是不是迷信呢？”以上是我在政训所上学时听到的。乡农学校推行了几年，其结果是劳民伤财，以失败而告终。

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

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都实行保甲制度。其具体办法是：对每一村户籍男女人口年龄，由村保长逐户登记报上，全村的情况，掌握在他们手中。若干家编为一甲，若干甲编为一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对人民实行层层管制。保甲制度，是宋朝王安石试行新法时创立的，他的用意想变弱宋为强国，当时朝中大臣范仲淹、欧阳修、苏洵等人群起反对，结果终至祸宋。国民党之实行保甲制度，其目的是严防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如果某甲某保出现了共产党，其保甲长必须上报政府，否则重究。

日伪统治时期，是每村为一保，保有保长，每十户为一甲，甲有甲长，村上如果出现了抗日的八路军，保甲长必须立即上报伪区乡公所，不得隐瞒。再就是日伪所需钱粮，由伪保甲长负责征敛送交伪乡公所，以供应伪区乡大小汉奸们的食需和薪饷。如果要兵，也由伪保甲长花钱雇用本村的壮丁当公事。

阳谷的移民及传说

阳谷的人，据族谱记载，大多数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安家落户的。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鲁西阳谷一带被杀得路绝人稀，路上丢元宝也没人拾，山西多山，地势险要，战争势力达不到，人口没啥损失，所以朱洪武登基以后，下令从山西往山东鲁西一带大量移民，至今洪洞县移民故址尚有碑文竖立着保存良好。前几十年阳谷南街罗明斋先生在山西工作，把洪洞移民古迹照了几张大像寄回家中。但明初移民从别省迁到阳谷来的也有。在土改时我李姓从山西迁来的始祖碑被砸烂烧成石灰啦，所谓“数典而忘其祖”者耶！

解放前农民闯关东下山西的资料

旧社会所谓关东，指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过去农民系单干，一切行动比较自由，无户口的限制。关东三省，奉天农业与农民生活与关里差不多，只有吉林、黑龙江省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劳力比较宝贵，在那里租地种，每人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吉林煤矿也不少，如果能参加上下井，收入更大。黑龙江省情况与吉林少有些差别，那里煤矿多，农业亦相当发达，到那里干啥，都有相当收入。阳谷县的农民在关东落户干活的至今还很多。

山西省简称晋，春秋时属晋国地，东面多关塞，西临黄河与陕西分界，中贯汾河，地势险要，土地肥沃，人口密度不大，外人到此，容易落户谋生。阳谷人往关外者不少，下山西者也不少。据说山西女多男少，阳谷人在山西作赘婿者也有的是。尤其晋南曲沃、侯马一带，阳谷人较多，甚至终身落户不回来的，也所在多有。另外晋北部大同一带，阳谷人在此安家落户的也不少，因为山西收入好，生活路宽，所以在解放前，人民生活困难的，不得不携眷下山西以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

解放后，以上情况有所变更，下山西的逐渐减少，闯关东的渐增。原因是山西的资源不及东北，国家有计划地开发东北，建设东北。

1942 年大灾荒

1942 年正值日军侵华猖狂时期，我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奋起抗战。这时又来了天灾，长年不下雨，庄稼种不上。这一年鲁西各县都闹旱灾，但以堂邑县为最甚，成为鲁西大旱区的中心，又加汉奸盘处地面，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起初人尚麻痹，误认为还有不下雨之天，不料季节已过，还是不下雨，人始惊慌起来。于是“壮者散而之四方”，有下关外的，有逃往黄河南谋生的，也有下山西的；“老弱转乎沟壑”，他们走不动跑不远，只得到附近县份去要饭，光阳谷县境内就为数不少。这年阳谷也是旱区，仅落了几寸雨，庄稼不到半收，就是给他点也不多。灾民在集市上拾花生皮吃，捋树叶吃，光我村（安乐镇袁庄）就埋着死的妇女三人。这时逃荒的壮丁，回家拆房子，把檩梁和衣服、缸子、茶壶等都运出来，在阳谷随路子卖，换粮食；也有拿钱回家，买些木料和家具等，做生意以维持生活的。我问过灾民。你家乡啥样的？他说：“除了大富户没动，一般户都出来啦。”我又问：地里啥样

的？他说：“一片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真是到了“白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地啦。这年有几十辆手推车，上边满载红粮，我问从哪里运来的，他们说，从黄河崖，是王七大人往馆陶县放赈的，我问多少石，他们说七百石（约四万多斤）。看来是军阀怀桑梓之情，发放的救济。这年我在村东头路口一座北屋里教小学，灾民的小车都从这里过，他们将卖不完的东西，推往黄河南去卖。目睹此情景，当时我写过一篇“鲁西灾民回忆录”，游击区长武仲景同志，夜里到小学，他看了看说，请你把它写完，越详细越好。可惜原稿已失。这一年堂邑的青年妇女，嫁到阳谷的也不少。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人民重见天日，鲁西各县普庆丰收。解放战争开始，人民政府号召大参军，堂邑的青壮年也纷纷响应号召，有新战士身着戎装，头戴五星帽徽，来阳谷区部要他的爱人，区长只好动员其回家，过团圆生活。

1942年大灾荒对我县的影响

1942年，鲁西一带是个大旱年，加汉奸为虐，随路抢劫，天灾人祸，祸不单行。而我阳谷县也仅下过两场小雨，庄稼只有半收，人饿得东倒西歪，连走路的劲都没有。这时日伪在阳谷遍设据点，势甚猖狂，敌强我弱，我抗日游击队，仅能打游击，势力达不到农村，无暇顾及当时的旱情。那时人的思想意识低落，对抗旱打井并无认识，没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只有靠天等雨思想。如能及时打井或引河水灌田，生产定能前进一步，人民生活不至如此困难。四二年大灾荒以堂邑为中心，其他县分次之，我阳谷为最轻。堂邑有眼光的人，一看过期不下雨，季节已过，拉着大车带着家眷，路经我村，往黄河南逃荒走了。也有下关外的，下山西的。只有那些走不远跑不动的老幼妇孺，留落在阳谷卖苦力，农忙时给人做些零活，以维持个人生活，青年妇女也有与人做些针

线活的。到第二年下了透雨，年成好转，都各自回家啦，逃荒外地谋生的人，也都回原籍种地去啦。以上情况，述不胜述，无非是天灾与人祸造成的。

旧时代的盐店

在解放前，大盐称官盐。公家把大盐运到黄河崖上，阳谷县安乐镇、七级、阿城、沙土集、定水镇、郭店屯……等各乡镇都有盐店，推销官盐，目的是增加国家税收。县与省都设有盐政局，专管此事。如乡镇盐店出现了事故，由上级给撑腰。

海盐运到黄河崖，各盐店都雇大车去河崖上装运。所雇的大车，在中途也是偷扒盐，所以每辆车上都有押车人监视着。海盐过秤时，都是老秤，每斤足够十八两，到盐店出卖时，他却用小秤发出。本来卖多少盐，上级还给以固定利润，各街镇盐店，却克扣买户，所以常发生斗殴事件，店门上有人偷抹大粪或写黑帖子骂。

小盐生产和盐民的斗争

在旧社会，人民生活困难，为了糊口，贫民只得把旧墙根土或盐碱地的土扫下，回家淋成咸水，再倾到盐池子里，经太阳一晒，即结晶成为小盐，有好的小盐，赛过大盐。但是旧政府时代，为了保证官盐的出售，公家却豢养着一批盐巡（叫巡役），下乡专查私盐，如卖小盐的被盐巡查着，即被带走送到官家押起来，经过罚款才释放。所以盐民常与盐巡发生斗殴和流血事件。

在解放前，阳谷县因肥料不足，弄成地瘠民贫，因此，出现了不少的盐碱地，贫民揭借无门，只靠此作为一项糊口收入。尤其本县西北一带地区，出现了不少的盐碱地，贫民借此作为一项

财富收入，谁家要是积存一囤小盐，生活上可以有恃而无恐。

阿城意诚斋、洪盛斋酱园

解放前，阿城街有两家出名的酱园，一是意诚斋，一是洪盛斋。意诚斋是夏家口的买卖，在阿城剪子股街路南；洪盛斋是阿城南街杨拔贡家的买卖，在阿城剪子股街路西。这两家的酱园，其小菜和酱油醋酒等，在本县来说，都是很有名声的。所雇用的腌菜师傅，都是有名的能手，一待几十年，别家酱油是黑红色的，而意诚斋的酱油是白色的，这里边有他祖传之秘。因此，这两家的买卖不但在本县销售旺，而且波及到东阿等附近各县。这两家黄酒、酱油每几斤都用一个扁磁缸盛着，豆腐乳用小瓦罐盛着，龙须菜及各种小菜都用条编油纸篓盛着。豆腐干下锅不烂。货真价实，从不二价，既卫生，又可口，所以名扬一时。本县各村杂货铺，都往阿城两家酱园去打货，很受户主欢迎。有人评论，阿城街咸菜，不亚于济宁州的玉堂，并非过奖之言。

阳谷乌枣之制作

枣树是生长在我国北方山东一带的果木，过去各村旁枣树成行。耕地里栽上枣树，也不误长庄稼，原因是枣扎根少，不拔地，而且叶也稀少。

阳谷过去以产枣著名，树上枣一红，各村农民买好树疙瘩准备立窑子烧枣。其制法是：凡准备烧枣的，先盖好敞棚，敞棚里往下掘五尺的深坑，坑沿上再放上檩条作架子，在架子上边，铺上箔片；把红枣用大锅煮半熟，即下上黑烟料，摊在箔上，下边点燃木头疙瘩熏烤，烤一遍后，再取出晾一晾，如此三遍，即成乌枣，也叫“胶枣”。

到出卖时，有的南方枣客来，批下合同，预付定金，枣成后，按枣的成色定价付钱。也有的自己立窑子烧枣的。然后运往江苏省的上海、无锡、镇江一带去卖。乌枣到江南，把枣包存入行人那里，因北方去的枣太多，价格不固定，有时涨，有时落，赶着涨价卖出的可以挣钱，赶着落价卖出的不挣钱，甚至赔钱。俗话说：“熏黑熏黑，十年九得。”阳谷罗家海（编者按：今属范海乡）张清泉先生，年年烧枣，一烧几百包，另外，还有给别人代销代卖的百多包。此人系正派农民，到江南不嫖娼、不宿妓，行里也看得起他，卖了枣，带回竹杪子，扎扫帚，又赚一部分钱。他年年烧枣，年年挣钱，从枣上获利发了家。

枣极富营养，健脾胃，补益性大，可与生姜伍用入药。有枣吃人饿不死，可以度荒年。近年来，人民为了扩充住宅，枣树损坏的不少，再就是老枣树，结枣也小啦。1986年，我见还有买树疙瘩烧枣的。年底，干红枣每斤卖一元多。

旧时城镇金汁业（挖粪）者的组织活动

旧社会城镇的金汁业者，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有组织的。小城市（县城或乡镇）的居民，少地或无地，多以经商为主，做小商小贩，厕所的人粪，尽行出卖。操金汁业者，买了粪后，到家再加一次工，即粪的外皮掺些灰土坑泥作包皮，真粪包在里头，俗话说“卖大粪的心好”。出卖时，装在粪篓里，推着往农村出卖。但是操这一行的，也有组织，农村户主想买粪，也得先找他们的头目人联系，由他去叫人，一来几十辆，或百多辆，进村后，再由行人（粪经纪）用锨把粪打开，评价出卖，行人从中抽佣钱，这是一种。

另一种是省城，如济南，操这一行的有组织有领导，大城市的粪不要钱，白送人，他们把粪运到郊区，也是掺灰掺土，用水

和后，再用铁勺挖成粪饼，晒干后，城附近的户主或菜园，拉大车去买。

又一种是京城，如北京。人口密集，操金汁业者，有特大权力，号称“粪阀”。向住户和机关挖粪，不但不要钱，还须倒给他们钱。有一次，挖粪工人在大街上走，臭气薰人，北京市公安局下令，凡首都操金汁业者，粪篓上必须加个盖盖上，于是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他们组织同业数千人，背着粪篓，手拿粪钎，在大街游行示威，声明誓死不再干这一行。几天以后，北京市臭的招不着人啦，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又向他们赔礼道歉，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安乐镇铁丝篆碑之两次出土及其年代

1921年春，安乐镇东北一里肖庄，有农民在庄南挖坑泥，挖到深处，发现一座古碑，碑身高约4尺，有底坐，无碑帽，系秃头碑，碑身石质坚硬有光泽，碑文题为《悦性亭铭》，下署名“申恪文”。时间是宋朝淳化年间（宋太宗的年号）。字体系大篆，笔划圆如铁丝，故名铁丝篆。当时安乐镇小学设在庄严寺内，校长李瞻太先生，系清朝廪生秀才，善书法，爱字画，即时令人抬至寺内屋檐下立好保存。后来垂出字帖寄到北京，经名家评赏，认为这碑是全国有数的名碑，随即传闻到各地方去。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也曾为这碑作记述，云“此碑在安乐镇小学内保存”。

七七事变起，学校停办，在鬼子未来前，本地士绅申鸿渐先生命人把碑埋在庄严寺前之戏楼旁。申先生早已去世多年，庄严寺已倾颓，戏楼已拆除，正苦无寻处，不料于1987年，在安镇联校南数十步的墙下，被小孩掘出来，地点正在戏楼旁，但碑座已无，恐埋于他处。此碑于87年被县文化馆运去保存。

阳谷城内黄巢起义史迹的发现

1953年间，阳谷县府在从北门往东南大路南边，修建了一座图书馆（或体育馆）。泥水工人粉石灰时，挖了一个深数尺的土坑，发现内有数百个人头，坑底并埋一块一尺见方的大八砖，上刻：“乾符年间，获贼数百名，遂枭首于此”云，砖上的字道，并用银朱涂抹，清晰可辨。经阳谷中学教师按年号考查史书，断定是唐末统治阶级杀的黄巢的人。

阳谷文庙对联

大约民国年间，阳谷文庙门前有两棵大柏树，叫县长卖了，有人说县官为他母亲做寿木了。为此阳谷城内的人民十分气愤，士绅名流更为气愤，敢怒不敢言，于是他们以孔老夫子的口气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文庙上：

杨子为我不敢动树一毛，

墨子兼爱竟敢盗树折节。

联语谐音双关，化用《孟子》上的典故：“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一任县长姓杨，大概是杨霁峰。“墨子”也可直指县官的姓，具体不记得了。

讽刺功名迷

民国革命成功，废除科举制，兴办洋学堂。这时一部分守旧分子觉得自己满腹经纶无用处，一心想求个秀才，不准考了，甚为惋惜，想方设法求个功名，央求县官给个名号；也是他们自己

独出心裁，不叫“秀才”叫“佾生”，几十吊钱捐一个“佾生”。当时阳谷城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

佾生进文庙，夫子莞尔笑。子路愠现曰：这算哪一道（套）！颜回开了腔，连说妙妙妙。冉求拍手笑，连说时运到，我是聚敛臣，闹他几十吊，黑狗吃黄屎，各物有所好……（记不清了）这回你中了，挠茄——

注：据《词源》，佾生为佾舞生的省称，也叫乐舞生。旧时孔庙中祭祀时的乐舞人员，由童生担任。清制，各省府州县佾舞生，额设三十六名，外加四名，以备补缺。冉求聚敛，见《论语·先进第十一》：“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挠茄，是牲口经纪人的黑话“六十吊”。牲口经纪人为了迷惑买卖双方，用黑话讨价还价。各数都有个各称。如“爷俩去赶集”一百一（一大一小），“两拐”是五五、五十五或五百五。

七级的两个坑

七级的两个坑，一个是东阿饮马坑，一个是金马驹子坑。

七级镇为运河漕运码头，清末设有三厂，即阳谷厂、东阿厂、莘县厂，三县所征收的皇粮都是在此装船运往北京。传说当时七级镇有个姓翟的绅士前往东阿赶会，乘机拜谒县知事，可是县知事未理，因而翟绅士大怒，回来后不再让东阿县送皇粮的牲口饮水，东阿县无法，只好花钱买了一个饮马坑。东阿饮马坑因此而得名，现在七级东门外。

金马驹子坑在运河东岸，七级镇小西门里北边。传说，每逢大年五更时，有匹马到坑里去喝水，等它喝完水去牵，此马就不见了。当地群众以之为奇，称其为金马驹子，此坑因此得名。

（文中各篇除李子厚所写《荣旅清乡》，张兆月所写《阳谷文庙对联》、《讽刺功名迷》，田明远所写《七级两个坑》外，其余均为李玉法于1984—1987年所写。大题《阳谷旧闻随笔》系编者所加。）

鲜为人知的去思碑

段延平 段延世

去思碑是古时颂扬和纪念居官清正或为民众办好事的人物所立的碑碣，民国初年阳谷还在沿用这种形式。我县的去思碑多立于紫石街路北火神庙西侧，即文昌阁的后边（明、清改为县前街，即现南街县酒厂、纸厂和机械厂的東西路北粮局家属院东北角）。其中有一块是赞颂北洋陆军杜凤举旅长部下的一位营长的，可惜碑碣已毁，这位营长的姓名籍贯记不清了，但他救残济贫的善举尚在记忆，现记述如下。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旧部陆军少将旅长杜凤举驻防阳谷。后旅部移防，因地方动乱，留一个营继续驻阳谷，协助剿匪治安。该营营长是一位为人正直忠国爱民的军官。办案期间他本着好人不过，匪徒恶霸必除的原则，对官府贪赃卖法的行为提出警告严加制止，使一些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官员不敢轻举妄动。一次他发现劣绅又是黑刀辈的张某对孤苦的犯人家属敲诈勒索，便亲自找上门追问，立逼退赃倒款，交归原主，从而解救了犯人家属的苦难。平时他不吃请，不收礼，不喝兵血，不沾地方分文。他公正清廉的行为得到阳谷群众的称赞。但是他在处理抢劫发财的罪犯、一贯欺压善良讹诈乡邻的劣绅富户时却力主重罚，罚款的标准是：不义之财全部没收，原有财产酌情加罚，惯犯加重，初犯从轻，以保留受罚户谋生条件为限。据统计，共罚款一万七千多吊铜钱（一吊为一千文），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这位营长对每次罚款的姓名、年龄、籍贯、案由、时间、数

额及经办人员等情况均登记入册，归档备查。当时有些人对他的做法不满，怀疑他吞款肥私。可是大家没想到这位营长离阳谷时，他竟把阳谷的名流士绅、社会贤达、商会会长、地方官员请到营部，说明要把全部罚款交归地方，用作发展工商业，扩本生息，以资赈灾济贫，救济残疾和鳏寡孤独。与会者深受感动，无限敬佩，于是大家自动备酒设宴代表阳谷民众表示谢忱。临别，城关民众送行数里，彼此依恋之情十分感人。

营长去后，受托的知名人士慎重商讨，可是反复研究再三斟酌，总觉得阳谷交通不便，原来工商业落后，暂时难以选拔富有经验理此巨款的干才。物色了几位都不敢承担，后来段金芳先生推荐莱州府掖县的工商能手徐珍先生。此时徐已受聘于河北省大名府经办工商多年，我县特派徐的好友前往聘任。幸好徐公在大名、邯郸已培养了得力助手，能够接替他。

徐珍来阳谷后，根据当地的土特产和商业、手工业现实情况，提出如下建议：

（一）首先利用当地和邻县妇幼掐辫子的特长和用之不尽的麦荳原料，开设辫行，发动鲁西各县妇女掐辫子，这是利公利私的家庭副业。同时徐和上海、济南铁路局取得联系，解决及时运输问题，从而利用行情获得高利润。

（二）扩建阿胶厂，打开南洋群岛（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销路。他认为经营阿胶是得天独厚的工业，外地无力竞争，能够永兴不衰。

（三）根据鲁西盛产绿豆，建议开办大型粉坊，聘请外地技师制造粉丝，和上海建立运销关系，争取远销亚、美、拉。

（四）开设银号印制一、二、五吊的纸币，实行商业高息、贫苦低利的借贷，大力扶持小商贩和农夫，进而繁华市场控制金融，防止因动乱官币作废，引起工商倒闭。

另外又提出了任用掌柜（经理）、店员，吸收学徒，货品定级

与验收，帐项管理，开支规定，伙食标准，职数管理等一系列的严谨可行的经营措施。

大家认为徐珍提出的方案，是扩本生息繁荣阳谷的良策，于是一致赞同立即行事。因当时即将麦收，决议首先在西街小隅首南路西（即邮政局家属院南部）开设辫行。发动妇幼掐辫，并做好收购准备。待赢利后立即研究救济办法，设立民众性的赈灾机构。阳谷和邻县的妇女闻信后，争先备料赶掐草辫，很多群众交货后，得到可观的收入，妇女们喜笑颜开。

草辫运往上海后，赶上货源奇缺售价暴涨的良机。经办人喜出望外。可惜万万没想到货物刚刚运抵，上海发生了战乱兵劫，草辫被抢掠一空。理事人愁眉苦脸，徐珍难过非常，并为此大病一场，久卧不起。但是阳谷民众对徐珍的谋划和操劳仍是感谢不已，对那位两袖清风的营长感戴不忘，为了表示颂扬和怀念之意，特立去思碑，碑上除了撰写营长的功德，也述说了徐珍的高明谋略。

事后徐珍认为自己愧对阳谷，要离谷返乡，可是群众觉得徐先生为地方呕心沥血，贡献不小，再三挽留，请他定居阳谷，并筹集资本助其经商谋生。盛情难却，徐珍就寄居阳谷西街了。

1987年11月

“胡万岭发丧——不是小闹”的来历

杨元一

在我们方圆几十里，每每提起胡万岭，没有不知道的。特别是胡万岭发丧一事，更是家喻户晓，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胡万岭发丧不是小闹（也有说胡万岭发丧不是小乾坤，胡万岭发丧不是小玩艺）。确实不假，胡万岭发丧时的丧局大得令人吃惊。据说发丧时，他家里专门雇了几个花钱能手，同时对这几个人说，怎样能把银子花出去，就怎么办。具体花了多少银子，多得也无统计了。

胡万岭发丧期间，方圆四五里的人都盖锅到他家吃饭。若是随礼的，不论是什么地方的人，也不论是随礼多少，即使拿着几张草纸（一种给死人烧的纸，通常被迷信的人称为阴间的钱，故也称作纸钱），也可以领到一张纸条，到开饭的时候，便可以凭条入席吃饭。

有这么多的人吃饭，究竟买了多少东西呢？别的不说，就说光买猪一项吧：

凡是卖猪的，都卖给他家。价钱卖主说多少就是多少，并且都是现钱交易。在胡楼村后一条围子壕，当时就买了整整一壕猪。猪买的多了，浪费的当然也就多了。有的猪肉煮得不烂或烂得很了，就都倒进了猪圈或粪坑，弄得满村猪圈粪坑里都是肉了。有一夜，由于佣人疲劳过度，忘了锅里煮的肉，竟煮坏了八头猪。当时调料花椒用了一担二多。

从胡万岭家到墓地，一律用绸子布搭的寿棚。棚内挂有灰蓝

色的幛子。幛子上写着挽联，大部分是恭维胡万岭的话。出殡时，既有吹响器的，也有打架鼓的、放铁炮的等等，凡是丧事上的一切东西都有了。胡万岭的棺材一律用上等木材制成的，又油了约有三四寸的好漆，非常结实，致使文革期间用尖尖的洋镐也很难掘开。

胡万岭发丧用了一个多月，丧局之大是空前的，所花费的银子也是空前的。他搞这么大的丧局，花了这么多的钱财，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原来胡万岭是一个大地主，关于他的发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他家中有很多土地，约有几百亩。他将地的一部分租给别人耕种，通过收取地租的形式来致富。这种发家的方式也是封建社会里农民受苦地主致富的根源。他又将土地的另一部分雇人耕种。有一年，他家种了几十亩粟子，当时由于老百姓穷苦，饿得实在撑不住了，便将胡万岭家的粟子穗偷着吃啦，只剩下粟子秸杆。胡万岭听家人报告此事后，来到地里，非常气愤，但他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地主还算是比较同情穷苦人的，并没有因此对穷老百姓采取惩罚措施，只是赌着气对他家的长工说：“剩下的粟子秸杆也要轧，一定要打下粟子来！”当时长工们都感到很奇怪，又觉得可笑，以为胡万岭给气糊涂了。但由于身为佣人不敢反驳，只好依照吩咐去做。到此怪事也出现了，只见顺着石碾眼向外流粟粒。等挑开粟秸后，显露出厚厚的一层粟粒。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以为是神灵在帮助胡万岭。过后一称量，比往年收的粟子还多好几倍。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不妨把它作为胡万岭发家的一份材料来存阅。

别看胡万岭是个封建地主，但他经商还是比较有一套的，他的发家也是同这密不可分的。他主要搞的买卖就是贩运珠玉宝器。但他搞这些买卖并不是亲自动手，而是雇人办理。具体方法是这样的：买卖的本钱是由胡万岭所出，被雇人拿着这些资金去贩卖

物品。挣钱了，按一定的百分利润提取给被雇人，被雇人所得的只是微少的一部分，勉强可以糊口度日，大部分利润还是归胡万岭；赔钱时，不但不给被雇人钱，反叫被雇人包赔一切经济损失。他的这种经营方式就充分暴露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的本质。他的买卖搞得也相当大的，连济南都有他的珠宝店。

胡万岭不但有经济头脑，而且文化素养也比较深，他曾经是清朝的“文（编者按：应为武）进士”。关于这个进士，在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呢：

胡万岭在北京考进士时，在北京城遇见一位相面的先生。每逢胡万岭走过其面前时，相面先生总要慌忙站起，向他鞠躬，然后垂手而立，直至胡万岭过去后方才恢复原状。天天如此，日日这样，胡万岭甚感疑惑，决心要问一下原因。有一天，胡万岭又经过相面先生面前时，相面先生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胡万岭赶忙向前一步问：“先生！你为何对我这样恭维呢？”相面先生回答说：“您是富贵之人，我怎敢对您失礼呢？”胡万岭又问：“何以见得？”相面先生又答道：“从您的五官上便可看出，您以后的官运，无止无休！但不知您是哪里的人？”胡万岭说自己家住在山东阳谷。相面先生听后，一下子坐下了，对胡万岭的态度也没有先前那么恭维了。胡万岭又觉奇怪，便问原因。相面先生告诉胡万岭说：“只可惜你长了个富贵相却没有生在富贵之乡。山东阳谷既不靠山也不傍水，你的富贵离了山水是无法实现的。你将来顶大也只能是个进士而已！”果然，胡万岭到死也只是个清朝的进士。

胡万岭虽然这样有权有势，但他却很少欺压周围的穷苦人，因此在方圆几十里的名声也是比较好的，也算得上一位比较开明的封建地主。

就在胡万岭八十多岁时，他为了使自己的家业永存，便又娶了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做了四房姨太太。他死后，四姨太便掌握

了他家的财政大权。虽然四姨太很年轻，但每逢有文武官员路过此处时，都要拜访一下她，因为她是堂堂正正的胡万岭的四姨太。四姨太死后没有当即发丧，而是在楼上放了五年多才发的丧。丧局也是比较大的，但比起胡万岭的丧局来只不过是小儿见大巫了。

胡万岭的家产在四姨太死后被儿孙们瓜分了。到了文革期间，四姨太的坟被掘了出来，但并未发现任何珍奇的随葬品。胡万岭家中如此富有，为什么四姨太却没珍奇的殉葬品呢？这也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杨元一，阳谷县郭屯乡杨庄人。曾就读于安乐镇高中。）

胡万岭发丧不是小乾坤

陈清林

这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音乐声此起彼伏，场院里、街道上到处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说书的、唱戏的、拉车的、挑担的、赌钱的、卖艺的、听吹的、看唱的、逃荒的、要饭的，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娃娃，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汇集在这里尽情地享乐。这里本不是闹市，但胜似闹市。这种异常繁华的热闹场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在何方？此处正是民国年间阳谷县安乐镇胡楼村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地主、大资本家胡万岭的儿孙们在为胡万岭大办丧事。人们都说，胡万岭发丧不是小玩艺。关于他的丧事，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胡万岭，家大业大势力大，十里八乡都知道他。他发丧不是小玩艺，挥霍的钱财大如海。大炮隆隆响，两台大戏对着唱。有舟阁台阁和响器，陵响架鼓当领航。和尚道士和打手，威风凛凛在两旁。白洋布灵棚二里地，从家搭到陵墓上。地上铺的是绸缎，拉布的骡马累断肠。劳动人民累折腰，地主老财把钱烧。说大书，唱大戏，放大炮，吃酒席，挥霍浪费还有余的。余的钱买了两屋油，大火烧了五里地。这就是胡万岭的发丧旧礼俗，金银财宝如粪泥，全是剥削人民的。

（陈清林，阳谷县安乐镇大申庄人，现在七级镇政府工作。）